龟岸英

金振林 著

K827=7
M336J

33987

研究所
藏書

金岳霖

金振林著

人民出版社

XWTS 0024899

责任编辑：晓　白
装帧设计：王小明
版式设计：萧　琴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毛岸英/金振林著
MAO AN YING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0
ISBN 7-01-001824-3

Ⅰ.毛…
Ⅱ.金…
Ⅲ.毛岸英—传记
Ⅳ.K827.7

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北京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3年12月第1版　1993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11印张　6插页
字数：260千字　印数：00001—30500册
定价：9.80元

毛岸英(1950 年春)

新发现的杨开慧手迹

幼时与母亲杨开慧
和弟弟毛岸青
在上海合影(1924 年)

在上海大同幼稚园，第二排左一为
毛岸英、右一为毛岸青（1931 年春）

李杜将军的出国护照，右上为毛岸英
右下为毛岸青（1936 年 6 月）

在苏联莫斯科第一国际儿童院（1937年春）

与毛岸青在儿童院合影（1937年）

与儿童院的中国少年合影，后排左起：
毛岸英、蔡博、刘允斌、郭志成

儿童院青少年进行军事训练，左一为毛岸英

在依万诺沃第一国际儿童院，正中间为毛岸英
第三排左一为韩铁声（伊万诺维奇）老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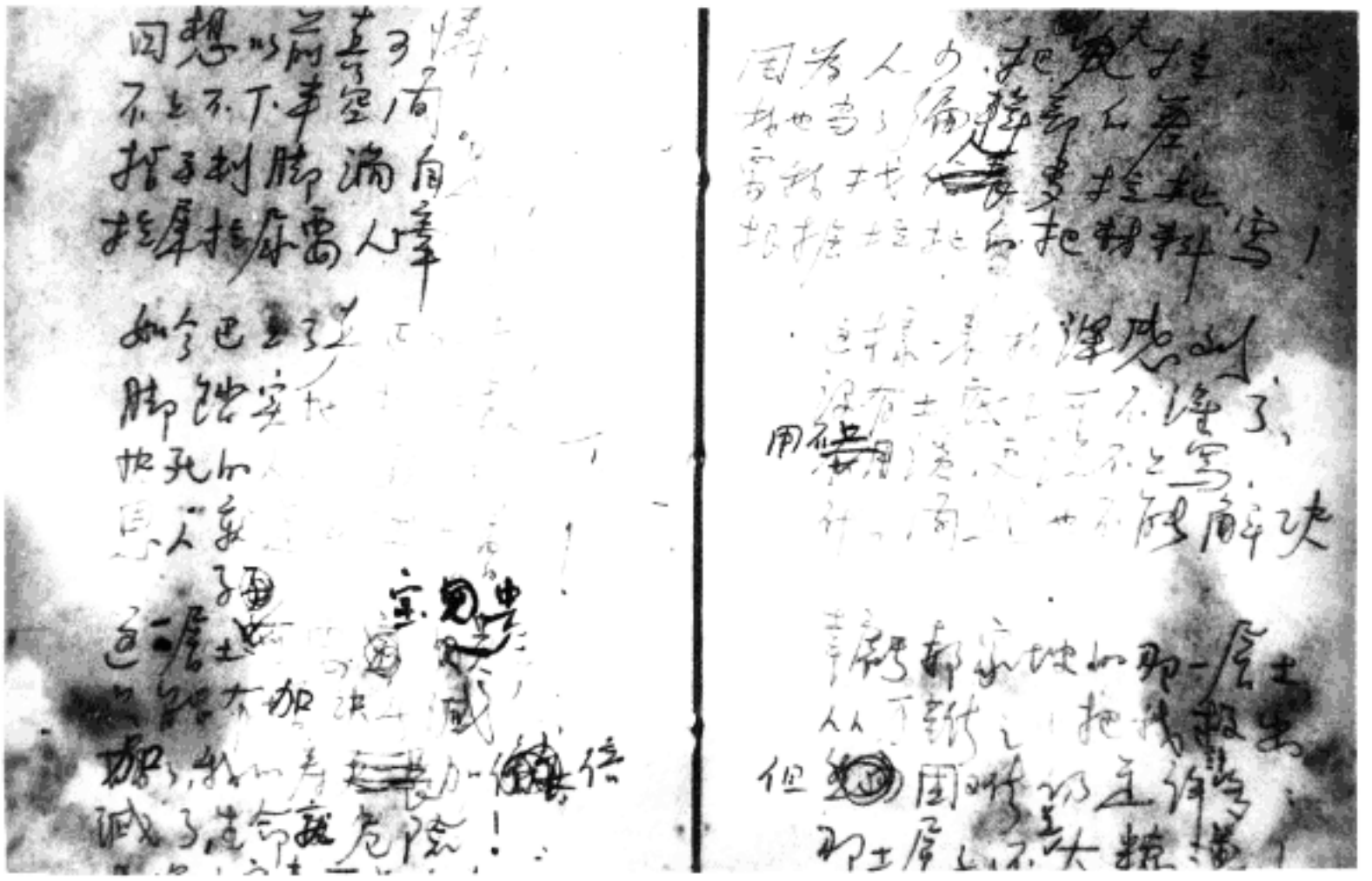
与儿童院的中外青年合影，后排左二为毛岸英

在延安(1946年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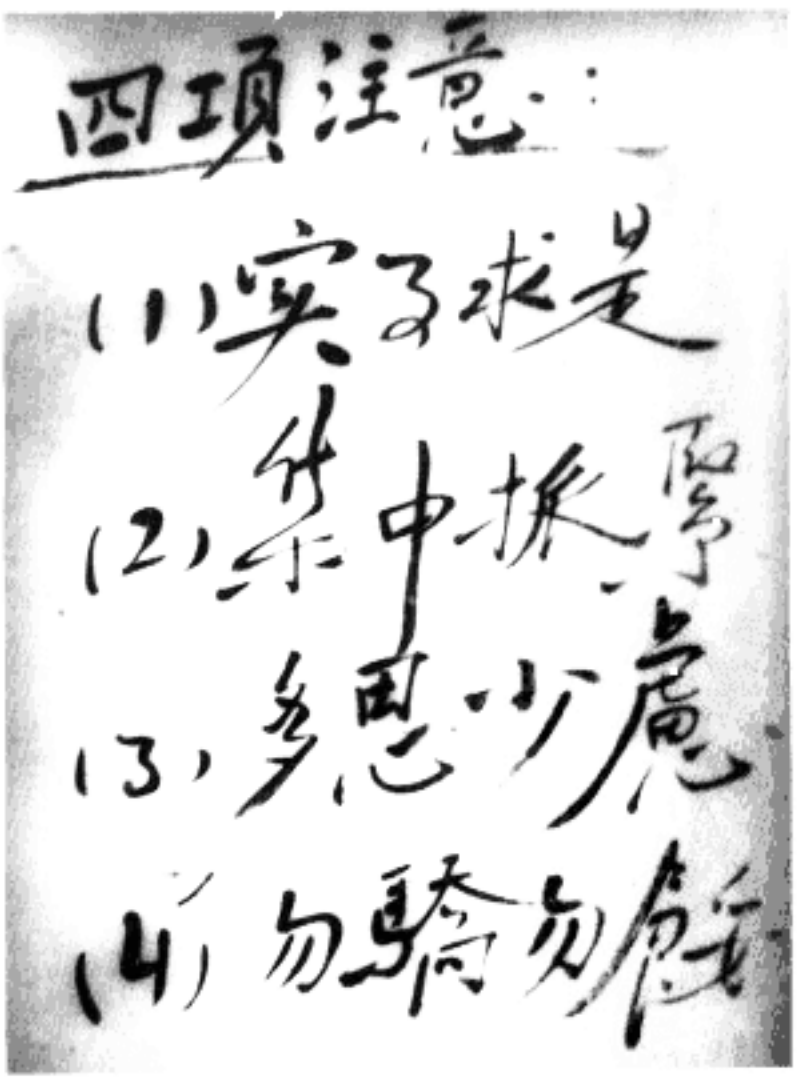
与土改工作团的同志们
在山东渤海何家坊
(1948年5月)

与父亲在延安王家坪(1946 年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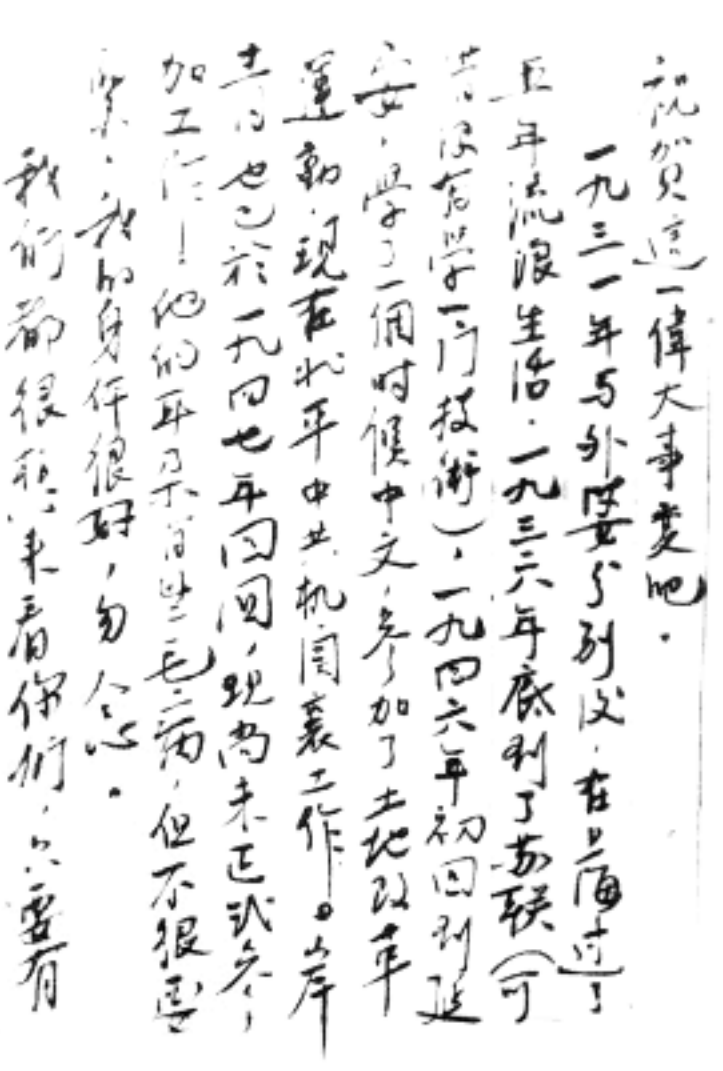
与父亲在北京(1949 年秋)



在山西临县郝家坡搞土改时的笔记（1947 年夏）



在山东渤海搞土改时的笔记（1948 年）



写给外婆的长信（1949 年 8 月）

在长沙（1950年5月）

在韶山旧居前
（1950年6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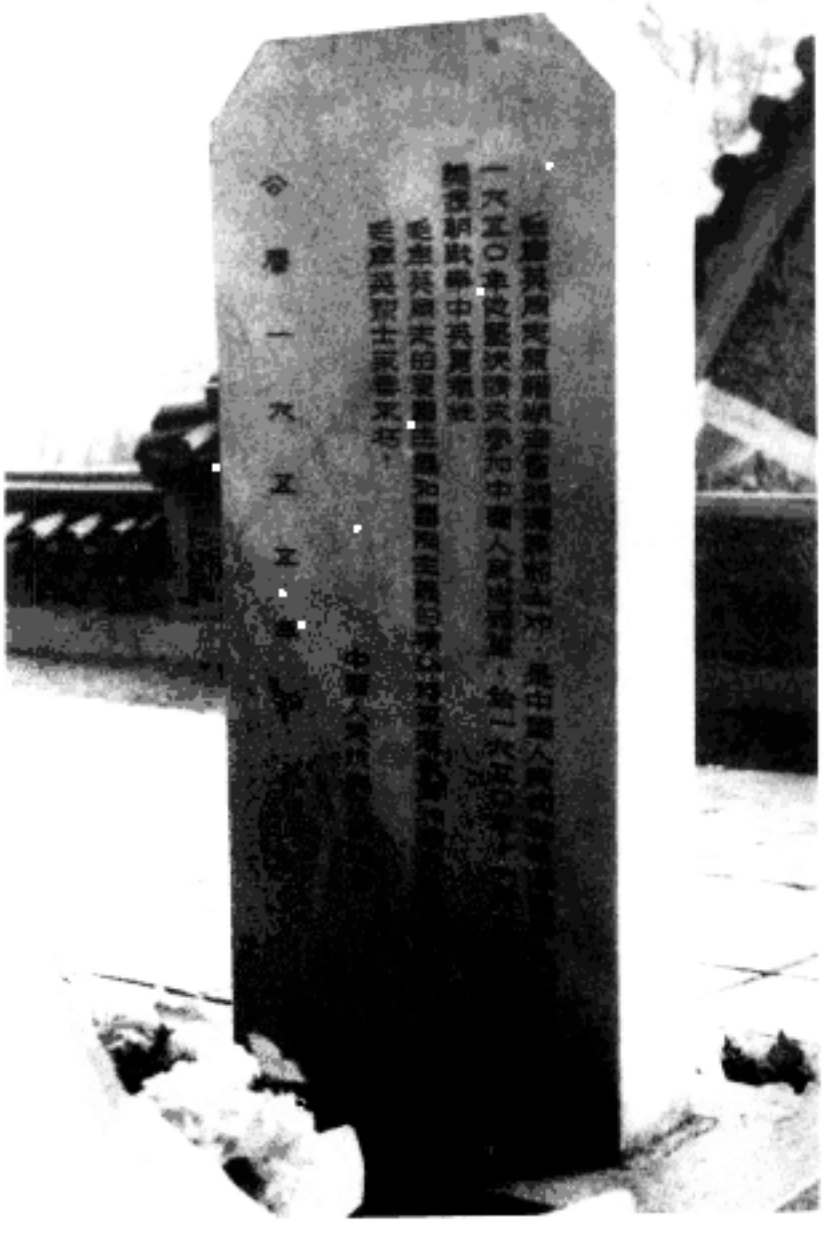
与韶山农民座谈
（1950年6月）

与父亲及刘松林(思齐)、李讷在北京香山(1949 年)

参加志愿军出国前夕

后排左二为毛岸英(1950 年 10 月)

长眠于朝鲜平安南道桧仓志愿军烈士陵园



毛岸英烈士墓碑志

目 录

引子 1

第一部 童年·恶梦 5

第二部 少年·立志 95

第三部 扎根·成长 173

第四部 恋爱·婚姻 265

第五部 激情·壮烈 305

尾声 334

附:毛岸英生平大事记 347

引　子

毛岸英，一个响亮的名字，一个光辉的名字！可惜，他的生命太短暂了，在这个世界上，他仅仅活了28个春秋。

有人问我：你为什么要为毛岸英立传？他既不是大人物，也不是历史上、党史上的名人，给他宣传，有什么意义呢？是上级交给的任务吗？不是；是为了名，为了利？不是！要说“名”，像我这把年纪的人，已经看得十分淡泊了，何况我已有300万字的15本大小著作摆在书架上，在中国文坛，可说“小有名气”吧？我用不着借名人抬高自己，或以名人的光辉来涂抹自己；是为“利”？在当前市场经济发育发展的初级阶段，“爬格子”发财致富的能有几人？有谁愿意付出20年的代价，走遍全国，寻访200余人，通读2000万字材料，去写一本二三十万字的纪实作品？有谁为了这本册子呕心沥血，以致于在初稿封笔那天，突发重病，差点去见马克思而又差一点见不到这本书的出版？名耶？利耶？非也！

那么，或者你是毛氏的至亲好友了？否！我这个江苏人，与韶山的毛氏家族毫无干系。1950年10月24日，毛岸英牺牲的时候，我还是个系着红领巾的农村小学生，我跟毛氏家族不搭界，既无血缘关系，也无地缘关系。

但是，有人问我：你为什么要耗费那么多心血，去写毛岸英呢？

一言以蔽之：因为他是毛泽东的儿子！

毛泽东，在中国现代当代和历史上是个叱咤风云的举足轻重的人物，可以说，因为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而改写了中国历史，甚至改写了世界近代史。他的伟大的辉煌的一生，震撼了全世界，无论是他的朋友还是过去的敌人，都不能不承认，毛泽东是一代伟人，在中国历史上“数风流人物”，首推毛泽东！

有关毛泽东的书，成千上万。人们大多数只知道他的幸运的光辉灿烂的一面，而很少了解他的家庭的不幸的悲剧性的一面。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毛泽东一家牺牲了6位亲人，而他的故乡韶山一带，牺牲了1000多人，连他的“亲爱的夫人”杨开慧的家乡板仓，也有400多人为革命流尽了鲜血！

而毛岸英，因为他是毛泽东的儿子，在他很小的时候，就要随父母颠沛流离，就要跟妈妈一同坐牢，就要远离故土、亲人，去过流浪生涯；就要远离祖国，在异国他乡生活10年；因为他是毛泽东的儿子，就不能有特权，就要到最艰险的地方去，就要严格要求自己；也因为他是毛泽东的儿子，英年早逝……可以说，因为他是毛泽东的儿子，不仅没沾毛泽东的光，反而为此付出了代价，乃至牺牲了生命！

然而，毛岸英并不因为他是毛泽东的儿子，他就没有个性，相反地，他的个性非常突出。由于特殊的历史、人文、地理、政治环境促使毛岸英有一段特殊的非同常人的遭遇，这就造就了他的善良、刚毅、旷达、热情、正直、勇敢的性格。在他身上，有他崇敬的父亲毛泽东的缩影，有中国革命血与火的烙印。

凡此种种，造就了毛岸英平凡的值得人们学习的人生。他那无愧于领袖儿子的身份是闪闪发光的。写他的一生，反映了人民领袖

风范的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作风的一个侧面。这种作风，曾经是它取得政权、获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

现在，人们提起“高干子弟”就带有几分贬意。要说“高干子弟”，那么，毛岸英可算是中国第一号“高干子弟”了，可是，毛岸英是怎样对待这个敏感问题的呢？

我有幸看到他的亲笔，他这样写道：

“这一两天，心里很不平静，它是由于我的社会地位与本身实质之间的矛盾上，前者是‘好得很’，后者是‘糟得很’。”

“我从不希望由于我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儿子，而受到特殊照顾，被‘另眼看待’。”

所以，熟悉和研究毛岸英成长的道路，对现代以及未来的青少年，决不仅仅是讲一个人的故事而已。

长久以来，毛岸英的形象总在我的脑海中萦回，挥之不去。1992 年 10 月 24 日，我站在五岳独秀的南岳衡山磨镜台宾馆四号楼 405 房间的阳台上，放眼远眺，只见秋阳融融，青山满目，看白云之飘飘，听松涛之萧萧，聆山泉之呜咽，念天地之悠悠，思岸英之悲烈，独怆然而涕下……

因此，适逢毛岸英诞生七十周年那天，我心血来潮，灵感迸发，文思如泉涌，一种责任感和负债感，驱使我迫不及待地写下去，写下去……

第 一 部

童年·恶梦

童年，对于人们来讲是金色、是童话，伴随着它的是美好、是幸福。可是缠绕着杨开慧心头最厉害的不是死神的到来，而是“我的小孩，我有点可怜他们！”怎样才能使他们“在温暖的春天里自然生长，而不至受狂风暴雨的侵袭！”不幸的是，母亲的担心后来变为现实……

童年，对于毛岸英兄弟来讲，简直是一场恶梦……

因为他是毛泽东的儿子，便吃百家饭，走万里路，随父母奔波……五岁便走了半个中国

1930年10月24日，是毛岸英的8岁生日。

头天傍晚，岸英背着妈妈杨开慧给他缝制的土布书包，从板仓村口的杨公庙小学放学归来。在晚秋的夕照下，他从山坡上边走边捡一些枯枝干柴，带回去给孙嫂烧锅做饭用。回到家里——应该说，这是他外婆杨老太太家，他三兄弟和母亲及保姆孙嫂仅是在这里借住罢了——岸英很有礼貌地喊一声外婆、妈妈，然后把书包往桌上一丢，飞也似的正要出去跟小朋友们玩耍，可是没跑出多远，就被妈妈叫住了。

杨开慧取出一件新做的青布长衫，朝他笑道："岸英，你知道明天是什么日子吗？"

岸英愣愣地望着妈妈手中的长衫，摇摇头。

"你要长尾巴啦！"孙嫂插话道。

"长尾巴？没有啊！"岸英调皮地在屁股后头摸了摸，故作正经地说。比他小11个月的岸青学着哥哥的样子，先在自己屁股后边摸，再摸岸英的屁股，那个只有3岁半的老三岸龙，也学两个哥哥的样，在岸英、岸青的屁股上乱摸，天真地嚷嚷着："噢，长尾巴了，长尾巴了！"三兄弟你扯我拉，缠成一团，开慧会心地笑了，看着孩子们在一天天成长、懂事，是她心灵最大的慰藉。

"明天是你的8岁生日，懂吗？"孙嫂指着岸英说："又长一岁

啦，懂吗？尾巴又长了一节！”

“我懂！妈妈明年有30岁了，有30节尾巴。孙嫂40岁，有40节尾巴！”岸英刚讲完，岸青岸龙更是闹成一堆，似懂非懂地嚷嚷着：“噢，妈妈有30个尾巴，孙嫂有40个尾巴！”

开慧和孙嫂相视一笑。开慧要他们到外面禾场上玩去，孙嫂张开两只大手，赶鸭子下水似的把三兄弟哄出横屋，孩子们又在天井里绕着那棵正在落叶的桃树你追我打。

横屋里静了下来，孙嫂神秘地朝屋外张望了一番，然后悄悄地喊开慧的小名，说：“霞姑，有个贩罐的人好奇怪，一整天都在我们家前前后后转来转去，贼眉贼眼的，不像个好家伙。”

开慧刚才脸上的笑意全部收敛，两只机敏的黑眸子转了几转，详细询问孙嫂那人的装束模样，孙嫂一五一十地说完，开慧抿着厚嘴唇，颔首道：“会不会是乡里那个余连珊，他在范瑾熙手下当了一名铲共义勇队员，从小就不务正业。”

“霞姑，那范瑾熙你也记得？”孙嫂忐忑不安地问。

“他是板仓人，从小就认得，走的不是一条道。他现在是何键办的国术训练班教官。”开慧觉得没必要跟孙嫂谈这些，以免孙嫂为她担心，递了一块银元对孙嫂说：“你到铺子里割斤把肉，买些油豆腐，明天是岸英的生日，他跟他爹一样，喜欢吃红烧肉，回来再炒些新上市的花生，岸英喜欢吃的。”孙嫂刚提着一只小竹篮出门，岸英就转了回来，扑在开慧膝头上，装成很懂事的样子说：“妈妈，我放学走到棉花坡，碰到一个旧货佬，他问我是不是霞姑的大儿子？问妈妈在屋里搞么子？”

开慧一把将岸英扶起，严肃追问他：“么子样的打扮？”岸英把情况一讲，开慧连忙打发他出去看好门，自己若有所思地从横屋走到卧室，关上门。她的脑海很乱。她轻轻地咬了咬丰腴的下唇，眨

了眨眼睛，泪水不禁在眼圈里打滚，……过了一会，她揉了揉泪眼，不愿叫孩子们看到自己在掉泪，轻轻地走到门口，抚视着正在天井里玩耍的亲生骨肉，不禁又感慨万端：为了革命，为了毛泽东追求的事业，这三个孩子也跟着父母吃尽了苦头，到处漂泊，颠沛劳顿，几乎走遍江南大半个中国。孩子啊！你们真是生不逢时，父亲不能关照你们了，作娘的大概也管不了你们多少日子了！想到这里，她的思绪一时飞到了与毛泽东结婚后，她以及孩子们和毛泽东度过的那段甜蜜而又酸楚的生活……

杨开慧出生在长沙县东乡板仓一个书香之家。父亲杨昌济（怀中）是毛泽东的老师，而毛泽东又是杨先生最器重、最欣赏的学生之一。由于毛泽东和父亲的师生关系，杨开慧和他早在1913年就相识了。毛泽东比杨开慧大8岁，她对他十分钦佩，开始时像对大哥哥一样敬仰。1918年，杨先生受聘到北京大学教授伦理学，与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等为同事。这样杨开慧全家便随父亲迁居北京。这期间，毛泽东曾两次到北京（第一次是为组织赴法勤工俭学；第二次是率驱逐军阀张敬尧的代表团到北京请愿）。他经常到杨家，有时就住在杨家。在接触中，他们两人的关系越来越亲密，情愫渐生。

1920年1月17日，杨昌济先生病逝，杨开慧全家护送灵柩回长沙。此后，她跟毛主席更是朝夕相处，情投意合，支持毛泽东的革命活动。

当时，毛泽东正在长沙筹办文化书社，杨开慧得知他正急需钱用，就动员母亲把那笔奠仪费拿出来，给毛泽东办事业。杨老太太一时舍不得。这笔奠仪费是杨先生逝世后为解决杨先生身后家属的生活困难，由蔡元培等人发起，朋友们纷纷解囊而募集来的。杨

先生去逝，杨家失去了主心骨，经济上也少了进项，杨老太太还要抚养两个孩子（开智、开慧），寡母孤儿，今后的日子是艰难的呀！所以，开初杨老太太不同意，可是，经不住杨开慧的反复劝说，杨老太太还是把400块大洋的奠仪费交给了毛泽东作革命活动的经费。

他俩人的感情越来越炽烈。1920年冬天，毛泽东便决定和杨开慧结婚。婚礼是在南门妙高峰下的一座小楼举行的，晚上夫妻双双回到船山学社毛泽东的卧房兼办公室。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不久，俩人搬到长沙郊外的清水塘22号居住。那时候，清水塘一片荒芜，枯树、菜畦、古井、坟堆……毛泽东夫妇住的那幢房子在一口大塘边，屋旁长着一棵柳树。作为新居的屋内，仅有借来的一张床和一张不大的书桌。毛泽东就在这一灯如豆的光线下，常常为党工作到深夜。此时，他担任着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清水塘22号也就成了湖南革命斗争的指挥部。就在这时候，杨开慧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了掩护毛泽东的革命活动，杨开慧把母亲接了来一起住，自己则担任了湘区党委的机要交通工作。平时还要为毛泽东抄抄写写，她真正成为毛泽东的“贤内助”。

转眼间，到了1922年秋天。杨开慧身怀的头胎已经足月了，可到了10月下旬，预产期早过了，她还挺着大肚子，迟迟不见生产的迹象。

从10月6日起，是毛泽东最繁忙的、最紧张的时期。他正领导长沙泥木工人举行声势浩大的罢工斗争，有时忙得连饭都顾不上吃，每天回家也很晚。

杨开慧虽然不愿打扰他，可是，这是头一胎，未免有些紧张、害怕、发愁。母亲和一些老人劝她多活动活动，说这样或许能生得快一些，顺利一些。在大家的催促下，也为了安慰妻子那颗不安的心，毛泽东在百忙中抽出一点时间，陪着妻子过湘江，到河西岳麓山秋

游。杨开慧平素不爱活动，现在又拖着很重的身子，他们只能慢慢地散着步。一会儿，在青枫峡口的爱晚亭，欣赏“枫叶红于二月花”的秋色；一会儿，又走到云麓宫，站在高处，远眺长沙城全貌……

这一着还真奏效。散步回来后不久，杨开慧便发作，赶忙送到湘雅医院，10 月 24 日早晨，一个白白胖胖的儿子降生了。就在儿子出生这天，毛泽东作为泥木工人的首席代表，同反动军阀赵恒惕谈判，进行着说理斗争，在毛泽东等代表据理力争下，湖南省政府被迫接受了泥木工人的要求，罢工取得了胜利。这对毛泽东来讲，可谓“双喜临门”。看着新出世的儿子，刚刚当了父母的毛泽东杨开慧，高兴得嘴都合不拢了。杨老太太煮了几箩筐鸡蛋染成红色，凡是来“看产妇”的人，都给“喜蛋”……

毛泽东为儿子起了一个既响亮又雅致的名字：岸英。

毛岸英出生在一个革命者的家庭。然而在反动军阀统治下的中国，革命者的生活是动荡不安的，他的家，他的子女也要跟着过动荡不安的生活。还不到两岁，毛岸英就随着父母到处奔波。

1923 年 4 月，湖南军阀赵恒惕下令通缉毛泽东，毛泽东被迫离开长沙。此时，杨开慧又怀着第二个孩子，况且岸英也才半岁，她不能随夫远去，毛泽东不得不只身去了上海。婚后的第一次别离，平添了毛泽东许多愁绪，那种依依惜别的感情是难以言喻的。他写下了《贺新郎》一词，向杨开慧倾诉：

……

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凭割断愁思恨绪。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

1923 年年中，毛泽东到广州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

表大会。会上，他被选为党中央领导成员。1924年1月，他又参加国民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又当选为国民党的中央候补委员。会后不久，他被国民党中央委派到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就在这年夏天，杨开慧和母亲一起，带着岸英和刚刚出生不久的岸青来到上海。毛泽东亲自到码头迎候他们母子。父母结束了两地生活，幼小的孩子却开始不停地迁移生活，直到大革命失败。

在上海期间，毛泽东的工作非常忙，无暇照顾孩子们。杨开慧虽然没有在党内党外担当什么具体任务，主要是协助毛泽东工作，收集整理资料、文件，因而，她也很忙。她要一面工作，一面带孩子，经常是把摇篮放在桌子旁，手上办公，脚下蹬着摇篮哄着孩子，休息时还要洗尿布。

当时，担任党中央妇女部长的向警予就住在毛泽东夫妇的楼上，她是蔡和森的妻子。蔡和森和毛泽东是第一师范时的同学，和毛泽东一样，他也是杨开慧父亲的得意门生，杨开慧和他们的关系很密切，因此，她也参加有关妇女问题的会议，协助向警予工作。杨开慧还经常到工人夜校讲课，有时每周讲二三次。工人们听不懂她的湖南话，她就耐心地反复讲，一直到人们听懂为止。

在上海住了半年多，到年底，毛泽东身体不好，于是，他向党中央请了假，带着全家一起回韶山老家养病。一家人从上海动身，乘船、坐车、步行，回到韶山时已是1925年的旧历正月十四日了。自从和毛泽东结婚以来，杨开慧这还是第一次回韶山丈夫家，更不用说，岸英、岸青也是头一次回老家。岸英两岁多了，已经会走路了，岸青还要妈妈抱着。

在家乡的这些日子，毛泽东一方面养病，更重要的是搞农村调查，发动农民群众起来闹革命。有时，他带着杨开慧到四乡去走亲访友；有时，邀乡亲们到家里谈天说地。虽然，毛泽东离家这么多年

了，但他没有忘记乡间的风俗人情，对待乡亲们非常随和亲热。乡亲们听说毛泽东夫妇回来了，也都纷纷到他家里来看望他们，乡间的事情都愿和毛泽东杨开慧讲一讲。当时，乡间流行着一种叫“打木脑壳”的木牌游戏，也盛行打麻将牌，事情不多时，毛泽东和杨开慧就同大家一起玩，人来的多时，就多设几桌。凡是遇到这种情况时，毛泽东和杨开慧总是嘱咐四嫂（毛泽东弟弟毛泽民的夫人）多煮点饭，多称点肉回来，多做点菜，让来玩牌人一道吃饭。

白天如此，晚上恰是毛泽东杨开慧忙的时候。有时只能睡个把钟头，再忙一点，甚至通宵不能休息。

毛泽东、杨开慧的努力很快就有了成果。到了1925年的6月间，韶山农民“雪耻会”（秘密农会）在上屋场正式成立，会员很快发展到300多人。不久，秘密农会在湘潭县的20多个乡中纷纷建立起来。农民运动的发展，使毛泽东和杨开慧两人更忙了，每天白天都要四处奔走，少则几十里，多则上百里，晚上回来还要办公、开会。

俩人忙得根本顾不上年幼的岸英和岸青。为了照顾孩子和家里，除了托付给四嫂外，还请了一个人专门煮饭，实际是帮寄信、取报纸的通讯员。每天，当她去买菜时，毛泽东便把一大札写好的信件交她带到银田寺寄出，然后把报纸和寄给毛泽东的信件捎回来，捎回来的信和报也总是一大捆。这些信报，毛泽东再忙也是必看的。他把两张桌子拼起来，一边放一盏煤油灯，把报纸摊开来仔细认真地阅读。而杨开慧更多是到设在“毛氏宗祠”、“毛震公祠”、“李家祠堂”的农民夜校去讲课，启发农民的觉悟。

农民发动起来了，在农民运动中，涌现了一批农民运动的骨干。毛泽东和杨开慧抓住时机，很快地在农民骨干中发展了一批党员，紧接着在韶山建立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秘密支部。

毛泽东和杨开慧回乡不到半年，韶山以至湘潭县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又引起了反动派的恐慌和不安。军阀赵恒惕再次下令通缉捉拿毛泽东。在群众的掩护下，毛泽东安然脱险，然而，韶山是待不下去了。7月份毛泽东一个人先去了广州，在当时那里是国民革命的大本营。10月，杨开慧和母亲一起又带着岸英、岸青赶到广州找到毛泽东。这时岸英刚满3岁。他们全家住在广州的东山庙前西街，和沈雁冰（茅盾）、萧楚女、张秋人等人是邻居。

毛岸英随父母在广州住了一年多。算起来，这是他出生到现在，住得时间最长的地方了。然而，就是在这种相对稳定的生活中，岸英也不能同父母共享家庭的天伦之乐。这一年中，父亲毛泽东的工作更为繁忙，他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的职务，同时还主编国民党中央机关报《政治周报》。从1926年5月起，他又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而母亲，不但要为父亲担任助手和联络交通工作，还要抽出时间到中央政治讲习班去听课。作为毛泽东的交通员，杨开慧频繁地与周恩来、邓仲夏、恽代英、林伯渠、李富春等党的负责同志接触、联系。

北伐战争开始后，进展非常顺利，8月下旬，盘踞在湖南的大大小小军阀都被打垮了，北伐军在湖南战场取得了彻底胜利。在北伐战争的胜利推动下，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民运动迅速发展起来。湖南是毛泽东的家乡，而毛泽东此时又担任了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的书记，他们全家怎能不为这大好的革命形势而欢欣鼓舞呢！在这样的情况下，1926年11月，杨开慧携同母亲带着毛岸英先期回到长沙。没过多久，毛泽东也回到了长沙，一家人住进了望麓园的一所房子里。

这次回长沙，实际上只住了很短的时间。从毛泽东来讲，主要是为了考察湖南的农民运动，目的是为了收集第一手材料，用以答

复党内党外的一些人对于农民运动的责难。农民革命起来了，要推翻几千年来压在自己身上的大山，求解放了。这可不得了，什么“糟得很呀！”、“痞子运动”呀！这些攻击如果单纯出自绅士阶级也就罢了，可是，农民运动领导者——中国共产党内部，意见也不统一，一些人为反动派的言论所吓倒，不但不敢理直气壮地支持已经起来的农民斗争，为了迁就右派而宁愿抛弃农民这个最主要的同盟者。

为了证实蓬勃兴起的农民运动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毛泽东从1927年1月4日到2月5日，在湖南的五个县做了32天的调查，收集了大量的材料。杨开慧帮助毛泽东把调查来的材料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后来，毛泽东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这里面融会着杨开慧的多少心血啊！

调查刚告一段落，报告还没来得及写成，毛泽东又匆匆地走了。这次是北上到武昌，他要赶到那里筹备并主持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在武昌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计划是他提出来的，为的是培训农民运动的骨干和领导者。毛泽东一走，杨开慧也得走。自然，岸英、岸青又要随父母走了。一家人由长沙的望麓园又迁居到武昌都府堤41号。

从岸英出生以来，毛泽东一家就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居无长所，没有一个像样的家，因此，日子过得相当艰苦。因为经常要搬家，多则一年半载，少则两三个月，就连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都很简单。毛泽东只有一件白衬衣，要出门就不能洗，洗了就没有替换的。杨开慧也仅有一件灰不灰、红不红的格子旗袍，其他衣服也很少。大人况且如此，孩子就更不用说，几乎是一无所有。

到武昌后不久，阴历的三月初三，杨开慧又生下了第三个儿子毛岸龙。毛泽东到医院看望妻子和新生的儿子。他抱着肉嘟嘟婴儿，左看看，右瞧瞧，看着刚出生的婴儿的那付模样，开玩笑地说，

我的伢子怎么这个样子，冇（湖南的地方方言，即不是、没有的意思）哪个换了我的伢子去吧？逗得大家都笑了。杨开慧生下岸龙，身体非常虚弱，保姆孙嫂要给单独做有营养的饭菜，杨开慧坚决不肯，仍和全家一起过着清苦的生活。

……

想着、想着，她的思路突然中断了，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马上处理。她转身又走进卧室，再次把门关好，从抽屉里取出一叠用毛边纸写的诗文，一件件地审视着。

当她看到《偶感》这首诗时，情不自禁地轻轻地念了起来：

天阴起朔风，浓寒入肌骨。
念兹远行人，平波突起伏。
足疾已否痊？寒衣是否备？
孤眠谁爱护，是否亦凄苦。
书信不可通，欲问无人语。
恨无双飞翮，飞去见兹人。
兹人不得见，惆怅无已时。

念着、念着，她的思绪又飞到了3年前，毛泽东和她，和孩子们分别时的情景……

转眼间，他们全家又在武昌住了几个月了。在这几个月中，形势发生了急转直下的变化。先是蒋介石背叛了革命，勾结帝国主义、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上海搞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之后，汪精卫又搞了“七一五”“分共”，武汉地区的反动派叫嚣“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

武昌又住不下去了。为了不引起反动派的注意，这次迁居，毛泽东一家只好分开走。保姆孙嫂带着岸青先回湖南，直接来到杨开慧的老家板仓。过十几天，杨开慧的母亲带着岸英、岸龙也回来了。

最后回来的是毛泽东和杨开慧。毛泽东是在参加了“八七”会议后，作为党中央的特派员到湖南的，他的任务是改组湖南省委，筹备和领导秋收起义。回到长沙后，毛泽东和杨开慧先住到北门外的沈家大屋。后来由于形势严峻，工作紧张，人多了极不安全，杨开慧便回板仓了。

1927年的8、9月间。长沙。马日事变① 后，街头仍被白色恐怖笼罩着。八角亭、南门口一带是往日最繁华的商业区，而现在一到太阳傍西，绸布庄、百货店等等店铺便关门闭市；小吴门、浏阳门这几座城门要地更是早早地关了门，用重兵把守着，不准老百姓接近。长沙的8月，本来是一年内最酷热的时节。往年，市民们一到夜晚就在街头路边仰叉而躺，无力地拍打着蒲扇，一直要睡到第二天的清晨。然而，今年的8月，即便是最酷热难熬，人们也不敢露宿街头了，而是早早地蜷曲在低矮的棚屋内，忍受着燥热闷气，胆子小的连气都不敢大声出，胆子大点的，也只能窃窃私议。整个长沙城一片死寂气氛。早上，住在城里的老百姓总能听见凄厉的号哨声，总看得见一队荷枪实弹的士兵，押着一个个瘦骨嶙峋、被折磨得不成人样的“囚犯”，沿着石板路，出浏阳门，到荒郊野外去枪杀。湘江里不时漂着被杀害的革命者的遗体。白色恐怖笼罩着长沙，笼罩着湖南，笼罩着全中国。

9月初的一天下午，从长沙北站开出一列火车，气笛一声长

---

① 马日事变——1927年5月21日（即马日），反动军官许克祥在长沙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史称“马日事变”。

鸣，向北徐徐驶去。火车的前半部是几节车厢，是乘人的客车，后半部挂的是货车。在前边一节客车车厢里，靠窗口坐着一位商人打扮的中年人，看上去有三十四五岁的样子。他伟岸英俊、气宇轩昂，宽阔的前额闪闪发亮，只在眉宇间时时隐现着的川字纹，显示着他焦急、忧心。他不说话，只是沉思、冥想。他身穿一件绸长褂，手里拿着一顶浅灰色礼帽，不时地当作扇子那样扇动着，以驱赶着暑气。有时，看见有军警走进车间厢，他便把礼帽戴在头上，帽沿直压到眉毛，把身子扭向车窗，脸朝向窗外……

列车驶进了一个小车站，刚一停稳，中年人便下了车，随着零零散散的人们走出了车站。一出站，便见到一个农民打扮的青年人，在他的暗示下，中年人与他相隔不远，顺着一条朝东的大路径直走下去。

离小站很远了，他们走下大路，又踏上小路，在寂静无人的茶树林间穿行。半夜时分，两个人踏着星光，在狗吠声中走进板仓冲。两人约好了第二天启程的时间和暗号便分手了。中年人从长满茶仔树的山坡小路直插到板仓杨宅。

“润之，这么晚了，你怎么回来的呀！”门一打开，杨开慧便惊喜的问道。她赶紧把毛泽东迎进屋，接着把妈妈和孙嫂唤起来，忙呼着为毛泽东沏茶、热饭……

喝了一杯茶后，毛泽东把秘密藏在衣服里的党中央关于进行秋收起义的决议以及中共湖南省委决定由毛泽东去安源、平江、浏阳、醴陵等地领导秋收起义的决议给杨开慧看。她默默地读着文件，文静深沉的面庞越发显得严肃，一方面为党中央作出的武装反抗反动派的进攻而欢欣鼓舞，另一方面预感到他们这个家庭的生活又将要发生巨大的变化。

她轻轻地摇着蒲扇，为汗流浃背的毛泽东扇风解热，试探地问

着："住几天呀？"同时，双眸上下打量着心爱的人，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毛泽东讲，"离开才半个月，看你瘦了好多啊！"

毛泽东怕杨开慧难过，没有告诉她天亮前就要离开板仓，而是把话题引到孩子们身上。他从她的手中拿过扇子在岸英、岸青和出世不到半年的岸龙身上扇着，驱赶着花翅膀长脚蚊子。毛泽东在轰一只蚊子时，不小心碰着岸龙，他一下就惊醒了，哇哇地哭了起来。杨开慧怕把岸英和岸青也吵醒，马上把他抱了起来，一边拍一边哄着。可是，岸英、岸青还是醒了，看见爸爸在为他们扇扇子，一骨碌从床上爬起身，高兴地叫着："爸爸！爸爸！你回来啦！"毛泽东一手搂着一个，一边亲着，一边嘻笑着，爱抚着。

岸英机灵地从爸爸手中抢过大蒲扇，两只手抓着，对着爸爸使劲地扇着，嘴里还数着："一、二、三……"

"岸英，离开爸爸这些天，没有吵事吧？学了几个字呀？"

岸青抢着话题，"我懂、我懂。"接着就念起来："大羊跑，小羊跑，大羊跑上桥，黑狗跑来咬，大羊用角顶，黑狗跌下桥……"念着念着自己也哈哈哈地笑了起来，屋里充满天伦之乐，尤其是毛泽东暂时地忘却一切，笑得最响、最甜。

岸英看见弟弟出色的表演，也不甘示弱，"我会唱歌"，随即唱了起来："打倒土豪，打倒土豪，除军阀，除军阀……"

孙嫂给毛泽东端来一碗米粉，一碟子红辣椒，随即拉着岸英向杨母房里走去，边走边说："好孩子，快睡去吧，鸡都快叫三更啦！"

岸英极不情愿走着，恋恋不舍扭回头恳求地说道："爸爸你再不要走了，明天教我写毛笔字啊！"

爸爸点头微笑着，朝岸英努努嘴。岸英把两只小拇指放在嘴里，两个食指扒着眼皮，装着老虎样子吼了一声："啊……唔……"

毛泽东和杨开慧看着，都笑了。

吃完饭，毛泽东从杨开慧怀里接过岸龙，跟她拉着家常："时间过得真快呀！一转眼，岸英都5岁了。"她没作声，微微地点了点头。

"为了革命事业，这些孩子从小就吃百家饭，走万里路啊！"想到这里，毛泽东十分感慨地说。

杨开慧没有讲多少话，她是个内向的人，持重而又深沉。看到毛泽东的衣服划破了，她拿出针线，缝了起来。她知道毛泽东在等她表示态度，于是，一转话题说："你放心去吧！家里纵有千难万险，我也不会松肩的。"

毛泽东为有这样坚毅、勇敢、贤惠、善良的妻子而自豪，他感激地点了点头，然后说："不过，敌人越来越残忍了，'铲共义勇队'活动很猖狂，你要多加小心，平时要隐蔽好，孩子们……"不等他说完，杨开慧接过来说："只要我在，孩子不会吃苦的，即便我遭殃，孩子……"她不过是在安慰毛泽东那颗放不下的心。

咚！咚！咚！

有人在后门轻轻地敲了三下。这是暗号，地下交通员来接毛泽东上路了。

分别的时刻到了，毛泽东默默地与杨开慧相视片刻，随即走向岳母房里，留恋地看着已经睡了的岸英、岸青。杨开慧把手中的桐油灯递给毛泽东，他接过灯，照着岸英的脸看着，看着。突然，一颗珍珠大的泪滴，从岸英眼角滚了下来。他用温柔的大手，轻轻把岸英的泪珠抹掉，……显然，岸英并没睡着，他已经懂事了。

后门又敲响了三声。他向她无声地扬了扬手，开开门走了出去。她咬着嘴唇强忍着，慌忙从碗柜里拿出几个煮熟的鸡蛋，追了出去，塞在毛泽东手里。毛泽东又深情地望了她一眼，转身跟着交通员走上了山路。走着走着，他一次又一次地回首张望。

这是他最后一次到板仓，跟他心爱的人告别来的。可是，当时

谁又能想到，此后他俩再也没有见上面，这次竟是他们最后的诀别。

毛泽东走了，他肩负着党的重大使命，从这里走向湘东赣西，去领导了举世闻名的秋收起义。

当后门吱呀响了一声时，假装睡觉的毛岸英，再也忍耐不住了，他光着脚从竹床上跳了下来，奔向后门外，望着爸爸远去的方向大声哭喊着："爸爸，爸爸，你不要走！"

妈妈捂着他的小嘴巴，怜爱地说："岸英，轻一点呀，让人听见了不得了！爸爸过几天就会回来的。"她把岸英搂在怀里，安慰道："你是爸爸的好伢子，爸爸不喜欢流泪的伢子的，你要听话啊！"经妈妈这么一说，岸英真的忍住了眼泪，紧紧抱住了妈妈……

毛泽东与杨开慧分别后，后来形势越来越紧张，反动派到处抓人杀人。为了躲避敌人，杨开慧不得不带着孩子东躲西藏，在离板仓十多里的舅舅家住过一阵，又在姨妈家也住过一段……

不管是住在板仓，还是躲在亲戚家，每到一地，岸英常常跟着妈妈走亲访友。妈妈跟一些农民伯伯、叔叔、婶婶商量事情，他就机警地在门外放哨。他知道妈妈干的事，就是爸爸临走时交待过的替穷人办好事。板仓一带，在地下党的领导下，武装斗争也在暗中开展着，农民自卫军经常在夜间活动，教训那些专门欺压穷苦农民，帮助铲共义勇队的土豪劣绅。每当听说农民自卫军的行动取得胜利，岸英总是快活地拍着手，对妈妈说："土豪害怕了，土豪害怕了！"母子俩高兴地唱那支"打倒土豪，打倒土豪，除军阀……"的歌以示庆祝。更使岸英兴奋的是，这些胜利当中，有妈妈的功劳，是她发动群众起来斗争的。

最让杨开慧惦念的还是丈夫。开始毛泽东还能与杨开慧保持

着联系。在毛泽东领着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后，给杨开慧写了一封信，信中告诉她，由于条件十分艰苦，加上连日行军打仗，脚都烂了。信中还讲，部队到了井冈山以后，进行了休整。11月，革命军打下了茶陵县城，在那里成立了第一个苏维埃工农兵政府，主席是湖南攸县人，名叫谭震林。毛泽东在信中还讲，井冈山上气温很低，已到初冬时节，战士们仍穿着单衣……接到毛泽东的信后，杨开慧非常不安，惦念的心情加重了，于是，她提笔写了《偶感》这首诗……她只有在诗中抒发她对毛泽东的怀念之情。虽然，井冈山离板仓并不遥远，然而在当时的情况下，犹如隔着千山万水，要想见到亲人比登天还要难。杨开慧曾托地下党的交通员给毛泽东捎信，信上做了记号"×"代表安源，"O"代表着长沙，找不到人就把信烧掉。可是，随着井冈山的名声越来越大，敌人对井冈山的封锁越来越严密。几年来音信不通，杨开慧也只好把思念埋在心里，记录在诗句中。

杨开慧翻看着这一份份醮着血和爱心写下的诗、文，心里难过极了，她舍不得将诗文毁掉，相信有朝一日，这些诗文能送到毛泽东的手中。于是，她就用一块手帕将诗文包扎好，塞进屋后墙壁的砖缝中。再把墙缝掩盖好，不露一点痕迹①。早在前段时间，外面风声一紧张时，杨开慧就把一批有用的文件装在一个蓝花瓷坛子里，埋在离家不远的一处山脚边的地下深处②。而一些随时需要的重要材料，如湘阴、长沙、平江、浏阳、修水一带地下武装情况等密件，她都整理好，放在既顺手又保密的地方，有情况，马上销毁。

---

① 1982年杨开慧故居改建时，从后墙的砖缝中发现了这批珍贵的文物，共有手稿12页，4200余字，包括自传体无题散文一篇、诗两首、杂文两篇，还有没发出的信两封。

② 解放后，这批文件也被挖掘出来。

安排好了这一切后，似乎已做好了一切准备，她更加镇定自若了，现在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事了。然而，作为母亲，她唯一放不下的只有孩子，她心爱的岸英、岸青、岸龙……

岸英从5岁起就跟着妈妈学习。杨开慧教他念字、默写，教他写毛笔字。先临摹柳体字帖，渐渐地又要他每天写两个字，每个字写30遍。岸英写好了，妈妈总要先替他活动活动手指、手腕，然后，认真地批改，在写得好的字上用红笔画一个圈。每画一个圈，岸英总是兴奋地说："妈妈让我吃红鸡蛋了！"

7岁那年，岸英进了附近的杨公庙小学读书。由于妈妈的早期教育，岸英在班上不但学习好，品行也端正，老师喜欢，同学们都愿意跟他接近。

放学后，岸英把功课做完，便拿起砍柴刀，领着岸青跟孩子们一起到山上去砍柴。有时候他爬到树上掏鸟窝，有时他下到塘里捉泥鳅，搞得浑身上下像个泥猴子。每次，他把半小桶活蹦乱跳的泥鳅送回家时，总是嘱咐妈妈说："爸爸最喜欢吃泥鳅了，我们都不吃，把它晒干薰好留起来，等爸爸回来再吃……"

听着儿子这样贴心的话，杨开慧多么欣慰啊！岸英在板仓住了三年，和妈妈、弟弟们形影不离。杨开慧看着他一天天长大。明天就是岸英8岁生日了，他长成大伢子了，懂事了。

然而，这两天情况一直不妙。她不愿把这些事告诉杨老太太，怕老人家担惊受怕，孩子们还不懂事，跟孙嫂也不好谈这些，只是闷在心底，遥望东方，跟毛泽东心交神会。

这时，孙嫂急匆匆赶回来，把竹篮放在桌上，便惊慌地走到开慧身边，悄悄地说："我看到不少枪兵，在板仓四周转来转去，霞姑，你可要小心啊！"

开慧没吭气，脸色更加庄重、严峻，她准备迎接一场腥风血

雨！[1]

过生日是愉快的，然而，他的8岁生日，是和妈妈一起在敌人的监狱中度过的。

湖南深秋的晚上，太阳在5点多钟就落进西山肚里去了，留下的余辉也不长久，到了6点钟左右，天地间就模模糊糊混沌一片，人们在堂屋里点上油灯。孙嫂把油灯的玻璃罩在嘴里哈哈气，然后用毛草纸在罩子里转着擦着油污，嘴上留下一个黑圈。要在平时，看到孙嫂这付样子，开慧准笑出声来，可是，今晚秋风在屋顶和山坡上刮得呼呼叫，周围的气氛显得异常紧张，紧张得叫人有一种窒息的感觉，哪里还笑得出来。

“孙嫂，你快搞了饭给伢子们吃了好叫他们上床睡觉吧！”开慧心事重重，她要先安排下孩子，不让这些幼稚的洁白无暇的心灵上留下人生撕杀的痕迹。对于一个年轻的母亲来说，面临风险，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心头肉啊！

杨宅是个凹形的屋场，中间横屋是堂屋，右边那间是开慧跟孙嫂住的卧室，左边那间是杨老太太的卧室，也是开慧的生身之地。开慧打发家人上床睡觉后，便捡起一堆材料文件以及她平时写的一些诗文草稿，躲到卧室后边的厕所里，一页一页地放在火苗上，看着火舌舔着黄色的毛边纸，卷曲着变成黑色，变成灰烬……

---

① 本章材料来源于新发现的杨开慧手迹和毛泽民夫人王淑兰回忆，及作者两次采访孙嫂（陈玉英）的记录。

事情刚刚办完，就听到屋子外边杂沓的脚步声和强忍着的干咳声。不久，天井门被人强行推开，院子里有枪柄在砸东西的碰撞声，然后，是一阵死样的寂静。开慧从暗处可以看到薄暗微明处有一个大个子在指手划脚，侧门两边挨个儿排列着两列枪兵。

开慧索性和衣坐在床沿上，微微地扬起头。孙嫂刚躺进被窝，见她那样子，刚开口喊"霞姑，怎不睡？"就被开慧用柔软的右手捂在嘴巴上，孙嫂情知不妙，便低声耳语着："霞姑，会是来捉人的啵？你要设法逃呀！"

开慧镇静自若轻声细语："劫难到了，无处藏，无处逃，孙嫂，这三个伢子……"

孙嫂竟啜泣起来，找不出话来安慰开慧。

桌上的小闹钟一圈又一圈地转着，开慧的心在颤抖，血在奔流，她在想敌人这次为什么要下这么大的功夫要抓她，以往，也遇到过危险，但她都机敏地躲了过去，这一回来了这么多枪兵，房子被团团围住，有必要用这么多人对付老人、妇女、孩子？对，这是敌人在疯狂地报复，肯定是丈夫和红军又打了大胜仗，敌人对付不了毛泽东，只好在他的妻子和孩子身上施淫威。想到这里，她更加镇定了……此刻，似乎无所作为了，人，已经被团团围住，只有思想是自由的，可以海阔开空。

跟毛泽东失去联系两年多了，心里一直挂牵着，只从湖南《民国日报》、《晚晚报》等敌人报纸上，从字里行间偶然透露的信息中，略知毛泽东和红军的踪迹。

原先，敌人欣喜若狂地在报纸上大肆吹嘘"朱（德）、毛（泽东）匪部惨败溃逃，井冈山为我军全面收复"等等，过了一些日子，报上又出现了"长沙失陷，共匪占领长沙，何（键）省长幸免于难。""朱、

毛、彭(德怀)、黄(公略)四大寇围攻古城长沙。"在长沙北120里外的清泰乡板仓铺的杨开慧和她的战友们,受到莫大的鼓舞,湘阴、浏阳、平江、长沙边界的地下武装活动更加活跃。

红三军团攻占长沙,成了国内外的头条新闻,因为敌人报纸上不止十次地登载过:"匪首毛泽东在东固毙命","军息:匪酋朱德确实被打断右腿,朱、毛溃不成军……"然而,谎言毕竟是谎言。现在,又添了"彭"、"黄"二人。

1930年7、8月间,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的确占领了古城长沙。那次是因为何键①的部队去平江"剿匪",长沙一时成了一座空城,红军很快攻进城门,打开监狱,释放了几千被关押的工农革命分子,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

然而,红军两次打长沙,尤其是第一次攻进长沙城,敌人的确震惊不已,尤其何键更是咬牙切齿。头次打长沙,幸好他会泅水,从北门横渡湘江,逃窜银盆岭,保全了一条狗命,否则,给红军捉到后不千刀万剐才怪呢!这个刽子手从1927年5月21日"马日事变"起,杀了几万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光是杨开慧老家板仓一带,就有460多人死在他的手上,真是血债累累,罄竹难书。

后来红军撤退到江西中央苏区,长沙又成了何键的一统天下,冤狱遍地,民不聊生。何键和他的狗头军师们惊魂甫定,总结被红军破城的惨败教训,除了历数他的下属无能、友军不支持外,他这个刽子手突然想起了隐蔽在板仓乡下的毛泽东妻子杨开慧。"对,一定是这个共匪婆子当了内线。她藏在乡下,怎么两三年我都没发觉!"何键好像恍然大悟,把桌子一拍,吩咐他的国术(武术)训练班

---

① 何键——湖南西隆脑人,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军长,积极从事反共活动,策动部下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曾被国民政府任命为湖南省主席,1954年死于台湾。

教官、特务头子范瑾熙："你是板仓人，你一定要尽快把毛泽东的老婆捉拿归案，事成有赏，要是让她逃跑了，当心你的脑袋！"何键杀气腾腾地说。

于是，从10月4号，红军攻下吉安开始，范瑾熙就派暗探余连珊化妆成贩卖陶罐的小商人，在福临铺、清泰乡、板仓一带盯梢。

"嘭嘭嘭！嘭嘭嘭！"

有人急促地敲杨家的门。

又是一阵急迫的擂门声，有人喊话了："霞姑娘，快开门！"

杨母开门后，敌人责问："杨开慧在哪里？"不见开慧，他们又敲东边的门。

孙嫂喊了一声："你是哪个？"

此刻，开慧知道敌人已开始收网了，便向孙嫂点点头，示意她去开门。

门拴一拉开，两排端着枪的清乡队员便拥进卧房，在两边排开，门外横着一队士兵，横屋后门也被堵得死死的，山坡上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杀气腾腾，如临大敌。

弓着身子，走进来一个30多岁的大高个，他穿着武行便装，戴一付近视眼镜，进门先盯了一眼坐在书桌油灯旁的开慧，然后皮笑肉不笑地从鼻子里哼了一声。

"嗯，霞姑娘，你在屋里啊！"

开慧愤恨地盯了那人一眼，挖苦道："哈，原来是范瑾熙先生啊，你又立功啦！"

"谈不上，谈不上，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家乡人么！"范瑾熙用手点点架在鼻梁上的眼镜，掏出一支烟来，喷云吐雾。

这时，鹰嘴猴腮的余连珊挤进屋来，手里还提着一把烧开水的陶壶，穿一身叫化子式的衣裤，臭表功地说："霞姑娘，我早就盯上你啦，这两日弄得我饭也吃不上，坐在山里挨冻受饿！"

开慧挖苦道："这回你立头功，6 块薪水会翻几番罗！"

"少罗嗦，给我捆起来！"余连珊恶恨恨地对清乡队员们发号施令，几个枪兵忙从裤袋里掏出麻绳，要捆杨开慧。

开慧怒斥道："我是个 良家妇女，你们为么子事要捉起我们去啦？"

范瑾熙狰狞地一笑："没么子事，上头要问几句话，跟我们去一趟长沙。"

杨老太太扑到杨开慧身边，吼叫着："范瑾熙，你何解随便捉人？我家霞姑犯了么子罪？"

"毛泽东的堂客，坐探！"余连珊直通通地道出了真情。

"一人做事一人当，润之的事何解又牵到霞姑头上？你们还要株连九族不成？"杨老太太几乎是边哭边骂，护着女儿，不让匪兵绑她。

"杨家妈妈，不带霞姑回长沙，何省长那里我可交不了差啊！"范瑾熙装得很斯文。杨老太太吐口唾沫骂道："呸！哪个是你'妈妈'，你这个从小不务正业的范瑾熙，看你有好下场罗！"

人们争吵哭叫的当儿，跟外婆睡的岸英光着脚丫子，从外婆房里闯出来，一见那景况，不由分说双腿跪在妈妈脚边，脸蛋儿埋在妈妈的膝盖头，痛哭流涕："妈妈，我的好妈妈，我不让你走！"回过头，狠狠地盯着范瑾熙一伙凶神恶煞的坏蛋："你们害我妈妈，不得好死的！"

"嗬，毛泽东的小崽子，倒蛮凶的呀！好，给我一同绑起！"范瑾熙凶相毕露，手下人又七手八脚地要捆岸英。孙嫂不顾一切地把岸

英搂在怀里，范瑾熙冷笑道："好呀，一个老妈子佣人，对主子倒是忠心耿耿呀，来人！把她也给我捆起来！"可怜的孙嫂，被几个枪兵用麻绳捆得结结实实，和杨开慧一起都推到吃饭的横屋里，匪兵们从肩上卸下枪枝，似乎松了一口气，有的打哈欠，有的哼小调，有的发牢骚。

开慧、孙嫂被绑着坐在屋角边，岸英啜泣着搂着亲爱的妈妈，杨母和岸青、岸龙哭哭啼啼……哎，幼儿孤母，喊天天不应，哭地地不灵，在这个黑暗如漆的世界上，任人欺凌！

余连珊因为这几天侦察监视杨开慧有功，显得神气十足，在杨开慧屋里乱翻乱踢，口里讲是搜查毛泽东的书信、文件，实际上是想捞点钞票。

开慧心中有数，一些珍贵的资料早已装在蓝花瓷坛里埋在隐蔽处，给毛泽东的诗文也藏在夹墙内，一些文件已经在敌人敲门前在厕所里烧成了灰烬，至于党的其它秘密，都装在她心中，也是万无一失了。

匪兵们守着杨开慧等待天亮好上路。

深秋的夜是很漫长的。

余连珊说了一声："他娘的，老子当贩罐佬一整天没进粒米，杨老太，有么子吃的罗？拿出来孝敬孝敬！"

杨母没理他。余连珊的话有了连锁反应，匪兵们便自动在灶屋里、碗柜里翻腾起来。

他们找出一块猪蹄膀，开慧冷冷地说一句："咯是给我仔岸英过生日吃的。"他们在罐子里翻出新炒熟的花生，香喷喷地咀嚼着。岸英骂道："你们咯些好吃鬼，咯是妈妈炒了给我们吃的，你们吃了烂肠子！"

过了一阵子，范瑾熙指挥60多个清乡队员，将开慧、孙嫂和岸

英，押到杨公庙。杨公庙是个小学堂，离杨宅不到半里地，匪兵们分几层，把杨公庙圈个水泄不通，又在大殿中烘起一堆篝火，时暗时明，火舌舔着黑夜。

范瑾熙把杨开慧绑在一根柱梁上，自己翘着二郎腿，一屁股坐在学生课桌上，悠然自得地吸着烟。匪兵们搞来了锅瓢碗盏，在篝火上弄饭吃。

范瑾熙瞟了杨开慧一眼，转向众匪兵："弟兄们，奉何省长之命，今日犒赏大家，每人大洋一块，猪肉一斤，"说着，便命令一个匪兵从背袋里取大洋。开慧数了一下，包括余连珊在内，一共 64 人，这些人，她大都不认识，是范瑾熙从附近的福临乡调来的，板仓属清泰乡。

"买肉呀！拿酒来呀！"匪兵们得意忘形，群魔乱舞。于是，有人自告奋勇地跑到两里外的铺子去打酒。

酒醉饭饱之后，范瑾熙命令向长沙开拔。

此刻，天已大亮，周围的乡亲们听说霞姑被捕，纷纷赶来为她送行。

开慧望着朝夕相处的乡亲们，心头一阵发热，眼里饱含热泪，她最后看了一眼生她养她的家乡，山丘田畦，房屋农舍，又看了一眼杨公庙——她小时候读书的地方，也是岸英现在读书的地方……

范瑾熙怕她逃跑，把她五花大绑着还不放心，叫人推来两部车，开慧被捆在一辆车上，孙嫂坐在另一辆。岸英起先光着脚，跟在妈妈的鸡公车后边走，但渐渐地走不动了，范瑾熙就让他跟孙嫂挤在一辆车上。敌人押着车子，吱吱嘎嘎地沿着乡村大道，向长沙城走去。

敌人把杨开慧和毛岸英，还有孙嫂押到长沙后，关进了协操坪

监狱。这所监狱是国民党的“模范监狱”，是专门用来关押革命者的，不知有多少革命志士的鲜血洒在这块土地上。

号子里没铺，只在潮湿的水泥地上，铺了一层稻草。夜里，岸英就跟妈妈、孙嫂挤在一堆，等待黎明。这号子里，就是大白天，也昏暗潮湿，透不进阳光。

敌人审问犯人的公堂，就在他们号房的斜对面，中间隔着小天井。自从岸英母子被抓来以后，每当听到公堂里鞭打犯人的响声和犯人的呻吟声，岸英就抱着妈妈难过地问：

“妈妈，他们会打你吗？”

妈妈用温暖的手抚摸着岸英的头，坦然一笑说：

“要打要杀随他们，妈妈做的是好事。妈妈不怕打，不怕杀！”听到这些话，岸英双眼直愣愣地看着妈妈，渐渐地，大眼睛被泪水濡湿了，妈妈用温柔的手，替他揩眼泪，微笑着说：“伢子，来，听妈妈讲故事。……”

监牢里的夜色来得特别早，特别浓重。岸英捧起钵子里的盐水饭，送到妈妈面前，疼爱地说：

“妈妈，你两天没进一粒米了，吃点盐水饭吧。他们真坏，把这些发霉的米给我们吃，连一点菜都没有。”

妈妈苦笑了一下，接过饭钵子，尝也没尝一口，就放在地上，摇摇头说：

“伢子，妈妈吃不下。妈妈惦着岸青、岸龙。外婆这么大年纪了，夜里难得照料他们啊！”

“杨开慧！”

随着喊声，从牢门口走进一个30来岁的油头粉面的人来。他既不像当官的，也不像一般老百姓，手提一只黑皮包，走进牢门来，

向牢里打量一番，问道：

“你是杨小姐，啊？”

岸英打量着那人，又看看妈妈，胆怯地不知会发生什么事。只见妈妈沉静而蔑视地盯着那人，冷声冷气地回道：“干什么？我就是。”

那人打开黑皮包，掏出一个本子，换了一副笑容，从西装胸袋里掏出一张名片，说：

“杨小姐，久仰了，我是《晚晚报》[1] 的采访员。”

妈妈扫视了一下这个采访记者，知道他想从自己身上捞点油水了，便冷淡地说：

“你们这些人是替国民党吹喇叭抬轿子的，有什么就讲吧！”

“杨小姐，你家居何方，今年多大年纪，家庭情况如何？”

“这个嘛，你们铲共义勇队早已打听得一清二楚，何必问我？既然你打开本本，我也不使你失望。我叫杨开慧，今年 29 岁，父亲是北京大学教授杨怀中，家住长沙东乡板仓。”

《晚晚报》那个记者刷刷地在本子上记了下来，恭维说：“不简单，书香门第，又只 29 岁，正是风华正茂的时候啊！”

岸英很讨厌这个家伙，就老是打岔，一时问妈妈话，一时从地上捡了一张旧报纸要妈妈念。开慧一看这份旧报纸，原来是早上姨妈来探监时，偷偷塞在她裤口袋里的。她给岸英念过多次，岸英几乎都背熟了。为了从精神上战胜那个反动记者，她仍然朗声念着报纸：

“十月四日，共党毛泽东部第九次攻下赣西南重镇吉安。”

这一念，使那个记者十分狼狈。他想不到国民党办的报纸却给

---

① 《晚晚报》是解放前长沙出版的一张特务小报。

共产党鼓了气。

记者皱紧眉头问：

“杨小姐，你家里好好的，为何要做共产党？你犯了国法，晓得嘛？”

开慧淡然一笑，声音激昂地说：

“我没有犯法，是何键犯了法。从1927年‘马日事变’至今，湖南人民死在他手里的何止千万！他是个血债累累的刽子手！”

岸英应妈妈的腔说：

“何键是大坏蛋，抓我妈妈，还抓了我和孙嫂。”

那记者讨了个没趣，又改换一副腔调，劝说道：

“杨小姐，现在你能悔过自新，我替你向何主席讲情，就无生命危险了。我们可以在报上代你发个悔过书，如何？”

岸英看见妈妈一昂头，鄙夷地从鼻子里哼了一声：

“我杨开慧岂能屈服于你们？我把生命早置之度外。为了大众的事业，虽死何妨。”

记者拼命地记下来，生怕漏掉一个字似的。他心想，只要把这篇访问记一发表，他就会名利双收，在即将受刑的毛泽东妻子身上，可以大发一笔横财！他追问着：

“小姐，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我的话完了。”开慧再不搭理那个记者。那家伙又问了一句，没有回音，挖空心思再问一句，仍然没有回音。他瞧瞧开慧，见她庄静朴素，看来问不出什么名堂了，便合上本子，叹了口气，假惺惺地说：

“可惜，可惜，又一个女才子。”

“你还不走开？我妈妈不理你！”岸英厌恶地推着记者往牢门走，“你滚蛋吧！”

“嘿嘿，毛泽东杨开慧生的儿子，从小都这么厉害！”记者走出牢门，还回过头来讲了几句。

入狱的第四天下午，号子门上的铁锁哐啷一声打开了。

“提杨开慧！”牢头卒子凶神恶煞般的吼声，在牢里回响，号子里显得特别恐怖。伪清乡司令部执法处派特务来提审了。开慧从容不迫地走出牢门，经过天井四周的走廊，走进杀气腾腾的公堂。

岸英屏出呼吸，要孙嫂抱着他，从一本书那么大的窗口里向斜对面凝望着，侧耳细听。

“毛泽东在哪里？”敌人审问了。

“……”沉默。

“你们地下党在哪里？”声音更大。

“……”仍然没有回音。

“你在长沙东乡除了煽动百姓造反夺枪，还搞了什么名堂？”敌人狂叫着。回答还是沉默。敌人怒吼起来：“快说呀，你是哑巴？”

又沉默了很久，岸英听见妈妈冷冷地回答三个字：

“不晓得！”

执法处长喝令卫兵：“给我重重地打！”

听见劈劈拍拍的抽打声，好像一记记都打在自己身上，岸英不禁对着水泥过道大声哭喊起来：“不准打我妈妈！我妈妈是好人！”

“啪！”牢头卒子把那扇小窗户关上了。

传来执法处长的吼声：“给我加压杠！”“踩，加人！”……这些如狼似虎的叫声，好像魔鬼的喧嚣。8岁孩子那纯洁的心灵，怎能经得住这样的打击啊！听不到妈妈的声音，岸英真担心妈妈被这些坏蛋打死！

过了一两个钟头，突然从公堂那边传来妈妈惊天动地的回答：

“要杀要砍，听便！要从我口里得到你们满意的东西，休想！”

杨开慧被送回牢房。她被敌人打得皮开肉绽，青布衣服上全是鲜血。岸英一把抱住妈妈，一边流泪一边用小手去抚摸妈妈的创伤，问：“妈妈，哪里疼？等我长大了，替你报仇，把他们抓起来，打一百下屁股。”

妈妈听了孩子的话，心里甜滋滋的，虽然全身骨头架子好像散了一样，扯心的痛，然而，有这么可爱的孩子在身边，对她是个极大的安慰。她微笑着，艰难地抬起手，揩干岸英的泪水，安详地说：

“孩子，你要记住，爸爸正在打白匪，妈妈受苦也是为了穷人。等你们长大了，就会有好日子过的。”

聪明的岸英会意地点着头，嘴里嗯嗯着。

妈妈的疼痛稍好一点，就把岸英拉到身边，要孙嫂拿来一块石板，喘着气说：“伢子，妈妈昨天教你的字还记得吗？”

“记得，‘爱，爱穷人，爱祖国’。”岸英记性很好，把昨天妈妈教的几个字全默写出来了。妈妈满意地点点头，把石板上的字抹掉，又写了几个生字，对岸英说：“这是个‘恨’字，恨敌人，恨坏人。”

岸英也跟着念起来，直到他会写会背了，妈妈才躺在稻草上，轻轻地呻吟着。

岸英怕妈妈冷，就脱下自己的破褂子，盖在妈妈身上。

从 10 月 24 日被捕到 11 月 14 日牺牲，杨开慧被多次过堂审问，每次都被打得遍体鳞伤。每次回到监房里，她总是把岸英搂在怀里，眼泪扑簌簌地流淌，叮嘱道：“你要记住妈妈啊！你不会忘记妈妈吧？”岸英仰着头望着妈妈满是伤痕、血迹的憔悴的面庞，报以热泪，说：“妈妈，你不用说，我都懂，懂！”

地下党组织和杨开慧的亲属、朋友们在南京、长沙进行了很多

营救开慧的工作，可是，何键不肯放下屠刀，他为了缓和舆论的压力，只把杨开慧由“杀头示众”改为“枪决”。

1930年11月14日中午，岸英和妈妈正在吃那又霉又硬的籼米饭、臭咸菜，牢头卒子打开铁锁，牢门外边“八”字形地排开两队荷枪实弹的士兵，一个小头目从公文夹里取出一张提签，大声念道：“女共犯杨开慧一名执行。”他把提签交给牢头卒子，还得意洋洋地向四合院扫视了一番。

这个四合院关了几百名犯人，这时候却像死一样的寂静。每个人连自己呼吸的声音都能听到。

岸英丢下饭钵子，扑上去死死地抱住妈妈：

“妈妈，你不能去。妈妈，不能去啊！”

妈妈把自己钵子里的饭菜都倒给岸英，把自己的夹衣披在他的肩上，极其镇静地说：“伢子，不要流泪，哭是没用的。你要吃好饭，睡好觉，长大了好为穷人办事。”

妈妈从枕头底下取出一套早就准备好了的青布衣服，换了一双白底青布圆口布鞋，和牢房里的难友们一一点头告别。走到号子门口，她又回过头，弯下腰，把岸英紧紧地搂在胸前，用自己身上的热气最后一次温暖她的爱子的心，在他那满是泪痕的脸上亲了又亲。她多么舍不得岸英、岸青和小小的岸龙啊！这个时期，对党、对毛泽东的满腔心里话，千言万语，她都无法倾吐！

“嘿嘿，既然这么留恋孩子，就向何主席悔过了吧？”小头目狡黠地阴笑着。杨开慧瞪了他一眼，咬咬嘴唇，长长地吁了口气，向岸英讲了最后一句话：

“伢子，记住：血债要用血来还！”说完，便昂首挺胸，大步走出牢房，转过丁字形的走廊过道，与每个号子里扒在窗口上目送的难友们作最后的一别！她脸上非常安详、镇静。

岸英从小窗子里望着妈妈走进了公堂。他没有办法救妈妈，牢里的阿姨叔叔也无能为力，他们都愤怒地瞪着刽子手，把牙齿咬得紧紧的。岸英声嘶力竭地呼天号地："妈妈！妈妈！"

杨开慧从监狱里走出去，沿途，多少人冒着危险赶到由监狱到刑场的路边，向杨开慧告别，向她表示最衷心的敬意。

杨开慧英勇地就义了，她死得好悲壮、好惨烈！为了折磨这位不屈的共产党人，凶残的敌人不是一下子就让他毙命，而是先开枪把她打伤，让她流血，让她疼痛。她在痛苦中煎熬着，两只手深深地抠进了泥土里，地上留下了两个深坑……。

目送着妈妈从容地走了，再也回不来了，毛岸英哭哑了嗓子，哭干了眼泪，他咬紧牙关发誓，要为妈妈报仇！

对于死，她早就有了预感，也安排好了自己的"后事"。

她曾在长沙街头看到过被高高悬挂着的朱德妻子伍若兰的首级，那时，朱德正和丈夫一起领导着英勇的红军将士与反动派做殊死的斗争。她与伍若兰素昧平生，可她却崇敬这位伟大的女战士，敬仰着这颗永远高昂的头颅。她没说一句话，悄悄地离去。回到家里，她带着满腔悲愤，写道：

“……或许是我不太合时宜的原(缘)故罢!为什么人家欣喜的事,我却要悲伤呢?想不到前清时候罪诛九族的故事,现在还给我瞧到(杀朱德妻虽然未及九族,根本是一回事)!我以前根据我的时代眼光,对于杀人的事实,常常是这样说:杀人是出于不得已的啊!虽然事实常常不是这样的……可是呵,这一次杀朱德妻的事,才把我提醒过来!原来我们还没有脱掉前清时候的文明风气,罪诛九族的道理,还在人们心里波动! ……”

杨开慧牺牲的52年后,她的这篇文章被发现。从文章中可以看见,一方面,她充满了对没有人性的反动派的憎恨,另一方面,她又看到了敌人惯用的“株连九族”手段。伍若兰的被杀害,不能不使她想到自己是毛泽东的妻子,要是落到敌人的手里,等待着她的,将是同样的命运!她为可能要发生的事情,是作了思想准备的。她早已把党的文件隐藏好了,如果自己遭到不幸,地下党组织可以安然地斗争下去!

在敌人的监狱中,她顶住了敌人酷刑和欺骗利诱。她的心早已死定,坚决不屈服投降!一位亲戚来探监看望她,她非常平静地说:“你回去替我搭个口信.我屋里有一块青布料子,没做成衣服,你要家里请个裁缝,给我做一套合身的衣服,我要穿着……”那位亲戚热泪盈眶,不等她把下面的话说出口,便用手捂住了她的嘴,示意岸英就在身旁。她咬了咬嘴唇,又叮嘱道:“我走了以后,不作俗人之举!”

她是毛泽东的妻子,她更是一位忠诚的共产党员!她早已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

然而,她又是一位母亲,她最难割舍的岸英三兄弟,一个8岁,一个7岁,一个才3岁,活生生的天真可爱。万一自己遭遇不幸,孩

子们怎么办?在杨开慧被捕前唯有这件事一直萦怀在她的心头。母亲年纪大了,丈夫又远在江西打仗且行踪不定没有音信,自己死不足惜,孩子托付给谁?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她给堂弟杨开明写了一封托孤的信:

一弟:

我好像看见了死神——唉!它那冷酷的面孔!说到死,本来而(于)我并不惧怕,且可以说是我喜欢的事,只有我的母亲和我的小孩,我有点可怜他们!而且这个情绪缠绕得我非常厉害——前晚竟使我半睡半醒的闹了一晚。

我决定把他们——我的孩子们托付你们,经济上只要他们的叔父长存,是不至于不管他们的,且他们的叔父是有很深的爱对于他们的。但是倘若真正失掉一个母亲,或更加一个父亲,那不是一个叔叔的爱抵得住的,必须得你们各方面的爱护,方能在温暖的春天里自然生长,而不至于受那狂风骤雨的侵袭!"

然而,这封带着慈母心肠的充满着不安、满怀着希望的信,却未能送出去,只好藏在屋后的砖缝里,也是在50多年后被人们发现的。

什么原因信未交给"一弟"杨开明呢?是一时找不到杨开明?是信写好后尚未来得及送出就发生险情而匆匆将信藏进了砖缝内?……各种可能都有,但是,一个严峻的事实,就是在杨开慧被捕前后,杨开明也被捕了,而且和杨开慧同时关押在一个监狱中。这期间,被敌人抓去的,除杨开明外,还有毛泽东的两个弟媳和一些亲友。这一事实恰恰证明了被杨开慧痛恨的"株连九族"的事发生了。

而且,更加残酷的事实是,就在杨开慧牺牲的前后脚,她的这

位堂弟、一位年青的共产党员也壮烈地牺牲了。在从陆军监狱署走向刑场的路上，残忍的敌人怕他宣传“赤化”，竟用两把尖刀扎进他那瘦瘦的两颊，还将一把刺刀扎在他的肚皮上，鲜血顺着他的身体往下淌着，沿着小巷的石板路，滴成了一条弯弯曲曲的红线。而他，忍着钻心的疼痛，昂首挺胸，向站在路旁的市民们含笑告别。他并不知道他的堂姐写信托孤于他的事情。

也许这一切杨开慧并不知道。可是，杨开明的壮烈牺牲，真正是雪上加霜，杨开慧托孤之事也就根本无法如愿了。要是杨开明不死，岸英兄弟就有希望在他的关怀下，“能在温暖的春天里自然生长”。堂舅父和母亲一起走了，等待着岸英兄弟的，必定要“受那狂风骤雨的侵袭！”这是杨开慧最担心的，最不愿意想而又不得不想的结果。这样的结果，不幸被杨开慧言中了，痛苦的生活在等着他们。妈妈牺牲后，岸英兄弟开始了恶梦一般的童年经历……

三颗罪恶的子弹，夺走了妈妈的生命！而那一刻，毛岸英在牢房哭得死去活来。他撕心裂肺地叫喊着：“妈妈，好妈妈！我要妈妈！我要好妈妈！……”一直哭得精疲力竭，躺在角墙里，双手仍紧紧地抱着妈妈刚刚换下的尚带体温的衣裤……

1930 年 11 月 14 日那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板仓乡下一群民众，冒着危险偷偷地赶到长沙浏阳门外识字岭刑场，找到开慧的尸体，用一块白色布包裹着，用滑杆悄悄地连夜抬回板仓。杨家按照开慧生前的嘱咐，“不作俗人之举，”没有摆流水席，没有请师公、和尚念经做道场，只买了一副杉木棺材，将开慧收殓后，掩埋在她童年时代嬉戏玩耍、青年时代陪着毛泽东畅谈革命理想的棉花山。

毛泽东曾经于 1921 年春，1922 年元月、1927 年考察农民运动

时和1927年"八·七"会议后，到过板仓，棉花山上留下他们伉俪的多少足迹，如今，一个远征，一个牺牲，永远离别了！

当时，何键这个刽子手还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将岸英同时杀害，而是又关了十来天，便将他和孙嫂一同释放了。孙嫂领着岸英在长沙学宫街杨开慧舅舅向明卿家呆住了两天，然后回到板仓乡下住了三个多月，孙嫂便离开了杨家，回她的老家宁乡了。

岸英回到板仓，再也见不到亲爱的妈妈了，他哭得死去活来。外婆把他们三兄弟带到棉花山，指着新坟说："好伢子，妈妈睡在咯里，她是被何键杀死的，你们长大了见到你们的父亲，要他报仇雪恨！"

岸英哭成个泪人儿，两手扒着黄土，恨不得扒开地皮，再看一眼亲爱的妈妈。回到家，在梦中也哭着"我要妈妈！我要报仇！爸爸，你给妈妈报仇啊！"梦中惊醒了，又哭，哭累了，眼泪哭干了，又昏昏迷迷地睡着，睡梦中又喊妈妈。妈妈一个人躺在冰冷的山上……

爸爸在哪里呢？叔叔毛泽民、毛泽覃在哪里呢？堂舅杨开明本来可作他们的保护人，妈妈不仅写了信，也在口头上拜托过，可是，他也跟妈妈在同一时期惨死在识字岭……现在，除了外婆，他是无依无靠了，一个8岁的孩子，像嫩芽一样，哪经得住狂风骤雨的侵袭呀？这是开慧临死前最最担心的呀！

"爸爸在哪里呢？"岸英哭够以后，变得沉默内向了，失去了8岁孩童的天真烂漫，不时向外婆打听爸爸的下落，"娭毑①，你告诉我，爸爸在哪里？我要找爸爸给妈妈报仇！"

---

① 娭毑——湖南方言，即祖母。

外婆告诉他，爸爸在很远的地方打白匪。

是的，毛泽东正在江西中央苏区领导苏区军民准备粉碎蒋介石的第一次“围剿”。由于湖南是白区，红、白两区如同两个世界，长期未通音讯。但是，每到一处，毛泽东都要吩咐下属多找些报纸回来，看报是他从小养成的习惯，对于国民党的报纸，他可从字里行间推测出事情的真面目。

1930年12月，也就是开慧牺牲一个月后，毛泽东在一张过了期的报纸上看到了触目惊心的消息：

“毛泽东妻子杨开慧拿解警备司令部。”

“最近，清泰乡成立铲共义勇队，清查户口，异常严紧。日前经人密告，该队因派员前往将杨氏及其长子又女工一名，一并拿获，解送警备司令部，前日已经军法官详加审讯。”

毛泽东看了这几行字，心如刀绞，知道爱妻落入何键的魔爪，凶多吉少，可又束手无策，鞭长莫及，搭救无方。隔不几天，毛泽东又从敌人报纸上看到开慧就义的噩耗，痛不欲生，热泪盈眶。

他指挥着千军万马，在战场，曾经历过多少残酷的场面，然而，开慧就义，对他精神上打击是巨大的，犹如五雷轰顶。那个不眠的冬夜，他在东固山名叫墩上的红军总部的房间里，彻夜不眠。他摊开苏区自制的毛边信笺，用毛笔在砚台里舔了很久，此刻，在桐油灯光下，又浮现出他写字开慧替他磨墨的情景，他那流血的心里头轻轻地呼喊着：“霞姑，霞姑……”

毛笔饱醮着浓浓的墨汁，他在信笺上写下八个字：

开慧之死　　百身莫赎

写毕，把笔掷得老远。这是他钟爱开慧的肺腑之言！

他写了一封信，附上这句悼词，还设法凑了30块大洋，通过秘密渠道辗转送到板仓乡下，作为开慧的安葬费。当地乡亲们便用它为开慧立了一块石刻墓碑：

向庚山甲　毛　民
男　母　国
岸　杨　十
龙英青　开　九
刊　慧　年
　　墓　冬
　　立
　　修

湖南的冬天，不同于北方的冬天，干冷干冷的，而是阴冷阴冷的，要是碰上西伯利亚寒流南下，接着便出现了铅灰色的天空，寒风挟着冰样的雨丝，更是冷得心里打颤颤，人们不得不窝在屋里烤炭火。而懂事的岸英，却领着比他小11个月的岸青，跪在妈妈坟前，哭一阵，跟妈妈说几句话，又哭……他担心妈妈睡在地下太冷了，烧些纸锞给她取暖。妈妈死时他没看到，所以，在他的脑海里，妈妈的形象却永远是慈祥的带着笑意，他总不相信妈妈会死，总盼着妈妈有朝一日突然出现在眼前，把他搂在暖烘烘的怀里，亲他吻他，问他在学校里念了什么新书……想到这里，他又哭了，眼睛肿得像个红桃子，小脸蛋上出现了粗糙的皱裂……他不相信妈妈死了，可又忍不住问岸青，妈妈从刑场抬回家的情景。

岸青所受的刺激、惊吓比岸英更加强烈，他看见了妈妈被抬回来时的情景。

那天夜里，几个乡里人抬着滑杆，竹椅上边斜躺着一个人，全

身用白布裹着。

“回来了?”杨老太太眼泪婆娑地问。

乡邻叹了口气,回答:“回来了,再晚点不知给野狗撕成什么样子哩!”那时,浏阳门外的识字岭,是国民党枪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主要刑场,有些死者家属得不到讯息,不能及时收尸,就被抛在露天,成群结队的野狗把那儿当成了有吃有喝的天堂,有时,为了争夺人肉而互相嘶咬。若是按照何键的命令暴尸三日,开慧的尸体肯定身首异处,不堪入目。幸好乡亲们冒着风险及时抢回了板仓。

杨老太太悄悄揭开遮在女儿脸上的白布,只见开慧紧闭双目,口里流出的鲜血已经淤积成黑色的斑块。10年前,老太太曾经受过中年丧夫的痛苦,现在又经受更大的痛苦:晚年丧女。她一头扑在开慧身上,哭喊着:“霞儿,霞儿,你的命好苦啊!为么子不让我先死呢?”一时气咽,昏死过去。

岸青和岸龙跪在地上,岸青抓着妈妈僵硬的双脚,希望妈妈能站立起来。可是,妈妈只穿着白袜子,那双青布圆口鞋在被刽子手枪决倒地时,就被卫兵们抢着脱下来,向空中抛去,丢得老远。反动派、刽子手们的心虚得很,传说不把死者的鞋子丢掉,他的魂灵会跟着刽子手追回家的。

老母、幼子,加上刚从南京回乡的舅妈李崇德,光靠她们几个是办不成丧事的。幸亏开慧一家人缘好,又有些地下党同志帮忙操办,加上开慧有遗嘱:死后“不作俗人之举”,因此,除了一副棺材外没添什么东西。人们忙着在棉花山上挖墓穴,这里就把开慧洗抹收殓。按照她的遗愿,仍穿着监刑前穿上的那套衣裤。当把开慧平稳地放进棺材,将要盖上棺盖时,杨老太太、舅妈、岸青、岸龙以及左邻右舍哭成一条声,惨不忍睹。人们抬起棺材,因为岸英还在监狱

里，就让岸青当孝子，穿着一身白孝衣，骑在棺材上，为妈妈送葬，八个人抬着送上山……

岸英回来后，怕听这些事，又不住地向岸青打听妈妈下葬时的细节，越难过越要了解，越听越难过，不几日，他就像一棵小树，被凛冽的寒风刮得枝叶全无，东倒西歪。他本是个天真烂漫无忧无虑的孩子，突然像长大了似的，原先喜欢说说笑笑，见人就喊叔叔婶婶，如今，他不苟言笑，坐在那里发愣，不住地抹眼泪。外婆搞了好菜，他也不吃，却把菜碗带到棉花山上，供在妈妈坟前，念念有词地说："好妈妈，你饿了吧？你多吃一点啊！"他总记得妈妈省吃俭用，有好菜都留给他们三兄弟吃，每当他放学回家，丢下书包，妈妈早把热饭热菜端到桌上，喊着："岸英好崽，快吃饭啊！"岸英吃饭时，妈妈那双充满喜悦的眼睛就跟着岸英的筷子转，筷子夹了肉，妈妈的眼睛盯着香喷喷的肉，又随着筷子看岸英把肉吞进小嘴，有时，还亲手夹一块鱼，把刺剔除后，硬是送到岸英嘴里，看他咽下肚，妈妈也咽口唾沫，得到莫大的欣慰……冬天的早晨，岸英怕冷不愿起床，妈妈要将他的小棉衣放在胸口焐暖，把两只手伸进小裤管里直到手边暖暖和和的，才让岸英穿……

然而，大难从天降，妈妈给他的母爱，妈妈的呼唤、叮咛以至于嗔骂，都在顷刻之间消失了，永远地失去了，岸英幼小的心灵，怎承担得起这致命的打击呢？

外婆看着他日渐瘦削，不想吃喝，发呆发傻，心里更是着急，万一岸英再有什么三长两短，她怎么向岸英的父亲交待呢？外婆安慰外孙，说着说着自己也伤心地哭了，再轮到岸英安慰60岁的外婆："娘驰，你别难过，我长大了要为妈妈报仇！"祖孙抱着，哭成个泪人儿。一个家庭里，父亲不在，现在又失去了母亲，今后的日子怎么过呀？老天怎么不长眼睛啊！

岸英三兄弟在地下党办的上海大同幼稚园过着安逸的学习生活，老师像父母一样爱他们，小朋友之间也友爱互助，像一个大家庭。岸英三兄弟真如母亲杨开慧所希望的那样，能“在温暖的春天里自然生长”吗？

在板仓，处在极度悲愤中的杨家，正为今后的生活一筹莫展的时候，而在江西，身处戎马倥偬中的毛泽东也无时无刻惦记着三个孩子，党组织也在想方设法抢救这几个孩子——革命的后代。

1930年冬天，毛泽东的胞弟毛泽覃，从中央苏区来到当时党中央所在地上海。他临走时，毛泽东吩咐他到了上海要设法把三个孩子带到党中央的地下机关。当时，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共产党，答应接受一些中国革命烈士的遗孤、党和红军将领的子女，为中国革命事业培养一批接班人。

毛泽覃找到了党中央机关。经过再三研究，由毛泽民写信到湖南，把三个孩子接到上海来。

湖南地下党接到毛泽民的信后，便由地下交通员化装成修伞补鞋匠来到板仓，通过约定的暗号，把密信转到开慧的亲属手里。信里讲，希望按照信上约定的时间和地点，把三个小孩送到上海，如果过了这个时间，就千万不要送。

杨家收到这封信，就找杨怀中先生的老朋友明德中学校长胡子敬，筹措了50块大洋作盘缠。

离开板仓的前一晚，外婆和舅妈在桐油灯下，等三个孩子都睡

熟了，便把密信藏在岸龙的棉裤里，收拾了简单的行李物品。

第二天清晨，杨老太太和舅妈扮着走亲戚的模样，领着岸英三兄弟，由板仓农民纠察队员缪佩秋用鸡公车送到粤汉铁路边的白水火车站，搭闷罐火车到了武汉，然后又改乘江轮顺流而下。

“妈妈，妈妈，什么时候看到爸爸呀？”

外婆和舅妈非常疼爱地把三个孩子搂在胸前，苦笑着，心酸极了。原来，为了防备特务盘查，舅妈要三个孩子改口，不喊外婆喊奶奶，不喊舅妈喊妈妈，还给岸英兄弟起了新的名字：杨永福、杨永寿、杨永泰。一时，孩子们还不习惯。

春节是在途中度过的。一路上，他们小心谨慎，生怕出现意外，老老少少再也经不住风吹雨打了。就这样提心吊胆地捱着，悲痛、困苦、劳累，每时每刻都在袭扰着他们……

轮船在长江里航行了三天两夜，终于停靠在上海外滩十六铺码头。

正是黄昏时分，浊黄的浦江水面，飘着油花、粪便、杂草和外国大轮船撞翻的小舢板的碎片。外国兵舰上耀武扬威地升着他们的国旗，高鼻子水兵在甲板上喝得醉醺醺的，有时还把酒瓶向大轮船扔过来。岸英很气愤。从舅妈口里知道了这班高鼻子就是“列强”，是侵略我们中国的帝国主义者，他们从轮船甲板上捡起一些破烂东西，用力地向外国兵舰扔过去。

外婆、舅妈和岸英三兄弟随着人流涌上十六铺码头。

刚到上海滩，人生地不熟，到哪里去找信上约定的地点呢？

“啥人要黄包车？”一个头戴船形阔边毡帽的老头，两只手臂弯里拉着黄包车的杆子，两手怕冷而缩在袖管里，正向下船的人拉生意。

舅妈想，何不向他打听一下？便问那工人：“辣斐德路在哪里？”

那工人看他们是从乡下来的，便一口应承："上车吧，阿拉马上把你们送到。"见岸英他们有五个人，又喊了身边一辆黄包车。外婆和岸青、岸龙坐一辆，岸英和舅妈坐一辆。工人掀着拉杆上的铃子，飞起穿着草鞋的双脚，在大马路上奔跑起来。

那个老工人大约60来岁，驼背躬腰，拉了不到半里路，早就喘着气，汗珠儿一串串洒在脚下。

"妈妈，我要下来，我不坐了，你看！那个老伯伯多苦啊！"岸英对舅妈说着，硬要下车。黄包车工人听不懂他们的话，还以为他们嫌慢呢，于是，又加快了脚步，岸英心里更难过，差一点哭了起来：

"老伯伯，你太苦了，让我下来跟着车子走。"

老工人听清了他的意思，苦笑着说："小少爷，阿拉惯了的，不吃力。"

岸英第一次听人喊他"小少爷"，顿时面红耳赤，申辩说："老伯伯，我不是小少爷啊，我也是穷人……"说着，眼泪快流出来了。

幸亏辣斐德路（现名复兴中路）离十六铺不太远，不久，黄包车停了下来，舅妈给两位工人付了钱，领着杨老太太和三个孩子，在街上找约定的地点。

天已入夜了，大马路两旁的霓虹灯闪着耀眼的红绿光，把这些乡里来的人搞得头昏眼花。看见了天主教堂，这是他们要找的目标。顺着这个标记，他们在教堂旁边不远的地方，很快便找到了一家酒店。酒店是两层楼房，门额上挂着一块大木匾，上面写着五个大黑字：

天生祥酒行

舅妈喜出望外，悄悄四顾，见左右没有可疑的人注视他们，就从岸龙棉裤里掏出那封密信，跟门牌、店号查对了一下，正是这个地方！辣斐德路399号。她按照约定的暗号，在左边朝东的小门上

敲了三下，看见有人探出头，她便把密信从窗口投了进去。

“天生祥酒行”是党的秘密联络中心，店老板姓余，是位30多岁的湖南人，腿有点拐。那时，在西门、马当路、淡水路一带，开设了很多酒店，店主都是湖南人，是党的地下联络点，天生祥酒行的余老板是负责人。酒行负责跟党中央领导联络的两个交通员，也是湖南人，一个叫大彭，一个叫小彭，是两兄弟，年纪都还不到30岁。

余老板早就从地下交通员小彭那里得到消息，说是毛泽东的三个孩子，暂时放在他那里。于是，他接到密信后，便把杨老太太、舅妈和岸英三兄弟安排在酒店楼上休息。同时要小彭通知毛泽民、钱希均夫妇在一家旅馆里跟孩子会面。

毛泽民（化名杨杰）是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经理，他负责管理党办的几个印刷厂和书店，秘密印刷、发行马列主义的书籍和党中央的刊物。那天晚上，毛泽民和他的爱人钱希均（化名张静），按小彭的指点，来到一家地下党办的旅馆里。

毛泽民看见杨老太太、舅妈以及岸英三兄弟，心里又喜又悲，说不出是个什么滋味。

岸英一见毛泽民，便一头扑在他怀里，抱着叔叔说：“我妈妈死了！”

毛泽民抱着岸英，强忍着悲痛：“伢子，别难过，革命总要死人的！”

“叔叔，我要见我爸爸，你带我找爸爸去呀！”毛泽民这条硬汉子，这时也忍不住鼻子发酸。当他把大手在岸英头上、脸上、身上摸了又摸，接着去亲岸青、岸龙时，泪水便簌簌地落下来。

“好伢子，你爸爸不在上海，在很远很远的地方。”泽民说。

那时，正是1931年春节以后，有钱人正忙着过元宵节，街上已有爆竹声了。岸英望着窗外，北风呼啸，风中夹着雪花，飘飘扬扬，

这是上海滩上最寒冷的日子。他搂着心爱的叔叔，说着妈妈被捕、坐牢和就义的情况，说到悲痛处，泣不成声，伏在叔叔的怀里，哭成个泪人儿。

叔叔抚摸着他的头，沉痛地说：

“伢子，革命总要有牺牲的呀！你爸爸和红军战士正在消灭敌人，替你妈妈和千万劳苦大众报仇！”

叔叔的话，使岸英沉静了。他不哭了，只是啜泣着，两只小拳头捏得紧紧的。

“叔叔，我要找爸爸，我要参加红军打坏蛋！”岸英坚定地请求着。

毛泽民舒了口气，心痛而又爱抚地说：

“你爸爸正在打仗，那里艰苦得很，等你长大一点，我们再送你去，你说好不好？”

叔叔停了停，微笑着说：“小叔也跟你爸在一起，前些日子到了上海，带来你爸爸的信，要你们到上海来，知道吗，要听话。”

毛泽民夫妇承担着党内重要的工作，工作性质决定要绝对保密，况且他们跟一般党员一样，每月只有5块钱津贴，这三个孩子也不好带在身边，然而，苏联轮船还没有到上海，怎么办呢？

党中央领导同志跟毛泽民研究以后，决定先把岸英兄弟安置在党的外围组织——全国互济总会办的大同幼稚园，等苏联的轮船一到，再送他们到苏联去学习。大同幼稚园设在法国天主教堂旁边，天主教堂的董牧师是地下党员，党组织跟他联系后，他又通知大同幼稚园的地下党员，约定了一个日子，在法国公园（今复兴公园）领孩子。

那是一个阳光温暖的冬天的下午，毛泽民穿一套藏青色西装，夫人钱希均穿件藏青哔叽的旗袍，他们打扮得像阔佬。毛泽民的左

手里拿着一张《新闻日报》，这是地下党的联络记号。

杨老太太和舅妈也领着岸英三兄弟来到公园里。

毛泽民夫妇装得若无其事的样子，沿着公园的院墙转了大半个圈，这时，有三位老师打扮的人，两个男的一个女的迎面向毛泽民夫妇走过来，其中一人左手上也握着一份《新闻日报》。问答了几句，对上了暗号，他们就是来接岸英兄弟的。

毛泽民向在不远处玩耍的岸英兄弟打了个招呼，杨老太太、舅妈和岸英三兄弟走拢来。毛泽民指着一个戴眼镜的年纪较大的男人介绍说："永福、永寿、永泰，这是校长。"

婶婶指着那一男一女向岸英三兄弟介绍说："他们是你们的老师。校长和老师跟自己的爸爸妈妈一样，好喜欢你们哪，你们要听校长和老师的话，好好读书，将来长大了好替妈妈报仇。"

岸英很乖，叔叔婶婶一说完，他就拉着校长和老师的手，很惹人疼爱地说："校长，老师，你们就和我的爸爸妈妈一样，我听你们的话。"并且自我介绍道："我叫杨永福、二弟杨永寿、三弟杨永泰。"他指指岸青、岸龙。

叔叔婶婶又要岸英跟外婆、舅妈告别。外婆扭过脸，抹着眼泪，根本不敢再看孩子一眼。

岸英三兄弟就这样进了大同幼稚园。在老师的教育下，岸英和孩子们一起读书、游戏，渐渐地，往日的活泼又回到了他身上，他开始享受到童年的欢乐生活。他天真烂漫，欢蹦乱跳，深受老师们的喜爱，伙伴们也愿意和他交朋友，不久，他就成了孩子们的小头头。

在幼稚园里生活了一段时间后，岸英给叔叔婶婶写了一封信，信是用毛笔写的，一口气写了 12 张毛边纸，文字很通顺，也充满了稚气，他在信里讲：

“我们在大同幼稚园，每天上课，老师很关心我们，教了我们许多新鲜事，以前听都没听过，真有趣。我们三兄弟都很好，就是想念爸爸妈妈，想念叔叔婶婶和外婆舅妈……

“岸龙还小，身体很弱，夜里常常尿床，我怕他尿湿了被子，每天半夜都要起来喊他。有时他夜里做恶梦，喊妈妈，把被子都踢掉在地上，我在给他盖被子，还要拍着他，让他睡好……

“外婆要保重身体，等我长大了，我要接外婆来一起住……”

婶婶边念信边流泪，说：“这伢子才八九岁，信就写得这么好，真难得！”毛泽民说：“她妈妈教子很严！”

当时地下工作纪律，不允许泽民夫妇和杨老太太去大同幼稚园看孩子，孩子的父母是谁，也是保密的。

然而，杨老太太思念孙子心切，接到这封信后非要看看孙子不可。不得已，毛泽民夫妇通过地下党联系，安排他们在法国公园见一次面。那天，毛泽民、钱希均和舅妈李崇德都去了。岸英三兄弟看见亲人，亲热得不得了。

岸英问外婆：“姨婆，你们在啥地方？我们可以去吗？”又问钱希均：“叔叔家里还有小弟弟吗？爸爸到你们那里去了吗？爸爸要是来了，我想见他，我有好多年没有见到他了。”

大家安慰他说：“你爸爸不在上海，到上海时就要他来看你！”

岸英不住地点头：“我在幼稚园，有了新的家啦，我要好好念书，还要帮弟弟，教他写毛笔字！”

1931 年 5 月，端午节前，毛泽民夫妇得到党的指示，要他们取道香港，去中央苏区工作。临走前，毛泽民先把杨老太太送到在南

京的岸英的舅舅杨开智那里，又在法国公园跟孩子见了一面。不幸的是，这次见面竟是岸英和叔叔见的最后一面，1943 年 9 月，叔叔毛泽民被国民党杀害于新疆乌鲁木齐。

见面时，毛泽民夫妇没有将去中央苏区的事情告诉岸英，只是叮嘱岸英他们："你们要好好学习，老师校长都和爸爸妈妈一样，小朋友团结友爱，岸英你大些，要把弟弟带好，外婆、叔叔、婶婶有别的事情，不能常来看你们了。"

岸英很懂事的说："叔叔婶婶，放心吧！我长大了，懂事了，我在幼稚园里还是班长。"聪明伶俐的岸英，在临别时，突然从衣袋里掏出一封信，要叔叔设法带给爸爸。

毛泽民高兴地说："好呀！以前你写的信寄不出去，这回我一定托人带给你爸爸。"

叔叔把岸英的信十分珍贵地收起，信是用毛笔写的，岸青也在上面签了名，老三岸龙不会写自己的名字，就在哥哥名字后边写了个"三"字，表示他是爸爸的第三个好儿子。

"爸爸能看到我们的信吗？叔叔什么时候带我们去看爸爸？叔叔，你带我去当红军吧！"岸英仰起脸，发出一连串天真稚气的问话。

1978 年 12 月 14 日上午，我来到北京演乐胡同 81 号，访问毛泽民的夫人钱希均。当时，她已经 73 岁了。她向我讲述了他们夫妇到中央苏区见到毛泽东时的情景……

1931 年 9 月，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胜利以后，毛泽东率领红军回到江西瑞金，住在叶坪村，毛泽民夫妇去时，他正在筹备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毛泽东看见他们夫妇，很高兴，问毛泽民什么时候在上海工作？什么时候到苏区来的？家里情况怎么样？三个孩子好不好？……

泽民夫妇一一作了回答，特别提了岸英三兄弟在上海的近况，还把岸英写给爸爸的信交给了毛泽东。

“岸英真是个好伢子啊！”毛泽东看了岸英的信，心情无比激动、喜悦，做父亲的多么想见到自己心爱的孩子啊！

作者收集的毛岸英照片中，有一张岸英三兄弟在上海大同幼稚园的照片。这是迄今为止毛岸英最早的照片之一。再早的那张已公布过，照片上，杨开慧温存地手抱一岁左右的岸青，坐在椅子上，两岁的岸英，依傍在母亲身旁，这张照片是唯一的一帧开慧与两个孩子的合影，那时，老三岸龙还没出生，估计这张照片摄于上海(1924 年 5 月以后)或广州(1925 年 10 月以后)。

上海大同幼稚园的合影照片，据上海市公安局户政处负责人在给我的信中称：“已经查到了岸英、岸青、岸龙在沪时的掩护人董健吾(即上海地下党开办的大同幼稚园负责人)，董尚保存有当时寄托在大同幼稚园的地下党儿童的照片。据称其中有岸英三兄弟。据董称，拍照时间是 1931 年春。”

照片的背景是绿树、假山。后排站着五位女老师，其中每人手中各抱着一个孩子，孩子都较小，二三岁之间；前排一溜儿排坐着 11 个孩子，一式的穿着雪白的围兜，都没戴帽子，可以看出有三个是女孩子；在老师与前排之间，最左边的头戴黑白相间的瓜皮孩童帽，身穿西式小棉袄，他就是毛岸英；而与他们相对称，站在二排最右边的，穿着跟岸英一模一样，只是个头稍矮一点，他就是毛岸青。至于 4 岁的岸龙，至今还没辨认出来。

这是一个春光明媚、树木葱茂的初春，从衣着看来，总在清明前后。

从照片上的 20 个孩子来看，地下党对他们安排是很正规、很

幸福的，环境优美，老师和善，穿着干净、漂亮。而岸英是个头最高、年龄最大的一位，所以，他给外婆信中讲，他去不久就当上了幼稚园的班长。

从失去慈母，来到上海，到进入大同幼稚园，岸英童稚的心灵里，又注入了温暖，那些老师便成了他亲爱的新妈妈，三个苦儿终于回到党的怀抱，可以不愁吃穿，好好学习了。

而毛泽东及其亲属们，看到孩子安置得很好，总算松了口气！

> 母亲的话，不幸被言中了，岸英兄弟的命运多灾多难，好日子是短暂的，接踵而来的便是"狂风骤雨"的侵袭。虽然往事不堪回首，但是，看到张乐平的漫画集《三毛流浪记》，他触景生情，对妻子说："我除了没当过小偷，没给资本家做干儿子外，三毛干过的事我都干过了……"

写这一段的时候，我遇到了三个难点：

关于毛岸英兄弟，在毛泽民离开上海到江西根据地后这5年的生活到底怎样？现在说法不一。

记得1979年5月7日下午，我去长沙学工街希圣巷8号杨开智家采访时，正好岸英的舅舅杨开智、舅母李崇德在家。当我提出，有人写文章说，岸英在上海从来没有流浪街头，一直住在董牧师家

……我的话还未讲完，开智老人便激动地说着站起身来，取出一封岸英的亲笔信，对我说："你看你看，岸英明明白白地写着呢！"

我摊开有些发黄的信笺，只见岸英用毛笔直行写道：

舅父并转外婆：

看到舅舅的来函，悲喜交加，热泪不禁夺眶而出。人终然是个有高度感情的动物！离别已经二十年了，对于人生来讲，这不是一个短小的时间……

一九三一年与外婆分别后，在上海过了五年流浪生活，一九三六年底到了苏联（可惜没有学一门技术）……。

岸英　叩

1949.8.17

杨开智接着愤然地说："1950年岸英回来，跟我生活在一起个把月，经常谈起上海流浪的事……"

杨开智是当事人，为人严谨，他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替岸英编造故事。同时，有岸英的墨迹在，加上他的妻子刘松林（思齐）亲自向作者转述了岸英看"三毛流浪记"时叙述上海流浪的情景。现在有人出来断然否认毛岸英曾流浪的事实，因岸英已牺牲，死无对证。

无独有偶，翻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12月出版的《师哲回忆录：在历史巨人身边》，内中谈到毛岸英的一段赫然在目，它记录在这本书的第101页到102页：

毛岸英的小名叫永福，到苏联后取名塞尔盖依，爱称是谢廖沙。他的弟弟叫永寿，到苏联后取名为亚历山大。……据岸英告诉我，他们在上海到处流浪，只靠哥哥照顾弟弟，兄弟俩相依为命，卖报、拣破烂，给人家打扫屋子挣口饭吃。为了使他们能受到教育，也为了他们的安全计，上海地下党设法找到社会关系，才把他们兄弟二人送进

上海基督教圣公会，交给董健吾牧师收养。董牧师并不知道他们是毛泽东的儿子。董牧师虽然收留了他们，但也难以资助，强迫他们做力所不及的工作，干不了就拳脚相加。这期间，毛岸英兄弟生活十分艰难，岸青因被打损伤了脑神经。

显然，此处也非长住久居之地。党组织又经过一定的渠道同共产国际取得联络，托人将他们带到法国。他们乘船到了马赛，共产国际派康生到马赛将他们接到莫斯科。康生把这件事也当作他的一个政治资本。

师哲(1905年—　)1925年被送到苏联基辅军官联合学校学习，从1929年底起在西伯利亚格贝乌(即克格勃)工作9年，1937年被任命为莫尼诺国际第二儿童院副院长兼教务长，他的回忆应该是真实可信的。

第二，就是时间问题。大同幼稚园何时解散，毛岸英兄弟又何时开始过流浪生活的，在采访过程中，得到的说法也不一致。况且，被采访的人，在谈及当年的事情时，站得角度不同，因此，所讲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也就有出入，即使讲同一件事，也有不同的说法。这当中有因年代远久了，记忆不清了；有当事人对当年的环境、事情感受上的不同，等等原因。

关于大同幼稚解散的时间，综合起来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1931年夏秋时节，一种说法是1932年春。我到倾向于1931年这种说法，原因有二条，其一，还是前文所述的毛岸英给舅舅杨开智的信中所讲的："一九三一年与外婆分别后，在上海过了五年流浪生活，一九三六年底到了苏联……"根据有关资料，毛泽民是1931年5月前后离开上海到中央苏区工作的。在离开上海，他把岸英的外婆送到南京岸英的舅舅家。这与岸英信中的时间相吻合。其二，

30年代初期，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到最严重的破坏莫过于主持党特科工作并负责全党保卫交通工作的顾顺章被捕叛变投敌，时间是1931年的4月25日。他的叛变，势必影响到上海地下党工作，使党遭受重大损失。大同幼稚园的解散是不是也受到这一事件影响呢？最起码，它与幼稚园被迫解散时的环境相同。

再有，是毛岸英的小弟弟毛岸龙的下落问题，目前大致也有两种说法：一是说他在随哥哥流浪街头中，居无定处与哥哥们失散，从此杳无音讯；一是说他在大同幼稚园时因患痢疾送到广慈医院，经抢救无效而死。关于毛岸龙，我也搜集了一些材料，与上面两种说法又有所不同。

现在，我所写得毛岸英的这部传记，是根据我采访众多人所得到的材料，而且，这些材料是经过我们综合分析的。我是个作家，是写纪实性作品的作家。“纪实作品”重在“实”，这是区别于小说、故事创作的一个显著特点。但是，面对说法不一的情况，有时我也犯难，究竟哪一种说法准确呢？

后来，我一想，我本人不是搞历史研究的专家，写的这篇东西也不是学术论文，既然，有些情况一时众说纷纭，我也就没有必要非把事情抠得那么细、那么准确无误。事实上现在也做不到这一点。在数学领域，对一些难以搞清楚的问题，还可以采取“模糊数学”的研究方式，何况搞写作呢！我的原则是，把我手中采访和收集的材料，排列组合，只要做到作品交待的相对合情合理，基本符合当时的情况（即时间、地点、环境、人物等），就达到创作的目的了。

按照这个原则，我顺着我的创作思路走下去……

刚刚在春风和煦中过了几个月的好日子，可是，天有不测风云，杨开慧临终前最担心的“狂风骤雨”又来侵袭三兄弟了。

上海地下党被破坏后，环境十分恶劣。大同幼稚园被迫解散。

大同幼稚园被解散后，岸英兄弟暂寄养在董健吾家。当时，董健吾和夫人郑兰芳住在我地下党联络点松柏斋古玩号（在淮海中路普安里附近）。毛岸英兄弟在董健吾家生活期间，生活费由党组织按月供给。当时在中共中央上海局工作的浦化人等曾多次到董健吾家看望他们。因此处距嵩山路法国捕房较近，安全有些威胁，董健吾的岳母（同董住在一起生活）对照料岸英兄弟有些怨言。不得已毛岸英兄弟又被送到凤阳路修德里541号董健吾的前妻黄慧光处生活。董健吾告诉黄慧光，说这是他朋友的孩子，暂时住在这里，以后另有安排。不久，董健吾就告诉黄慧光和他的子女们，岸英兄弟是毛泽东的孩子。当时，上海的白色恐怖非常严重，敌人疯狂地到处抓捕共产党人和进步群众。黄慧光一家对岸英兄弟和自己全家的安全非常担心，时刻提心吊胆，怕他们在和外人接触中，引起怀疑和走漏风声。后来就很少让他们出去，也没有让他们去上学。在黄家生活的这段时间里，为了安全，他们曾变换过三个住地，从修德里搬到三多里，又从三多里迁到牯岭斯盛里。

岸英兄弟到黄慧光家里生活初期，党组织仍按月供给生活费，董健吾在生活上给黄慧光一些帮助。后来，董健吾辞去牧师职务，不从教堂领取薪水了。没有了固定经济来源，便无法照管黄慧光的生活，因此，中断了对毛岸英兄弟的生活供给。黄慧光是无职业的家庭妇女，她身边已有四个孩子，加上岸英兄弟，生活极其艰难，全家只靠她的长子一人的微薄收入生活。不得已家里的其他人，只好给人家洗衣服，扎纸花，得点收入维持生活。岸英兄弟也帮助扎纸花和干些家务活，减轻家中的困难。当时，岸英兄弟过的是饥寒交迫的日子，吃的不好，穿的是破旧衣服，盖的是破棉絮。由于生活无着落，岸英兄弟便经常流浪街头。

岸英三兄弟生活没有着落，便投靠了一家烧饼铺，在那里当学徒。烧饼铺里的老板娘，三兄弟很怕她，当面喊她“师母”，背后却叫她“大黄牙”。大黄牙的烧饼铺，请了一个老头当伙计，岸英三兄弟名义上学徒，实际上成了主要劳力。

每天天不亮，冷落的大马路上，开始响起粪车推过的咔咔声。岸英这孩子还在甜蜜的睡梦中，大黄牙就披着衣服来到他们床前吼道：“小赤佬，太阳都晒屁股啦，还睡懒觉。”有时连喊几声都醒不来，她就把岸英的被子一掀，扯起他的小耳朵骂道：“你这个没娘没爷的小赤佬，还想当小少爷享福啊?!”有时，还在他屁股上打几下。直到岸英起了床，她才打着呵欠去睡一场“早觉”，真的睡得太阳晒屁股才起床。

岸英裹着破衣服，拖着没有后跟的破鞋，提着一只篮子上街买小菜。他把菜买回来，第二件事就是生煤球炉子，接着是刷马桶、倒尿盆。岸青、岸龙也早早地被赶出被窝，服侍大黄牙的少爷、小姐。

那个大少爷比岸英大两三岁，留着小分头，穿着时兴的吊带裤、牛皮鞋，像个小绅士，他跟他妈一样，对岸英兄弟动不动就挥舞拳头，非打即骂。岸英有苦说不出：妈妈被杀了，爸爸叔叔都未在身边，有谁去疼爱他们?当弟弟被打骂了，或是太劳累了，岸英就搂着他们，安慰他们，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妈妈临死以前对他讲的话：一定要学好本领，长大了像爸爸一样，替天下穷人报仇！

对！要好好学习，环境再艰苦也要学习。他想起妈妈临刑的那天上午，吃饭前还手把手地教他写“井冈山”三个字，在石板上画了好多高山、大树，还有头戴五角星的红军，现在妈妈离开了，难道就不学习了吗？不，决不！

他多么羡慕那些孩子，穿得整整齐齐，背着书包去念书！有一次，大少爷放学回家，把书包丢在桌上。他就捡出一本书，如饥似渴

地看了起来，不料被大黄牙发现了，没头没脑地给他两巴掌，恶狠狠地骂道："穷瘪三，这书是你看的吗？快滚出去给我拉煤球去！"岸英含着泪水和两个弟弟一起推着"老虎车"去煤店拉煤球。

他们经过一个巷子口，看见路边上摆着个小人书摊子，小人书的封面可好看啦，有孙悟空、猪八戒、有济公和尚，还有"人猿泰山"……五颜六色吸引了成群的孩子，间或也有黄包车夫蹲在那里看。岸英兄弟被吸引住了，他们多想看看这些有趣的小人书，打开知识的宝库啊！岸英想：既然放在路边上，大约谁都可以看的，就伸手去拿那本"孙悟空"，正要看，那个管书摊儿的老头儿忙把书夺过来，掸掉沾在上面的煤灰，和气地说："小把戏，看一本，一个铜板；租一本回去看，五个铜板。"

岸英不由自主地两手伸进口袋里一摸，半个铜板也没有，袋子早就烂成几个洞了，他只好叹口气，领着弟弟，拖着沉重的"老虎车"回烧饼铺去。

岸英一心想学文化，他想知道穷人翻身求解放的道理，他要学习，哪怕一天学两个字，一年就是七八百个字啦！

岸英背着大黄牙，偷偷地看呀、学呀，哪怕在地上捡一张包东西的破报纸，他都要仔细看半天，看看有没有爸爸的消息，看看能学几个生字。小人书看不懂的字，可以看图画，可是，报纸上那么多生字，找谁问呢？

一天，岸英买菜回来路过一家小书店，他蹑手蹑脚地走进店堂，看见满屋子摆着好多的书画。他仿佛走进童话般的神奇世界，翻翻这本书，新鲜；看看那本书，有趣。后来发现有一本很厚很厚的长方形的书，他问卖书的人："这是啥东西？"卖书人告诉他："这是字典。""字典是干什么的？""不认得的字可以找它，它是不开口的先生啊！"岸英像着了迷似的，心想，不开口的先生多好，要是我把

他请到身边，碰到难字生词，翻一翻，它就告诉你，那多好，对，买一本！

“老板！这个不开口的先生要卖好多钱一本？”岸英满面笑容，兴冲冲地问。他心想，七八个铜板总可以了吧？

卖书人伸出大拇指和食指：“不多！大洋八角！”

“8角？！”岸英有些吃惊，脸上充满希望的笑意被赶跑了。

“8角，就是好几十个铜板呀！”岸英吐了吐舌头，恋恋不舍地把字典放回原处，叹口气离开了书店，他下意识地摸摸口袋，袋里连一个铜板都没有，怎么办呢？从哪里搞钱呢？给大黄牙当奴隶，连饭都吃不饱，哪来钱？岸英苦苦思索了好半天，想不出一个办法。不过，既然看中了那个不开口的先生，他一定要想方设法弄到手。

他买回一篮豆牙菜，大黄牙丢给他两三个铜板。他跑到隔壁弄堂里的一家馒头店里，把铜板递过去，习惯地说：“喏，来三只开花馒头。”他总是给岸青、岸龙各买一只，这几个铜板是兄弟三个的早饭钱。刚刚把三只开花馒头接到手里，他突然醒悟了似的退回一个，说：“退我一个铜板好啦！”

第一天，他存了一个铜饭，把开花馒头给岸青、岸龙每人一只，弟弟问他吃了没有？他咂咂嘴说：“刚吃下去，饱饱的。”

岸英想：肚子里空一点没啥，脑子里可不能空啊！从此，他每天都省下一个铜板，勒紧裤带不吃早饭。

岸英是个正在成长的苦孩子，在大黄牙家里只能吃到剩菜剩饭，本来吃得就差，营养不良，如今，他又勒紧裤带……铜板是越聚越多，身体却越来越瘦了。到青年时期，岸英还有些“上弓腰”，即胸脯凹陷，走路时背有些弓，这是少年时缺少营养所致。烧饼铺的老伙计很同情岸英，有时背着大黄牙，给岸英塞几个烧饼。

隔了个把月，岸青终于发现了哥哥的秘密，怜悯而又难过地

说："你不吃早饭不行啊！大黄牙每天要你做这许多事，你要饿病的啊！"

岸英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微笑着，对着岸青的耳朵说："我有个秘密……"岸青听后不住地点头"好，哥哥，我和你一起存钱，把不开口的先生请回来，我们就能把天下的难字都认得啦！"

岸英是个有恒心的孩子，想准了的事，他一定下狠心办到，即使再饿再冷也能忍受。他和岸青勒紧裤带，大约两三个月的早晨没有吃早饭，总算积存了几十个铜板，他终于蹦蹦跳跳地走进书店，从袋子里倒出所有铜板，一边要书店伙计数钱，一边拿起《学生字典》翻看。

这本字典，岸英一直把它带在身边，它跟随岸英到了苏联，到了革命圣地延安和晋绥边区的山西临县，还到了山东渤海，河北的西柏坡，最后，跟随他的足迹，到了北京，字典成了岸英一生中形影不离的良师益友！这本蓝色布面的《学生字典》至今还保存在刘松林（即刘思齐）身边。《字典》已经很旧了，但保存得很好，仍能看得出是由武进陆文奎编纂，商务印书馆印发，每册定价大洋捌角的字样。它真是岸英的好老师啊，因为岸英只在杨公庙读了一二年小学，到上海流浪时根本没能系统学什么，后来到苏联，一边学俄语，一边学中文，1939 年便插入苏联十年制学校读六年级（初中），这样大步跨越，字典功不可没啊！

烧饼铺的日子再也混不下去了。有一次与大少爷发生口角竟互相撕打起来，岸青忍无可忍，对着大少爷的鼻子就是一拳，大少爷死命地嚎叫着，哭爹叫娘。

"好啊，你简直反啦！竟敢打少爷！"大黄牙随手从门角里拾起一把扫帚，对着岸青就打下去，正打在脑门顶上。岸青用手捂着头，手背上又遭了几扫把，岸英知道岸青脾气很犟，忙跑上前，一手抱

起岸龙，一手拖着岸青，冲出了烧饼铺。

大黄牙恶狠狠地挥动着扫把，大骂道："小赤佬，一生一世勿准侬进我家门！"

岸英什么也不怕了，在门外愤怒地反抗说："大黄牙，我早就不想给你干啦！你和乡里的土豪劣绅一样狠，一样坏！"

漫天大雪，岸英领着两个弟弟头也不回地离开了烧饼铺，随身唯一的宝贝就是那本小字典，其余一无所有。

到哪儿去呢？实在无处藏身，到处流浪。奔波了一天，他们终于在法租界与中国地界相邻的庙里，找了个避风寒的地方。三兄弟又开始了流浪的痛苦生活，再次尝尽人世间的不幸与不平。

经过一段时间流浪生活，岸英好不容易请人担保，找了个卖报的苦差使。每天清晨他就找报贩子等派报，两个弟弟是他的小助手，光着脚板，在大街上、广场上声嘶力竭地叫卖。

刚开始，他就吃了苦头，挨了流氓一顿揍。上海卖报也有"报头"，划了区域的，英租界的不能到法租界去卖，"大世界"的不能到外滩去卖。岸英起先不懂这些规矩，看见哪里人多，报纸销路好，他就到哪里去，一时到法租界，一时又到公共租界，他想：只要手脚勤快，报就卖得多，卖得快。

那天，他到南京大戏院门口正卖得起劲，突然从人群里冲出两个小瘪三，把手向岸英一伸："小赤佬，来，报纸阿拉统统要！"岸英一看势头不对，挟着报纸就要走，可是，那两个小流氓冲上前，拳打脚踢，把他的报纸扯得稀烂。岸英知道这群流氓很凶，只好忍耐着，慌忙离开戏院门口。

岸英三兄弟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了庙里。第二天天不亮，岸英早被冻醒了，刺骨的北风刮走了盖在身上的旧报纸和稻草。岸英看了看岸龙，有点不对劲，摸摸他的额头像火炉一样发烫，呼吸也

很急促，好像接不上气一样。他心想：不好，岸龙一定得了病，要赶早替他看病、买药给他吃。

他把岸青喊醒。岸青看见弟弟发烧，也慌了手脚。

岸龙是个年小体弱的细伢子，他从小跟着两个哥哥饱经风霜，吃尽了苦头，很懂事，也很听话。这天，他比平时更乖，睁开眼，看见哥哥要上街干活儿去了，就从衣袋里把白天舍不得吃、留下的一个又硬又黄的开花馒头掰成两半，一半给大哥岸英，一半给二哥岸青，喃喃地说："哥哥，你们要吃饱啊！我喊一、二、三，你们就吃下去。"他学着岸英的口气，劝哥哥吃馒头，声音有些发抖，看得出他是硬打着精神说话的。

岸英安慰小弟弟，说："好弟弟，这个馒头留下来，你肚子饿了就啃几口，你在发烧呢！我们去找活干，多挣一些铜板，买药水给你治病。等你病好了，我们一齐去找爸爸。"

岸龙两眼烧得红红的，嘴唇干裂，本来没精打采，一听说去找爸爸，他笑了，天真地说："好，我们去找爸爸，找妈妈。"停停，他眼里充满喜悦地说："哥哥，我们再给爸爸妈妈写信好吧？"

岸英为了使弟弟在病中高兴，便强忍着内心的酸楚，苦笑着说："嗯，写信写信。"

他在膝盖上摊一张捡来包东西的旧油光纸，用一支半寸长的三星牌铅笔，在上面写着"亲爱的爸爸"五个蚕豆大小的字，岸龙接着念叨：

"还写上亲爱的妈妈，我们想你啊！"

岸英含着泪，真的加上了"亲爱的妈妈"五个字，他眼眶里的热泪再也忍不住了，终于滴落在岸龙那烧得像红萝卜似的脸蛋上。这时，岸龙已经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口里还在念叨着："亲爱的爸爸、亲爱的妈妈……"

横跨在苏州河跟黄浦江合流处，有一座大桥，桥身的铁架很高，桥面成弓形，坡度较大，从桥上过身的黄包车，每逢到这里，一些流浪儿就来推一推，可得到两个铜板。

岸英兄弟除了卖报外，最近找到了推车挣钱的门路。他们看见黄包车来了，车上坐着的男女是不肯下来走一步的，只要车夫拉不上去喊一声“小把戏，来！”他们便猛跑过去，弓起腰，用尽力气，一步一步地艰难地把车子推上桥顶，车夫就从袋里掏出两个铜板给他们。

……

今天岸龙病了，他们两兄弟推车特别卖力。从早到晚他们没吃一口东西，推了一车又一车，天快黑了，数一数铜板，刚够41个，正好替岸龙买一瓶西药水。

他俩多么快活，飞也似的跑到西药铺，药铺正要“打烊”，他们说了一通好话，才把药水买到手。

岸英拿着药水瓶向破庙奔去，跑呀跑呀，两条腿发酸发软，跑不动了，还继续跑，心想，早一分钟赶到庙里，弟弟就早一分钟治好病。

兄弟俩终于看见了破庙。岸英老远就喊着：“永泰、永泰，阿哥买药水回来啦！”

要是以往，只要听到喊声，岸龙早就奔出庙门，飞也似的迎接哥哥。可是，今天没见岸龙的影子，大概还未醒来吧？

岸英跨进庙门一张望，哪里有岸龙的影子啊？更奇怪的是，他们睡觉的地方，除了那一堆稻草，几块破席片和麻袋都不见了。一个又冷又硬的馒头掰成两半，仍然留在那里，那封写了“亲爱的爸爸、亲爱的妈妈”而又无法投寄的信，被北风刮得在地上打转转。

关于这段不堪回首的岁月，当年毛岸英给妻子刘松林（思齐）叙述过。刘松林在看了笔者给《儿童文学》（1978年第三期）写的

《记毛岸英烈士》初稿后，于1977年12月9日下午，在中国军事科学院她的家中，和笔者交谈了三个小时。

“有一次和岸英看张乐平的漫画《三毛流浪记》，他非常激动，对我说：“我除了没当小偷，没给资本家做干儿子外，三毛干过的事我都干过了，卖报纸、捡垃圾、拾破烂。能吃的，坏了的饭菜也吃掉。能卖的，就作废品卖几个钱。推黄包车，推一次给两个铜板。捡香烟屁股，也是为了去卖。用马粪纸做个三角形的漏斗，拿在左手，把烟头丢进去，有时烟头燃起来，烧伤了手。我还想了个办法，用个棍子，头上绑根磨尖的铁丝，可以不弯腰就能扎到香烟屁股。回到庙里，把烟纸剥掉，留下烟丝，聚了一堆就去卖钱。上海的街上专门有些人收这种烟丝，再搓成纸烟装在盒子里卖，一般是穷人才抽这种烟。晚上睡在破庙里。有一天早上出去时，弟弟岸龙在生病，晚上回来时，弟弟没有了，听说死了，被人埋了。

“地下党被破坏后，离开大同幼稚园，就放到董牧师家，什么事都做，买菜、烧火、做饭，刷马桶、洗地板、带小孩、洗菜，根本没有时间学习，天不亮就起床，很晚才睡。我利用出去洗菜的机会，偷偷地到小人书摊上，花了两个铜板看《三国演义》、《西游记》。租回来钱不够，回来还要教岸青学习。

“在外流浪时，没有衣服没有被子，在庙里铺上稻草，身上也盖稻草，互相挤着取暖；夏天就躲开警察，在门洞里睡觉，下水道管子里也睡过。流浪时字典总带在身边，有机会就看报查字典。”

刘松林告诉我，毛岸英从苏联回国时，中文底子不错，他说主要是在中国学的，先是妈妈杨开慧亲自教，在上海则是靠字典自学。

1935年4、5月间，正是江浙一带的黄梅雨季节，穷人的日子

难过。像岸英、岸青这两个无家可归、无人昵爱的苦孩子，生活更加艰难了。

一天，岸英和岸青从报贩子那里批来一些大报，突然，岸青两眼睁得鸡蛋那么大，张着嘴半天也合不拢，只见十几个大字如针扎眼：

“毛匪泽东胞弟毛泽覃已毙”

“军息：伪中央区所谓之伪师长毛泽覃（系毛泽东胞弟）前因我军积极搜剿，乃率领残部，鼠匿瑞金东之黄蟮口东北大山中，本月二十六日，经我毛炳文部二十四师汤团，在该处搜获，该匪顽抗拒捕，遂为我毙……”

“又讯：二十四师汤团，二十八日击毙伪师长毛泽覃，在尸身搜获匪首朱毛之妻照片，兼中南银行钞票洋数十元，……”

看着看着，岸青眼泪模糊，不满30岁的小叔叔那亲切的笑容，顿时浮现在眼前。国民党报纸上讲叔叔“顽抗拒捕”，可见小叔叔死得多么英勇。岸青脑海里翻腾着？妈妈死了，小叔叔死了，心爱的弟弟岸龙也不在了，还有多少人在挨饿挨冻，这是谁的罪过呀？我要报仇！

可是，这个仇怎么报呢？他身体那么孱弱，手无寸铁。突然，他在口袋里摸出半支粉笔，这就是武器。他把千仇万恨都集中在粉笔上，用颤抖的手，在电线杆上写下六个大字：

打倒帝国主义

写完字，他微笑着欣赏自己的胜利。突然，法国三道头（巡捕）飞跑过来，对着他的肩背就是一脚，把他踢倒在地上。路边上，那家以开纸烟店为掩护的特务分子，也蹦出来，对着岸青的头，一个巴掌接着一个巴掌。可怜的岸青，本来就很瘦弱，加上还没吃饭，饥肠

辘辘，怎经得起两个刽子手的拳打脚踢呀！

岸青躺在湿淋淋的水泥地上，也不求饶，嘴里仍旧骂着："就是要打倒帝国主义！就是要打！"

"好呀，你还嘴硬，老子打死你活该！"

"打死这个小赤佬，不犯法！"

正在危急的关头，岸英从远处跑来，腋下还挟着一些没卖完的报纸。岸青躺在地上，已经昏死过去，鼻孔、嘴角流着血。

岸英一下子扑到岸青身上，把他紧紧地抱起。这时，一些下班的工人看了都打抱不平。

一个黄包车工人走上前，把岸青抱起，放到车上，问岸英："小兄弟，拉到啥地方去？快找人看病！"

岸英领着黄包车回到破庙里。他把弟弟抱起，让他躺在稻草上。他没钱请医生，庙里一些流浪儿，有的搞来姜汤，有的拿来红药水。岸青终于醒了过来。

"弟弟，还疼吗？"岸英问他。

岸青摇着头，嘴角上露出苦笑。

"永寿，是怎么搞的呀"？小乞丐们问他。

岸青摇摇头，说不出话。但是，他的脸上流露出愤怒。他被打成脑震荡，耳朵也被打坏，听不清声音了！

"弟弟！好弟弟，你怎么不说话呀？"岸英急哭了，怎么办呢？岸龙失踪了，岸青又被打成这个样子，加上报纸上又登出小叔叔毛泽覃英勇牺牲的消息，爸爸又没有下落……

岸英，像一株小松树，被狂风暴雨吹打得东倒西歪，差点连根拔起。然而，他把根深深地扎在人民的泥土中，他把恨深深地埋在心坎里，顽强地生长着！这狂风，这暴雨，使他的性格变得更加倔强，更加勇敢。

岸英兄弟俩在上海度过了整整5年的流浪生活，到1936年，他已是一个14岁的少年了。惨痛的遭遇使孩子过于早熟，他要比同年的孩子更聪明，更老成。

他们终于脱离了深渊。李杜将军接受了神秘使命。

14岁，他又周游半个世界

1936年6月，上海外滩。

上海滩的初夏，已经有些燥热，黄梅雨季刚过，到中午太阳当顶时，只能穿衬衫。

这是一个云开天朗的暖和的早晨，晨雾刚刚从黄浦江退去，一轮红彤彤的太阳，从浦东那边冉冉升起，空气清新，和风轻拂，上海人最喜欢这样的天气。

一辆黑色的福特牌小汽车，从市区驶向外滩。车内坐着一个大人，三个少年。那个身板结实的中年男子，身穿白色西服，脚踏一双擦得发亮的奶油色牛皮鞋，藏青色的领带也是笔挺的，他五官端正，天庭饱满，浓眉大眼，高鼻梁，大耳朵，一脸的威武。然而，他又是一个慈祥和善的人，即使紧闭双唇，脸上也露着微微的笑意。他就是大名鼎鼎的东北军师长、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李杜① 将军，眼

① 李杜(1880—1956)辽宁义县人，1908年毕业于东北讲武学堂。1932年任吉林自卫军总司令和东北边防军驻吉副司令长官，率部与日本侵略军作战，1936年任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抗日战争时期任国民党战地党政委员会委员、军事委员会军事参议官，陆军上将。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在东北解放区缺席当选为吉林临时参议会参议长。新中国成立后，任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市政协常委

下，他化名王元华，脱去了戎装，完全是一副阔商的打扮，潇洒而富足。

车内的三个孩子，大的十五六岁，是董牧师的大公子寿琪，另外二人就是14岁的毛岸英(杨永福)和13岁的岸青(杨永寿)。他二人留着平头，面庞瘦削，一看就知道长期缺乏营养，加上临时做的夏衣夏裤，穿在身上不大合身，整个装束像从乡里来的童工。他们管李杜叫王叔叔。

他俩好像做梦一样。

今早起床，董牧师的妻子满面笑容地给寿琪和他们兄弟俩煎荷包蛋，煮阳春面。不久，一辆福特牌的小汽车停在巷子口，三个孩子上了车，发现车里还有一位叔叔。岸英坐在汽车里，沿途看见他曾经卖报纸、拾香烟屁股的马路，再看看车内的气派，简直不敢相信所发生的这一切。

而岸青随着沙发的晃动，竟故意一上一下颠着，得意洋洋。倒是寿琪有些离别的惆怅，他还有些依依不舍地跟妈妈和弟弟告别哩！

汽车驶在外滩柏油马路上。只见马路上人声鼎沸，一队队游行示威的学生、工人和市民，高举着横幅，呼着口号从南边走过来，有人带头喊口号："停止内战！""收复东三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此起彼伏伴着黄浦江的怒潮，直冲云霄。

李杜将军在汽车夫肩上轻轻地拍了一下，示意停车。咔—哧！汽车停了，李杜将灰白色的礼帽压在额头上，开门下了车。他左右一看，只见一群手持警棍的警察和头上扎着红头巾，上海人称为"红头阿三"的印度巡捕，迎着游行的队伍挡上去。路边上，巷子口，一些歪戴着鸭舌帽和墨镜的密探特务，鬼头鬼脑地向游行群众指指点点。

“收复东北！……”

这呼声，使李杜将军心潮激动，他不禁锁起了眉头，叹口气，摇了摇头。此刻，岸英也从车里钻出头，李杜慌忙将他按进车内，自己也座进车里，乒地关上门要汽车夫开车。

李杜既担心遇到熟人，又怕引起密探特务怀疑，出现麻烦，千万不能在最后一刻出毛病。

十六铺码头，一片乱七八糟，一个讲着苏北话的小摊贩和讲上海话的小阿飞，不知如何争吵起来，上海阿飞骂苏北人：“‘甘北子罗’(江北猪罗)！”江北人骂他：“上海瘪三！”二人差点打起来。这地方岸英太熟悉了，5年前春天的一个阴冷的晚上，他三兄弟和外婆舅妈是从这儿上岸的。5年来，只稍许过了几天好日子，然后就是流浪、流浪，当小叫化子，尝尽了人间的辛酸苦辣。现在，一切却像恶梦中醒来一般，该结束了。

“叔叔，阿拉到啥地方去？”岸英见汽车停在码头的入口处，警惕地问李杜将军。

李杜示意他少说话，先下了车，向两个外国佬摘一摘绅士帽，微笑着，说了几句外国话。

外国佬原先板着一副面孔，听李杜讲英语，介绍了自己的身份——大概是一家什么公司的大老板，一向瞧不起中国人的外国佬，脸上堆起了一点笑意，伸手向他要“派司”。

李杜取出由外交部颁发的护照，递上去，那外国佬边看护照，一边盯一眼李杜，一边用蹩脚的中国话念出声：

“姓名　王元华

年龄　四十五岁

职业　商人

籍贯　山东

随行 ……”

念到“随行”时，问李杜：“随行在哪里？是你什么人？”

李杜忙打开车门，要三个孩子出来见见外国佬。

“先生，是我的亲戚，陪我到欧洲去考察！”李杜用外国话回答。那外国佬将三个孩子一个个与护照的相片对照，验证一下，就用长长的大手，在孩子的头上轻轻按一下，放进木栅栏里边。

李杜心中提心吊胆的，怕在验证时出意外，因为他知道，这三个孩子中间，有一个是顶替岸龙的，万一……。当然，他更怕的是有特务盯梢。

倒是岸英岸青“天聋地哑”般，不知这位和善叔叔的心情，也不知他将他们带向何方。他俩还沉浸在突然降临到他们身上的境遇之中，仿佛在甜甜的梦里一般。

一切都顺利。李杜让汽车夫搬下行李，送上轮船。按照船票上的房间号码，他们来到二等舱。舱内正好四个铺位，一边两张床，中间还有一张桌子放台灯、热水瓶、烟灰缸之类。

一进舱，李杜就把舱门关牢，不让孩子们出去。好奇心的驱使，孩子们把脸贴着舱窗玻璃，看着十六铺码头上熙熙攘攘的人流。

“嗡—嗡—嗡”

三声汽笛长鸣，轮船也震得发颤，把岸英吓了一下。倒是岸青，无动于衷，因为被法国“三道头”(巡捕)打得耳朵有些“勿来事”，汽笛声虽然听到了，但不像岸英听到那么清楚。

“好，康脱罗梭号开船喽——！”李杜兴致勃勃地说，那神情，倒像个大孩子，脸上堆满了笑容。总算又闯过了一关。

“叔叔，什么‘号’开船喽？——”岸青还是没听清，再三问李杜。

“康—脱—罗—梭—号！”李杜一字一板地告诉他，一连讲了三

遍，岸青还是似懂非懂地重复着，发不好那个音："看，看——土，土，罗，罗一嗦一！"

岸英在一旁插话说："这是外国名字，我来念：看一你一罗一嗦一号！干脆，你那么罗嗦，就叫它：罗嗦号！"

"好！罗嗦号，罗一嗦一号一开一船一喽！"

三个孩子异口同声地应和着，欢喜得在床上打滚。

康脱罗梭号是法国的一条大邮船，非常豪华、漂亮，奶油色的船身显得很高贵，黑色烟囱上缀红色的波纹，桅杆上挂着的万国旗在微微地飘扬，船尾挂着的是一面法国国旗。

邮船渐渐地远离了码头，在黄浦江缓缓地移动，不住地嗡嗡鸣笛，以免撞到江中来往船只。

岸英把鼻子贴在舱窗玻璃上，两眼炯炯地盯视着岸上的人流、高楼。这一切多么熟悉，而又多么令人心酸。然而，从现在起，这一切，连同痛苦的童年岁月都过去了！

康脱罗梭号随着黄浦江的污泥浊水，驶入滚滚东去的长江。黄浦江与长江的交叉口，便是有名的吴淞口，这里停泊着外国的大轮船和铁灰色的军舰，远远看得见黄毛高鼻子的外国水手在甲板上耀武扬威地跟法国邮船上的人打招呼，果皮扔过来扔过去，但都掉在江水中。

岸英恨那些外国人，恨不得也拿起果皮扔过去，打在那高鼻子上，可是，李杜还是不让他们出舱门，只准在房间里玩。

不一会儿，邮船经过长江口的佘山炮台旁，再往外看，"唉唷，真是天连水，水连天，好大好大的海啊！"岸英欣喜若狂，顾不得李杜的"禁令"，私自开门走到船舷甲板上，伏在船栏上远眺。岸青也跟出来，望着尾随海轮的白色的海鸥群，高兴得在甲板上乱蹦乱

李杜披着一件风衣，把房门锁上，领着三个孩子参观邮船。他们先绕着二楼的船舷走一圈，站在船尾眺望那渐渐远去的江南江北的初夏风光，然后爬上三楼，在船台上游玩。

咳，船真大呀，这里还有网球场，有晒太阳的一排排高级的躺椅，有几只很小很小的舢板船，吊在空中……

岸英从没坐过这么大的船，也没有见过这么宽阔的海，他不断地向李杜将军打听："王叔叔，这是什么？""那是什么？""这水为啥这么蓝啊？""这是东海还是黄海？……"

李杜很快地喜欢上岸英这孩子，这不仅因为岸英兄弟是他所敬仰的毛泽东的儿子，并且同情他们的苦难身世，更主要的，岸英很懂礼貌，懂事而好学。

"我们自由啦，再见，中国！"李杜将军看着佘山炮台渐渐远去，突然将风衣取下，在空中画了个弧线，让海风吹拂着他的头发、他的衣襟，浑身舒畅。

"再见，中国——"

"再见，再见——"

"罗嗦号开船喽——"

三个少年，跟着李杜呼喊着。

岸英已多年没有这样自由自在地呐喊过了，他要在喊声中结束过去的一切，像一群群展翅的海鸥，飞向遥远光明的未来！

李杜将军又把孩子们赶进船舱，带他们到洗澡间去痛痛快快洗个淋浴。当他看见岸英、岸青脱光衣服，裸露出一排排凸出的肋骨，皮包骨头的手臂上露出青筋时，他强忍住眼泪，摇头叹息道："多可怜的孩子！"

岸英他俩已不记得什么时候痛快地洗过澡了。流浪的生活，还顾得上洗澡！第一重要的是把肚子弄饱，冷的、热的、生的、熟的、臭

的、香的，凡是能够吃的都吞下去。其次是有个地方睡觉，不冻死就好，报纸、麻袋、稻草都是最好的铺盖，再不就是兄弟拥抱在一起，互相用体温取暖，相依为命。只有在看见有自来水的地方，首先是弯下腰去喝点冷水，然后才是用手捧着水，洗洗脸，至于洗澡，那是顾不上的，他们的身上及颈项、手背，长年累月的是脏乎乎的，完全是一付黑人的模样。衣服么，用几个铜板到旧货店换几件人家穿剩的旧衣裤，即使这样，他们也非常爱惜，一件衣服岸英穿不得了，给岸青，一直要穿到一条一条的，遮不住屁股了，才连同里面的跳蚤、虱子一同扔掉……。

现在，有新衣服了，有澡洗了。前些日子还有位叔叔带他们到有名的王开照相馆，拍了半身快照。现在岸英才知道，那是要贴在叔叔的“派司”（护照）上的，没有那“派司”，没有那照片，“外国赤佬”就不放他们上船。

“朋友们，我们到餐厅去吧！”岸英洗完澡，就感到肚皮里咕咕叫了，好像王叔叔知道他们心思似的，把两手一摊，邀他们去餐厅，“尝尝西餐的滋味吧！”

在豪华美观的椭圆形餐厅里，他们四人围着一张方形的罩着红色台布的餐桌坐下，立即有一个“伯欧”（仆人）走过来，用英语问李杜，“要点什么？”

李杜要了四杯牛奶，四份“三明治”，还有奶油、奶酪、沙拉、粉肠、卤菜，还有一瓶“beer”（啤酒）。

一会儿，“伯欧”端上来大大小小的盘子、碟子，还有刀、叉，只是没有筷子。

岸英、岸青你看我，我看你，没有筷子怎么吃下肚呢？

王叔叔笑笑，右手拿起雪亮的刀，左手举起明晃晃的叉，在“三明治”上用叉抵着，右手的刀便将“三明治”切成一块一块的，在上

面涂上奶油，然后，用叉一扎，送进嘴里……岸青看得流口水，也照着王叔叔的样子，只是手实在不听使唤，索性用手抓起来往嘴里送，引起了一阵哄笑。

岸英嚼着“三明治”，大彻大悟地说：“啥呀，三明治，不就是馒头上面摊了一层煎鸡蛋？”

“不是馒头，是面包！”小董吃过西餐，帮助纠正。岸英从他那口气里，感到受了侮辱。

岸英又吃那盘“沙拉”，“咦？啥么子沙拉？就是没有煮的小菜么，拌了奶油，格一点也勿好吃！”小董忍不住笑出声来。岸英投他一瞥，拳头攥紧了。

第一次用刀叉失败了，又没筷子，岸英兄弟俩干脆用左右开弓抓着吃，不仅把自己面前的盘子碟子一扫光，就连王叔叔给他们又要的一份，也吃得盘子见底，只是怪味的“沙拉”他们没动一下。岸青说：“啥么子沙拉，生草生菜，阿拉乡下是用来喂猪喂羊的呀！”

李杜很同情这两个饿怕了的孩子，看着他们狼吞虎咽的样子，又好笑又难过。

“咯只乡巴佬，‘沙拉’也不懂，‘三明治’也不晓得吃，还到外国去！”小董讥笑他们了。

这些年来的流浪生活，使岸英的性格变得倔强、好斗，他忍不下这口气，心想，过去在你家，我们受气，没有撑腰，今朝你妈妈也不在身边了，还耻笑我们是“乡巴佬”，好吧，乡巴佬又怎么样！

他站起身，一拳朝小董揍过去，不解恨，又送上一拳。岸青也帮哥哥的忙，打得小董歪倒在地上，呜呜地直哭。

这一着是李杜意料不到的，他很生气，吆喝住岸英：“住手！怎么不讲文明！都给我回到房里去！”

三个少年，都哭着乖乖地回到房间里。李杜气呼呼地指着岸

英："侬打人，还哭啥！"

岸英扑在被子上，呜呜地哭个不停，又喊妈妈，又喊外婆，又喊叔叔……李杜给他哭蒙了，不知这孩子为何这般伤心。

哭够了，岸英才啜泣着说："王叔叔，今天是我不对，可是在他家的时候，他们几兄弟打得阿拉好疼好疼啊！"

"喏，阿拉背上也给扫把打过……"

小董在一旁不吭气，抹着泪，他现在终于明白：没有妈妈在身边，自己再也不敢逞强打人啦！

李杜不能触痛岸英的创伤，又不能容忍他在餐厅的举动，要他们各就各位——睡觉。第二天，他悄悄地找小董谈心说："你是大哥，比他们俩大好几岁，用不着讽刺他们是'乡巴佬'呀！"又找岸英："你要做个文明的孩子，动不动就打人，'勿来事'！都是中国人，要团结和气。"岸英跟他诉一顿苦。李杜心里明白了，但还是警告岸英："往后不准再打架，懂哦！"岸英自愧地点点头。

不过，对于这次的"战斗"，岸英可不后悔，在十多年后，他对妻子刘思齐描述这场"战斗"："我在去法国的轮船上，把他狠狠地揍了一顿！"

军人出身的李杜有着早起的习惯。他起床后，舒展舒展腰腿，把三个熟睡了的少年喊醒："朋友们，起床，看海上日出去！"

十四五岁的少年，正是贪睡的季节，他们很不情愿地起了床，披上衣服，踏上甲板。

岸英极目四望，不禁大喊道："嘿！大海，大海，怎么一下子变成了蓝色的，跟天空一样蓝！"

李杜告诉他们：这里已是东海了，东海和南海的海水是碧绿碧绿的。"

啊，太美了，海连天，天连海；水天一色，好像无边无际的绿色荷叶。一群白色的海鸥，平展着翅膀，跟海轮平排飞行，有时突然冲进海浪 里，好像淹没了，可不久又抖起翅膀，飞上蓝天，尖嘴里叼着一条银白闪光的海鱼。辽阔 的东方，天的尽头和海面的交会处，渐渐地露出一线白光，白光向海、天扩展着，扩展着，那月白的地方，渐渐有了红晕，而抬头看西方的天穹，在瓦蓝的浮着白絮的高空中，突地划出一道剑样的光带，绯红的，玫瑰色的，淡黄色的，美妙无比，瞬息万变。

“啊，太阳，快看！”李杜指向海天相交处，只见一轮巨大的红日，腾地从蓝墨的海水中跳跃而出，仿佛带着一身汗水似的。刚刚上升的红日，还不很圆，尤其是与海面接触处，断断续续地在淋着红色的水光水花水影，而刚刚还是碧绿湛蓝的大海，像血染的一样，变成了“红海洋”……

此刻，甲板上正站满了海员和旅客，大家谁也不吭声，静默极了，每个人都陶醉在大自然的壮丽的景色中。

日出处染上了一片朝霞，五颜六色，瑰丽辉煌，这赤、橙、黄、绿、青、蓝、紫，渐渐地像彩墨画似的，越染越开阔，以至于很快扩放到整个东方，此刻，旭日变成了火球般的太阳，太阳比刚出海时瘦了小了。岸英直感到双目受不了时，才迸发一声：“太伟大了，太伟大了！”李杜仿佛大梦初醒似的，也念叨着：“大自然，真是美妙无比！”

李杜是行伍出身，可他不是一个粗鲁的军人，他喜欢听音乐，也爱哼哼歌曲，有几首救亡歌曲是他最爱唱的，每当唱这些歌时，他眼前便浮现家乡的山山水水和父老乡亲，歌声中，他显得忧伤、愤懑。睡前，饭后，他吹出的口哨声，也总是这几支歌曲的旋律……

李杜喜欢看书，岸英也嗜爱书报，他常常接过李杜的书，认真地阅读，不懂的字，就先请教那个不开口的老师——《学生字典》，查不到的，或只知字面，不懂词义的，就请教李杜。李杜很喜欢他孜孜不倦的好学精神，得知他只是在母亲身边读了一两年小学，在上海流浪时靠这本字典，如今已能看《三国演义》、《西游记》等大部头古典名著时，赞叹不已，不住地摇头叹息："唉，这个世道，真难为这些好孩子了。"李杜很快成了岸英的知心朋友和老师。

有一次，岸英神秘兮兮地悄悄问李杜："王叔叔，你怎么找到我和弟弟的呀！"

李杜笑而不答，看了一眼其他两个孩子，便走出房间，岸英很机警，马上跟出去。在甲板上，岸英挨着李杜的躺椅坐下，两眼深情的望着王叔叔的脸。然而，岸英并没有得到一个满意的答复。

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不久，便和"围剿"红军的东北军、西北军建立了联合抗日的统一战线关系。李杜将军和张学良将军一样，都拥护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主张，对毛泽东非常钦佩和尊重。此时，他正准备到西欧去考察。临行前，他接到了张学良将军交给他的秘密使命，即：中共地下党委托李杜将军将毛泽东的孩子带出去。接受了这个任务后，他便全力以赴地去完成，从在上海办理护照起到在海上飘泊一个多月，以及到达巴黎交给接替的人，整整半年的时间，他始终恪尽了保护人、师长、朋友的职责。对于岸英的提问，李杜不可能透彻地回答，他只告诉岸英："你爸爸毛泽东先生已经到达陕北，他很想念你们。那边正在打仗，按照5年前跟苏联达成的协议，还是将你们送到苏联去学习。

岸英对于爸爸已抵达陕北的消息，早就从报纸上看到了。国民党报上常讲"毛匪已被全部消灭"，"毛泽东为当今石达开第二"，不

久，又在报上出现了通栏标题：共首毛泽东大股流窜陕北，我张学良部正在追击。

不知是遗传因子还是岸英从小生活在政治斗争的环境之中，他从小就关心时事，对政治极感兴趣，他迫不及待地问李杜：

“王叔叔，既然张学良是蒋介石的副总司令，你又是他的部下，你怎么愿意冒险送我们去苏联呢？”

这一问，倒是把李杜问窘了。他跟 这个 14 岁的孩子讲政治、谈战争，似乎不相宜，只摇摇头，用一首古诗回答道：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岸英点点头，似乎明白了一点。

李杜突然站起身，在甲板上漫步，又唱起了他心爱的歌曲：

“万里长城万里长，
长城外边是故乡，
高粱肥，大豆香，
遍地黄金少灾殃；
自从大难平地起，
骨肉离散父母丧
……

岸英知道王叔叔很痛苦，便跟在他身后。奇怪的是，邮船是向南航行的，而王叔叔却总是抬头望着北方。

从上海到香港，820 多海里，康脱罗梭号航行了三四天还未到，孩子们耐不住了，不住地问李杜将军：“王叔叔，怎么还不到呀？”

“朋友们，别急呀。”李杜总是这样亲切的称呼他们，使岸英他们感到很温馨。在上海流浪的日子里，他们的化名杨永福、杨永寿，几乎连自己是谁都忘记了，因为人们对他们的称呼不外乎是：

“dog”(狗)“pig”(猪),或用难听的字眼来臭骂他们。有人称他“朋友”了,真有点受宠若惊。

李杜站在甲板上,面向东南方向,眺望着海的尽头,天上的云头,对岸英说:“永福,你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吗?”

“阿拉勿晓得,那里是日出的地方吗?”岸英瞧过去,除了几只海鸥、海燕在翱翔,什么也看不到。

“那是祖国的宝岛台湾,台湾可富裕啦,居住着高山族同胞。”说到此,李杜眼里发亮了。

“王叔叔,我们的‘罗嗦号’经过台湾吗?”岸英天真地问。

“去不了呀,那里被日本鬼子占领了!”李杜心情忧郁地摆摆头。

“我长大了,要带兵把日本鬼子赶跑,把台湾收回来!”岸英信誓旦旦地说。

康脱罗梭号终于抵达第一站——香港。

香港是远东最繁华的港口,那里鱼龙混杂,李杜怕国民党的特务发现,所以,心里虽然很想上岸去看看,休息休息,沾沾陆地的气息,可为了孩子的安全,他还是不准孩子们上岸,只在甲板上观望一番。

“香港是啥人的?”岸英不解地问。

“唉,跟台湾一样,也是我们中国的,可是清朝政府打了败仗,把香港割让给英国了。”李杜又叹了口气。

“清朝是坏蛋,阿拉长大了也要带兵把它收回来!”岸英握紧两只小拳头义愤填膺。

“朋友,要收回来的地方可多啦,将来要靠你们这一代了。”李杜忧心忡忡地说。香港码头上乱七八糟的样子,他不忍目睹,便回到船厅里,转动着排球大小的、花花绿绿的地球仪。

"这是啥玩艺儿?"岸青问。

"地球仪,就是我们的地球的模型,喏,这里是北极,这里是赤道,我们要经过赤道。你们还要去靠近北极的苏联!"李杜好像地理教员似的,在地球仪上指点着,孩子们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岸英欢欣地问:"王叔叔,我们这'罗嗦号'怎么走呀?你快告诉我。"求知欲极强的岸英,不放过任何学习机会。

李杜掏出一支美丽牌香烟,点燃、喷吐着香雾,然后,稍作思考,用最浅显易懂的口吻告诉三个孩子:

康脱罗梭号从上海启航,经过长江入黄海过东海,经过台湾海峡,在香港停留,上下客人和货物。然后,通过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在越南的西贡停留后。再经南海,过南沙群岛——这些小岛,像明珠散布在碧波荡漾的大海中,海中有无数奇异的鱼虾珍宝。还经过曾母暗沙,它靠近马来西亚,是中国最南端的领土。然后,穿过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之间的马六甲海峡,康脱罗嗦号就从太平洋进入到印度洋。途经科伦坡,在印度的孟买港停留后,再驶进红海,往前走,就来到了非洲、亚洲、欧洲的交会处——埃及的人工开凿的苏伊士运河。穿过运河,进入地中海,大约还要走2000多公里,才能到法国……

岸青听到印度二字,就神经质地反感,"印度红头阿三(巡捕)最讨厌了,阿拉卖报老挨他们的打!"上海外国租界里,喜欢请印度人看门,当警察,印度大胡子喜欢在头上扎个红头巾,所以,上海人蔑称他们是"红头阿三";而法国巡捕,衣服袖子上有三条杠杠,上海人骂他们是"法国三道头",这些家伙在岸英岸青的头脑里,跟外婆讲的牛鬼蛇神、阎王老子一样可恨可怕。

李杜又向他们解释道:"'红头阿三'是印度的坏人,哪个国家都有好人坏人。印度、埃及、巴比伦和我们中国,是世界上四大文明

古国。朋友们，我告诉你们，任何国家、任何地方，既有好人也有坏人。”

岸英点点头，又突然问：“王叔叔，我们要去的苏联，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了，那里也有坏人吗？”

李杜笑而不答，停了片刻说：“你们去看看就知道了，我没去过那里，我希望你们到哪里遇的都是好人！”

一个多月的航海远行，岸英在李杜将军的指教下，懂得了很多，他知道了天是多么的广，地是多么的宽，海是多么的阔，而和自然界相比，人又是多么的渺小啊……岸英饱览了太平洋、印度洋的迷人风光，黄海、东海、南海、地中海的特色，领略了赤道的炎热，了解了西贡、孟买、苏伊士的风土人情。他们也看见海中强盗——鲨鱼吞吃小鱼。观赏了飞鱼跃上康脱罗梭号的甲板。他们用铁丝做成鱼钩，安上肉骨头，轻而易举地就钓上十来斤重的海鱼，送到厨房里加工，然后，饱餐一顿……有一件事又使得岸英改变了以前的观点，使他感到人类的伟大，人具有极大的创造力。当轮船驶过阿拉伯海、穿过曼德海峡，进入了狭长的红海，再往前走，就到了苏伊士运河。岸英听王叔叔讲过这条运河是用人工开凿出来的，它是连接欧亚的咽喉要道。以前，没有这条运河时，往来欧亚的船只好从非洲最南端的好望角绕行，要多走几千海里，航行的时间要长很多。现在有了这条运河，欧亚两大洲的航距缩短了将近1万公里……亲身经过这条运河，岸英感到，自然界伟大、人类也伟大！

然而，在大海上旅行，可得有耐心，要能忍受无聊和寂寞。大海茫茫，水天浑然一色，放眼望去，除了海，还是海。刚上船时的那股新鲜劲早已过去，船上的东西看过了不知多少遍，每天都是老样子。这样的日子，大人都感到无聊，更何况三个爱说爱闹，对新东西感兴趣且闲不住的孩子。现在，三个人已捐弃前嫌，成了好朋友，在

李杜将军忙自己的事情的时候，他们就在一起玩玩笑笑、打打闹闹，很是融洽。可是，有时候他们也为海中的鱼，热带的风光，赤道的奇景争论不休，嚷嚷得天翻地覆，面红耳赤。

这样航行，对岸英来说，在这14岁孩子的心灵深处，留下了不可泯灭的印象，终生难忘。但是，他在以后也很少谈起这段不平凡的经历，因为，那时他毕竟不是跟父母渡海旅行，而是像一只无线的风筝，在空中飘忽，他是在闯世界。他们兄弟到底要到哪里？王叔叔说我们要去的苏联，还有很远，一路上还要费多少周折，而苏联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是不是人们讲的那么美好，这都还是个未知数。加上远离故土，心中感到惆怅，有时他闷闷不乐地坐在甲板上，望着海面和远处发愣。

离开了灾难深重的祖国，结束了痛苦的流浪生活，跟着李杜将军旅行，岸英的心情是愉快的，但也有触景生情、勾起辛酸往事的时候。有一天，“罗嗦号”经过印度次大陆南端的一个岛屿，岸英他们看到了一种奇怪的动物，它们的样子像老鼠一样，只不过特别巨大，比人还高，东张西望，只是那两只前脚缩在胸前，用两条后腿蹦蹦地走路，停下以后，变戏法似的从胸门前的皮袋里抓出几只“小老鼠”，太有趣了。

“王叔叔，那是啥怪物，把小孩藏在肚皮里？”岸英好奇地问李杜。

李杜告诉他，这是澳洲特产——袋鼠。袋鼠前胸有个皮袋子，为了保护它们可爱的孩子不受外敌侵犯，常常把“儿女”藏在皮袋里……

“啊！，袋鼠太伟大了，这样爱孩子！”岸英摇头感叹不已，同时。此情此景，又触痛了他心中那未痊愈的创伤。

“世上的所有动物都爱自己的孩子，万物之灵的人，更不例外

啊!"李杜大发感慨。

这袋鼠和李杜的感叹,激起了岸英的思母之情。他想起,小的时候,在冬日,妈妈总是用她温暖的胸脯,搂抱着他;喂饭菜,怕鱼有刺,总是先放在嘴里,剔除干净;热菜,怕烫了岸英,要吹凉再送到岸英嘴里。有一次岸英病了,妈妈熬了中药,用羹匙喂他药,他咬紧嘴巴,将羹匙咬住不放,气得妈妈打了他几下屁股,可是,妈妈旋即又抱起搂着他……

想着妈妈,看着袋鼠,这个5岁就离开爸爸,8岁就失去妈妈的孩子,竟伤心地伏在膝头上失声痛哭起来,把李杜吓了一跳。

"妈妈,我们最好的妈妈,你死得好苦哇!"他这一哭,岸青也跟着哇哇大哭。

李杜很同情这两个从小失去慈母的苦孩子,眼睛也湿湿的。

"朋友们,古人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坚强一点,长大了,学好本领,为母亲报仇雪恨!"李杜以一个职业军人的气概,把拳头在空中一挥,说:"来,朋友们,我教你们唱一支歌!"

一听唱歌,三个孩子都围拢来,跟着李杜一句一句地学: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煤矿,
还有那大豆高粱……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我的同胞
还有那衰老的爹娘……
'九一八,九一八'
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离开了我的家乡,
抛弃了无尽的矿藏,

流浪，流浪，

整日价在关内，流浪，

什么时候，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家乡

什么时候，才能收回那无尽的矿藏

爹娘啊，爹娘啊，

什么时候，才能欢聚在一堂……。

李杜唱歌时，仍旧面向东北方，唱着唱着，他的声音嘶哑了，他那明亮的大眼里，饱含着泪花，唱到最后一句，他再也唱不下去了，竟喊着"爹娘啊——"痛哭出声，他的歌声也感染了三个孩子，孩子们抱着他的高大身躯，嘤嘤地啜泣着。这些远离祖国，失去故乡失去亲人的人啊，多么可怜。

每次唱到这支歌，李杜就难以抑制感情的潜流。作为东北军的一个师长，在"九·一八事变"时，他就守卫在沈阳的西北部，他亲眼看见日本飞机轰炸他防区的柳条沟，强占北大营。可是，蒋介石下令不准张学良率领的东北军将士反击，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他们只好一枪不发，带着满腔的悲愤，退到关内。有一支小曲最使人心疼：

高粱叶子青又青，

九月十八来了日本兵，

先炸柳条沟，后占北大营，

烧杀奸淫真是凶，

烧杀奸淫真是凶，

中国的军队有好几十万，

恭恭敬敬让出了沈阳城……。

每当唱到"恭恭敬敬让出了沈阳城"，他既愤怒也自斥。作为一名军人，不去打日本鬼子，而被蒋介石调到西北"剿共"，这真是中

国革命军人的不幸啊!这次他愤而出访西欧,去考察军事、实业,也是对蒋介石"攘外安内"作法的一种消极反抗!

7月底,康脱罗梭号邮船安抵地中海北岸的法国马赛港。一个多月的航海旅行结束了,他们在海上行驶了1.4万多公里,几乎绕了半个地球。至此,岸英才松了口气,他问李杜:"快到了吧?"

李杜摸着他的平头说:"早着呢!"

刚刚上船时,虽然岸英兄弟起初不习惯吃西餐,可是,他们适应能力很强,渐渐地一切都习以为常了。一个月里,他们二兄弟胖了许多,肌肉填补了肋骨之间的坑坑洼洼,瘦骨嶙峋的胳膊、大腿,也丰腴结实起来。这一切,使李杜很满意。而岸英在这个月里,不仅身体长胖长结实了,更重要的,他开阔了眼界,又跟李杜学习到许多历史、地理、自然、动植物、海洋生物知识,好像进了一座野外博物馆,一座自然大学。

马赛港是一座繁华的港口,各国的大轮船停泊在港口。正逢7月,欧洲的炎夏日子,许多法国人和黑人、白人,都到马赛附近的尼斯避暑消夏。法国是个号称自由、博爱、平等的资产阶级国家,人们思想开放,街上男男女女,老老小小,袒胸露臂,岸英看得眼花缭乱,对一些穿着很短少的女郎,他都不敢正视,还不住地摇头:"唉,太不成体统了,不穿裤子,怎不怕丑?"

李杜笑道:"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风俗习惯。西方跟我们中国不一样,各国都有他的长处,要不,我们中国为什么派了那么多留学生到法国来呢!"

"嗯,王叔叔讲得有道理。"岸英点了点头。

站在马赛街头,李杜自然想起了著名的《马赛曲》,由此又想起

了中国的《义勇军进行曲》，还有《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而岸英兄弟和小董登陆后，突然变成了“聋子”和“哑巴”，因为，外国人讲的，他们一句也听不懂，他们问法国人的话，对方也是摇头摆手，连李杜将军也成了“半文盲”。他只会英语，然而，骄傲的法国人即使是懂英语，也很少用它对话，他们认为，自己的语言是世界上最好听的，最优越的语言，所以，明明听懂了你讲的英语，他也用法语回答你的问话，害得李杜不住地摇头：“嘿，这些法国佬！”

“法国三道头是坏蛋，把我的耳朵都打聋了一只！”岸青咕咕哝哝地说，对法国人充满了仇视，“王叔叔，阿拉怎么到这个坏蛋国家来啊！”

李杜笑道：“永寿，法国是个伟大的国家，和我们中国一样伟大，法国人好人多，坏蛋少，也跟我们中国一样，‘三道头’（巡捕）只是少数坏蛋。”

“嘿，阿拉还要‘打倒帝国主义’！”岸青牢牢记着在电杆上写这条标语而被法租界的“三道头”狠狠揍了一顿的事。

李杜凭他的英语和一本法国地图，带着三个少年，找到了马赛火车站，买了四张票，乘快车北上，直奔法国首都、世界著名的花都——巴黎。

这趟特快列车是豪华客车，不仅车身漂亮，车速特快，车箱内也很干净、舒适，窗明几净，座位的沙发又软又松，但在大热天不沾屁股。

岸英已记不清什么时候坐过火车了。虽然曾随父母到过上海、武汉、广州，可那时他还是个三四岁的细伢子，一晃10年过去了，如今他已是个14周岁的少年了。少年对世界特有的兴趣与好奇心，使他坐在火车内一时望着窗外风光，一时看着车厢里的旅客和列车服务小姐，他们都是黄头发、蓝眼睛、高鼻子，说话咿里哇拉

的，有意思极了，真是应接不暇，大饱眼福。

“王叔叔，噢，现在可以叫你李叔叔了吧？”岸英调皮地缠着李杜将军，“法国不是主张自由与平等博爱吗？总不会像国民党在上海那样随便抓人杀人吧？”

“可是，到了巴黎，去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办手续的时候，我们还不能暴露真面目，懂吗？大使馆里是国民党的人。”李杜仍然小心翼翼，生怕在去苏联的某个环节上出毛病，那就前功尽弃，白白跑一趟欧洲了。他倒可以考察实业，而这几个孩子，尤其是岸英、岸青，再回到上海当流浪汉不成？那样，他不仅对不住他心目中的民族英雄毛泽东，也对不起自己的老朋友、老上司张学良将军啊！

火车进入了法国最美丽富饶的卢瓦尔河谷，这里的许多古堡，李杜将军是仰慕已久的，可惜身负重任，不能去欣赏路易十四时代的城堡，去饱啖卢瓦尔河的鲈鱼、鲑鱼的美味。

列车经过法国北部平原时，大地上是一片红、一片黄、一片白，在红、黄、白相间中，填满了翠绿。

“王叔叔，那是啥呀？这是啥？”岸英欣喜若狂，不断地问。

“那红的、黄的，是玫瑰，那白的是茉莉，那绿的是葡萄。玫瑰、茉莉花可以做香水，法国的香水，世界闻名；那葡萄是著名的法国葡萄酒的原料……。”李杜欣赏着一幅幅织锦般的、彩色斑斓的、花的田野，一边向岸英他们介绍。

田野里，也有大片的田地，但不见人和牛，而是常汽车那样的东西在耕地。

“那是啥？

“拖拉机。”

“耕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

“耕地用机械，既省力又快速。”

“阿拉乡下种地做田好吃力呀！”

“将来也有用拖拉机、收割机的时候。”李杜叹了口气说：“不知我们中国何年何月才能这样进步哇！”

“等我爸爸，把江山打下来了，我们也用‘鸡’耕田！”岸青竖着耳朵听，也大发感慨。“我现在肚皮饿了，可以吃一只鸡。”

“这个‘机’，不是那个‘鸡’，是‘土鸡’，岸英帮忙纠正，弄得李杜将军笑出了眼泪。

火车终于抵达巴黎。

“嘿，原来以为外国人都是大个子，你看，法国人跟我们中国人差不多高，那些女人，有的还不如中国人高呢！”这是毛岸英出车站的第一个感触。

“这儿天气真怪，一会儿刮风，一会儿下雨，一会儿又出太阳，跟我们那里黄梅天差不多！”这是岸英的第二点感触。

他们很快找到了下榻的地方。

李杜原以为去苏联很简单，把护照递上去，办个手续，签个证就行了。可哪知，这些外交使馆官员，都是一些老牛作风，按部就班，拖拖拉拉。在中国驻法国大使馆里的领事部、教育处……来回地折腾，还得笑脸相迎，生怕不知哪一关会出纰漏。如果国民政府驻法国大使馆发现永福永寿就是毛泽东的亲生儿子，肯定会卡壳。所以，李杜再三叮嘱：“你们别忘了，一个叫杨永福，一个叫杨永寿！”

“记得，我有福，他有寿！”岸英举起小拳头向李杜保证。

中国驻法大使馆的房屋，还是清政府时代留下的地产，因为国民政府经费拮据，年久失修，千疮百孔；而苏联驻法国大使馆，是俄国皇帝精心选址修建的，不但豪华气派，里面的设施也现代化，更有一块地毯似的草坪和树丛。李杜将两国使馆一比较，不禁摇头叹气。

把护照递给苏联使馆，他们先收下，要他过几天再来。过了几天，说莫斯科还无回音，再等。再去，说那边有回音了，要看看三个孩子。岸英兄弟和小董去了，那位红鼻子外交官把他们从上到下看了个够，然后，只摇摇头，耸耸肩，又打发他们回去，告诉他们一个星期后再听消息……

就这么折磨着，白白地消耗时光。

李杜倒还有事干，他要考察实业，实际上有张学良交待的秘密任务，要忙着会见中国旅法华人、留学生。但他也没有忘记在空闲时，带这三个孩子逛巴黎。

岸英永远忘不了从300多米高的艾菲尔铁塔上鸟瞰塞纳河风光的喜悦、惊奇；忘不了参观世界上最大的艺术宫殿——卢宫，真是琳琅满目，眼花缭乱，美不胜收；忘不了一代枭雄拿破仑在荣军院里的豪华灵柩；忘不了法国骄傲于世的凯旋门，巴黎圣母院；也忘不了跟李杜在著名的协和广场、宽广的香榭里舍大街上漫步的情景。他们第一次乘坐了地铁，下边分好多层，好像蜘蛛网一般。他们还参观了地下墓道，真是吓人。李杜告诉他们，巴黎地下都空了，不是地下铁道，就是地下坟墓……

从炎夏到隆冬，时光流逝，很快过去半年，李杜、岸英干着急也没用，只好耐心等待。他们那时不知道，苏联正处在大清洗的前夜，对国内控制很严，对外国侨民到苏联去，也是非常敏感，审了又审。

在这半年里，岸英抓紧机会自学，也学会了一些法语，他年纪轻，模仿力和适应力强。他长大成人后，可以自豪的是，他除了中文外，还精通俄文、英文，法语也马马虎虎，因为国际儿童里有27个国家（或民族）共产党领导人及革命烈士的子女，天长日久，各种语言交流频繁，自然，德语、日语、西班牙语等普通的会话，还是能说上几句的。这是后话。

终于等到那一天，苏联大使馆通知他们：同意杨永福、杨永寿去苏联。“万岁！”岸英激动得抱着李杜将军打圈圈，岸英也乐得抱着哥哥不放。只有小董，哭鼻子了。因为，苏联政府不同意他入境，因为他不属于共产党领袖或烈士子女。不过，他也到法国逛了一圈，值得！

按照约定好的时间，李杜将岸英、岸青送上了火车。也许岸英他们并不知道，也可能李杜并没有告诉他们，在送走了岸英兄弟俩后，他也要离开法国了。就在12月12日，在祖国的西安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大事，这也是他意料之中的事，张学良、杨虎城二位将军把蒋介石扣押在西安，他心中十分痛快，必须尽快赶回祖国去，因为那里要发生巨大的变化。临别前，他搂抱着两个结识不久的小朋友，意味深长地说：“有志不在年高，无志空长白岁。到了那边要好好学习，将来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回国有用武之地啊！”岸英、岸青也抱着王叔叔泣不成声，依依不舍……

那一天，他们在苏联驻法国大使馆碰到一个高个子的山东人，三十七八岁的样子，长得很精明。他对李杜将军说：“这两个孩子交给我吧！”约好了上火车的时间，李杜这才松了一口气。原来，此人就是中共驻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康生。

第 二 部

少年·立志

他的志向是当政治家、军事家，并且执意地追求着……然而，父亲却劝他，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告诫他不要得意忘形，不脚踏实地、实事求是是危险的。父亲没有干涉他的选择，可是，他回国后却因没有学到一门技术而懊悔过……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毛岸英兄弟在苏联的生活是怎样的呢？现在要想搞出个眉目来可能是相当困难的了。好在我有先见之明，早在1978年秋冬季节，我访问了韩铁生、郑一俊，访问了蔡博、李特特、郭志成等人。我访问的这些人中，有毛岸英的老师，有毛岸英的同学、好友，当年共同学习、生活在苏联。每会见一位，我都详细地询问了毛岸英的情况，他们也都尽其所知向我讲述当年的情景。我还访问了毛岸英的爱人刘松林。我把他们谈的情况仔细地记录下来，所以，我手上有不少材料可用。现在看来，这些材料都成为记述毛岸英生平的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和可以相信的依据了。写作，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体验，莫斯科什么样？以前，没有感性知识，然而我的机会来了，1991年5、6月间，我借去芬兰赫尔辛基参加世界期刊代表大会之机，在莫斯科停留了24个小时。仅仅24个小时，也就是一天的时间，太少了！但没关系，不为别的，除了能多转一转世界之外，还有更重要的目的，当然，这只有我心里清楚，主要是想体会一下，哪怕仅仅几个小时也是难得的为将来的创作寻找一种感觉……

他成了国际儿童院里的小领袖；他在果麦尔城大出风头……父亲对他的文章百看不厌，为自己的儿子开始了新的生活而高兴。

1936年末。

一辆国际列车疾驰，向东、向东……沿途经过柏林、华沙……

走了好几天，几乎横跨了整个欧洲大陆，又是几千公里的漫长旅行，最后，终于到达了莫斯科。

下了车，迎接这两个中国南方少年的是冰天雪地和严寒。他们走出莫斯科车站乘车来到一个名叫莫尼诺的地方，住进了设在这里的中国儿童院。这里到处是一片银装素裹的白色世界，仿佛一下子掉进冰窟窿似的冷。小时候，他们就听妈妈讲过北极的神话故事，很可怕的，会冻死人呢！

岸英哆哆嗦嗦地而且神秘兮兮地对岸青说："这里靠近北极啦，听说耳朵鼻子都要冻住的，千万别乱摸，要是不小心，一抹耳朵，耳朵就掉下来了！"可是，他自己真的试着摸了一下鼻子、耳朵，只感觉鼻子耳朵冻得木木的，但它们都没掉，仍然好好地长在脸上。看到哥哥"试验"失败时的尴尬样，岸青也煞有介事地说："在这里不能随便在外面撒尿的，要是撒尿的话，还没等尿完，那尿就会冻成了一根弯弯的冰棍儿了，阿拉试试看。"说着对着雪便尿了起来，结果，撒出的尿并未冻成棍儿，而眼前的雪却被热乎乎的尿冲化成一个泛着尿黄的、一尺多深的窟窿。看着自己的"杰作"，岸青带着满意和胜利的音调说："嘿嘿，看看是阿拉厉害还是侬厉害！"

在外边站得时间长了，浑身上下干冷干冷的，"乖乖隆的冬，韭菜炒大葱！"岸英在上海滩跟流浪儿混在一起，学会了一些俚语土话，这会儿，他冻得直打哆嗦，双臂紧紧缩着，牙床直打颤，不知不觉当中突然冒出一句苏北下河话来。兄弟俩又冷又好奇，但终于耐不住了，便飞也似地跑回到房间里。

这里的房屋，跟中国的不一样，尤其不像湖南乡里的土坯房子，不但不生火，而且几乎是八面透风。这里一年中有一半多时间处在冰冷的寒季，所以，房屋的墙壁都是双层的，玻璃窗户也是双层的，房内有暖气，有火墙，与外面冰天雪地恰好相反，房间里总是

热哄哄、温暖如春，室内室外完全是两个世界。

莫尼诺国际第二儿童院真是孩子们的天堂，这里住的都是中国革命家的后代。这所儿童院是为了解决中国革命家的后顾之忧，经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同意，专门设立的。儿童院里有三位教师：郑一俊（俄语名字叫阿烈耶夫）和妻子赵云龙；女教师方朗，她原是上海纺织厂的女工，受过中等教育，丈夫在国内牺牲了。师哲是儿童院副院长，他来不久即将儿童院作了调整，把希腊、保加利亚、西班牙等国的孩子送到伊万诺沃国际第一儿童院，将中国孩子集中在莫尼诺第二儿童院。中国教师教孩子们的中文、中国历史等，目的是让他们知道自己的祖国，将来为祖国工作。另外，还有几位苏联教师，负责教孩子们俄语、数学和革命理论等。

先后住进儿童院的有：

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杨永福，俄语名字：塞尔盖依，爱称谢廖沙），毛岸青（杨永寿，俄语名字：亚力山大，爱称戈勒）；女儿：李敏，即娇娇

刘少奇的儿子：刘允斌；女儿：刘爱琴

朱德的女儿：朱　敏

蔡和森、向警予的儿子：蔡　博；女儿：蔡　妮、蔡　转

林伯渠的女儿：林玲玲、林　莉

李富春、蔡畅的女儿：李特特

苏兆征的女儿：苏丽娃；儿子：苏河清

郭亮的儿子：郭志成（郭多难，俄语名字：弗拉基米尔·大保）

张太雷的儿子：张芝明（小保）

赵世炎的儿子：赵令超、赵施格

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瞿杜一）

罗亦农的儿子：罗西北

陈昌浩的儿子：陈祖涛

王一飞的儿子：王季龙（王继飞）

林彪的女儿：林小林（琳）

博古的女儿：秦吉马

……

这些孩子当中，他们的父母，有的已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如郭亮、瞿秋白、蔡和森、向警予、赵世炎、罗亦农……；有的在战斗中壮烈牺牲，如张太雷等等；有的正在领导着中国人民和日本帝国主义浴血奋战，如毛泽东、朱德、刘少奇、林伯渠、李富春……等等。

莫尼诺儿童院于1937年成立，1940年关闭，中国孩子便都转入离莫斯科二三百公里的伊万诺沃城，在那里设立有国际第一儿童院，接受的孩子扩展到27个国家和民族地区的革命家的后代。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的这种作法，有效地支持中国和其他国家的革命者们，解除了他们的困难和顾虑，使他们全身心投入到为祖国、为民族解放的事业中去，同时，也为各个国家培养了革命和建设的接班人，这一历史功绩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所属的国际儿童院也都撤销了。这时候，孩子们也都成长为青年人，其中大多数进入苏联的大学和各种专科学校继续深造。

岸英兄弟俩进入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比起在上海的流浪生活来，简直是从地狱来到了天堂。当时的苏联是唯一的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有一首歌是这样唱的：它多么辽阔广大，有无数田野和森林；在这里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他们骄傲地互称同志，互相尊重，非常自信，无尚光荣；他们热爱和平，追求着和睦、幸福，这里没有压迫，没有剥削，每个人都要工作，每个家庭的生活都得到保障。当

时，苏联实行的是五天工作制。工作的时候，人们都很紧张、热烈。以煤矿工人、劳动英雄斯达汉诺夫命名的社会主义竞赛运动正在全苏蓬勃发展，人们都在奋发工作，争当“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然而，一到休息的日子，人们都愉快地去旅行，去度周末，尽情地、自由自在地呼吸、享受。

岸英兄弟刚刚到莫尼诺的时候，儿童院里的孩子只有 50 来人，生活非常舒适。苏联政府对这些中国革命的后代十分关怀、爱护，提供了种种优越的条件，让他们生活得幸福。

为了能够更详细地了解毛岸英在苏联学习、生活的情况，我访问了他在苏联儿童院时的一些同学。李特特——李富春和蔡畅的女儿，在农业科学院工作，1978 年 12 月我拜访她的时候，她已经 54 岁了，可是她热情好客，在我的请求下，她向我讲了很多很多 40 年前的往事……

我是 1938 年冬天到苏联的。毛岸英兄弟在莫斯科学俄文。在那里的还有林莉、林玲、小保、蔡妮、菲菲……岸英比我们年龄大，是高级班的，我们都刚去不久，也比他年纪小，在初级班。在我们这些小弟弟、小妹妹面前，岸英总爱逞英雄，显他年纪大。岸青不像岸英，总调皮捣蛋，岸英只比他大 11 个月，却总要照顾他，帮他洗衣服，做很多事情。岸英兄弟俩常在一起下棋，下得非常认真，常常是岸青输，可是输了又不认输，非要悔棋不可，不让悔，就发脾气，吵闹，俩人常常吵架，最后，又总是岸英让着他。每到这时，岸英非常气愤，狠狠地说：“好！好！这一回让你，以后再也不跟你玩了，再玩是小狗！”可是，过不了多久，经不住岸青的纠缠，俩人又摆开了架式，杀了起来。后来岸英到军事学院去学习，临走时交待我们帮助岸青。星期天，我们一些女孩子就去帮岸青整理整理内务，洗洗衣

服。

当时，莫斯科还有一座“中国参战人员疗养院”，也叫“红军长征干部休养所”，是专门为中国的红军将领开设的。红军长征胜利后，很多干部身体不好，国内没有条件，党中央便把他们送到这里，他们一边治病休养，一面听苏联专家讲军事、政治、经济、联共(布)党史等革命的理论。苏联专家讲课，由韩铁声当翻译，他的俄语名字叫伊万诺维奇。后来。红军将领们陆续都回国了，韩铁声便到儿童院来给我们当老师了。

红军长征干部休养所离儿童院并不很远，每逢休息日，都有人来看望我们。每次来人，都为我们带来糖果、点心。在异国他乡，见到这些叔叔、伯伯、阿姨们，像见到了亲人一样，很是亲热。我们也排练了一些节目，表演给他们看，有俄罗斯民间舞蹈、小话剧、诗歌朗诵……岸英的嗓门高，喜欢朗诵，在台上，他站在前排，右手向前方一伸，就朗诵开了，很富有感情，很投入，像个演说家。我们站在后排为他伴唱，气氛很活跃。岸英还喜欢唱歌，经常唱的一支俄国歌曲是《含羞草》。

我们这些中国孩子吃住在儿童院。白天，就到附近的苏联学校去上学。放学后，儿童院为我们安排了很多业余的小组活动，有军事组、摄影组、芭蕾舞组、航模组、绘画组、刺绣组、墙报组……我和岸青参加的是绘画组，他喜欢画画，我也喜欢。岸英的文章写得很好，是他母亲在他小时候教他学习古文，后来他又特别爱看书看报，勤于学习的缘故。我们在儿童院里办墙报，他是编辑，我是美编，我在他写的文字稿旁画些山水人物图案或是写上美术字。岸英是军事组的组长。他对当时的国际形势非常关心，什么芬兰战争、兴凯湖对日战争啦，他都十分注意，认真钻研，讲起来头头是道，显示出很聪明[illegible]干。

冬天，是我们最活跃、最开心的季节。我们都学会了滑雪、溜冰。打雪仗是我们踊跃参加的活动。岸英个子大，男孩子都愿意跟他在一方。打起仗来，我们都是他手下的败将。但是，我们不服气，打败了也不气馁，跟他对着干。他滑冰、滑雪技术都很好，很娴熟灵活，在我们面前，他经常故意露两手，显示显示。他对文体活动都爱好，踢足球、打排球，他也是主力……

少先队每次组织野营，岸英总是作为领导人物出现，因为他是少先队的大队长。他个子高，力气大，野营途中，常帮助女同学和年纪小的同学拿东西。作为回报，我们女同学也总是把带的食物分给他一部分，他饭量大，吃得多，我们就当他的后勤部长。

在我专心地听着李特特向我讲述往事的时候，她讲的一件事情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

她说，1939年的一天，毛岸英以儿童院少先队代表的身份，参加了苏联的少先队一次代表大会，在会上介绍中国革命斗争情况，蔡妮当他的翻译。那次，他大出了风头。为此，周恩来伯伯启发他写了一篇文章。周伯伯回国时，把文章带回延安登在报纸上。

根据李特特的提示，我钻进了图书馆，一张一张翻阅着发了黄的报纸。报纸的纸张很粗糙，印刷质量也不怎么高，报纸上密密麻麻的排满了繁体字，看起来很费劲，这使人想起了，当年延安的条件是何等的艰苦。翻着翻着……“可找到了！”我兴奋得差点不能自制，几乎喊出声来。这一举动惊忧了周围正在刻苦钻研学问的老少学者们，他们不约而同的抬起头，带着不满的神情看着我。我抱歉地回视了他们一眼，赶忙低下头，仔细地看着我寻找到的东西。说实话，我认为，我找到的以及我的心情，不亚于他们那些学者在研究中的新发现。

毛岸英的文章发表在1940年4月12日《新中华报》第六版上。当时《新中华报》是中共中央的机关报，它不但在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被广泛阅读，而且在国统区也有很大影响，具有很高的权威性，毛泽东曾称赞它是全国报纸中最好的一家。毛岸英的文章登载在《新中华报》上，可想而知，看到文章的人也是很多的。文章是以信的形式写的，从中人们可以了解到中国少年在苏联的生活、学习情况，也可以了解到苏联人民和少年儿童对中国革命和中国抗日战争的关注、同情和支持。在文章的前面，《新中华报》特地加写了编者按。

为了使读者更能了解毛岸英，我把他的这篇文章全文照录下来，因为，这封信发表后，在边区引起很大反响，人们争相阅读。岸英的父亲——毛泽东看到后，也为儿子的成长高兴，为儿子的才干感到无限的欣慰、骄傲。

中国儿童在苏联

——毛岸英

这是一个16岁（发表时应为18岁——作者注）的小朋友从苏联写来的信，我们可以在这封信里看到苏联人民对中国儿童的热烈的爱护和对中国抗战的伟大的同情。值此“四四”儿童节纪念大会开幕之际，把这封信发表出来，作为一件宝贵的礼物，同时我们也代表全中国的儿童向伟大的领袖斯大林同志，全苏联的人们及儿童们致敬。

——编者

（衔略）

我用极大的热情写这封信给你们，述说一下我们在

苏联的生活情形及苏联人民对于我们的待遇及对中国人民的热烈的同情。

我于1937年初来到苏联后，真好比到了天堂一般。当我在中国时，从来也没有想到会有这样幸福的生活，苏联的人民看待我们比看待自己的儿童还要好，把我们当做上等的贵宾看待，想尽一切方法使我们的生活能够圆满和快乐。

我和其他的中国儿童住在一起，我们所住的房子真可说是头等的楼房。里面陈设得美丽精致，又宽爽，又清洁。有图书馆、有打球室、有游艺厅、有图画室、有运动厅、有自修室、有电影、有演剧及表演台等；外面则更是雄壮：有足球场、有篮球场、有对球场（排球场）、有网球场，有专门的运动场，有专门的避风雨、避太阳的亭子，有我们自己所种的菜园子，有天然供给我们的游泳、钓鱼、划船的河流等。真是说不尽讲不完。

我们每天三顿大餐和一顿茶点，早饭后有苹果或桔子吃；下午有糖果或饼干等吃。每六、日至少有一次电影看。电影都是有声电影，有关国内战争的，有关于伟大领袖列宁的，有关于破案侦探的，有关于苏联儿童的幸福生活的，有关于苏联国际军事力量的，还有关于中国的，例如：《中国给以反抗》、《英勇的中国》、《中国在斗争中》等等。除此以外，我们还常到戏院里去看戏。

时常有人请我们去作客，而每次则总有我参加（我是二十个中国儿童团员的主席），同时，总是要我去用中国话演讲（致词）。

我记得第一次我用中语致词时，有点讲不出来（发

慌)，但第二次就好多了，第三次、第四次则更不慌不忙的了。

有一次，内务部的俱乐部在过新年时，请我们去，同时还请西班牙的儿童，西班牙的儿童用西班牙语发了言(另一个则用俄语翻译)，当我发言时，差不多每一段话都引起了热烈的鼓掌，但我并没有因此而发慌。特别是当我讲到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战时，说到伟大的中国人民一定能得到胜利的时候，更是掌声雷动。

苏联的人民是多么同情我们中国的抗战啊！还有一次，我记得是白俄罗斯果麦儿城(省城)开全城儿童代表大会，(由红色救济会组织)也请我们去。当时只派了我和另外一个中国女孩妮妮去。我们坐在飞快的火车上，不到一天就到了。当我们下了车，一出车站时，只见广场上挤满了人群，儿童团员们排着队迎接我们，还有人送我们鲜花，他们打着旗，吹奏音乐，真好像迎接一位什么大领袖一般。因为人越挤越多，简直走不出去，就是民警帮忙也挤不出去，后来没有办法，只得坐在汽车上冲出去。后面的人群跟着我们的汽车跑。但汽车到底比他们跑的快，他们很快地就追赶不上了。我用手向他们摇动，表示对他们的抱歉与感谢。不一会，我们到了一个大旅馆门口，推门进去，就上楼。此时，市党部书记、市青年团书记、果麦尔城红色救济会主席、儿童团总队长等都来了，他们询问了我们一些情况问题，我都圆满的答复了。

我们休息在一间很阔气的房间里，特别使我们高兴的，就是听说这房间曾是苏联国防委员长，著名的伏罗希洛夫大元帅及著名的苏联骑兵总司令布将纳(布琼尼)元

帅所住过的房间。

晚上6点钟时，大会应该开幕了，我们当然也要去。在路上，我们遇见了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代表（政府委员）及果麦儿省教育厅长鲁多妮可娃女士，她是非常和蔼可亲的人……不一会，我们就到了开会的地方，它是果麦儿城的儿童宫，从前是一个地主和王侯伯斯容维奇的住所，现在改为果麦儿城的儿童宫。里面宽大得很，有各种各样的设备，组织有各种各样的小组，如：航空组、海军组、摄制组、音乐组等。很多儿童在功课完后就到这里来，多么幸福！我们一进会场时，忽然掌声大作，大会的代表们都向我们中国儿童的代表敬礼，热烈的欢迎我们。

掌声静后，就开始选举主席团。第一名就是"贵宾"的我，第二名就是与我同来的妮妮小姐。再就是市党部书记、青年团书记、最高苏维埃代表及教育厅长普鲁多妮可娃女士，以及其他等等。先由果麦儿城红色救济会主席报告。然后就是我用中国语致词（妮妮作翻译），当我们起坐走到讲台时，一阵热烈的掌声真是如雷贯耳。

我说："伟大的中国人民，在他面对侵略者日寇的斗争中，是要胜利的。全世界爱好和平的正义人士，尤其是伟大的苏联人民，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帮助，使中国人民更有多倍的力量和勇气，更能很快的战胜日寇。苏联是中国人民最忠实、最好的朋友——！"当我讲完后，一阵热烈的大鼓掌，真有可能把屋顶震破。掌声稍静后，红色救济会主席忽用粗高的声音喊道："与日寇斗争的伟大中国人民万岁！"恰巧在这个时候，另外一个人也在那里高呼口号："英勇的中国人民万岁！"两个一对或，使着劲，弄得很

是有趣。“我们亲爱的斯大林同志万岁！”下面又有人在那里喊。“四万万五千万的中国人民一定会胜利！”又是一个有力而雄壮的呼唤。

次日，我又被请到马克思学校、斯大林学校及铁道工人子弟学校去演讲。每一次都受到最热烈的欢迎。“中国人民万岁”、“伟大的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民万岁”、“中国人民一定会胜利的！”等等雄壮的口号，每次都使我感到无限的兴奋和说不出来的感觉。我想不仅我一个人有这种感觉，就是全中国人民（除汉奸、托洛茨基匪徒们），全中国的儿童看见到苏联的人民、苏联的儿童，这么热忱的欢迎中国儿童，这么衷心的同情中国的抗战，也一定感觉到非常兴奋和欢喜的。

在苏联，每份报纸上，每天都有一大篇关于中国的消息。战情和游击队的活动消息，每天都有。常有关于中国人民在抗战中所表示的英勇战绩的登载，常有苏联记者的通讯，有关于中国的各种论文。除此以外，还常登载中国抗战的各种照片。中国军队若得到了什么新胜利，苏联的报纸总是用注目的大字标题登载。同时，蒋委员长的演讲，李宗仁、陈诚等名人的谈话等，也总是用大字标题写着。

总之，苏联的报纸在精神上，对于中国的抗战是具有极大的同情和帮助。对于日寇则恰恰相反，不是登着“日军的进攻遭受完全破产，”就是写着“日寇后防的不安”、“日本的经济崩溃和物价的高涨”、“日军受了大损失”等等。在最后一个时期，除了日军的每天损失外，在每半个月内，差不多都有一个日军的损失统计，两万，三万，三万

五千，四万……死的真是不少。

除了报纸，苏联的各种杂志周刊上也常有关于英勇的中国人民斗争的速写文章，同时，还有许多在精神上帮助中国抗战的标语图画。例如，有一张标语图画上，画着一个中国士兵用刺刀刺着一个在中国土地上爬不动的日寇，并用红字写着："与日寇作斗争的中国人民万岁！"除此以外，苏联的无线电每天总要播四次最后新闻，早上七点钟及晚上十一点半，差不多总是有中国战情的广播报告。其他的中国消息，则大都在十二点、六点钟传报。我差不多每天早上七点钟都去听的。

若在过什么大节时，例如十月革命和"五一"节，苏联的无线电更是在精神上同情中国的抗战，有时还要请中国人去广播演讲，或是从重庆接电话过来，再广播全国。总之，苏联人民对中国人民是具有极大的同情的；同时，我想中国人民对于苏联人民也一定是这样的。

我现在俄国学校里学习。我要百倍、千倍地完成我的学习。我很注重于政治和军事，成为一个很好的宣传家，并且愿意成为一个政治军事家，以便将来为伟大的新中国的事业而奋斗。我坚决的相信在抗战胜利以后，在国共合作的基础上，中国一定会被建设成一个先进的、自由的、幸福的强国。在那个时候，中国将享受自由与平等的生活，中国的儿童将得到免费学习的权力，将不再过那种贫苦的生活，那时啊，中国是伟大的、强大的、民主的中国了！

亲爱的祖国同胞，信已经写得很长了，不可再往下写了，再会吧！若有机会，将来还可以写信给你们，但我也希

望你们写封信给我及全体的我们。我以极大的热情等待着你们的信。最后，向坚决领导全中国抗战的民族英雄蒋委员长、英明的中国共产党及八路军的领导者——毛泽东和朱德同志以及全中国的英勇抗战的将士致以最热烈的敬礼！同时，也向全中国的儿童——未来新中国的主人翁致最亲切的兄弟的敬礼。

岸英的这封信，洋洋洒洒3500字，充分表现了一个中国少年的组织能力与表达能力，用词遣句都很有分寸。岸英的这篇文章作为父亲的毛泽东是百看不厌的。

在莫尼诺国际儿童院，他才第一次见到了周伯伯，可是他哪里知道，8年前，周伯伯为了寻找他们兄弟曾焦虑万分……周恩来嘱咐他们不要忘记祖国，要刻苦学习，你们身上寄托着中国的未来和希望。

李特特对我讲，毛岸英这篇文章是在周恩来启发下写的，也是周恩来带回延安发表的。我查阅了有关资料……

周恩来是1939年9月中旬到苏联莫斯科的，他这次来苏联是为了医治臂伤的。1939年7月10日，周恩来骑马到中央党校去作报告，途中，马受了惊，狂奔起来。骑在马上的周恩来被突发的意外事件搞得措手不及，而被掀下马来，坠地受伤，他的右手壁撞在石头上，造成粉碎性骨折。他忍着巨大的痛苦，一边治疗，一边仍然不

停地工作。8月初，他还在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作了重要报告。40多天后，医生对他的胳膊复查后，发现臂骨愈合的很不理想，尽管采取了按摩热敷等措施，右肘仍处于半弯曲状态，无法伸直了，右臂的肌肉也出现了萎缩。限于延安的医疗条件，中共中央决定，由邓颖超陪同，让他到苏联去治疗休养。8月27日周恩来离开延安，先在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停留了一段时间，检查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的工作，先后四次和新疆省主席盛世才谈判，争取他继续同中共合作抗日……直到9月中旬才到达莫斯科，住进了克里姆林宫医院。

毛岸英是第一次见到周恩来伯伯，那篇文章也是在这次见面后，由周伯伯带回延安的。

中国儿童院的孩子们，经常参加苏联少年的少先队的活动。为了便于活动，在1939年1月21日，列宁逝世纪念日的这天，儿童院也建了少年先锋队组织，孩子们都加入了少年先锋队。由于岸英在各方面都表现很出色，群众威信很高，所以，他被大家选为少先队的大队长。当上了少先队的领导，他又是儿童院中的小演说家，因此，凡是有涉外的活动，大家经常推举岸英代表儿童院的中国孩子出席。

1939年的岁末，儿童院的孩子们正在张灯结彩地准备迎接1940年元旦到来。正在忙碌的孩子们被突如其来的消息激动了，“周伯伯要来儿童院啦！”“周伯伯要来看我们啦！”孩子们高兴地跳着、叫着。儿童院的七八十个中国革命家的后代得知周恩来伯伯要来看望他们，兴奋得像盼望过新年一样。那边孩子们赶忙着排练精彩的节目，要表演给周伯伯看；这边，孩子们一面扎着鲜艳的纸花，

一面热烈地谈论着。

在他们中间，很多人曾见过周伯伯和邓妈妈，那些没见过的孩子立刻把见过周伯伯的人围在了中间，带着羡慕和急切的心情问这问那……毛岸英没见过周伯伯，但是，他知道周伯伯跟爸爸一样，是位受人尊敬的、非常了不起的人，最最好的人。孩子们在七嘴八舌地大谈着周伯伯、邓妈妈是怎样关怀着革命烈士的后代……他们中间说得最多的要数蔡博和郭志成了。

岸英急于想更多地知道周伯伯的情况，不住地催促着蔡博和郭志成："快说，快说，别尽卖关子喽！"

蔡博的父母都是为革命牺牲的。他的妈妈向警予是党中央委员，妇女部长，1928 年 5 月 1 日在武汉被反动派杀害；他的父亲蔡和森是党中央的重要领导人，第五、六届党中央政治局的常委，1931 年 6 月因叛徒出卖而被捕英勇牺牲。母亲和父亲先后牺牲，蔡博并不知道，那时他和妹妹的年纪还小，他正在湖南老家湘乡东山学校上学。1938 年 10 月下旬，日军占领了武汉，周伯伯转移到长沙。一到长沙，周伯伯便打听蔡和森烈士子女的下落，当他听说蔡博兄妹住在湘乡老家时，便派人到湘乡，在十八集团军驻湘乡转运站的协助下，很快便找到蔡博兄妹俩，并接到长沙。后来，周伯伯安排他俩转到重庆，与周伯伯住在一起。在和周伯伯、邓妈妈一起生活的日子里，他们待蔡博兄妹像自己的亲生子女一样……

没等蔡博说完，郭志成便截过话头滔滔不绝地讲述起来，"我也是周伯伯派人找到的。我爸爸郭亮 1928 年被何键杀害在长沙。爸爸牺牲后，妈妈带着我到了长沙县铜官乡下躲避起来。一天，妈妈接到地下党的通知，便带我到武汉八路军的办事处。我们在办事处住了十多天，就和周伯伯他们住在一起。周伯伯和邓妈妈住在楼上，我们住在楼下。周伯伯和邓妈妈可喜欢我啦，给我买了许多玩

具。后来由项英伯伯带我们到了延安。我们去看了毛伯伯，我知道毛伯伯喜欢吃鱼，延安又没有鱼吃，我就把妈妈给我的两个鱼罐头送给了毛伯伯。后来，蔡畅姑姑把我们从新疆秘密带到苏联……周伯伯一见我，准认得的。”

郭志成很自豪地讲述着，边讲边手舞足蹈。其他见过周恩来的男孩女孩，都争先恐后用万分感激和敬佩的语言，向大家介绍着敬爱的周伯伯。

“周伯伯有孩子吗？”岸英听得入了迷，突然提出了这么个问题。

“当然有啦！”郭志成想当然地回道。

“听妈妈说，邓妈妈没有孩子……”一个女孩子歪着头说。

孩子们突然你看我，我看你，沉默了。

“去问问阿烈耶夫老师。”岸英提议，如果周伯伯有孩子，也到莫尼诺儿童院来学习，那该多好啊！

阿烈耶夫被请来了，他没有正面回答孩子们的提问，只是说：“你们中间有许多孩子的父母，都被国民党杀害了，可是，周伯伯像亲生父母一样爱着你们，关怀你们，你们都是周伯伯的好孩子啊！”

“嘟、嘟……”门外响起了汽车喇叭声。

“周伯伯来了，快去迎接呀！”岸英耳朵灵，一听汽车喇叭声，第一个奔出了大门。

孩子们拥到汽车旁边，仔细一看，周伯伯不在车上，从车上下来的是满面笑容的邓妈妈：“邓妈妈！邓妈妈！”

蔡博、郭志成，还有许多受过周伯伯、邓妈妈直接关怀的孩子们，都围过来，簇拥着邓妈妈，流着幸福的泪花，亲热地大声叫着。

邓妈妈今天特别高兴，能在莫斯科郊区见到这些可爱的孩子，她笑咧了嘴巴，不住地点头，“噢，噢”地忙着应诺，还不时地在这个

男孩头上摸摸，捧起那个姑娘脸上亲一亲，激动得眼里含着泪花。看着这些健康活泼的中国革命家的后代，她心里多么开心啊！

蔡博向邓妈妈介绍了岸英、岸青。她一手搂一个，仔细地打量着这两个失去母亲的孩子，过了好一会，她才轻轻地摇着头，嗫嚅地说：

“孩子，你们受苦了。”

本来笑盈盈的岸英，突然得到母亲一样的爱抚，心里一热，眼泪簌簌地往下掉。邓妈妈用温厚的手，替他揩干眼泪：“孩子，别哭了，来，快来吃糖吧，大家都来吃糖！”

邓妈妈把糖果分给孩子们。在鲜花一般的孩子们的簇拥下，邓妈妈来到了他们的活动室。

邓妈妈从衣袋里掏出一封信，对孩子们说：

“周伯伯在莫斯科治胳膊，他很想你们，这封信是他用左手握笔写的，向你们问好，以后，胳膊治好了，他会来看你们的。”

邓妈妈说完，孩子们噼噼啪啪地鼓起掌来，接着，由一个女孩子宣读了周伯伯的问候信，信一读完，又是一阵经久不息的掌声。

原来，周伯伯非常忙碌，虽然到莫斯科是来治伤的，然而，他并没有休息，就在岁末的这些日子里，他还在忙着撰写向共产国际详细介绍中国抗日战争状况的《中国问题备忘录》。为了赶在年前写完这个数万言的《备忘录》，他只好推迟到儿童院与孩子们见面了。

“孩子们，你们把学会的文娱节目向邓妈妈汇报表演一下吧！”阿烈耶夫说完，孩子们就高兴地在房子里跳起俄罗斯民间舞来。邓妈妈看着这样幸福活泼的孩子，笑得更合不上嘴了。

“给周伯伯写信慰问慰问！”岸英灵机一动，提议说。

“好哇！好哇！”大家拍手赞成。

于是，阿烈耶夫代表全体中国孩子，给敬爱的周伯伯写了一封

慰问信。邓妈妈离开儿童院后，阿烈耶夫还代表全体师生去克林里姆林宫医院看望了周恩来，向他详细汇报了孩子们在儿童院的学习、生活情况。周恩来十分满意，他嘱咐阿烈耶夫要他把孩子们的简况编一个花名册给他。临走了，又再三嘱咐："回去向孩子们转达我的问好，我的伤稍许好些，就去看望他们。"

阿烈耶夫带来了周伯伯的亲切问候。孩子们更加盼望周伯伯早点儿来儿童院，大家能够早日看到敬爱的周伯伯。岸英的心情更加急迫。

1940年元旦那天，孩子们久已盼望的周伯伯终于来到了莫尼诺国际儿童院。

当年周伯伯40岁刚出头，他日夜为革命操劳着。孩子们哪里知道，直到前两天，也就是12月29日，他为共产国际写的备忘录才完稿，共5.5万字。周伯伯在苏联治病期间，忍受了多么大的痛苦啊！医生给他注射麻药后，就硬把胳膊掰到一定的角度，固定起来。麻药效力消失后，疼得他豆大的汗珠直往下滚，不由得叫喊，急得大家团团转。然后他还要忍着巨大疼痛，咬牙挺着，进行按摩，以便使萎缩的肌肉恢复生机，这使他遭受了极大的痛苦。因此，来到儿童院那天，周伯伯比较瘦弱，面色显得有些清癯。然而，他精神饱满，一看到中国孩子——这些革命家的后代，他自己也仿佛变得年轻了。他的右手微微向胸前弯曲着，不能作较大幅度的摆动。

周伯伯穿件深灰色西装，满面慈祥地笑着，跟所有孩子都握了手，挨个地问："叫什么名字？几岁啦？"

当邓妈妈把岸英、岸青拉到周恩来身边时，周伯伯非常激动，眼里闪着光泽，把两兄弟一左一右紧紧地搂在怀里，轻轻地捏着头，无限感慨地说：

“找到你们，可不容易啊！”

听了周伯伯的话，岸英兄弟也激动地不知该说什么好了。在周伯伯、邓妈妈的身边，他们感到和当年在爸爸妈妈身边一样温暖……

也许岸英并不知道，当年，为了寻找他们，党组织费了多少心血。

原来，毛泽民夫妇到江西中央苏区去工作后，党组织便通过地下党的联络站天生祥酒行的佘老板关心着岸英兄弟的。由于环境的残酷，佘老板也时时都为岸英他们担心，生怕出差错。也不知什么时候才能送他们到苏联去。不久，党内出现了叛徒，叛徒不是一般的人，而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主持交通和特科工作的负责人顾顺章，其危害性非常大，在上海的党组织遭到很大破坏。大同幼稚园也被迫解散，孩子们都分散到四方，有的投亲，有的靠友，大一点的孩子便设法安排去做工。因岸英兄弟在上海举目无亲，佘老板匆忙地把他们安置在法国天主教堂供事的地下党员董牧师家中。开始，党组织还能给董牧师家一些经费，岸英兄弟的生活还算过得去。后来，白色恐怖日益严重地笼罩着上海，天生祥酒行出了事，佘老板被捕了，不但岸英兄弟的经济来源断了，而且，董牧师和党组织的联系也断了，环境越来越恶劣了，董牧师家里也住不下去了，几经转移，岸英兄弟便下落不明了。

情况汇报到周恩来那里。

周恩来神色十分严峻，两道浓眉紧蹙着，眼睛寻视着在座的每位同志。在周恩来严肃的目光下，大家都感到非常内疚，毛泽东正率领红军与敌人殊死战斗，他的孩子却不见了，同志们纷纷检讨自己，“没有把毛泽东同志的孩子照顾好，我们有责任”……周恩来轻

轻地摇了摇头，没有一点责备大家的意思，而是语重心长对大家说："要讲责任，党中央负责，我更有责任，我要做检查，但是，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当务之急，是赶快找到岸英兄弟，否则，我们更对不起毛泽东同志。"他的诚恳、负责的态度，深深地打动了每一个人，大家认为他说的非常对，当务之急是找到孩子，于是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分析情况，献计献策。正当大家议论纷纷时，又听到周恩来说到，岸英兄弟才八九岁，肯定不会走的很远，如果没有被人收养的话，一定混在流浪街头的孩子们中间，上海这种流浪儿童很多，都是无亲无友，无家可归的；重点在这方面找一找，可能会找到的。不过，上海这么大，流浪儿又很多，找他们要多派一些人。但是，千万要注意方式方法，不能冒失。岸英跟妈妈一块坐过牢，看到反动派是怎样折磨和杀害他的妈妈的，吃过不少苦头，对反动派非常仇恨，警惕性是很高的，不会轻易相信不认识的人的……大家听着周恩来的分析，都非常信服。交通员小彭自告奋勇地请求说："这个任务就交给我们吧！"小彭是联系中共中央负责同志的交通员，又是湖南人，地下斗争经验很丰富。周恩来很满意，可是他还是再三叮嘱小彭说，光靠你一个人不行，上海这样大，要把交通员动员起来，分头到各处寻找。

不久，小彭便在四马路、五马路（即现在的福州路、广东路）一带，发现两个报童，大一点的有八九岁，小一点的有七八岁的样子，两个人蓬头垢面，头发长得遮住了耳朵，操着湖南腔叫卖着"卖报！卖报！"很像是岸英兄弟。他没有惊动他们，而是远远地跟着他们。开始时两个孩子发现老是有一个工人模样的年青人跟着他们，很戒备，时常趁他不注意时，就溜走了。渐渐他们发现，那位工人叔叔很和善，并没有恶意，反而经常买很多份报纸，包括卖不掉的过期报纸。后来，他们慢慢友好起来，小彭有意识用湖南话和他拉家常。

听到熟悉的口音，小一点的孩子也用湖南话和他攀谈起来。大一点的孩子比较老成，看到这种情况，向小一点的孩子使了个眼色，扯扯他的衣角，说“我们回去吧！”看到这种情况，小彭没讲什么，会心的微笑着。他把发现的情况向周恩来作了汇报。考虑到小彭是党中央交通员，不便长期跟着岸英兄弟俩，小彭便另外派了两个小交通员暗地里注意并照顾岸英他们的生活……

然而，这种情况又没有维持多久，周恩来离开了上海，到中央苏区去了，后来，由于叛徒出卖，小彭叔叔被反动派抓去杀害了。

这些，岸英未必完全了解。然而，也许他还记得当年在上海，有位年青的叔叔经常向他买隔日的旧报纸，经常有人来关照他们……他可能不知道，这些都是敬爱的周伯伯——尽管今天他才第一次见到周伯伯——安排的。在当时极端恶劣的条件下，周伯伯包括小彭叔叔他们本身的处境也是十分危险的，可是，他们仍然尽最大的努力，创造条件，暗中保护着、关怀着岸英兄弟。

岸英可能更不知道，为了保护他们兄弟，那位和蔼可亲的小彭叔叔被捕后，吃尽了苦头。由于叛徒的告密，国民党特务知道他是党中央的交通员，对他施加了残酷的毒刑，要他交出党中央负责同志的住址，他至死不屈。特务又要他说出毛泽东儿子的下落，并引诱他说，只把毛泽东的儿子住在哪里告诉他们，便可以放他出去。面对敌人的利诱，小彭冷笑了一声，说，孩子住在哪里，我知道，但是，他们是革命的后代，我不会告诉你们的！你们是找不到他们的！见来软的不行，特务气急了，吼叫着，快说！他们在哪里！烧红了的烙铁又贴在小彭那被烫焦的胸口上，他痛得昏死了过去……

无论使用什么方法，小彭都坚贞不屈。敌人见从他身上捞不到什么，无计可施了，便在一天晚上，把他装在麻袋里，丢在了黄浦江里。小彭他宁死也不屈服，视死如归，就在临终的最后一刻，他都没

有哼一声。

党组织后来又是怎样找到岸英兄弟的呢？

这个问题，岸英在轮船上曾问过李杜将军，但李将军并没有回答他。他的责任是把岸英兄弟送到法国，交给来接头的人，再由那个人带他们到苏联去，至于离开上海前的情况他并不清楚。

周恩来深有感触地说找到他们兄弟很不容易。的确，为了寻找岸英兄弟，地下党组织费了很大的气力。当年周恩来每到一地，他都委托当地的党组织设法寻找革命干部和烈士的后代，并千方百计地把他们送到延安，送到苏联，安排好他们的生活和学习，像蔡博兄妹、郭志成……很多很多孩子。寻找这些孩子也遇到了很多困难和麻烦，然而再难，也不像寻找岸英兄弟那么难。周恩来一直把寻找毛泽东孩子的事放在心上。以至到后来，1946 年他率中共代表团在南京、上海同国民党谈判期间，他还专门派地下党的交通员打听过毛岸龙的下落。这次，他在苏联中国儿童院见到岸英兄弟，可想而知，一定是非常高兴、非常欣慰的。

1936 年，地下党是怎样找到岸英兄弟的？这确实不好回答。作为为毛岸英写传的作者来说，这个问题不能不引起我的极大兴趣，几十年后，我也是带着这样的问题采访了很多人，但是，由于当年的环境和条件的局限，被访问的人有的知道一点这方面的情况，有的知道一点那方面的情况，没有一个人也不可能有哪个人能完整地讲述出当年的事情来。同样，要是真有哪个人从头到尾讲得有鼻子有眼的话，那倒真的让人怀疑他所讲得是否真实、可靠了。今天，我也只能把我了解的材料放在一起，我的责任是把材料串起，力求能展现当时的全貌……

首先我从在钱希均那里了解到的情况入手。

1935年10月，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革命有了落脚点，形势开始向好的方向发展。12月9日爆发的“一二·九”运动，使党在白区的工作冲破了多年来的沉寂，从低潮中走出来，白区党的组织也渐渐地恢复起来了。

当时，在陕北担任中华工农民主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的毛泽民在保安筹集粮食，他听说担任苏区对外贸易总局局长的钱之光要到西安去采购物资，便找到他，要他到西安后打听一下有没有人要到上海去，毛泽东的三个孩子还在上海，几年了，不知道现在到底怎么样了，请到上海的同志和上海地下党联系，帮助找回来。钱之光到西安后，正好碰到潘汉年，他正要动身到上海，他肩负着重要的使命，一方面与那里的同党中央失去联系的党组织重新接上头；另一方面在民主人士中开展统一战线工作；还有一项更重要的任务是作为中共的代表，去和国民党当局的代表谈判合作抗日问题，钱之光便把毛泽民交待的任务委托给了潘汉年。潘汉年到上海之后，便和上海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同时也把寻找毛岸英兄弟的事情委托给了上海地下党的同志。

寻找工作虽不似大海捞针，但也难度相当大。这几年，上海一直处在白色恐怖环境中，自从中央交通员小彭牺牲后，另外一些知情的人，有的也先后被捕牺牲，有的随党中央转移到中央苏区，红军长征后，这些人也都不知下落。就是个别在上海的人，也因环境恶劣而隐蔽了起来，他们也不知道岸英兄弟的近况。党组织派出交通员查找线索，他们不放过任何一个微小的目标……渐渐的寻找工作有了眉目。地下党的同志又找到了董牧师的家。

1936年春夏之交的一天晚上，在岸英他们栖身的地方，突然来了一位工人模样的上了年纪的人。他有意接近岸英兄弟，先跟他们扯家常，又像摸他们底细。岸英对来人抱着怀疑的态度，倍加警

惕，起先是沉默不语，半天也不说一句话，而且还悄悄地从地下捡起两块砖头，准备出现情况时好用它来战斗。渐渐地，从老工人的言谈当中，他看出来人并不是坏人，便又把砖头悄悄地放下了，他愣着眼神看着这位大伯，不明白眼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对自己情况怎么了解得这么清楚……等他确实证实了这位大伯真的是爸爸派来寻找他们兄弟时，这个饱受人间痛苦，很少掉泪的坚强的孩子，像受莫大委屈似的，扑在大伯的怀里，伤心地哭开了……这哭声有对父亲的思念，对母亲的哀悼，对小弟的怀念，也有对旧社会的仇恨，对5年来流浪生活所受凄苦的诉说……兄弟俩伤心地痛哭着，大伯的胸前都被他们的泪水浸湿了一大片。这位工人师傅知道了这两个孩子真是岸英、岸青以后，心中非常兴奋，开始时还满脸笑容，仿佛找到什么宝贝似的，可是，很快他被两个孩子伤心的痛哭感染了，孩子受了不少的罪啊！他一把搂住了两个孩子的肩膀，也不去哄他俩别哭，而是任他们痛快地倾吐着心中的苦水，他嘴里只喃喃地念叨着："孩子，你们受苦啦！……"等他俩哭够了，工人师傅也用手抹了抹眼泪，长叹一声，对两个孩子说：孩子，这不仅是你们两个人的苦，千千万万的穷苦人和他们的孩子，都是这样苦的呀！你们的父亲不正领导着红军与反动派斗争吗？等打倒了反动派，解放了全中国，穷苦的人才能有好日子过了！"

工人伯伯把岸英兄弟又安置在董牧师家里。俩人洗了澡、理了发、换了衣服，他们脱去了流浪儿的脏模样，又恢复干干净净堂堂正正的孩子面目。

孩子找到了，上海地下党下一步安排是把他们送到苏联去。当时，各项工作都刚刚开展起来，这件事情也是很棘手的。党组织想尽办法，通过各方面的统战关系，由国民党的一位非常有影响的高级将领介绍，趁东北义勇军司令李杜将军去西欧考察实业的机会，

把岸英兄弟和董牧师的儿子一同带出国。

在董牧师家住了一段时间后，地下党便把岸英兄弟托付给了那位“王叔叔”……

经历了这么多的曲折，难怪周恩来说，找到你们真不易啊！

“你长大了准备干什么呢？”周伯伯慈祥地问岸英。

岸英红着脸，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我很注重于政治和军事，我想成为一个政治军事家，将来为伟大的新中国而奋斗！”

周伯伯满意地点着头，和蔼地审视着岸英高高的身材、坚定的目光，连声说：

“好！好！继承父辈的意志，打天下。”

“你们呢？”周伯伯的视线在每个孩子脸上扫视着，询问着

孩子们先是短暂的沉默，低着头不作声，然后，互相推诿着，都不好意思第一个说话。

“还怕羞呀？一个人没有理想，就像没有翅膀的鸟一样，不会有远大的前途的。”周伯伯进一步启发大家。

“我想当飞机设计师！”

“我当医生！”

“我当建筑师！”

“我当农学家！”

孩子们七嘴八舌地讲开了，周伯伯开心地哈哈大笑：“好极啦！你们的想法很对，等到中国革命胜利后，国家建设需要各行各业的专家、工程师、教授！”

周伯伯接着向孩子们介绍了国内战争的形势，指着房间墙壁上挂的毛泽东、朱德的画像说：

“毛伯伯、朱伯伯时刻关心着你们这些革命后代。你们一定要团结友爱，刻苦学习；除了学习一般的苏联功课外，还要学习中国的历史、地理，了解中国抗战的形势。总之，你们不要忘了中国，不要忘了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和朱德同志，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中国的未来和希望！”

孩子们认真地聆听着，会意地点着头。

就是在这次见面时，周恩来鼓动岸英把他们在苏联生活、学习的情况写下来，等他回国时带回去，好让国内的人们更多地了解他们的情况。岸英按照周伯伯的要求，写下了那封充满激情的信。

周伯伯就要离开儿童院了。他提议跟大家合影。摄影师由儿童院摄影组的同学担任。周伯伯、邓妈妈先和全体同学合影，然后，跟岸英、岸青一起照了相，再和蔡和森家的一男二女合影，又跟郭亮、张太雷、赵世炎等烈士遗孤照了相。

当年照片上的亲亲热热、欢欢喜喜的形象，一直保留到今天！

自从妈妈牺牲后，毛岸英兄弟便失去了母爱，“妈妈”这两个字对他们来讲已经非常生疏了。然而，联系起来她和他们之间的母子之情的竟是一位刚刚出生不久、还没有名字便夭折了的婴儿……

1938年一个春日的上午，郑一俊（阿烈耶夫）老师领着一位眉清目秀，高高的身材，略带清瘦的，30岁上下女干部模样的人，来

到岸英兄弟面前，向他们介绍道："谢廖沙、戈勒，你们瞧她是谁？她是专门来看你们的！"

岸英兄弟来到苏联一年多了，他们没有亲人在这里，也不曾有人专门来看望他们兄弟俩。平时，在莫斯科疗养院休养的红军长征干部们，除了看望自己的子女外，一般都是为了看望全体孩子们。有时，岸英他们也作为孩子们的代表到疗养院去慰问叔叔、伯伯、阿姨们。另外，他们俩常到共产国际的宿舍中看望那位曾经在中国当"太上皇"的奥地利人李德，以前他是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代表，大权在握，而现在他只是"国际"普通翻译而已。岸英当然不清楚他在中国根据地内的所做所为，和他相识，还是他 1939 年从中国回到莫斯科以后，除此之外，他们兄弟俩再也想不起来还有什么人与他们有关系。

面对这位突然出现在自己面前的女人，岸英一时不知该怎么办好，而郑老师的表情和刚才说的话，她不像平时来看望中国孩子的叔叔阿姨，好像她与我们有什么特殊的关系。可是，我又该怎么称呼她？也叫她阿姨？他一时不知所措，干脆一声不吭，同时，他又用审慎的目光，偷偷打量着来人。

只见她瘦长的个子，浓眉毛大眼睛，温和的面庞上带着略显尴尬的微笑，然而从她的表情里又透露着疲惫，显示着几分忧郁。岸英他们不知道，她是经历了很大的痛苦抉择后才到苏联来的，而且严酷的战争环境和万里长征跋涉，把她的身体都搞垮了。前不久，她还到医院，经过医生的检查，发现深嵌在她头部、背部和肺部的弹片已经和身体长在一起了，也不可能动手术取出来了……无论是精神上还是身体上，她都要忍受巨大的痛苦和折磨。见到岸英兄弟，她也感到不知如何是好，怎样启齿，只好回过头问阿烈耶夫，"他们就是岸英、岸青吧？"

看到双方的不自在的样子，阿烈耶夫忙来解围，“是的，他是哥哥岸英，又叫谢廖沙；他是弟弟岸青，又叫戈勒。”说完他又转过身来，向岸英兄弟俩介绍说，“她是你们的贺妈妈，贺子珍，刚从中国来，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是的，我就是贺子珍，到苏联改名文英。”

贺子珍脸上漾着笑意，亲昵地说，“你爸爸可想你们哪！”

岸英一时成了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在他心目中只有一个妈妈，那就是生他养他亲他爱他的杨开慧。虽然她已经牺牲很多年了，但是她每时每刻都活在他们心中，现在这个女人怎么成了妈妈呢？对他来说这是不能理解的，也是不能接受的。所以，此时他显得比刚才冷漠了，16 岁的少年，又经历过那样的特殊历程，要想让他的感情转过弯来，是很困难的。

他也不喊她贺妈妈，也不向她打听父亲毛泽东的情况。虽然来莫斯科后，他就给父亲去过信，寄过照片，但对于父亲现在的家庭生活，他一无所知，从中国来的人，也从来不在岸英面前提起这些。

“你父亲身体很好，工作很忙，他常常念着你们呢！”又是贺子珍打破僵局。

阿烈耶夫发觉自己在这种场合，是个多余的人，便招呼贺子珍坐下，自己悄悄地走开了。

贺子珍见岸英岸青的床铺脏乱得一塌糊涂，便以母亲特有的本性，把爱洒在孩子们的身上。她将手中提的一网袋水果放在桌上，弯下腰替他们清理床下的“杂货摊”。她的举动，弄得岸青岸英直伸舌头，表示不好意思。接着，又把岸英换下的衣服，卷成一堆，拿到河边去洗干净，晾好…… 看到她屋里屋外的忙着，岸英虽然也觉得很过意不去，然而，他还是面无表情地跟着干起来，没说一句话。屋里像样子了，也把她累得够劲儿的。他们又重新坐下来，

她把苹果削好了送到俩兄弟面前。开始，岸英不愿意也不好意思接受，可看着贺子珍的一片真诚和充满母爱的双目，岸英便消除了敌意，忙着泡了一杯热茶，送到贺子珍面前，但仍没喊她贺妈妈，只当作一个普通的客人罢了。

莫斯科东方大学与儿童院相隔不远，每到周末或节假日，贺子珍总要带些物品去看望兄弟俩个，像慈母一样关怀他们的衣、食、住、行。因为当时苏联政府对中国红军干部及疗养人员的待遇还不错，每月有70个卢布，除了吃、穿外，尚有节余，贺子珍便把剩余的钱花在两个孩子身上，尽量地给他们温暖、母爱。

渐渐地他们的关系融洽了，虽然岸英、岸青的学习很紧张，但只要有空，他们也去看贺子珍。贺子珍住在共产国际办公楼的一间小房里。

过了一段时间，岸英兄弟俩觉得她有一段时间没来儿童院看他们了，难道是病了吗？他们商量了一下，认为应该去看看她。此时，他们感到她已经是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了。刚一进她的房间，岸英便发现了一个小不点儿男孩。这是贺子珍到苏联后生下的一个男孩，是毛泽东的儿子。

“唉唷，这小弟弟多像我爸爸呀！”岸英看见那个脸上打着皱巴的小男孩，左看右看，越看越喜欢，越看越像毛泽东，额头高高大大的，鼻子眼睛都酷似毛泽东。

“哎哟！这个小男孩怎么有点像我呀？”岸青好像发现了什么似的，轻轻地抓着小孩的手腕，欢喜得爱不释手。

看到岸英兄弟俩的惊喜样子，贺子珍会心地笑了，这样的笑容是很少见的，“因为他和你们是同一个父亲呀！”岸英不知怎样表达他的欢喜之心，喜滋滋地把小弟弟的手往他的嘴里塞。对他的粗鲁表示，这位小弟弟可不领情，一点面子也不给，“哇”的一声大哭了

起来。

以前，贺子珍单人住在共产国际的宿舍里，现在有刚出世不久的一个小男孩陪伴着她了。打这以后，岸英和岸青就经常来看望她和小弟弟。每次来，他们都要逗小弟弟玩。有时岸英帮助贺子珍补习俄语，有时，贺子珍给他们讲井冈山的战斗故事，讲中央苏区活捉敌师长张辉瓒的情景；讲长征爬雪山、过草地；讲他们的父亲；讲自己负伤时的痛苦经历……兄弟俩听得入神，有时开心地哈哈大笑，有时又伤心地掉下泪水……岸英特别喜欢贺子珍唱江西民歌，尤其喜欢由民歌改成的红军歌曲，那一声清脆的"啊呀来喽……"像是把人带回到祖国秀丽的江南，使人精神振奋……

每到这一时刻，贺子珍便不再孤独，她的小屋里便充满了家庭般的欢乐气氛掌声、歌声，笑声……

岸英兄弟俩都非常爱这个小弟弟，岸青老要争着亲自为他起个名字。看着兄弟们的亲热劲，贺子珍故意地问他们："叫个什么名字好呢？"岸青抢着先说：

"起个俄文名，叫卡秋莎吧！"

"你算了吧，干嘛叫卡秋莎，那是大炮的名字。即使是人名，也是女孩子的名字。"岸英不同意弟弟的意见，"要不……，就叫罗曼诺夫吧！"

"这是沙皇的名字，不好不好！"贺子珍不知不觉中也搅到这当中来了。

"那就叫什么'斯基'吧，"这回岸青一本正经地说道。

"还司机呢，又不开汽车，干脆还是叫什么'洛夫'吧，比叫'斯基'好！"岸英汉语俄语混合用一起了。

看着兄弟俩互不相让，争得面红耳赤的样子，而那位小弟弟却瞪着小眼睛，安详地躺在那里，并不知道因为他所发生的这场"战

争”。贺子珍乐坏了，笑得直不起腰来，肚子都笑痛了，过了好一会儿才慢慢停下来，她舒了一口气说：“好啦，好啦，你们别争了，等以后再给他起名字吧！”

岸英比贺子珍早一年多到苏联，而且年纪也小，在学习俄语方面掌握得非常快，也不费劲。可是，贺子珍一来年龄大了，记忆力下降；二来身体不好，伤病缠身，到苏联来又人生地不熟的，环境陌生，学习俄语很吃力。再加上又有这个孩子，生活拖累使她更觉得学习很困难。但她还是顽强地学习着。为了能挤出更多的时间来学习，上课时，她不得不把孩子寄托在婴儿室，等放学后，再接回自己带。

为了帮她赶上学习进度，岸英便成了贺子珍的俄语“老师”，从日常生活用语开始，一步一步地往深处学。一个认认真真，不厌其烦耐心地教，一个虚心好问刻苦地学，所以，她进步还是很快的。在这种亲密的接触中，既提高了学业，也增进了他们之间的虽没有血缘关系但日益加深的亲情关系和母子感情。

有一天，岸英又到贺子珍那儿帮她补习功课，一进屋，发现气氛不对劲。她坐在那里两眼发直，愣愣地不说话，没有了平时对他的那种慈爱和关怀。肯定有什么事情！岸英是个聪明的孩子，他什么也没问，默默地走了过去。来到她的身旁，抬眼一看，看见桌子上放着一张纸，纸上的字不多，是一份电报。他拿起一看，是父亲打来的，“请速回国，要事相商毛”。

“是爸爸打给你的电报，”岸英关切地问。接着他劝慰她，“爸爸请你回国呢！你还是回去吧，他一个人，也很孤单的，你回去他一定很高兴的。”

怎么对岸英说呢?她不愿意甘当领袖的家属,她是有强烈事业心的人,希望得到机会,做更多的工作,为此,她曾把刚刚出生仅四个月的女儿——娇娇,送到老乡家抚养,自己进抗大学习。现在,毛泽东来电报催她回去,岸英也劝她还是回去好,岸英哪里知道她心中在想些什么? 她对岸英说:"你瞧,到苏联来学习,我是下了多大的决心,花了多少精力和时间。现在既然已经来了,刚刚安下心来,学习已经开始了,怎能有头无尾半途而废呢?怎么也要把课程学完了再回去。更何况,有些人巴不得我学不成。他们早已放出口风来,说有些人到苏联来是为了混牌子,捞名誉的……哎!跟你讲这些有什么用,有些事情你是不知道,跟你说也说不清。"

贺子珍决心先不回去,她给毛泽东回了一封信,信上说,在这里的学习已经开始了,不能半途而废,待学到一些东西后再回国服务……

谁知道,不幸接踵而至。

10 月的一天,岸英兄弟又兴冲冲地到东方大学来看贺子珍和小弟弟。可是推门一看,只见贺子珍衣衫不整,也未梳洗,毫无气力般地和衣躺在床上。岸英想,她平时不是这个样子,突然间像苍老了许多,再仔细看去,见她泪流满面,两只眼睛直呆呆的,眼珠一动不动,岸英敏感地觉察到又发生了什么问题。他便四处张望,突然,他吃惊地发现小弟弟没在屋里。他急切地问道:"弟弟呢? 小弟弟呢?"

岸英这一声问"小弟弟呢?"像是把贺子珍从睡梦中惊醒了一般,又把她引发到了悲痛欲绝的境地,她嚎啕大哭起来,哭得泣不成声,痛苦地在床上滚了起来。

原来,为了学习,贺子珍狠着心坚持把孩子送到婴儿室去。前

两天，孩子得重感冒。开始，并没有引起她的注意，仍然把他送到婴儿室。怀这孩子的时候，贺子珍因伤病缠身，加上条件差，身体就不好，孩子出生后体质也就很差。婴儿室的工作人员工作也马马虎虎，不负责任，没有护理好。结果，感冒转成了肺炎，还没等送到医院，便不行了。这个可怜的孩子，来到人间刚刚十个月，便夭折了。人们钉了一口小棺材，把他安葬在莫斯科郊外的公墓里。

这个打击，不但对贺子珍，对毛岸英来说也是巨大的。他是多么爱他这个小弟弟呀！他是那么地幼小，连话都不会讲呢，还来不及叫他一声"哥哥"，便走了；他还没名字就离开了这个世界……想着这个可怜的小弟弟不幸的命运，他又想起自己曾经饱受过的苦难，他曾经受过多少狂风暴雨的侵袭，童年便失去母亲，弟弟岸龙也不在了，现在，又眼巴巴地听候这么好的小弟弟被病魔夺走了生命，不由得他也控制不住难受的心情，泪如泉涌……

过了好一会，他回过神来，想起那哭得要死要活的贺子珍，他用了好多话来安慰她，可都没有效果。看着她那悲痛欲绝的样子，他打心底里头难过，不由得勾起了他的思母之情，他动情地向贺子珍哭诉着："贺妈妈，您别难过了，小弟弟死了，还有我和岸青呢，我们也是您的好儿子呀！"

他和贺子珍相处得这么长的时间里，还从来没有直接称呼过她。喊她别的，不合适，可是，让他叫她"妈妈"，他又总是张不开嘴，碰到必须得叫什么的时候，他不是打个磕巴混过去，或是用"您"、"您"来代替。在这方面，贺子珍也明白的，由于感情的关系，她并不强求孩子们。此时此刻，大家处在万分悲痛之中的时候，双方的感情被小弟弟的不幸联接起来了，两个备受挫折的心灵碰在一起了，他终于敞开了自己的心扉，喊出一声"贺妈妈"！岸青也在旁附和着，"贺妈妈！贺妈妈！"地叫着。

这真诚的、震撼魂魄的喊声，慰藉着贺子珍[illegible]于破碎了的心。突然，刚刚还满床翻滚、痛哭不止的她，[illegible]了魔法一般，停止了哭声，从床了腾地站了起来，一把将两个孩子紧紧地搂在怀里，“儿呀！儿呀！”不停地叫着。岸英兄弟俩好像又回到了当年，在妈妈怀抱里一样，感到母爱的温暖。一个是刚刚失去幼子的母亲，“儿呀！儿呀……”的喊声；两个从小就失去妈妈的苦儿，“妈妈、妈妈……”的叫着，三个人抱作一团，又痛快地哭了起来……这是一种悲痛与幸福交织在一起的情景，这一情景，让任何人看了，那怕是铁石心肠的人，也不能不流下一掬同情之泪的。

不久，又从国内传来了毛泽东与江青结婚的消息。不幸的事一桩接一桩地降临在她的头上。总算还有岸英和岸青两个孩子伴她在这异国他乡，母子三人相依为命，互相安慰着……

不知不觉之中，两年的东方大学学习生活结束了。贺子珍决心留下来工作，她也来到国际儿童院，在东方部，教孩子们学习中文。她和岸英兄弟真正地生活在一起了。不久，1940 年秋，莫尼诺国际第二儿童院关闭，她又随儿童院一起来到伊万诺沃市，仍然在国际第一儿童院东方部工作。

1941 年初，她的宝贝女儿娇娇也来到了她的身边。当年她离开她到苏联来时，她还不满周岁，现在已经是 4 岁的小姑娘了，这对她来讲，不能不说是个极大的安慰。岸英兄弟又有了个小妹妹，也喜出望外，高兴得不得了。在这远离祖国的北方冰城，母子母女四个人团聚了，建立了一个不像家的真正温暖的家，贺子珍无微不至地照顾着兄妹三人。

1941 年 6 月 22 日，希特勒发动了对苏联的侵略战争，苏联的一切都转向了战争轨道，所有旅居苏联的外国共产党人也要支援前线，生活费也停发了，人人都要靠劳动去领取配给的食品。贺子

珍接受的任务是为红军打毛衣、织袜子，每天要完成三双袜子定额，有时要工作到深夜，只有完成了任务，才能领到 300 克的面包。

战争带来的食物的匮乏，儿童院里的生活早已不像从前那样丰富，食品也异常紧张，岸英、岸青和娇娇每天的早餐只有半片面包、一碗玉米粉粥，午餐和晚餐仅仅是一片面包和一盘盐煮土豆。这点食品连娇娇这样的小孩子都不够，更何况岸英兄弟俩，如今已是十七八岁的小伙子了，这点吃的还不够他们“打牙祭”的呢。这点食物仅够填填空空的肚子，更谈不上有多少营养、多少热量。也难怪，此时，全苏联人民都如此，儿童院能保证三餐就已经是相当优越的了。

虽然自己每天也仅有几片面包，但是，贺子珍惦念的是正在成长中的孩子们。她总是把领到的面包分出一部分来收好，每到周末，孩子们来到身边时，她把土豆切碎，烧好一锅汤，然后拿出面包来给孩子们吃。饿了一星期的孩子们，就像三只嗷嗷待哺的雏鸟扑向了她的身旁。看着他们狼吞虎咽地吃着，她总是慈爱地说，慢慢吃、慢慢吃，别噎着，没有人来抢你们的。她也吃不饱，加上原来身体就弱，经常感到体力不支，但她忍耐着，她要把自己为数不多的口粮省下来给孩子吃，这就是母亲，这就是母爱，这就是母亲的天性，这是自然界中最崇高、伟大的品性……贺子珍把全部心血倾注在岸英兄妹身上。在工作之余，她放弃了休息，拿起了锄头开荒种地，种萝卜、西红柿和土豆，尽可能为孩子们多提供一些食品。就这样，在这异国战争的环境中，他们一家人亲亲热热，同甘共苦地过着这艰苦难熬的日子。生活在这样的母亲身边，岸英兄妹是幸福的……

然而不幸的事又落在了贺子珍的头上。

娇娇，她心爱的女儿病了，这对她来说是多么大的打击呀！

在娇娇还不满周岁时，她就离开了她，虽然是为了更好的工作去学习的，但是，作为母亲，她总好像对不起女儿。她忘不了和女儿相聚时的情景……

小娇娇是从延安坐飞机到苏联的，然后被送到贺子珍住处。送的人没有交待清楚要找谁便离开了。同住在一起的中国同事问小娇娇找谁来的，她说要找妈妈，叫贺子珍。人们赶紧告诉了贺子珍。她赶忙跑到娇娇跟前。由于分开时，娇娇还太小，妈妈长什么样，她根本不知道，贺子珍也不知娇娇现在长成什么样了。看到小女孩她便亲切地问：

“你是谁？叫什么名字呀？”

“我叫娇娇。”

“娇娇干什么到这里来了？”

“我要找妈妈！”

“你妈妈叫什么名字？”

“我妈妈叫贺子珍呗！”

“你给妈妈带什么礼物来了？”

“我把娇娇给她带来了。”

贺子珍一把抱住了小娇娇，泪流满面，哽咽着说：“娇娇，我的好孩子，我就是妈妈呀！”娇娇也紧紧地搂着她的脖子止不住哭喊着“妈妈！妈妈！”贺子珍不仅有了两个大儿子，又与小女儿欢聚了。娇娇来到母亲身边，又有两个哥哥相伴，母亲为她买来新衣服、裙子，还有好玩的玩具，感到无比快乐幸福……

现在，娇娇病了，病得很重，发高烧、抽风，昏迷不醒，苏联的医

生说没救了，并推到了太平间外室，就等咽气了。贺子珍急了，她苦苦哀求医生想办法救小娇娇，然而，得到的仅是耸肩、摇头。

就在这陷于绝望的时刻，她显示出母亲的极大勇气。她不能没有娇娇，她刚刚失去了小儿子，这种事情再也不能发生……她把娇娇从医院接了回来，日夜守护在她身边。她把所有值点钱的衣物、东西都卖掉了，换回了白糖、牛奶，用小匙撬开娇娇的牙齿，一点一点地把甜甜的牛奶喂到她的嘴里……在她的精心护理下，奇迹发生了，小娇娇睁开了眼睛，用微弱的声音叫了一声"妈妈"……这也许又是母亲的呼唤，也许是母爱的力量，娇娇渐渐地好转起来，被妈妈从死神的手中抢了回来。

可是，儿童院那位不通人性的女院长，不让贺子珍护理重病中的孩子。由于贺子珍要看护孩子，暂时不能去劳动，女院长便不顾零下三四十度的寒冷天气，不发给她取暖用的木柴，还不发给这个，不发给那个……故意刁难贺子珍。

这么冷的天气，连大人都受不了，更何况重病中的孩子呢，病弱的身体怎能经受住这样的严寒呢？面对这种无理的人，平素性格温和的贺子珍一再忍让，尽可能地自己克服这难以想像的困难。就在娇娇刚刚能下地时，院长就来逼贺子珍去上班。贺子珍请求再准许她在家照顾孩子几天。院长不但不答应，反以污蔑的口气冲她说："你们不劳动，难道还要让我们养活你们这些懒家伙吗？"

贺子珍从来都是努力工作的，听到污辱人格的话，实在忍无可忍了，外柔内刚的贺子珍终于咆哮起来，她豁出去了，把一肚子的委屈、痛苦、愤怒一股脑地向没人性的女院长倾泻而去，言辞激烈地历数了她平时尽搞大国沙文主义、专制、跋扈，没有一点同情心的所做所为。并且反驳地说，我从来就不会偷懒，干多少事大家都看到了的，用不着你来养活，我的口粮都是自己用劳动挣来的……

平时，女院长在儿童院是绝对的专横的，还从来没有人敢当众和她争吵过，她恼羞成怒了。贺子珍这些话，当然也绝对不能为这种蛮横不讲理的人所接受。女院长大叫了起来："我看你是疯了，我要把你送到疯人院去。"她说到做到，不久，一张写有贺子珍患有精神分裂症的报告出现在她的办公桌上，然后，一辆白色漆红十字的救护车开到儿童院，贺子珍被强行拉上车，任凭贺子珍怎样哭喊声明也无济于事，车门"砰"的一声关上，呼啸而去……这是肃反扩大化作法的影响，这是人为的灾难，那些曾经给领导提出过意见的人，很多被视为持不同政见、反对领导人，都被当作"疯子"看待。

等到毛岸英得悉后，贺子珍早已不知去向。从此，他也就未能再见到他那和蔼可亲的贺妈妈，他只能为不幸的、多灾多难的贺妈妈暗暗地掉泪。他太年轻了，没有力量救出可怜的贺妈妈。

在志向追求上，他很像父亲当年那样，他没有听从父亲的建议，在这方面父亲倒不像祖父，他对儿子是开明的，尊重儿子的选择。

莫斯科郊区莫尼诺的冬天，是一个冰封雪冻的银色世界，气温在零下三四十度，地上的积雪有一两尺厚，在暖融融的太阳的照耀下，积雪反射着刺目的亮光。

爱闹爱笑的孩子们自然不愿呆在屋子里烤火。岸英是个坐不住的孩子，他戴上护耳皮帽和皮手套，脚踩滑雪板，轻盈矫健地在

雪地上滑翔。他一会儿在树林里打旋，一会儿在斜坡上飞驰而下，简直像箭一般神速。他一面滑着，一面招呼其他孩子：

“快来滑雪啊！胆小鬼才坐在屋里烤火呢！”

“冲啊！”

一群男孩在岸英的带动下，一窝蜂拥了出来。广阔的雪原上，只见一个个黑点在飞动，在追逐。笑语声传到莫尼诺国际第二儿童院的大门口，在那里观望的女孩子也忍不住了，一个接一个地踩着雪板手撑滑杖，小心翼翼地在雪地上行走，生怕摔倒了，叫男孩子们笑话……孩子们就是在这种笑闹声中，度过漫长的寒冷多雪的冬天。

岸英在儿童院跟同学们关系都很好，也很团结、友爱。可是，在诸多的同学之中，他又和蔡博特别要好。蔡博是1939年到莫斯科的，他来到不久，便跟岸英交上了朋友，俩人志趣相投，甚是亲密，这也许是父辈遗传给他们的基因的缘故。蔡博的父亲蔡和森与岸英的父亲毛泽东是长沙一师的同窗挚友，俩人志同道合，无论是追求真理、探索救国救民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道路上，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创建共产党的活动中，还是在推翻旧世界的革命斗争中，他们一直是并肩战斗的战友。还有蔡博的母亲向警予、姑姑蔡畅，岸英的母亲杨开慧……他们父辈母辈都是革命的同志、好友。当年岸英的外公杨昌济老先生称岸英的父亲和蔡博的父亲是他千百个学生中“尤赏心的两位”，是“海内人才，前程远大。”

父辈的这种在志向追求中建立起来的友谊传给了子辈。他们经常在一起畅谈理想，谈怎样才能继承父辈的革命事业。他们有了共同的语言，共同的理想基础：父辈都是伟大的革命家，我们都是革命家的后代，同样是志同道合的朋友。父辈开创的事业我们一定要承接下来。将来革命的重担一定会历史地落在我们的肩上，由我

们挑起来走下去。现在我们要学习父辈的榜样，在革命洪流中，把自己锻炼成为一个伟大的革命家。

自从蔡博来后，岸英他俩虽然和同学们仍然保持着很好的关系，但是，兴趣爱好上，特别是理想志向的追求上不同，他们与其他的孩子，尤其是那些女孩子就有了明显的差别。岸英他们喜欢读历史书，特别是关于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方面的。平时，他们总是爱钻研"联共(布)党史、中国历史、政治理论书籍等等，热衷于谈论政治、军事，关心着政治和国际形势、中国革命的发展和未来……而那些女孩子们喜欢看的是文艺书，爱读世界名著，要是有一本小说的话，她们都争相抢着看。平时，她们喜欢做的和谈论的是绣花、打毛线或养小动物……有时，岸英他们在谈论和畅叙未来和理想，女孩子们听见后就用讽刺挖苦的腔调大喊："你们快来看呀，这里有两位世袭的伟人！"对于她们的"讽刺打击"，他们总是不屑一顾，有时也反唇相讥地说："你们这些小姐懂什么！"然后嘴里嘘着"去！去！去！"把她们轰走了。岸英的信念非常坚定。

冬天慢慢地过去了，从南方飞回的大雁带来了春天的信息。可是，莫斯科的春天，与中国不一样，总是姗姗来迟，等着积雪都融化了，青草冒出了头，操场周围的女贞树吐出新芽再长成绿油油的新叶时，已是5月份了。

"在咱们湖南，在我的老家韶山、板仓，3月里满山遍野就都开满了映山红，一大片一大片的，鲜红鲜红的，真好看……"身处异国，岸英十分怀念着故乡，妈妈的形象又浮现在眼前……蔡博很理解他的心事，他也有着同样的感觉。一时间，他们都沉默了……他们在思念着祖国，思念着为革命壮烈牺牲的亲人。这种情绪激励着他们，现在只有好好学习本领，长大了才能继承父母的事业，为祖国服务。

岸英兄弟在苏联开始了新的生活，远隔几千里以外的延安，正繁忙工作的父亲——毛泽东，那颗悬着的心落实了。但是儿子们的生活、学习到底怎样？在紧张的工作之余，他时常对着西北方向凝眸沉思，他心中仍然惦念着岸英兄弟。

在儿童院，在阿烈耶夫老师指导下摄影组的同学，用莱卡照相机，为同学们拍了许多照片。照片放大洗好后，编印成册，同学们纷纷寄回给亲人们看。岸英岸青拍了一张合影，拿到照片的当晚，岸英兴奋得睡不着觉，提笔写了封十几页的长信，信是写给父亲毛泽东的。在信中，他叙述了离开父亲后，跟妈妈一起坐牢、上海流浪以及到苏联学习的简单过程。倾诉了怀念母亲、思念父亲的切切之情。

信和照片是托回国的人带回去的。经过长途跋涉，几番周折，信和照片终于送到毛泽东在延安窑洞的办公桌上。毛泽东喜出望外，拿着岸英岸青的合影，他看了又看，眼泪模糊了视线。他抹抹眼泪，再看，只见岸英俩兄弟都穿着圆领羊毛套衫，平头上戴着法兰西小帽，那小帽，中国孩子称为“蕃瓜帽”，没有帽沿，像只扁圆的南瓜（蕃瓜），顶上还有一个蒂子。

两兄弟都抿着宽厚的嘴唇，相当严肃，没有笑容，没有他们这般年龄（十四五岁的少年）的孩童所特有的天真烂漫，好像都在沉思中……毛泽东细看着，那浓眉、凤尾眼，宽阔的鼻翼，多么像他们的母亲；那丰满的厚嘴唇，又多么像自己。他的眼睛又盈满了泪花。现在，失而复得的两个儿子终于找到了，而且生活得很好。看岸英那手[illegible]飞凤舞的毛笔字，多像自己少年时代的手笔啊！

毛泽东把岸英兄弟的照片放在枕头边，临睡前时常拿出来，看了又看，直到实在困倦了才睡觉。有儿子身影在枕边，他睡得踏实

多了。

有时，他也做梦，昼有所思，夜有所梦。他梦见和儿子相聚了，儿子长得高高大大的，很健壮，他高兴得笑出眼泪。第二天，他的警卫员替他整理床被时，发现他的枕巾湿了一大片。

毛泽东再也按捺不住了，挥笔写下一封信：

亲爱的岸英、岸青：

时常想念你们，知道你们情形尚好，有进步，并接到了你们的照片，十分地欢喜。现因有便，托致此信，也希望你们写信给我，我是盼望你们来信啊！我的情形还好。以后有机会再写信给你们。祝你们

健康，快乐，进步！

三月四日（一九三八年）

事隔一个月，毛泽东又托人捎信，并随带自己的照片。信的一开头就询问：早一月给你们的信收到没有？收到了，写点回信给我……。

从此，父子间鸿雁传书不断。阅读父亲的信，对岸英是个莫大的鼓舞；看到儿子的信，对毛泽东是最大的慰安。

1939 年 8 月 26 日，毛泽东又有一信：

岸英、岸青二儿：

你们上次的信收到了，十分欢喜！

你们近来好否？有进步否？

我还好，也看了一点书，但不多，心里觉得很不满足，不如你们是专门学习的时候。

为你们及所有的小同志，托林伯渠老同志买的一批书，寄给你们，不知收到否？来信告我。

下次再写。

祝你们发展、向上、愉快！

毛泽东

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六日

在父子通信前，岸英对父亲毛泽东并不了解。当时，以王明、康生为代表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曾宣扬一种论调以贬低毛泽东，到处散布说："毛泽东是精通孔孟之道的人，有这方面的学问，也精通国情，善于在农村活动。所以，他只能用孔孟之道的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方法去治国办事。毛泽东只能成为苏维埃运动的人物，他的马列主义理论不够，不能成为党的领袖"。康生与王明一唱一和，在驻国际的中国同志中间发起签名，要求让王明当中共领袖，高呼"王明万岁"。他们还宣传一种理论，非无产者出身的人不能担当无产阶级领袖……想不到这些反马克思主义的谬论，对刚刚进入苏联的毛岸英也产生了一些影响。

师哲在回忆录中写道："岸英兄弟到了莫斯科后就被送进莫尼诺儿童院，这已是1937年了。他们在国内养成了隐瞒自己真实身份的习惯，在苏联仍是这样，对我（副院长）也不讲实情。有一次，岸英和我在谈到毛泽东时，也是直呼其名，好像与他没有什么关系似的。我向他们说明，我知道他们的身世，也知道每个孩子的身世，并告诉他们，苏联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祖国，在这里无须隐瞒什么。

"记得在莫尼诺时，有一次岸英无意中谈到一个观点，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只能由无产者来领导。他还透露出毛泽东不是无产者，所以不能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意思。

"我不得不开门见山地进行认真的交谈，向他解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不是无产者出身，但他们确实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和领袖，毕生献身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岸英终于懂得了这些道理，以后也变得老成多了。"

岸英在跟贺子珍相处的一段时间里，从贺妈妈口里得知了父亲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历程，父亲在他的脑海中，形象逐渐高大起来，对于王明的一套理论他渐渐持怀疑态度，加上后来王明一伙在东方大学及儿童院与女院长狼狈为奸，共同迫害贺子珍，这就更加重了父亲毛泽东在他心目中的地位。

而今，可与父亲书信往来，直接受到教益了，这对岸英人生观的形成，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父亲鼓励儿子多读书，他本人就博览群书，这正符合岸英的心愿，他同样养成嗜书的习惯。

1940年秋，中国孩子从莫尼诺搬迁到伊万诺沃城国际第一儿童院。

和在莫尼诺儿童院一样，岸英跟其他孩子们白天在附近的十年制学校读书，放学以后就回到儿童院。那时他读十年制的七年级。岸英先是少先队大队长，后来担任共青团支部书记。在学校、在儿童院，岸英的学习成绩好，有魄力，号召力强，又是各种文娱体育活动的积极分子，无形中成了青少年的小领袖，大家喜欢他，信任他。

夏天，按照儿童院的规定，孩子们都要午睡。岸英一方面精力充沛，不睡也可以，一方面总觉得时间不够支配，因此，每天午睡时，他都躺在床上，悄悄地翻看一本书。

他的举动，引起了蔡博的好奇心。有一次他把岸英捧在手里的书抢来一看，才知道他是在读父亲在延安写的一本哲学讲义。岸英把这本爸爸从延安寄来的小册子，用一张《少年真理报》精心包了，在扉页上写了“《唯物辩证法》 毛泽东著 永福题。”他学了爸爸的读书方法，也是“不动笔墨不看书”，在书上画了杠杠、圈圈、点

点，有不明白的地方，还加上几个问句。

韩铁声老师最喜欢聪明好学的岸英，他总是亲昵地喊岸英："谢廖沙，谢廖沙！"而岸英也喊老师在苏联的名字："伊万老师，再给我们讲讲中国历史吧！"

伊万老师给中国孩子讲南北朝，讲唐、宋、元、明、清。当他讲起南北朝的南朝皇帝梁武帝信迷信的故事时，岸英差点笑破肚子，他把手一摆说："梁武帝真蠢，太可笑！"

岸英求知欲非常强烈，对于祖国的历史、地理，优秀的文化遗产，像海绵吸水，磁石吸铁一样，什么都想知道，而且要打破砂锅问到底，他反对那种在学习上一知半解便洋洋自得的人。

国际儿童院有一个图书馆，里面珍藏着许多苏联和世界各国的历史、文学书籍，这些书吸引着孩子们，尤其是求知欲特别强烈的岸英。

图书管理员是由国际儿童院党支部书记兼任，叫伊拉娘娜，是个热情的 40 来岁的女同志。她把大一些的孩子当成自己的弟妹，把小家伙当成自己的孩子。她也很喜欢岸英，每天，孩子们从各自的学校回院后，第一个站在图书馆门口等书看的就是岸英。

"谢廖沙，又是你第一名！"伊拉娘娜掏出钥匙边开门，边打趣地说。

岸英钻进图书馆，恨不得把所有的书都看完。

这简直跟他的父亲一模一样。毛泽东自小就爱书，读过许多中国古典书籍。在长沙求学期间，他为自己制定了一个自修计划，到湖南省立图书馆去看书。每天早晨图书馆一开门他便进去。中午[illegible]停下来买两块米糕吃，当作午饭。他天天在图书馆读到关门时才[illegible]来。他持之以恒自修了半年多时间，读了很多的书，读书面非常[illegible]泛，[illegible]当·斯密的《原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约翰·穆勒

的伦理书，斯宾塞的逻辑学，读卢梭、孟德斯鸠的著作，还读各国历史、地理、法律，也读诗歌、小说、故事书……

“谢廖沙，要关门啦！”每天晚上，伊拉娘娜可以不看一眼就大声招呼，岸英总是恋恋不舍地走了出来。

“谢廖沙，又是你最后一个出来！”伊拉娘娜笑着说。

“唉，一天要是变成 40 小时就好啦，我总觉得时间不够用。”岸英揉揉眼睛，伸伸胳膊，挨着党支部书记的肩膀边走边说。

“小伙子，学习了一天，快玩儿去吧！”伊拉娘娜用食指在岸英脑门上轻轻一点，十分亲昵地说。

星期六，岸英又是第一个来到图书馆。他想今晚没有其他活动，可要认认真真再研究一番联共(布)党史。为了安静，他拿着这本厚厚的俄文书，躲在最里边，离大门口隔着十几层书架，一面看，一面做笔记。

时间过得真快，不知不觉中手里的书已经翻了一大半，笔记也记了十来页。“咦？时间还没到？”岸英抬头四下看看，没见到伊拉娘娜，心想她在门口有事吧？于是又埋头继续专心致志地看下去。

啊，一本厚厚的联共(布)党史书终于看完了。岸英非常满足地放下书，挺起身子，伸伸腰，口里喊着：“伊拉娘娜老师，今天看得真过瘾啊！你也该回去了吧？”咦，怎么没有一点声音？图书馆里静得出奇，窗外鸦雀无声，只有风儿轻轻地吹着，路灯闪着亮眼。

岸英走到图书馆大门口，发现门已锁上了，“啊呀，这可真有点麻烦了，伊拉娘娜把我给忘记了。”怎么办呢？他在门边徘徊了一阵，心想，反正明天是星期天，今晚我就在图书馆里看书看个够吧！

他重又打开了电灯，在书架上找呀，找呀，终于找到他心爱的书——斯诺著的精装俄文版《毛泽东自传》(即《西行漫记》)。他如获至宝，贪婪地从第一页啃起，……直到天快亮了，岸英才感觉到

眼睛有些惺松，他怕睡着了会感冒，就在书架中间的巷道上跑起步来，活动一下，又精神振奋地阅读起来。

第二天伊拉娘娜开门了，同来的还有岸青和伊万老师。伊拉娘娜嘟哝着："怎么会呢，我锁门时还喊了谢廖沙几声，没答应呀，我想他一定是到别的地方去了。"

"哥哥一夜没回来，真把我急死了。"岸青焦急地说。这些话岸英都听清了，他站在大门边，等伊拉娘娜把门打开，他突然笑着站在门口："谢廖沙在这儿哩！"

伊万老师又心疼又称赞地说：

"好啊，谢廖沙，你读书真是'废寝忘食'啊！"说着，伊拉娘娜和岸青也嘿嘿地笑起来。

寒假里，伊拉娘娜将要去莫斯科休假了，这使岸英非常焦急，他担心她走后，图书馆会不会关门，这把钥匙交给谁呢？

伊拉娘娜早就摸透了岸英的心思。这天晚上，她将一把黄铜钥匙往岸英手上一拍："谢廖沙，这把钥匙给你，寒假里你可以把各种书籍看个饱啦！"她对岸英和蔡博说："你们年纪大了，应当知道我们党的历史。在里面一间小房里，有历届党代表大会的文件，你们好好学习，只要不把书搞烂就行，小伙子，去吧！"

这个寒假，岸英和蔡博将俄文版的联共（布）各次代表大会的文件，从"十八大"往前看，一直看到联共"一大"，对苏联党的历史有了较深刻的理解。

这个假期的自学，对于岸英在政治上、思想上的进步，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个18岁的青年，开始考虑今后一生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了。

这些年岸英总是把自己学习的心得，写成长信向爸爸汇报，同

时还分批寄去了不少照片。1941年1月31日，毛泽东给岸英兄弟寄来了热情的亲笔信，告诫亲生儿子：少谈政治。

岸英、岸清（青）二儿：

很早以前，接到岸英的长信，岸清（青）的信，岸英寄来的照片本，单张相片，并且是几次的信和照片，我都未复，很对你们不起，知你们悬念。

你们长进了，很喜欢的。岸英文理通顺，字也写得不坏，有进取的志气，是很好的。惟有一事向你们建议，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政治是要谈的，但目前以潜心多习自然科学为宜，社会科学辅之。将来可倒置过来，以社会科学为主，自然科学为辅。总之注意科学，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人家恭维你抬举你，这有一样好处，就是鼓励你上进，但有一样坏处，就是易长自满之气，得意忘形，有不知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危险。你们有你们的前程，或好或坏，决定于你们自己及你们的直接环境，我不想来干涉你们，我的意见，只当作建议，由你们自己考虑决定。总之我喜欢你们，望你们更好。

岸英要我写诗，我一点诗兴也没有，因此写不出。关于寄书，前年我托西安林伯渠老同志寄了一大堆给你们少年集团，听说没有收到，真可惜，现再酌检一点寄上，大批的待后。

我的身体今年差一些，自己不满意自己；读书也少，因为颇忙。你们情形如何？甚以为念。

毛泽东

一九四一年一月三十一日

写这封信时，毛泽东又亲自挑选了21种书共60本，既有哲、经、史书，又有古典文学和武侠小说，并注明："这些书赠给岸英、岸青，并与各小同志共之。由林彪同志转交你们。"

毛泽东的这封信，既有长辈为孩子的长进感到喜悦的心情，也有语重心长、充满父爱的建议和规劝。尽管岸英有志于深入钻研社会科学，并且已经在这方面得到了同志们的表扬，毛泽东仍然向岸英提出了"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的期望。

出于何种思考，毛泽东要岸英向自然科学学习，他并没有明确说明，是他深知政治危险性、残酷性，搞政治要付出很大的代价而不愿儿子再步自己的后尘？这种解释好像有点牵强，且片面，至少是曲解了毛泽东的本意的。有一点是明确的，有这种想法的不仅仅是毛泽东个人，而是当时很多老一辈革命家的共同想法。前文所述的周恩来就非常赞同孩子们当工程师、教授、专家的想法。当年在儿童院当教师的郑一俊（阿烈耶夫）、韩铁声（伊万诺维奇）曾向我讲起过，当年在莫斯科休养的很多老红军都跟他们讲过要关心照顾好这些孩子们，要注意让他们学习科学技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心里是清楚的，也想的很长远，当初他们处的政治环境是黑暗、腐败、反动的，他们只能选择一条革命的道路，来改革新中国政治。然而，中国不会长远地动荡下去，他们这一辈要完成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他们坚信一个崭新的中国一定会在他们奋斗中诞生。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打碎旧世界，结束阶级压迫的政治，为下一代开创一个新的天地，而建设新中国的任务将更多地落在后代身上。到那时不仅需要有高度政治责任感，更需有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祖国建设需要各种各样人材。我想，这也许是毛泽东在信中教导儿子，趁年纪尚轻，应以潜心学习自然科学为宜，社会

科学辅之的原委和目的。有了一技之长，在将来的祖国建设中有用武之地了，再提高为祖国、为人民服务的政治觉悟，这才顺其自然。正如毛泽东告诫儿子的："总之注意科学，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这才是毛泽东的出发点。毛泽东的信意义是深刻的，是深远的。后来，在儿童院的孩子们长大后，绝大部分选择了自然科学学科，进入了理工科大学和各种专科学校学习，其中就有毛岸英的好友蔡博等人。他们毕业之时，也正是新中国成立之初，正是用人之际。他们回国后，带着在苏联所学的技术知识，勤奋、努力地长年工作在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岗位上。然而，在当时的环境下，毛岸英还是选择了他所喜爱和热衷的政治和军事。也正像毛泽东在信中所讲的，你们的前程，决定于你们自己及你们的直接环境，我不想干涉你们，由你们自己考虑决定。在这一点上毛泽东，作为父亲，是开明的，至少没有像他的父亲当年对待他的那样。他既没有用父亲的权威，也没有用他拥有的权力，影响岸英的发展。

他没有忘记周伯伯教导：不要忘记祖国；他遵照父亲的指导：努力学习中国文化；他掷地有声地讲到：我是中国人，只要祖国一声令下，我立刻要回到祖国去……

1978 年 12 月 19 日的上午，我来到郑一俊的住所，他已是位 75 岁的老人了，但他记忆十分清楚，他向我讲述了岸英的一件事……

“阿烈耶夫，苏联人为什么这样尊重我的父亲毛泽东？”岸英喜欢提出一些古怪的问题，请教中国老师、教务主任郑一俊。“我在白俄罗斯果麦儿城演讲的时候，只要提到毛泽东，台下掌声如雷；当他们晓得我是毛泽东的儿子时，更是把我当成小领袖一样欢迎，阿烈耶夫，你能给我讲讲我父亲的事吗？”

有一次，在初夏晚餐后的黄昏，在莫尼诺国际第二儿童院的小白桦树林散步时，毛岸英向阿烈耶夫提出这个问题。阿烈耶夫笑了笑，没有直接回答他，而是反问道：

“谢廖沙，你是毛泽东的儿子，这个问题应该由你来告诉我呀！”

“阿烈耶夫，老实说吧，我最喜欢的人是妈妈杨开慧，我最尊重的人是我爸爸毛泽东。可是自从1927年9月，爸爸离开我们时，我才5岁，平时他忙着干大事，也很少在家，他的事儿我可说不上。”岸英不无遗憾地说。“真的，我连自己的出生年月也说不准。”

阿烈耶夫在小溪边找了块石头，坐下来，望着汩汩流淌的小溪流，思绪仿佛回到了中国。岸英也伴着他，坐在对面的草地上，口里嚼着一根狼尾巴草。

“谢廖沙，你父亲的确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他并没上大学，也没能出国留学，可是，他把学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跟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比如，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他带领部队上了井冈山，在农村开展游击战争，积蓄革命的力量，又经过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把中国革命从危险中拯救出来；在抗战中，又以民族利益为重，与国民党合作，一致抗日……，总之，在革命历史关头，是你父亲和朱德、周恩来等一批革命家挽救了革命，拯救了党，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都是创举啊！”阿烈耶夫提纲挈领地讲了个头，然后，又以讲故事的形式，介绍中国近代的革命历史。岸英不断地点

头，深深地烙在脑海中。

“我长大了也要像父亲一样，当个政治军事家！”岸英更加崇拜父亲了。

“你父亲未必希望你也走他的路，你现在还年轻，要学好各门功课，打基础，等到三五年后，再选择自己的志愿。”阿烈耶夫劝说道。

“我想好了，现在世界上还有多少人在反动统治下生活，光靠科学技术是救不了他们的，必须使用暴力，推翻反动统治，这就要有一大批政治、军事家，拿起枪杆子，把反动派打倒！”岸英信誓旦旦地说。

不知是遗传因子的影响，或是从小家庭政治氛围的熏陶；也许是岸英从小看到敌人杀死自己最心爱的妈妈，后来又在上海流浪，尝遍了人间的辛酸苦辣，他同情贫苦人民，他仇视那些地主资本家，发誓要继承父辈的事业。

由于岸英政治上出众地坚定，人品又正直、坦诚，关心集体，加上学习刻苦，成绩优秀，在这孩子们的“共产国际”中他成了当然的小领袖，表现了一个小政治家的风格。身在异国他乡，他坚持了原则，既是一个坚定的爱国主义者，又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国际主义战士。

有几件事使青年毛岸英在政治上初露锋芒。

1940 年秋，住在莫尼诺儿童院的中国孩子们来到了伊万诺沃市。搬迁的原因是因为持续了三年的西班牙内战，到了 1939 年 3 月，最终以共和国被颠覆而告结束。反动将军佛朗哥在德、意法西斯的支持下，在西班牙也建立起法西斯独裁统治。这样一来，许多西班牙的革命者在国内无法生存下去了，不得不逃亡国外，其中很

多人亡命苏联。一时间，莫尼诺第二国际儿童院内便住满了西班牙流亡者。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国际征求了中国抗战人员疗养院、儿童院领导及教师的意见，将原来清一色住着中国孩子的莫尼诺国际第二儿童院迁往伊万诺沃市，与在那里的国际第一儿童院合并。

伊万诺沃市在莫斯科东北方，接近西伯利亚，离莫斯科 300 多公里，坐火车要走一夜才能到达。它是一座纺织工业城，也是 1905 年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发源地之一。

原先的第二国际儿童院，实际上只是中国儿童院，如今合并后的儿童院，共有 200 多个孩子，他们来自中国、日本、美国、德国、法国、罗马尼亚、南斯拉夫、保加利亚、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巴西、朝鲜、印度、马来半岛和阿拉伯国家（西班牙单独搞的）。他们的父母除了已经牺牲之外，大部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成为新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党和政府、军队的首脑人物；有的成为这个国家的共产党或工人党的领袖。这批学生中，在六七十年代，也有成了接班人的。当时，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很重视这批孩子。

当我第一次看到了毛泽东 1941 年 1 月 31 日给毛岸英的信时，我就注意到了毛泽东的这样一句话："人家恭维你，抬举你，这有一样好处，就是鼓励你上进；但有一样坏处，就是易长自满之气，得意忘形，有不知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危险。"父子俩相距遥远，十多年未见过面，父亲怎么对儿子了解得这样清楚，这些话显得是那样的亲切而又严肃，是忠告，是提醒，是关心，是批评……可能是岸英在给父亲的信中，在汇报自己的成长、成绩中，流露出些什么，是高兴、兴奋，是得意、自满，是自信、自负……不管是什么原因，毛泽东作为父亲，他不仅仅是为儿子的成绩进步而感到高兴、欣慰，更体现着父爱的是他及时告诫儿子要戒骄戒躁，不要得意忘形，要脚踏实地，实事求是……

毛泽东写给儿子的这句话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我想，这句话一定包含着很多生动的含义，也许，这里面有着丰富反映毛岸英个性的素材，这使我想起了我在采访李特特时她曾向我讲述，岸英各方面都挺出色，经常在同学面前逞逞英雄，故意露一手；少先队组织野营活动，他以领导人的姿态出现；凡是有“外事”活动，我们经常推荐他代表中国孩子出席……我还想起岸英发表在《新中华报》上的文章中流露出的情绪……毛泽东在信中指的是不是这些呢？

儿童院中，中国孩子的人数最多，有50多人。

岸英刚到第一儿童院时，看到那么多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少年伙伴，感到十分新奇有趣，他们之间除了哭声和笑声是共同的外，没有共同的语言，生活习惯也不一样。那些外国孩子不像中国孩子能吃苦，而且活泼好动，调皮捣蛋的多。那些女孩子，很快抱成了一团，在一块叽叽喳喳嘻嘻哈哈像百灵鸟。男孩子好像都很自尊，也很高傲似的，不过，没有多久也被中国孩子吸引过来了。

这些孩子刚到苏联来的时候，都是八九岁、十一二岁，可以称作孩子。几年过去了，他们都好像见风就长似地个子一个劲儿地往上拔高儿，现在都成了少男少女了。男孩子嗓门变粗了，一个个傲气了，一付凡人不理的样子；女孩子苗条、腼腆害羞了，一个个变得文静起来。而岸英、蔡博、郭志成这几位以前就大几岁的孩子，现在都已进入了青春阶段。

1978年10月的一天，秋高气爽。在我的热情邀请下，身为水电部高级工程师的郭志成借出差之机来到我家作客。他向我详细地谈起他与毛岸英的那段共同生活和学习的经历……

岸英比他早一年来到苏联。他们第一次见面，便给他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岸英诚恳、热情、很富有感染力。他和岸英同住在一

个宿舍，很快便成了好朋友。

好像曾和其他人商量好了似的，郭志成在向我描述毛岸英时，也说了这样的话：岸英是个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好学生，尤其在体育方面他是个活跃分子，踢球、下棋、滑雪、溜冰，样样都能来那么几下子，很引人注目，他也常常在孩子们面前逞英雄。也许，各方面都很出众，也爱出众，这是毛岸英的性格……

在谈到他与岸英的友谊，郭志成向我讲述两件小事。一件事，是他到莫斯科后的第一个冬天，岸英带他第一次溜冰。穿好冰鞋后，开始，岸英扶着他慢慢地在冰上走，转了几圈，刚有点适应了，觉得很开心。岸英说，要想学得快，必须尽早甩开"拐棍"，自己滑，不要怕摔跤，说着便突然把手一撤，让他自己向前滑去。可是，这毕竟是有生以来第一次滑冰，郭志成的重心总也保持不稳，穿着冰鞋在冰上又站不住了，仅仅滑了两步，身子一晃，便不由自主地向前趴去。初学者，还不会处处自我保护，这第一跤便扎扎实实地摔在冰上，把大门牙都磕掉了一半。另一件是岸英离开儿童院到军校去学习以后的事。有一次假期，他回儿童院看望弟弟和老同学。以前老在一起生活、学习并没有感觉到，现在分开了，见一次面不容易，所以，聊起来好像有说不完的话。岸英走时，郭志成一直送他到车站站台，一个在车内，一个在车外，俩人在起劲地谈着，听岸英讲着军校的生活、军人的理想……不知不觉之中，火车开动了。起初，车走得很慢，他俩好像并没感觉到，一个坐在车上，一个跟在车下，隔着车窗还在边走边谈。后来，火车加快了速度，郭志成便跟着跑起来，谁知站台上有个洼坑，他一点都没有注意到，一脚踏了进去，身体就势便趴了下去，摔了个嘴啃泥。

郭志成跟我讲，这两件事我一直记忆犹新，特别是岸英牺牲后，这么多年过去了，每当想起他，我便想起摔的这两跤来，而每当

触到这剩下的半颗门牙时，我跟前也就浮现起岸英的音容笑貌，想起了和他在一起的那段友情。

接着，郭志成又向我讲起当年在儿童院的往事……

迁到伊万诺沃市以后，我们生活的儿童院真的成了孩子们的“共产国际”了。岸英早已在中国孩子们中建立起了领导威望，到这个国际大家庭中，渐渐地他的威信在各国孩子们中间也树立起来。开始，他先和肤色相同、生活习惯近似的朝鲜、日本、安南（越南）、马来半岛等亚洲国家的同学交朋友，慢慢地又和东欧、南美洲各国建立起友好关系。

中国的孩子们到伊万诺沃市第一国际儿童院不久，儿童院共青团支部改选。在中国孩子没转到伊万诺沃市前，上一届的团支部书记是由一位叫米的日本小姑娘担任的。这次改选中，由于岸英在孩子们当中有很高的威望，团支部一致推选他担任团支部书记。团支部还推选他为出席区共青团代表大会的代表。在代表大会上，他又不负众望，当选为共青团的区委委员。说来也巧，中国孩子合并到第一国际儿童院后，儿童院的儿童委员会（儿童院苏维埃）也逢换届改选，郭志成担任了儿童院苏维埃的主席。他和岸英本来就是好朋友，现在，他们一个管政治，一个管行政，俩人密切合作，成了国际儿童院的两巨头，大权都掌握在中国孩子的手中，一时间，他们两人好不风光。每当他们在一起商量事情时，不仅是中国的女孩子，连外国小朋友都善意地讥笑他们说，“瞧呀，两位小领袖又在研究‘大事’呢！”一般情况下，他们并不理会这些，有时也会回敬几句：“去！去！去！别尽说风凉话，我们是在谈正经事呢！别干扰我们的工作！”

有一张当年在伊万诺沃第一国际儿童院的部分儿童合影的照片，照片中大部分是中国孩子，也有不少外国少年。照片背景的那

面墙壁上挂着一幅毛泽东的像片，在像片的上方有一条用俄语写的标语：劳动人民争取胜利的组织者——共产国际万岁！照片中站在后排左边的中年人，戴着一副近视眼镜，他是岸英他们的老师韩铁声（伊万诺维奇）。岸英站在最中间的位置上。

岸英的好友蔡博还向我讲过这样一件事。中国孩子们到伊万诺沃市后，也跟在莫尼诺时一样，根据年龄的大小，分别插到当地的十年制学校读书。岸英、蔡博、郭志成、刘允斌都上了中学。他们志趣相投，除了在学校学习好中学的课程外，课余时间大部分放在学习英语、中国历史、国内政治和中文方面。他们把在莫尼诺就建立起的业余学习小组的习惯也带到这里，一直坚持不懈，目的是将来回国后能够更好地为祖国服务。这也是共产国际所要求的，课余时间各个国家的孩子要单独组织补习本国历史、地理、人文知识的课程，为的是使他们不要忘记自己的祖国。

以岸英为首的中国五六个男孩子们都是爱国主义者，祖国的观念很强，他们不但在俄国学校读书的成绩很好，而且也很懂事，就是感觉对自己国家的事情了解得太少，知识太少了。于是，岸英提议，他们便在业余学习小组的基础上组织了“关心祖国问题”的讨论会，大家分别作准备，在讨论会上就自己所了解的问题作专题发言。刘允斌在延安住过一段时间，听到和看到一些事，他便向大家讲当代革命历史问题；蔡博对近代历史兴趣浓厚，他便借助一本中文版的中国近代史书，向大家谈太平天国以来的革命斗争；岸英看过父亲的哲学书，受到了启发，懂得比别人多些，他就大讲起哲学来……刚开始时，有的教师对他们这种作法不放心，怕没有人指导，学偏了怎么办？后来听了孩子们的几次讨论，觉得蛮有趣味。尽管这些年青人的论点还很幼稚，不成熟，但他们的基本观点是正确

的。他们克服条件不足，执著追求、刻苦钻研的精神也叫人感动。看到老师的态度改变了，岸英他们学习的劲头更大了。

然而，为了这种学习，在第一国际儿童院还引起了两场风波。

一场风波是在中国孩子们中间兴起的，其实是一部分男孩子和一部分女孩子之间的事，蔡博向我谈起了这场风波的经过。

男孩子喜欢看政治理论、历史书，喜欢谈政治理想、形势，而女孩子们，别看她们的父母都是革命家，可是她们一般不关心政治。课余时间喜欢唱唱歌、跳跳舞，或是干点绣花、织毛衣、剪纸花一类事。再不然，几个人搂肩搭背地挤在一起，叽叽喳喳地又说又笑，像一群麻雀一样，有时吵得别人不得安宁。平时，男孩子们就看不上女孩子们的这种“小家子气”；而女孩子们对男孩子们的那种摆一副“政治家”的派头很反感。双方不时发生一点小冲突，但总的看是各方干各方的，还算相安无事。

问题就发生在岸英他们组织的讨论会上。这种学习形式，他们坚持了很长时间，一直保持着高昂的热情，老师们参加了几次，也对讨论有了兴趣，更主要的是周伯伯到儿童院看望他们时，也支持和鼓励他们多关心祖国，好好学习更多的知识，因此，岸英他们也就越发神气了。其实，看到岸英他们学习有声有色，有些女孩子也想参加听一听。但是，又不好意思。在这上面。岸英他们是有点失策的，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把女孩子都看作是“娇小姐”了，忘记了应该团结、吸收更多的人。这样一来，有个别人，本来就对岸英他们有看法，虽然她们对学习不关心，不爱好，但抓住这种现象大作文章，攻击男孩子。在“三八妇女节”那天，少年队的墙报上，刊出了一篇文章，批评岸英他们是“脱离群众”、“单独行动”……岸英他们从来没有受到过这样的诋毁，受不了了。他们感到，这不但是对他们学习热情的打击，向他们泼了一盆冷水，而且简直是无中生有的无

理中伤。

岸英他们这群好胜好斗的小伙子们被激怒了，他们立即组织起来进行反击。岸英带头，他一口气写了足足有三四十页的批评文章，蔡博也写了十几页，他们中最少的也写了四五页。这些文章的中心意思是：我们是中国人，我们要学习和了解中国的历史和现状有什么不对！我们不可能在苏联生活一辈子，我们的父母和兄长们正在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努力奋斗、流血牺牲，难道我们永远住在异国他乡，永远安心于安逸生活。不！我们绝不愿过这种生活，总有一天我们要回到自己的祖国去，为中国人民服务。可是，我们这些长期生活在国外的孩子们，很小就离开了祖国，如果现在不很好地学习和了解祖国的过去、现在，以至于将来，包括祖国的语言和人文地理知识，对祖国一无所知，就是有一天回到了祖国，又怎能为祖国的强大而工作呢？我们是中华民族的子孙，我们应无愧于这一称号。他们还批评写墙报的人：你们这些小姐，自己对祖国的历史和政治不关心，不感兴趣也就罢了，还要反对我们，真乃是岂有此理了……

为了引起更多的人注意，他们找了一块黑板，把写好的文章钉在上面，然后将黑板抬到了人人都要去的食堂的门口。开饭的时间一到，孩子们来到食堂前，立刻被黑板吸引住了，争相阅读，吃饭的时候也在议论。

岸英他们这帮血气方刚的小伙子们，本来在孩子们中间理论性就很出众，平时争辩起来都讲得头头是道的，只苦于没有对立面，今天，可有了机会了，他们发挥了全部特长，全部的聪明才智，文章像一颗颗重磅炸弹，一个回合下来，便把女孩子们批得哑口无言了，再也无力指手划脚，唠唠叨叨的说三道四了。说来也奇怪，经过这次较量，使得平时说多少话、做多少工作都不见效果的政治学

习问题，很大程度上得到解决。也许是岸英他们讲得有道理，对孩子们有说服力，让人信服的原因，那些以前不愿意或不关心学习的人，开始对学习热心了，有些人主动参加到岸英他们的队伍中来了。经过这场风波，岸英在孩子们中的威信更加提高了，“小领袖”的地位反而更加巩固了。

岸英还组织了英语学习小组，所以，他的英语也很好。

另一场风波是在中国孩子和儿童院院长之间发生的。

岸英的老师韩铁声向我谈起了这件事情，采访时在场的还有刘松林。

儿童院的孩子们在课余时间，按国籍分组，由各国教员向他们教授自己国家的民族文化、历史、语言，进行民族教育，这是共产国际制定的方针和原则，从在莫尼诺第二国际儿童院到伊万诺沃市第一国际儿童院，中国孩子一直也是这样做的。

可是，第一国际儿童院的那位女院长，却是位抱有浓厚的大国沙文主义思想的人，她认为，孩子们在苏联，就应该多学俄语，学习苏共的历史，其他课程都不必要。带着这种思想，她在日常安排中，不顾教师们的反对，千方百计地把各国孩子们的民族教育时间给挤占掉。对此，中国教员们和以岸英为首的中国学生们意见很大。在儿童院里，一方面中国孩子最多；另一方面，中国孩子们的民族责任感、民族意识也最强。特别像岸英他们这些孩子，非常不满这种作法。在这方面，他酷似他的父亲。为了坚持共产国际制定的民族教育的方针和原则，韩铁声老师和岸英曾多次向院方提出意见，一再要求，给中国孩子学习中国文化的时间。可是，那位傲慢的女院长气势汹汹地说，“这里是苏联，不是你们中国，学什么中国文化，将来，凡是在这里的孩子都要加入苏联国籍的，还是应该多学习学习苏共的历史吧！”

听到她那无理的答复，岸英和蔡博等人气愤极了。他们来到韩铁声老师的宿舍，谈起这件事，就大发议论，说着说着就义愤填膺起来。岸英说：不错，我们来到这里，苏联政府和人民对我们非常关心、照顾，共产国际也像“父亲”那样关怀我们。可是，我们都是中国人，这一事实是不能改变的呀！难道因此我们学习祖国文化的权利都被剥夺了吗？这也太欺侮人了吧！哼！我是中国人，就是到了年龄，我也不入苏联国籍！伊万诺维奇老师，我们都支持你，跟她作斗争，夺回我们的权利！

在同学们的强烈要求和支持下，韩铁声老师给共产国际有关部门写了一封信，把儿童院的这种不正常的情况向共产国际作了反映。不久，共产国际专门派了两位同志，到伊万诺沃市国际儿童院视察，其中一位便是匈牙利的著名政治活动家拉科西。他们来到儿童院后，和师生们进行了广泛的交谈，了解情况。岸英他们也把自己的想法和意见向他们无保留地讲了出来。经过一番调查后，拉科西等人代表共产国际当众宣布：要搞民族教育，要使这些孩子们不忘记自己的祖国，将来学成回国后为祖国和人民服务。听到这一决定，岸英他们带着胜利的喜悦，高兴地搂着韩铁声老师，高呼着“呜啦——”

共产国际的代表临走时和全体师生合了影。

然而此事并没有完。就在共产国际视察人员走后不久，岸英挨了一次批评，起因还是那位女院长，而这次岸英确实有欠妥当的地方。

事情是这样的……

在斯大林时代，苏联实行的是一长制，行政首长有处理一切问题的全权，在儿童院，也实行的是这种制度，别看儿童院并不大，但院长的权力却是相当大的。就是那位女院长，她不仅有浓厚的大俄

罗斯民族沙文主义，而且飞扬跋扈，并且心胸狭小，滥用权力（后来迫害贺妈妈的也是她）。儿童院有位教导主任，是苏联人，叫古兹班诺夫。他为人正直，对各国的孩子们很好，孩子们也很尊重他。他对院长取消各国孩子们的民族教育的作法不同意，曾向院长提出过意见，共产国际调查人员来院后，他也直言不讳地反映了问题。女院长受到共产国际的批评，正在气头上，共产国际的人员刚走，她便拿古兹班诺夫出气，无缘无故地强行把他赶出了儿童院。

当岸英得到古兹班诺夫老师被迫调离儿童院的消息后，一方面非常惋惜这么一位好老师离开了他们，另一方面对女院长的恶劣手段十分气恼，并打抱不平。于是，他以儿童院团支部书记的身份，召集中国孩子开会，研究反对院长错误作法的对策。会议是秘密召开的，除了被通知的中国孩子之外，其他任何人不得进入会场……

然而，会议进行的并不机密，儿童院的党支部书记很快就知道了他们在开会，也想到了会议可能与院长赶走教导主任有关，于是，他来到了会议室的门口，要求进去听听会议究竟是些什么内容。

他在门口喊道："谢廖沙（毛岸英的俄文名字），能让我进去听听吗？"

听到书记在门外的叫声，岸声知道被人发现了，有点紧张，但他坚持他们的作法，一口回绝道："对不起，书记同志，你不能进来。我们商量的事情，内容是保密的！"党支部书记吃了个闭门羹。

见岸英他们不给他开门，支部书记也无可奈何，他便找到韩铁声，"伊万老师，请您去做做谢廖沙的思想工作，把会议停下来，不要跟院长对着干！这样做是没有益处的。"韩铁声也是党支部的委员，他没有推托的理由，便跟着支部书记来到了他们开会的房间。

尽管岸英他们一个个都血气方刚，富有正义感，看不惯任何不合理的事情，但是，他们也毕竟年轻，经历的少，不知道社会的复杂性，尤其在这样的问题上，凭感情用事是不行的。他们并没有因为韩铁声是他们的老师而给他一个面子，他也被严辞拒绝在门外。这回岸英他们倒没隐瞒自己的观点，隔着大门他向韩铁声和盘托出了开会的目的，说："伊万老师，我们是要伸张正义，不是在搞秘密活动，院长把古兹班诺夫赶走，要讲清楚是什么道理！"

韩铁声向着支部书记摊开双手，耸了耸肩，表示也没有什么办法。实际上，他是倾向于孩子们的，但是，作为老师，不便于说出来的。女院长赶走古兹班诺夫，就是为了发泄她对中国老师和中国孩子们向共产国际告她状的私愤，只不过她不好对中国人做手脚而已，倒霉的自然是坚持原则的苏联教职员工了，韩铁声对这些当然清楚，也当然不满院长的行为。

党支部书记看看无法制止他们，又怕事情被搞大，只好将情况汇报到共青团区委会，求助于岸英的上级来解决问题。很快，岸英被召到共青团区委书记的办公室……

岸英是团区委的委员，组织观念是很强的，他还有这么个特点：认准了的事，就义无反顾地去做，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然而，一旦发现自己做错了，也是敢于承认错误，勇于改正错误的，包括有些事情自己并没认识到不对，经别人给指正出来，过后，他思想想通了，也会接受批评，马上认错。至于这件事，团区委书记与他是怎样谈的，我们不得而知，韩铁声没有向我们说明，很可能当年岸英从团区委回来后也没向他说起过。讲完这件事后，韩铁声只向我说这样一句话，经过了这场风波，毛岸英的威信并没有降低。

值得一提的是，即使岸英承认错误，那位专制跋扈的女院长能够改变她的本性？看起来，很难。当然她对岸英这样的天不怕地不

怕，富有正义感的青年人也是没有办法的，他不会吃她那一套，她也奈何不了他，更何况不久岸英便到军校学习去了。然而，她会不会做出那种“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事来呢？如前所述的，贺子珍被她关进疯人院，有没有她对岸英的记恨因素，转而打击贺子珍呢？我没有可靠的材料佐证。但不管怎么讲，即使没有这种因素在其中，女院长因贺子珍与她吵了一架就残忍地把贺子珍当作“疯人”对待，进行非人的报复，这也说明女院长是迫害狂，岸英反对她的作法是有道理的。

毛岸英就是这样一种人。还有一件事，更能体现他的性格。那是在加入苏联国籍的问题上，他的态度，又表现出与众不同。

1941 年冬末，为了战争的需要，联共(布)中央有个建议，希望生活在苏联的 16 周岁以上的外国公民，加入苏联国籍。岸英那年已是个 19 周岁的小伙子了。

在一次讨论会上，老师向孩子们提出这个问题后，不少孩子都踊跃发言。有的人说：“加入苏联国籍当然好啦，以后谁欺侮我，有苏联政府的保护！”有这种想法的人，看到祖国被帝国主义侵略，同胞被列强奴役、欺侮，想找一个强大的国家作后盾。还有的人说：“同学们，现在的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伟大导师列宁缔造的，眼下，斯大林同志正率领苏联人民跟德国法西斯血战，加入苏联国籍当然光荣。”这些人是从苏联的国际地位和作用上考虑的。

总的看，拥护加入苏联国籍人占多数，即使有人有想法，在这种气氛中，也不好发表不同意见。当时的苏联被誉为世界革命的中心，社会主义的苏联是每个革命者向往的地方，很多人把苏联当成自己的祖国。开始时，意见是一边倒的，是拥护苏共中央的决定的。

起初毛岸英没有发言，他一直在低头沉思。平时，他是孩子们

的头头，讨论和发言总是积极带头的，大家都愿意听听他的见解，今天他为什么沉默不语了呢？有的同学看出了他的心思，委婉地说："谢廖沙，入了苏联国籍，以后还是可以申请改回中国国籍的呀！"

岸英蓦地从座位站起来，右手按着长条桌，声若洪钟般地说：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们的祖国。只要祖国一声令下，我立刻要回到祖国去，如果加入了苏联国籍，就不方便了。"他环视着同学们，把右手在胸前轻轻一放，自豪地说："我坚决不入苏联国籍，我是中国人，早晚我是要回到祖国去的！"

这声音铿锵有力，异常响亮地震荡着会议室，敲击着在座的每个人的心，不少同学受到他的话的感染，甚至几十年以后，他们已经成为中老年人，一谈起毛岸英时，自然记得他在那次会议上的发言，不由得从内心里感慨地称赞毛岸英是一位非常果敢的、具有政治远见的人，是一位彻底的爱国主义者。

然而，无论是谁，又都不得不承认毛岸英是位爱国主义者，祖国在他的心中永远是伟大的、母亲般的；同时，他又是坚强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战士。先不说他后来报名参加志愿军，第一批入朝作战，就是在当年，在苏联反法西斯卫国战争关键时刻，在人数众多的国际儿童院中，只有他坚决地要求参加红军，上前线和法西斯侵略者真枪真炮地血战。他用行动，证明他不但热爱他的祖国，同样也爱社会主义的苏联，他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培养和教育了他的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他就是具有这样一种品格的人……

他又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国际主义战士。他给斯大林写信说："我爱苏联就

像爱中国一样”，我坚决要求上战场。苏德战争爆发，他投笔从戎。

自从1941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背信弃义，悍然向苏联发动闪电战以来，岸英十分关心战争的发展。每天，他的第一件事就是听广播，然后回到房间里，在世界大地图上，作红白标记。

1938年以来，被德国法西斯侵占的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挪威、荷兰、比利时、法国和巴尔干半岛各国，他都痛心地用小白旗插在上面。对于全世界瞩目的莫斯科大战，他则在莫斯科城上竖着一面大红旗，在城郊是红白相同，表示敌我正在激烈争夺。起初，德军已进攻到离莫斯科仅60里的郊外，莫斯科在大炮射程之内，3000架敌机轰炸莫斯科，把天都遮黑了。但是，莫斯科城却岿然不动。这天，岸英听了广播，得知苏联红军已打退希特勒对莫斯科的进攻，并开始转入反攻，他兴奋地对同学说：

“快来，快来看呀！”

他迅速把小白旗拔下来，换上小红旗，兴致勃勃地向伙伴们介绍情况。

苏德战争爆发以后，学校生活和儿童院的正常秩序都被打破。他们不分男女，都是民兵，要参加城市的保卫工作，参加民兵武装训练，有一次还在雪地上全副武装地滑行100公里……

冬天来临，苏联最大的煤矿之一——顿巴斯煤矿被德军占领，莫斯科和大后方城市中都没有了燃料。屋子里没有暖气，孩子们便自己动手做铁皮炉子，烧柴禾取暖。教室里没有暖气，不写字的时候，钢笔要放在胸前的大衣里，要是放在外面；时间久了，墨水就冻

了，不下水。写字的时候，先要用嘴哈哈气，然后，墨水才能流出来。

在“一切为了前线”的战斗号召下，国际儿童院办起了小作坊。有的学习打铁，自制燃烧弹，镟炮弹壳；有的做木匠，钉木箱子，给战士们装弹药；女孩子们成立了缝纫组，踩缝纫机，自己动手给前线的战士缝制内衣、手套、帽子、被子……孩子们表现都不错，尤其岸英劳动最积极。他不但自己的任务完成得很好，还要帮助其他人。他承担的社会工作很多，经常要找同学们谈心，解决思想问题。这项工作可不简单，因为27个国家的孩子，情况不同，思想都不一样。

1941年秋冬之交，最艰苦的任务是到伊万诺沃城北20多公里的山林里去砍树，男同学每天定额3立方米，女同学每天2.5立方米。砍的树还要劈成一块块木材送到前方，支援战争。

那些白桦、松柏，高的有20公尺，树干也有水桶那么粗，先要用斧子砍个缺口，然后用锯子锯，放倒一根真不容易啊！岸英虽然个儿高，力气也大，可是，每天要干十多个钟头的重活，也真够呛。开始一两天还好，到一个星期以后，小伙子们都累得精疲力尽了。岸英为给大家鼓鼓气，很随便地说：“同学们，你们干得不坏呀，斯大林同志知道了一定很高兴，我们的父母知道了一定很满意，我们都是革命者的后代，要为消灭法西斯出力呀！”

孩子们喜欢岸英，经他这么一说笑，全身的疲劳消除了不少。

每天都要搞到薄暮降临，同学们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附近的宿舍营地。他们在松树林子里搭了些军用帐篷，这就是他们临时的“住房”。

对孩子们最严重的考验是挖反坦克壕。当时战争比较紧张，红军已全部投入保卫莫斯科和斯大林格勒的战斗中去。敌人的飞机常来偷袭，为了防备德国法西斯的坦克进攻伊万诺沃城，儿童院孩

子们当然也不例外。

气温低到零下40多度，正是滴水成冰的时候。岸英这些生长在中国南方的青少年，可是第一次遇到这么冷的天。那地下的土层，冻得和石头一样，先用钢钎凿，凿半天也只在冻土层上留下几道白色的痕迹。岸英双手震得发疼，发麻，裂了缝，他用胶布贴上，再挖。要挖成3米深、3米宽的反坦克壕，每天每人的定额是一立方米，可真不容易！中国孩子在共青团支部书记的带领下，任务完成得比较好，经常受到教师和市里的表扬。

苏德战争正处紧急阶段，苏联红军在前线损失很大，要不断从后方补充兵员。苏共中央有个意见：国际儿童院的外国青少年，为了使他们回国以后，能很好地为祖国服务，要他们安心学习，可以不去前线。

岸英呢，他却坚决要求学习军事，上前线消灭德国侵略者，为了达到这个崇高目的，他可动了不少脑筋呢！

战争破坏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岸英眼看着德国侵略者犯下的滔天罪行，早就在课堂上坐不住了。一天，他从报上看到德国侵略者杀害苏联人民的消息后，十分沉痛，他不由得想起杀害妈妈的反动派和正在侵略中国的日本侵略者，新仇旧恨，义愤填膺。于是，他在纳粹飞机的轰炸中，在地下防空壕里，再也抑制不住对敌人的仇恨，铺开一张信纸，用流利的俄文向苏联最高统帅部写信：

最高统帅部

敬爱的斯大林同志：

我是一名普通的中国青年，我在您领导下的苏联学习了5年，我爱苏联就像爱中国一样。我不能看着德国法西斯的铁蹄蹂躏您的国土，我要替千千万万被杀害的中国人报仇。我坚决要求上战场，请您一定批准我的请求！

致

革命敬礼！

谢廖沙

一九四二年五月于伊万诺沃

（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

岸英署上谢廖沙和毛岸英的名字后，把信投邮局了。

一天又一天，他等待着斯大林的批准。十天半月，还没有音讯，他焦急了，写了第二、第三封信，每天翘首盼望斯大林的回信。

“唉，斯大林同志可能太忙了，哪有时间给我回信呀？”岸英叹着气，自我安慰了一番。他在课堂上和国际儿童院的小天地里，再也呆不下去了，他像只展翅欲飞的小山鹰，迫切希望能飞向炮火连天的战场。

1942年5月的一天，春光明媚，百花盛开，国际儿童院的院子里，鸟雀欢叫着，迎来了一位贵客。

这位贵客就是苏联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曼努意尔斯基①。他是个年近花甲的老红军、老将军，神态严肃而又慈祥。1938年，岸英兄弟在莫斯科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宿舍住过的一段时间里，曾跟曼努意尔斯基有一面之缘。

这回，曼努意尔斯基是来伊万诺沃市视察的。岸英一见他，就觉得好机会已经来临。岸英一进曼努意尔斯基住的房间，两脚一并，举起右手，在帽檐上一靠，行了个军礼，大声地说：

“报告曼努意尔斯基将军。”

将军站起身，仔细打量着这个精神饱满的英俊小伙子，好久也

---

① 曼努意尔斯基（1883—1959），苏联人。1924年起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成员，1928—1943年任书记处书记。

没搞清对方是谁，只好抱歉地说：

“唔，是个棒小伙子，可是，我的记性不好，怎么不记得你的名字啦！”他风趣地在后脑勺上轻轻拍了一下。

毛岸英挺神气地说：

“曼努意尔斯基将军，你不记得我，我可记得你呀，在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的住地，我见过你。”

曼努意尔斯基用指头轻轻敲了几下脑门，耸耸肩，还记不起。

“我那时只有16岁，还是小孩子，现在长大啦。”岸英为了给客人留下印象，一直笑眯眯的，做着手势，实在憋不住了，这才红着脸说：

“曼努意尔斯基将军，我叫谢廖沙，我，我是——干脆告诉你吧，我是毛泽东的儿子，我叫毛岸英。”

“哦，好呀，好呀，毛泽东的儿子。你有什么事要找我呀？”将军把两只粗壮的手，在岸英的肩头爱抚地连拍了几下，要他坐在沙发上，又亲自为他倒茶。

岸英先不谈参军的事，怕那样提要求，一下子给顶了回来就不好办了。他转弯抹角，先从苏德战争、中日战争的形势谈起，从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美国在太平洋的主要海军基地——珍珠港，谈到目前德国侵略者正在渡过顿河河曲，向斯大林格勒进军……

将军很欣赏毛泽东的儿子，称赞说：

“小伙子，你对目前全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形势了解很全面，你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发展趋势的预测，也是有道理的，关心世界大事，这很好呀！”

“曼努意尔斯基将军，请问你，我们年轻人，在当今应该打些什么基础，才能为反对法西斯战争作贡献呢？”

岸英面对着将军，两手平放在膝盖上，显得十分诚恳、虚心求教的样子。

曼努意尔斯基将军站了起来，在屋里踱着步，大马靴踩在地板上，卡卡地响着。岸英那对迫切的目光，目不转睛地盯着将军魁梧的身影。

“当前国际上反法西斯力量正跟法西斯进行殊死的搏斗，你们年轻人，一要关心政治，二要关心战争，准备打仗，三要学好文化基础课。你的爸爸毛泽东同志，特别会打仗，尤其是游击战争，打得更好，他领导中国八路军、新四军，给日本侵略者以致命的打击，是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中伟大的一股啊！”

岸英聆听着将军对爸爸的赞扬，脑海里浮现着抗日英雄在万山丛中挥舞大刀向侵略者头上砍去的英勇形象……他又想起：苏联人民为反法西斯付出了多大代价！差不多每家都有牺牲的，不但青壮年上了战场，就是青年妇女，也雄赳赳开赴前线……

第二天，岸英又去找将军。他再也忍不住了，终于鼓起勇气，一本正经地对将军说：

“曼努意尔斯基同志，我已经20岁了，我马上就读完八年级了，我决定不读完中学，想进军事学校，你看怎样？”他双眼盯视着这位老红军。

将军感到很惊奇，至此，他才明白谢廖沙跟他纵谈天下战事的真正意图，忽然笑道：

“小伙子，你别着急呀，将来打仗的机会多得很呢！”

“不，我现在就要学军事，准备上战场。”

“你是中国人，没有入苏联国籍，上战场还轮不到你呢！”曼努意尔斯基拍拍岸英的肩膀，笑眯眯地说。

“不，反法西斯人人有份，我是一个中国革命者的后代，我有义

务履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将军看见岸英的态度非常坚决,十分诚恳,就说:

“我是苏军政治部副主任,你想进军事学校嘛,这很容易,我可以帮忙,一句话就行,谢廖沙,你等着吧!”

没隔多久,岸英果真如愿以偿,进了伊万诺沃市附近那个中文叫“水”的地方——苏雅士官学校快速班学习。

这所学校是初级军官学校,是专门培养连队士官的,学生没有军衔。岸英去了以后,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军事训练。

岸英给伊万老师来信,汇报了士官学校的生活,还讲那里伙食困难,消耗体力大,肚子老是饿。伊万老师很疼爱岸英,就从商店里买了黄豆,放些花椒、盐,煮烂了跟蔡博一起去看岸英。他们来到军校时,正碰上苏雅士官学校的学生进行马术训练。

一个个全副武装骑着战马的学生,手持雪亮的两尺多长微弯的马刀,在操场上奔驰着,马刀在阳光下闪着银白色的寒光,飞跑的战马,经过模拟的德国侵略者跟前,骑手们高喊一声“杀!”一马刀砍下去,侵略者的脑瓜子便滚得老远……

伊万和蔡博在操场上看得发呆。他们被这队年轻骑兵威武的表现牢牢地吸引住了,在一闪而过的马队里,也分辨不出那个是岸英。

演习完毕,倒是岸英首先发现了他们。他牵着汗流浃背的大黄马,快步走上前来,气喘吁吁地向伊万敬了个军礼,说一声:

“你们好!”

伊万老师一会儿摸摸岸英的肩,一会儿给马梳理梳理鬃毛,称赞道:

“永福,你还真像个青年军官呢!”

“不是军官,是上等兵,你看,肩上没杠牌牌。”岸英笑着说。

“给你送黄豆来了，用花椒和盐煮的。”伊万老师把黄豆送到岸英手中。岸英毫不客气地抓了一把，塞在他心爱的大黄马口里，然后，抓一把捂在自己嘴里，咀嚼着，连声说：

“好呀好呀，伊万老师，你这是雪里送炭哩！走，到我营房里玩玩。”

伊万老师询问了岸英的学习、训练情况后，岸英诚恳地说：

“伊万老师，我想加入苏联共产党，你作我的介绍人行不行呀？”

“我怎么不愿意呢？不过，你没有加入苏联国籍，军校党组织会不会吸收你呢？你问清楚了，再写信告诉我。”

1943年1月，岸英进入莫斯科列宁军政学校学习。这时候，他已全副红军装束，穿着草绿色的制服，肩章上镶嵌着两颗金光闪闪的五星，标明他已是中尉军官了。在学员中，这是个例外。列宁军政学校是培养中级军官的学校，学员们绝大多数是打过仗的从前线调回学习的有经验的尉、校级军官，他们胸前多挂着勋章，只有岸英胸前一无所有，因为他没有战斗经历。但是战友们都很喜欢这个中国青年，有时还跟他开开玩笑：

“喂，谢廖沙，大概是曼努意尔斯基将军对你另眼相看，对你特殊照顾吧！哈哈。”岸英却不管这些，只要能学习军事，他们开什么玩笑，他都不在乎。

入校不久，他便向学校党组织打听了入党的事。大概也是因为曼努意尔斯基讲了话，军校党组织破例地同意毛泽东的儿子加入苏联共产党的要求。得知这个消息后，岸英欢天喜地给伊万老师写了信。

伊万老师担任了岸英的入党介绍人，他给岸英作的鉴定是：

“政治觉悟高，学习好，劳动好，革命精神饱满，树立了为共产

主义奋斗终身的志向，可以入党。”

于是，1943 年 1 月，经伊万老师的介绍，岸英在军校履行了入党手续，成了一名光荣的联共(布)党员，那时他 21 岁。1946 年回国后，他直接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在战争期间，列宁军政学校这所中级军官学校，为了战争的需要，短短的几个月就可结业。后来，岸英又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这是苏联红军培养高级参谋人员的最高学府。岸英进学院不久，他那投笔从戎、上前线杀敌的凌云壮志终于得到实现。

1942 年 11 月至 1943 年 2 月，斯大林指挥的苏联红军，在斯大林格勒大会战中，歼灭德国侵略军 30 多万。这一仗，被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此后，苏军开始反攻，德军节节败退。为了彻底歼灭德国侵略者，一批批的青年军官，头戴钢盔，身穿制服，肩挎长枪，接受统帅斯大林的检阅，开向白俄罗斯第二战线。

岸英跟千万名青年军官一样，摆动手臂，唱着雄壮的战斗歌曲：

“听吧，战斗的号角发出警报，
穿好军装拿起武器！
青年团员们集合起来，
踏上征途，万众一心，
保卫国家！
我们再见了亲爱的妈妈！
请你吻别你的儿子吧！
再见吧妈妈！
别难过，莫悲伤，
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

歌声越来越远，毛岸英——毛泽东的长子、国际主义战士、苏

联红军坦克连指导员，他的足迹踏遍了白俄罗斯、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的广阔土地，为苏联反法西斯战争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1945 年初，岸英在苏德战争结束前夕，奉命回到莫斯科。在那里，他受到了斯大林的亲切接见。为表彰他为苏联卫国战争所做的贡献，斯大林赠送他一支手枪，留作纪念。

苏德战争结束以后，岸英进了苏联的外语学院——莫斯科东方语言学院，学习政治经济学。这时候，岸青也进了东方语言学院学习。

1945 年底 46 年初，岸英回国时是戴着苏军上尉的军衔见父亲的。

第　三　部

扎根·成長

有一则古希腊的神话，叙述的是一位巨人、海神波塞冬和地神盖娅的儿子安泰的故事。他与敌人格斗时，只要身不离地，就能从大地母亲身上吸取无穷的力量而所向无敌。

一踏上了祖国的土地，他感到了自己的幼稚无知……他想往着到基层去锻炼自己，他体会到："希腊的安泰可为例，脚一离地气便息！"他决心："永不离群众、永事不离土！"

分离18年了，父亲爱子心切，亲赴机场接儿子。父子俩好像有说不完的话……

对祖国的一切，他似乎有些陌生了，但父亲教子有方，他从“劳动大学”到“窑洞大学”

1945年的秋天，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投降，被赶出了中国。战后，祖国的未来命运强烈地牵动着毛岸英的心。经过了战争的洗礼，这位将满23岁的青年，再也无法安心于宁静校园生活了，他下决心：回祖国去！到那火热的解放事业中去！要为建立一个新中国作贡献。

从前线回来，又进入语言学院学习，岸英仍保持着在儿童院养成的关心国内外时局的习惯，他经常和在莫斯科钢铁学院、动力学院等大学学习的蔡博、郭志成等人密切往来。他们在一起时，还和往常一样畅谈着……

“我想回国去，恨不得马上就走。”他急切地说。

“我看，你还是学完了再回国！”蔡博劝他。

“不！”他态度十分坚决，“我学的是政治经济，跟你们学技术的不同。我要和实际接触，到祖国的革命现实斗争中去才能学到真正的东西。”

他要求回国的心切，给爸爸写了封信，又给党中央负责在苏联

学生工作的领导写了信。信发出后，他又以焦急的心情等待祖国的回音。

作为父亲，毛泽东也感到，儿子长大成人了，应该回国参加实际斗争的锻炼了，于是，他同意了儿子的请求。

1945 年 12 月的一天，他终于接到了来自祖国的通知，随同两位苏联医生秘密地回国。然而，接到被批准回国的通知后，他怎么也按捺不住喜悦的心情，尽管要秘密起程，但是，他还是欢天喜地跑到钢铁学院，把这个消息偷偷告诉了几位好友。

朋友们都为岸英就要回到祖国，就要见到父亲——也是他们都十分敬仰的领袖，感到高兴。“我们联名写封信，叫岸英带给毛伯伯，向他问好，就说，我们一定不辜负他对我们的期望，努力学习科学技术，将来也要回去为祖国服务的。”有人提议，大家立即一致拥护。

“可以，可以！我一定带到，快写吧！”岸英此时的心情非常高兴，看到朋友们是那么地热爱自己的父亲，便满口答应着。

纸和笔拿来了，大家推举蔡博执笔，起草了一封信，然后，几个人恭恭敬敬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1945 年 12 月底，元旦在即。冰天雪地的莫斯科。一架伊尔型客机腾空而起，直向云天，向东方飞去。他这是第一次坐飞机，而且是飞回自己的家，他那颗激动不已的心，不可自持地跳个不停。此时此刻，他能不兴奋、激动吗……

就要到家了，离开祖国已有 10 年了；就要见到父亲了，他已有十八九年没见父亲了。想想离开祖国时是个什么情景……当年，父亲率领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虽然摆脱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但是，仍被压迫在西北的一角；而他们，正因为是毛泽东的儿子，就必

须隐姓埋名，就不能过正常的生活而要过忍饥挨饿的流浪生活。从小他们就要承担起因父亲而带来的责任，他们受了多少苦，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也正因为他们是毛泽东的儿子，国内便没有容身之地，不得不远走他乡，寄居国外。然而，对于这些，他没有抱怨，他从小就坚信父亲是对的，他们开创的事业是正义的，是伟大的。当年，虽然他还是个孩子时，便用吃苦受难支持父亲的事业，如今，他回来了，他追随父亲而来，用实际行动投身到父亲领导的人民革命事业中……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呢！

飞机在高空中平稳地飞行，从舷窗看下去，下面是一片银装素裹的白色世界，他又想起了在苏联生活的这些年，想起在国际儿童院那许许多多朝夕相处的伙伴，想起了冬天溜冰、滑雪时的快乐情景……

当年，从上海出发绕道西欧去苏联，光海轮就坐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而如今，从莫斯科到延安是乘飞机，加上中途等候换乘飞机的时间也就仅仅用两三天的时间。今非昔比了，但变化不仅是这方面。这10年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拥有120万党员的全国性大党了，它所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发展壮大，解放区面积达到近百万平方公里，人口达一亿多，特别是人民自己的军队，已经有130余万人。尤其重要的是人心所向，经过8年抗战的斗争，人们进一步认识共产党，认识到她是未来的中国社会的中流砥柱，人们拥护、热爱、钦佩共产党和她的领袖毛泽东，把毛泽东看成是人民的大救星。

这些变化，毛岸英虽身在国外，但也能感觉得到。今天回国，形势和当年亡命出走已大不一样了，同样是那句话，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呢？然而，毛岸英偏偏不是那种躺在老子的荣耀上过生活的人，他回国是要干事业，路是自己走的，父亲的功绩和地位对他来

讲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他不希望这些对他的今后有任何影响。他要从头做起，从最底层做起，要把自己的根深深地扎在人民中间。回国后，干什么工作呢？做政治工作？它的领域太宽广了；到军队去？这倒满符合自己的志向，还可以学习爸爸的战略战术。别忘了，自己还是个红军上尉军官呢……

这时透过窗口，脚下的大地已经改变了颜色，一片苍黄，无边无垠，从地图上看，应该是哈萨克一带了。突然在黄灿灿的沙丘中，出现了一片湖，湖水翠绿翠绿的，在四周黄沙映衬下，真像一块镶嵌在金制皇冠上的绿宝石，那应该是巴尔喀什湖了。不久，飞机飞过了山口，天山山脉出现在脚下。

“祖国！祖国的土地，我，我终于回到您的怀抱！”他激动得热泪盈眶，两眼紧紧地盯着窗外。他的情绪影响着舱里的其他乘客，人们以为他是第一回坐飞机的原因，可是，人们不知道他是谁，谁也猜不透此时此刻他在想些什么，为什么而激动……

飞机在新疆迪化（乌鲁木齐）郊区的机场降落，又转乘小飞机从迪化飞往西安，再从西安飞向延安——当时中国革命的心脏，他父亲的身边。

“看哪，延安，宝塔山！”

这时，机舱内一位身着苏联红军将军制服的50岁左右的人，从座位上站起身，用那碧蓝的锐利的目光，盯视着机翼下的大地，旋即，非常激动地以苏联人特有的豪放，将双手摊开，紧紧地将毛岸英搂在怀里，“呜啦——延安！”

毛岸英激动得眼里湿漉漉的，他连忙将头伸向舷窗，将额头抵在窗板上，目不转睛地俯视机翼下的一切：那起伏的黄土高原，那在画报上早已神会的宝塔；那蜿蜒的黄土大道，那路上的毛骡；那黄土坡上一层叠一层、一孔挨一孔的窑洞，以及很小很小的、走动

着的人们……

“那是王家坪，那是枣园，那是延河，延河封冻了，像条银蛇……”将军如数家珍地带着自豪而有些卖弄的口吻自言自语。

“阿洛夫将军，您到过延安？”毛岸英惊喜地握着阿洛夫的大手。

“到过，到过，我这回是旧地重游了，谢廖沙，延安可是个土得出奇的地方，你回来以后，生活上变化大，可说是，一个在天上，”他用手指向头上指指，又把巴掌向脚下压压，“一个在脚底！上尉同志，你要有思想准备呀！”说罢，用大手在岸英的肩头上拍一拍，故意摩娑一下那三颗金星闪闪的肩章。

另一位身穿普通西装的中年人，调侃地说：“阿洛夫将军，你过虑了，谢廖沙上尉是毛泽东的儿子，他不会吃苦头的！”

“米尔尼柯夫大夫，你错了，”阿洛夫将军以教训的口吻说：“你完全错了，你不了解毛泽东！”

米尔尼柯夫大夫只好耸耸肩，把双手一摊，跟毛岸英做了个“不可思议”的窘相。

三人顿时陷入了沉思。

专机上的两位苏联人，一个是红军将军级外科医生阿洛夫，一个是内科医生米尔尼柯夫大夫，后来中国人嫌他那个名字太长太拗口，连毛泽东都喊他“米大夫”，他是地方上的内科专家。一个外科，一个内科；一个在军内，一个在地方，这两位医学专家是斯大林应毛泽东的请求，亲自指派到延安担任毛泽东的医疗护理工作的。

毛泽东的身体一直还算比较健康。然而，自从 8 月 28 日飞往重庆，和蒋介石谈判，一干就是 40 多天。10 月 10 日，即“双十节”，他在重庆和蒋介石签订著名的“双十协定”后，即于第二天（11 日）飞回延安。由于内战阴云一直密布不散，从此他又日理万机，准备

对付蒋介石“下山摘桃子”。这样一来，由于疲劳过度，终于积劳成疾，一紧张便手脚发颤，大汗淋漓，头脑晕眩……

这可把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急得团团转，一些著名的医生，已经撤离延安；原先的苏联医生阿洛夫对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健康状况是很熟悉的，可是，在毛泽东从重庆返回后，他同苏联情报组的成员一起赶回国参加十月革命庆祝活动去了。

怎么办？毛泽东的健康牵动了多少人的心！

当时的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师哲（兼毛泽东的翻译）在回忆录中写道：

> 经请示毛主席同意，我给斯大林发了一份电报，说明毛主席的病情，希望他们给予医疗方面的帮助或提供一些医疗意见。
>
> 他们回电说，从电报上他们的医疗专家无法诊断毛主席的病情，没法提出任何治疗方案或建议，所以关于毛主席的健康问题还得另想办法，并采取切实可靠的措施。他们表示，如果需要，他们可以派医生去延安为毛主席担任医疗护理工作。
>
> 我接到回电后，就向毛主席汇报，征询他是否同意苏联派医生来延安为他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担任医护工作。他同意了。我很快给斯大林回电，请他们派医生来延安。
>
> 但过了大约两个小时，毛主席又叫我暂时不要给苏方发电报。然而，为时已晚，电报已经发出去了。
>
> 毛主席说：做得太快了，你这样着急干什么?!
>
> 我心想：这还不急！嘴上只好说：我的性格就是急，历来如此。

他再也没说什么。

这期间，毛泽东换了几个地方，本想让他静心休养，可是，他是个闲不住的人，身体稍微好些，他就主动地走到群众中去，访贫问苦，自己反而显得很疲劳。

正在为难之时，12月初，苏方来电说，他们拟派两名医生——一名内科，一名外科，不日飞抵延安，同行的还有毛主席的长子毛岸英，要我们做好准备。我把这份电报内容向毛主席作了汇报。他听后十分欣喜，并表示，到时他将亲自到机场去接。

毛泽东要亲自去机场接苏联医生和儿子，这可不是一般小事。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人们清楚地记得，毛泽东要亲自出动，去迎接客人，包括中央的领导同志回延安，那都是屈指可数的。

现在，正是滴水成冰的三九寒天，西北的风沙大，有时刮得天昏地暗，且带着病体去机场，要说迎接苏联医生，过去阿洛夫初到延安，他也没亲自出动。看来，十有八九，他这回要亲到机场去接，被接的首先是他心爱的长子毛岸英了。这个宝贝儿子，5岁离他，18年后再见，这在年过半百的毛泽东心目中，仿佛注入了兴奋剂，为此，他盼着那一刻，甚至彻夜难眠啊！当然，他的激动还掩饰在内心深处。由此，人们也可揣摸到毛泽东思子心切！机场接儿凝聚着多少父爱啊！

毛岸英呢，对于东奔西走为革命日夜操劳的父亲，他了解得太少了，以前连什么模样都记不起来了，见到父亲的画像、照片还是在他到苏联以后了。而今，父子离别十八载，要在延安相见了，父亲到底是个什么模样？跟自己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岸英在飞机上激动不已，思前想后，呼吸都紧迫了。当然，他根本想不到，日理万机的父亲要在隆冬严寒中亲去机场接他。

飞机在延安上空兜了个圈子，然后平缓地向机场俯冲，起落架降下了，在跑道上擦过，震得座位上的人不住地颤动，而留在机身后边的是滚滚烟尘——当年延安机场的设施可不太理想。

飞机终于平安降落。

毛泽东带着一队欢迎的人，站在跑道边，当飞机停稳后，他迎向伊尔飞机。

从飞机上第一个出来的便是毛岸英。

这是一幕多么激动人心的场面！

毛岸英在机舱口向外张望时，感到一切都很陌生：黄土高坡、土路、灰朦的天，枯树、凛冽的寒风，陌生的人群，陌生的场景。可是，当他正弓着身子走出机舱时，蓦然发现站在舷梯脚下的竟是他日思夜念、在梦中都呼唤的父亲——毛泽东。这些年来，他从父亲寄到莫斯科的照片，从电影、画报上，何止千百次地看到过父亲的魁伟形象，所以，虽然 18 年没有见面，今日打眼一望，第一眼还是发现了父亲。

父亲这么忙，天这么冷，父亲又有病在身，是不会到机场来接他的，他曾经几十次地这样设想。如今，太突然了，千真万确，站在面前的就是他最亲爱的最敬仰的父亲。

岸英几乎是从飞机舷梯上滑下来一般，站到父亲跟前，毛泽东迎上前去，张开手臂，紧紧地抱住岸英，激动万分地凝视着比自己个头还高的岸英，第一句话是："你长得这么高了！"岸英穿着苏军军绿色的呢大衣，肩章上的三颗星闪闪发光，年轻、英俊、魁梧，真使人喜爱。

岸英以苏联式的奔放热情，紧紧地搂着毛泽东，不断声地呼喊着："爸爸，爸爸，我多想你啊！"听着儿子亲切的呼唤，毛泽东眼睛湿润了，喉咙有些嗄哑地亲昵地轻轻地回道："一样的想你啊！"

但是，毛泽东是一个很讲礼貌的人，他不能总是抱着儿子，接着，他同阿洛夫、米大夫以及苏军上校机长和机组人员一一握手。

毛岸英笑咧了嘴，虽然也跟来接机的人们一一握手，可是，仿佛视而不见，连他在莫尼诺第二儿童院时的副院长，如今的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师哲，他好像也不认识了，他的双眼总盯着父亲。只见毛泽东穿着一身又肥又大的土灰色棉衣棉裤，脚下是一双大头棉鞋，这还不算，头上还戴着一顶灰棉帽，加上他那一口改不了的韶山土话，真是土得不能再土。可在岸英眼里，都是好得不能再好，亲切得不得了。

而局外人看来，这父子二人，一个是洋得潇洒，1.8米以上的个头，全副戎装，英姿飒爽；一个是土得出奇，一副陕北农民干部的打扮。

当然，迎接的人们在惊羡、喜悦之中，也不可能想得太多太远。

毛岸英登上了父亲的吉普车，毛泽东看着苏联医生、机组人员上了车，才钻进吉普车内，手一抬，吉普车在布满砾石、黄沙的河滩公路上颠簸着，向着毛泽东的住处行驶而去。

王家坪后靠清凉山，前面是一条大公路，公路那边就是宽阔的延河了。眼下正是枯水季节且冻了冰，冰下面，隐约地看见水在大大小小的卵石间穿流着。在延河西边，便是闻名的凤凰山，毛泽东在1937年和1938年间，曾在山下居住过。

1946年元月，毛泽东刚刚搬来王家坪，住在一栋新盖的石窑里。这个石窑，模仿窑洞的样式，但是，它盖在露天，不是挖进山肚里的，石窑里的窗户等等，都和窑洞一个样子。石窑有两间，极为普通的，里面的布局、陈设十分简陋，一边是卧室，放着两张帆布躺椅，一边是办公室兼会客室，放着电话机。

石窑外边，有一块不规则的月形空坪，长了不少的杨树、柳树、槐树。杨树上，勤劳的喜鹊还在上面筑了几只窝。石窑的西边有一块矮矮的四方石桌，桌四边有固定的石凳，是毛泽东跟同志们谈工作和谈话的好地方。石窑旁边盖有一间小平房，周恩来等中央负责人曾经在那里小住过，眼下是为岸英准备的临时宿舍。

傍晚，毛泽东设宴招待苏联医生、全体飞行人员和毛岸英等。宴会后，他请机长到他的住处座谈，并当场要师哲给斯大林写一封感谢信，说明阿洛夫、米尔尼柯夫大夫、他的儿子毛岸英等均已安抵延安，望勿悬念，对送给他的礼品表示谢意。他把这封信亲自交给上校机长，请他带回莫斯科转交斯大林。

阿洛夫、米大夫被安置在王家坪毛泽东住处的后排窑洞里，既有工作间，又有医务室。他们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对毛泽东的医护工作。

刚回来那几天，毛泽东要岸英跟他一起吃饭，边吃边聊，非常融洽。父子倾心交谈，日夜不离，18 年啊，有多少话要讲呀！“你回来了，好，好，很好。”爸爸仔细打量着他，脚踩牛皮大靴，身穿军呢大衣，那英俊秀气的面庞上，特别是开阔的眉宇间，天庭饱满。既看得出开慧妈妈的倩影，也有自己的特征。毛泽东拍拍儿子的肩膀，看着岸英比自己还高出几公分，满意地笑着。

俗话说，“人逢喜事精神爽”，毛泽东的病很快痊愈了。原来，两位高明的医生对毛泽东的身体进行了认真、全面的检查，专家们经过会诊，得出的结论是：由于操劳过度、负担繁重，精神过于紧张所致。药方：好好休息、安静地休息，精神缓和下来，加上药物治疗，就可以恢复常态。更主要的是，阔别 18 年的长子毛岸英回到他的身

边，他非常高兴，这比任何特效药更富疗效。

岸英没有忘记朋友们的委托，把蔡博等人给毛泽东的信交给了爸爸。毛泽东看了这些留苏学生的信，又认真地听了岸英的汇报，欣然提笔，给蔡博他们写了一封信：

蔡博、张芝明、刘永斌、黄平、赵小炎诸位青年同志：

永福回来，接到你们的信，十分高兴。正如你们信上所说，新中国需要很多的学者及技术人员，你们向这方面努力是很适当的。这里，只能简单地写几句话给你们，总之是希望你们一天天地成长、健壮、愉快、进步；希望你们团结一同留苏的中国青年朋友，大家努力学习，将来为国服务。

紧紧地握你们的手！

毛泽东

一九四六年一月八日

毛岸英回到延安，对毛泽东来说又是喜中有忧。

由于他从小在外流浪，无拘无束，后来在苏联10年，接受的是欧洲方式教育，长期跟俄国及世界各国的同学打交道，在生活上，待人接物上完全欧化了，看见熟人，喜欢“OK”、“呜啦”，张开双臂，喜形于色。有时，毛泽东看着他如何把双臂高举，又如何将手缩回，或耸耸肩。岸英喜欢打手势，以加重语气，毛泽东就把双眸老盯着他的手势，弄得岸英红着脸很不好意思。后来，只要毛岸英“手舞足蹈”，毛泽东那双锐利的眼睛就盯着他，弄得很尴尬。毛泽东的东方传统告诫儿子：年轻人在长辈面前，在年纪大的人面前，不可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岸英渐渐习惯了，只要想抬手，面前就出现了父亲冷峻的目光。除此之外，岸英还有一些俄国式的习惯，使延安土

八路们接受不了，就是爱搞些开玩笑式的恶作剧……在劳动时，把蚯蚓丢在一位姑娘的颈项里，弄得那最怕蚯蚓的姑娘又哭又叫。毕竟，岸英是个二十三四岁的后生，还未脱尽孩子气呢，又是长年生活在洋人的圈子，习惯与国内的人不一样，怪不得他在街上，看见七八十岁的老太太，也毫无顾及地像跟年青人说话一样随便，弄得人家啼笑皆非。

这还不算。岸英从苏联回国，也是个敏感的政治问题。当时，在延安有美军联络组，组长是包瑞德上校，后来任美国驻华大使馆武官。岸英回国，最感兴趣的是这位美国联络组长包瑞德上校。

那时，延安周末都举办舞会，毛泽东为了调养身体，休息脑筋，也常参加。岸英更是个舞迷，每场必到，而且像众星拱月，在他周围有着一群年轻漂亮的姑娘。她们大多数来自国统区，对于英俊潇洒的岸英真是心向往之，何况他又是人民领袖毛泽东的爱子。

更敏感的是，包瑞德上校知道毛岸英爱跳舞，喜欢交际，因此，每场舞会包瑞德必到，而且老是缠着岸英，二人一见如故，用英语侃侃而谈，没完没了……

凡此种种，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警觉，中国的传统是："子不教，父之过"，毛泽东要"管管儿子"了。

先从他的手势、服饰作起。毛泽东要岸英脱下那件呢军大衣的苏式军装，换上他给他的旧棉衣棉裤。江青则忙着用边区产的粗毛线为岸英织了毛裤、毛背心、毛袜子。不多久，毛岸英这个"洋学生"、"洋军官"，在服饰上渐渐地被父亲同化了，变成了"土八路"。

不几日，毛泽东又要岸英搬到中央机关去住，而且规定他不准吃小灶。有一回，他突然问岸英："你吃么子灶？"岸英如实回答："中灶。"毛泽东生气了，责问儿子，"你应该跟战士一样吃大灶。"岸英肠胃有毛病，叫苦不迭，但也得服从，从牛奶面包变成小米窝头，真

难啃啊！

接着，父亲又教导儿子怎样按中国的传统方式来和人们交往，他关照说："你先去看看延安的老同志吧。见了人不要没大没细(小)的，年纪大些的，你喊他伯伯、伯母、叔叔、婶婶；最老的要喊爷爷、老爹爹、老奶奶；跟你差不多大的，或者喊哥哥，或者称同志，不要随便喊人家的名字。"停了停，毛泽东又说："这些老同志，都是参加革命好多年的了，他们有丰富的斗争经验，你以后要多向他们学习。"

岸英记着爸爸的话，不住地点着头。

听从爸爸的吩咐，岸英到延安的各个窑洞逐个地去看望老一辈的革命家。对于老同志，他非常尊重，有礼貌，老革命家们都喜爱这位知书达理的好青年。跟周围那些同辈青年的交谈中，他也努力抱着谦虚、谨慎的态度，不要流露出一点留学生的架子。

一天，春光明媚，毛泽东工作了一夜后，并没有马上休息，在院子里的石桌旁，父亲和儿子又进行了一次正式的长谈。毛泽东发现儿子身上的一些毛病，要像当年他的父亲毛顺生管他那样，开始在岸英身上"用功"了。

毛泽东问了问岸英在苏联的学习情况，又问：

"你在苏联经常读中国的书吗？"

"经常读的。能找到的我就找来读。"

毛泽东又问："读过什么小说？"

岸英想了又想说："读过《红楼梦》、《水浒》，还有鲁迅的作品。《红楼梦》里的诗词不大好懂。"

毛泽东把读《红楼梦》的要领告诉岸英，然后，停下脚步，遥望延河那边的凤凰山上正在开荒的人群，慈祥地对岸英说：

“岸英，你在苏联长大，国内的生活你不熟悉，你在苏联的大学读书，住的是洋学堂，我们中国还有个学堂，这就是农业大学、劳动大学。”

听到这里，岸英早已明白了爸爸的意思，便接着说：

“是的，我离开中国这么久，在苏联大都过的学校生活，中国农村我不知道，也不会种田，我愿意向农民学习。”

毛泽东给儿子讲了孔夫子的一个故事：孔子的学生问孔子，会种田吗？孔子说：我不如老农；学生问他：会种菜吗？孔子说：我不如老圃。

“你在莫斯科睡得那么好，钢丝床，一人一个床，到了延安，就是炕上摊张芦席子，底下烧火，不要怕；老百姓有虱子呀，不要怕，有水就多洗一洗，没水，就用手多捉几个。”讲到这里，毛泽东也笑了，又说：

“过些时，我替你找个校长，住劳动大学去。”

当时，边区政府的每个人每年都有任务，要生产一担六斗小米。毛泽东的工作太忙，边区的一位特等劳动模范便主动替毛泽东完成代耕任务。有一天，那位劳模又赶着毛驴，又给毛泽东送粮食来了。毛泽东把岸英叫了来，指着劳动模范对岸英说：

“这就是你的校长。你过去吃的是面包牛奶，回来要吃中国的小米，可养人哪！”又指着岸英对劳模说：“我现在给你送一个学生，他住过外国的大学，没住过中国的大学。”

劳模惶恐地说：“咱叫什么大学，咱啥也不懂。”

毛泽东谦虚地说：

“我知道的你都知道，你知道的我还不知道。他还是个娃娃，我就拜托给你。你要教他种地嘛，告诉他，庄稼怎么种出来的，怎么多打粮食。”

劳模信心十足地说："那我行。"

"好吧，就这样说定了，这些小米，你带回去，当作学费。他过几天就去。"毛泽东要劳模休息休息，又跟岸英肩并肩，在院子里漫步。爸爸的话，像潺潺的溪水，轻轻的春风，滋润着岸英年轻的心灵。

1946年3月，是抗日战争胜利后的第一个春天。这天一清早，吴家枣园就忙碌着迎接客人的到来。吴家枣园在延安城南15里，是由十来个自然村组成的一个行政村，村政府设在吴家枣园，村长姓郝。一大早，郝村长就起来扫院子，还把胡茬子刮得干干净净。抬头望见槐树上的喜鹊在叫，他自言自语地说：

"喜鹊叫，贵客到。"

他忙了一会儿，就来到村口，手搭凉棚，望着山梁上，看看客人到了没有。他在心里琢磨着：毛泽东的儿子是个什么样的小伙子呢？听说刚从苏联留学回来，可能讲的是一口的洋话吧！

"毛主席的儿子来当农民啦！"大家很高兴地转告着，等着他的到来。

岸英也在盼望这一天。今天他早就起床收拾行装了。

"张参谋，眼下乡亲们睡炕还垫褥子吗？"岸英手里拿着一床蓝布褥子，扭过头来问张参谋。

张参谋说："老乡们生活很艰苦，都不垫褥子。"

岸英赶快把褥子收进柜子里，说："那我也不带褥子，垫了褥子，在老乡家里会显得很特殊。"

这时，毛泽东走了过来，把一件打了补丁的棉衣披在岸英身上。岸英脱去大皮鞋，换上爸爸送给他的布鞋，背包里捆了一斗小

米和几斤菜籽、瓜籽，从窑洞里走了出来。

毛泽东送了他一段路，语重心长地对他说：

“岸英，你要和老乡们一同吃，一同住，一同劳动，从开荒一直要干到收割，再回来。等你劳动大学毕了业，再上延安大学好不好？”

“好！”岸英爽快地回答着。告别了爸爸，岸英跟着张参谋向吴家枣园大步走去。

从岸英的住地到吴家枣园还要更远一些，还要爬大坡，张参谋怕岸英吃不消，就牵了一匹老黄马，一上公路，他就对岸英说：

“小伙子，行李怕有几十斤重吧？来，搁马背上，你也骑上去。这匹马你别瞧不起它，它跟你爸爸爬雪山、过草地，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作过贡献呢。”

岸英背着行李，边走边抚摸着老黄马，孩子气地说：“老黄马呀，你也数得上是老英雄呢！”

张参谋要替岸英卸背包，岸英横竖不肯，背起行李走在前面，诚恳地说：

“同志，我是去上劳动大学，现在就开始进学校了，这是劳动的开端呀，一起头就得好好锻炼自己，我怎么能骑老黄马呢？”

张参谋觉得岸英说得有理，就劝说道：“你这个背包可不轻，你就把背包搁在马背上，空手爬坡舒服些。”

岸英仍然摇摇头，不肯放背包，两脚迈着大步，存心考验一下自己的脚劲儿。

黄土高原的山坡沟谷，不比一般的丘陵山区，它沟深，坡陡。岸英爬坡还不习惯，走着走着，身上背的东西越来越沉。尽管已是春天，但气候自然有些凉，一早一晚人们还要穿上厚棉衣。可是，与时下天气正相反，岸英早已走得汗流浃背，里面的褂子都湿透了，他

把棉衣的扣子解开来。

“歇一歇吧!”张参谋看着岸英累得额头上汗珠一直往下淌,就建议休息一下。

这时,一位老汉赶着一群山羊,从山坡上唱着粗犷豪放的“信天游”向这边走来。

“大溜溜,二溜溜,牵着两头黄牛,三溜溜,溜溜溜溜……”

他抖着银白的胡须笑问道:“你可是——”他眯眼望岸英。

“大爷,我是小学生,是到你们村里住劳动大学来啦!”岸英谦虚地说。

“嗳,你就是毛主席的大儿子毛岸英吧?”老汉把又粗又大的手放在岸英的肩头上,心花怒放,“嘿,你长的样子多像毛主席啊!快,我领你们进村。”

岸英脱下爸爸给他的又肥又大的旧棉衣,架在背包上,跟着牧羊老汉向吴家枣园走去。张参谋要他把棉衣搁在马背上,他也不肯,用一句古话回道:

“不压不成材嘛!”

进了村,看见乡亲们都是笑容满面地迎接他,他心里好感激呀。他咧着嘴,笑呵呵地喊着:“伯伯、叔叔、婶婶,我是你们的小学生,从今后,你们多多指教我呀。”

乡亲们都很喜欢这个英俊温和的后生,郝村长更是打心里乐开了花,拉着岸英的手久久不放。

“郝叔叔,这些小米是我的口粮。菜籽、瓜籽是我从国外带来的良种,爸爸叫我带来,请你分给村里的老乡,让大伙都种上几畦。”

郝村长笑得合不拢嘴,忙把两个青年后生介绍给岸英:“这是大哥,这是二哥,他俩是种庄稼的能手,你以后就跟他俩在一个变工组。”

岸英被安排在那位劳模家里。

当晚，他到十几户老乡家里都走了走，坐了坐，把村里的情况摸了个粗杠杠。

第二天清晨，雄鸡刚刚开唱，岸英就醒来了。他和二哥一骨碌下了炕，背起镢头出了窑洞，喊着大哥，三人有说有笑地来到了荒山坡。

“今天上第一课，开荒！”大哥笑咧咧地说。

他们把山坡上的荆棘条砍掉一片，便开出一片荒地。这种荆棘条又柔又韧。上面长着尖尖的三角刺，岸英开始没经验，小心地避开刺，用蛮劲去拔，结果，很费劲，拔不动，手一松，荆条就“嗖”地弹了出去又抽回来，打在脸上怪疼的，手上也划出了血口子。岸英不作声，仔细看着大哥二哥是怎么干的。然后学着他们的样子，也拉开架式，坚持干着。

陕北使用的掘地的镢头，与别处的不太一样，岸英还是第一次使这家伙。他抡起镢头，举得老高，手又握不紧，镢头刨下去，蹦蹦跳，不稳当，掘得也不深，有时刨到了石头上，还震得虎口发麻。不到半小时，他那双细皮嫩肉的双手，就起满了紫血泡。

大哥要他用帕子将手缠起来，作了握拳头的架势，教他说：

“镢头不要举得太高；手要握紧木柄，不打转，下去才有力，掘得就深，手也不会磨出泡来。”

岸英在大哥的手上摸了摸，嘿，又厚又硬的老茧，怪不得他们扯荆棘条一点也不怕扎手，抡起镢头那样有力。

岸英按照他们教的要领认真地干着、干着……

头一天收工时，他已累得腰酸背痛的，浑身没有一点劲，像散了架一样，第二天上工时，抬胳膊都困难。他咬着牙坚持着。说也怪，几天下来，身上的酸痛劲没有了，而且感到力气增加了不少，劳

动的技能也慢慢地掌握了，能和大哥二哥比着干了。三兄弟开荒，三把镢头简直像三部犁一样，不一会儿就能开出一大片生荒。这时的岸英一改学生模样，跟大哥二哥一样，光着上身，汗流浃背，土灰沾得满脸。

第二课学着赶毛骡送粪下地。这毛骡还专门欺负洋学生呢。你要它走，它斜着眼睛瞪着你，愣是一步不动；你不要它走，它又撂开四蹄，的的笃笃地乱跑一通，拽都拽不住。为了驯服小毛骡，他可动了不少脑筋，也闹了很多笑话。不久，小毛骡终于乖乖地听候使唤了，只要岸英吆喝一声，小毛骡就老老实实地迈开细碎的步子，跟他下地送粪，指到哪里走到哪里。

在"劳动大学"中，岸英还学会种土豆，脖子上挂着个装种子的布袋儿，先从单手点种学起，还逐渐学会了双手点种；他又学会了撒谷种，种玉米，一手抓粪，一手点种。更有收获的是，他了解中国的农村，中国的农民。他肯学肯钻，不懂就问，还随身带个小本本，把老乡们种庄稼的经验、谚语都记上……老百姓当中有丰富的知识、学问。

村长和房东生怕岸英吃不消，劳模的老伴千方百计做些好饭给岸英吃，每逢这时，他都要坚决谢绝。住在老乡家，他就和房东过一样的生活，吃的是一锅饭。那饭，就是米糠、窝窝头；那菜，就是马耳菜、蒲公英等苦野菜，岸英吃得津津有味。土豆丝加点盐和辣椒炒了，就算是美味佳肴了。吃饭用的那碗，也是补巴连补巴，坏了就用鸡蛋清加粘土粘上。每天下地干活，离家远，为了省时间多干活，家里便用瓦罐罐把饭送到地里。岸英和大哥二哥一块蹲在地头，捧着吃照样吃得开心。村长过几天就打发岸英回延安看看爸爸，为的要他改善改善生活，可岸英坚决不回，他诚恳地说："我还没有学到什么东西，怎么能回去呢？"

……

1946年下半年，蒋介石指使胡宗南进攻延安，形势紧张起来。村里请示县委以后，决定把岸英送回去。

“我不回去，我农业大学还没毕业哩。”岸英执拗地说。

郝村长说：“你劳动大学已经毕业了。要打仗了，回机关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干呢！”

郝村长硬把岸英送到毛泽东身边。

毛泽东亲切地招待郝村长，问他：“岸英在你那里学得怎么样？”

郝村长赞不绝口地说：“岸英是个好后生，他学会了驮粪、刨地、犁地、播种这些庄稼活儿，还利用空余时间，组织村里的青年人学政治、学文化。上山劳动回来，还总要捎回一捆柴，把柴禾送给‘三同’户和烈军属。岸英在劳动大学毕业啦！”

郝村长的称赞，弄得岸英很不好意思。

毛泽东回过头，仔细打量着岸英：只见他头上用白羊肚毛巾扎着个英雄结，穿着灰土布汗褂子，两条又粗又黑的胳膊闪着黧黑的油彩，脸上黑不溜秋的，跟陕北青年农民一个样子。毛泽东风趣地说：

“好呀，白胖子成了黑胖子了！”

郝村长过意不去地说：“毛主席，这些天把你娃娃苦啦。就说掏（翻）地吧，岸英看见其他变工队员一个个超过自己，便使劲往前窜，俺拦也拦不住。咱们天不亮就开荒，天黑了才回来。早上扛着镢头下地时，还看不见人影子，吃袋烟工夫，天才亮，咱们抽烟，岸英就给咱们介绍苏联情况，如今那儿耕田翻地都不用人，也不用牛，而是拖拉机，一辆拖拉机抵上百人的劳动量。

"天亮了，大伙就干活，山坡上尽是深草杂树，把它烧成灰当肥料。一个变工队，15把镢头掏过去，像汽车在大路上走过，满天灰尘。岸英跟我们一样，只穿裤衩，光着上身，鞋里灌满土圪垃，脱下鞋赤脚干，变工队员每天的任务是开荒一亩，好劳动力也受不了呢。掏了20多天地，就又吆毛驴送粪，……"

郝村长滔滔不绝地说着，毛泽东便疼爱地瞧一眼岸英，似乎在问："是这样吗？你吃得消吗？"岸英不好意思地点点头。

毛泽东爱抚地摸了摸岸英的双手，厚实粗大的手心里，那些血泡都结成厚厚的茧子啦，毛泽东满意地夸奖道："这就是你在劳动大学的'毕业证书'！"

问完了岸英的劳动情况，毛泽东又像是自己问，又像有意给一旁的岸英听似的，虚心地请教郝村长：

"郝村长，我想提个问题，向你这个'教授'再领教领教。谷子(小米)地不锄，碾出的小米啥成色？每斗收多少斤？锄了一遍的，啥成色，什么份量？锄二遍三遍的，碾出的小米啥样子？"

郝村长这老实巴交的农民，为难地说："毛主席，俺只顾了种地、收谷子，可又没注意过这些事，也没分开过称，反正是越锄谷子长得越好。"

毛泽东说："我听说，人家老农已经有了研究。谷子地锄草很重要。在土壤、肥料、水份相同的条件下，谷子地锄三遍的，一石(担)能碾出七斗半小米；锄两遍的，能碾六斗；锄一遍的，能碾五斗；一遍不锄，只能碾四斗多。每斗份量也不一样，份量轻一些的，是因为谷子瘪，碾出来的粒子碎，吃起来不光堂，没有油性。看来，还要勤翻勤锄，是不是呀！"岸英心中当然也明白父亲讲话的用意。

郝村长睁大了眼睛，心想：毛主席，你对庄稼活儿知道的比俺还清楚呀！岸英心中当然也明白父亲讲话的用意。

毛泽东对岸英说："在中国，不懂得农民，不了解农村情况，就不晓得中国的实情。要知道没有贫农，就没有革命，任何时候，千万别忘了农民啊！俗话说得好，活到老，学到老，学不完的。往后有机会，你还要去学习，拜农民为师。"

岸英默默地点点头，把父亲的话牢牢地铭刻在心。

从"劳动大学"回来，岸英向爸爸提出，他要边工作边学习。爸爸觉得岸英的要求是真诚的，便让他在中共中央宣传部，跟一些老同志学习，在逐步熟悉情况的同时，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从最基层做起，也就是读"窑洞大学"，了解中国的情况，提高工作能力。

岸英对一切都有兴趣，他如饥似渴地学呀，记呀，问呀。

"每天必须坚持学习两个小时。"

岸英自己动手，用白报纸订了个笔记本，在第一页上，写下了这铁的纪律。刚开始时，他要参加修建窑洞，又要工作，加上对国内情况还不熟悉，困难是不少的。一般地说，他要起草一个文件或解决一个问题，比一般同志要多花两三倍的力气。然而，他有锲而不舍的毅力，跟他以前干任何事情一样，只要下了决心，就非要干成不可，不达到目的决不罢休！

有一次，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谈到自己学习的经验：

> "……不仅有了决心，而且要有恒心。决心与恒心一旦结合在一起，会生出惊人的力量。我自己过去就有这个经验：光有决心是不够的，没有恒心作为后盾的决心实际上成为最要不得的'五分钟热度'，但在没有决心之前，是谈不到什么恒心的。决心是第一步的，是事情的开始，恒心是第二步的。第三步，第四步……是事情的发展。一直得到结果为止。"

那时，中宣部有十多个人，田家英跟岸英同岁，他的中文基础好，又懂历史，俩人相处得很好。从1946年夏到11月，岸英和陈伯达、田家英、陈真、何均4人分别住在山顶上的四个窑洞里。岸英便虚心地拜他们为师。1946年11月，延安中央机关疏散到瓦窑堡，中宣部被安排在瓦窑堡附近的一个小村里。这时，岸英、叶蠖生等人同住一起。叶蠖生那时三四十岁了，对历史学很有研究，学识渊博，又很健谈，天黑以后，没有灯，叶蠖生就躺在炕上，给毛岸英讲中国历史。

"今晚给我讲陈独秀和王明，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他们错在哪里？对中国革命造成了什么损失……"

同志们就给他一段一段地讲，他认真仔细地听，直到夜深人静。

每天夜里，没有什么文娱活动，差不多都是中国近代史的"故事会"，从孔夫子讲到蒋介石，从洪秀全讲到孙中山，从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活捉张辉瓒，讲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对于父亲的革命活动，岸英逐渐熟知了。

这期间，岸英常把自己的工作情况和学习心得，写信告诉爸爸，爸爸看了他的信，很高兴。1946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53岁诞辰，从延安给岸英回了一封信：

岸英儿：

来信两封均收到。第二封信写得很好，这表示较之人初回国时不但文字有进步，思想、品质也有进步。你的那些工作是好的。坚持读文章的计划，很有必要，再读一年也是好的。

我的身体比你走时更好些了。

祝你进步！

毛泽东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廿六日

爸爸的鼓励和祝愿，成了岸英埋头工作、刻苦学习的动力，他把爸爸的信放在身边，经常拿出来看看、想想。

同志们都佩服毛泽东用兵如神，苏联红军将领曼努意尔斯基也称赞爸爸会打仗，岸英总想，如果我也跟着爸爸打一次仗，学一学爸爸的战略战术思想，那该有多好啊！

1947 年 3 月，岸英随机关又回到延安，回到爸爸身边。

蒋介石在“全面进攻”惨败以后，又纠集了 23 万兵力进犯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当时，西北人民解放军只有 2 万人，敌军十多倍于我，这个仗怎么打呢？岸英密切注视着战事的发展。

3 月 8 日，他参加了延安万人动员大会，听了朱总司令和周恩来副主席的重要讲话。他和参加会议的一万军民一齐跟着周副主席振臂高呼：

保卫边区！

保卫延安！

保卫毛主席！

当时，敌人 14 万人马，从宜川、洛川，分两路向延安包围，胡宗南扬言“三天占领延安”，“打到延安去，活捉毛泽东”。

3 月 18 日下午，敌人逼近了延安城。已经听到隆隆的枪炮声了。警卫人员早把毛泽东居住的王家坪后山的防空洞清理好了，准备防空。

这时，岸英也真为爸爸的安全担心。万一被敌人包围了，出不去，或者敌机空袭，怎么办呢？

“爸爸，都安排好了，可以走了吧？”岸英催促爸爸说。

毛泽东风趣地笑道：

“不要怕，大路朝天，各走半边，他走他的，我走我的，他在那个山头，我在这个山头。岸英，你不是在苏德战争中到过前线嘛？”

“那时希特勒全面溃逃，我们像赶鸭子下河一样把他赶回老家去，现在是敌人气势汹汹包围延安城。”岸英解释着。

周恩来为了毛泽东的安全着想，也请毛泽东起程。

毛泽东说：“好吧！吃罢晚饭再走。敌人要来延安就请他来吧。”他指着石窑里的家什，诙谐地充满感情地对同志们说：“把窑洞打扫干净，桌子放端正，茶壶茶杯放整齐，让胡宗南知道：延安是我们的，我们还要回来！”

岸英从爸爸的最后一句话里，感到浑身有劲。他跟爸爸、周副主席，还有王震等人，安安心心地吃了一餐晚饭。当毛泽东得知群众和干部都已安全转移，便从石窑门角里拿起一根棍子作拐杖，顺手把石窑门带上。

毛泽东右手拄着拐杖，敞开军衣的纽扣，走在队伍的最前面，踏上了转战陕北的征途。岸英跟随爸爸，到了陕北清涧县。

3月26日，党中央在清涧县枣林沟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党中央分作两部分，由刘少奇、朱德等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到河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与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继续留在陕北，率领中央前敌委员会，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并直接领导西北的作战。

为了在阶级斗争的大风雨中锤炼岸英，毛泽东把他交给到山西进行土地改革工作试点的中央土改工作团。为了便于工作，毛岸英化名：小曹。

“我来到郝家坡才两个月，已深刻感觉到自己长大了不少，土地改革工作中学习两个月所得的东西，要比蹲在延安机关学习两年还多。”

“人问我最贵何所得？

是不是金，是不是银，是不是地位和美名？

我说一样也不是，却是那鞋下一层土！”

——毛岸英

4月初，岸英背起背包，踏上了东渡黄河的征程。

久已向往的黄河，伟大中华民族的摇篮，终于出现在岸英跟前。虽说岸英从苏联回国已一年多了，然而，亲身体验黄河的伟大气魄，这还是第一次。他心潮起伏，抑制不住感情的激荡，跟着战友们一起，向着黄河，引吭高歌唱起了心中的赞歌：

我站在高山之巅，
望黄河滚滚，奔向东南。
金涛澎湃，掀起万丈狂澜，
……
啊！黄河！
你是中华民族的摇篮，

五千年的古国文化，
从你这儿发源，
多少英雄故事，
在你的身边扮演。
……
我们民族的伟大精神，
将要在你的保育下发扬滋长！
我们祖国的英雄儿女，
将要学习你的榜样！
像你一样的伟大、坚强，
像你一样的伟大、坚强！

岸英边唱边走，身心无比舒畅，一股酷爱祖国的强烈情感，油然而生。啊，黄河！你养育了我们祖祖辈辈，我要像你那样，奔流不息，永远向前！

河边上，黄河老艄公早已为他们准备好了船只。

艄公们那一张张饱经黄河之风的脸膛黧黑黧黑的，显得坚毅而又倔强。

陕北的 4 月，还是春寒料峭。岸英坐进木船，把手放在河水里试了试，还有些冰人呢。木船离岸，艄公们用力划着，逆水行舟，往上游方向推进，一场人与黄河搏斗的惊心动魄场面展现在岸英的眼前……经过一个钟头的拼搏，木船安全地停靠在东岸的渡口。经历了一幕幕惊险的场面，他对那个饱经风霜的老艄公以及年轻力壮的船工，充满了无比敬仰的感情。可是，艄公们不但不要船钱，还从兜儿里掏出鸡蛋大的核桃和又大又甜的红枣，硬要塞给同志们。

“工作同志，这是咱船工的一点心意，陕北的土产，带着路上吃吧！”不收，不行；给钱，又不要，岸英他们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只

好含着热泪连声说："谢谢。"老艄公诚恳地说。"你们去搞土改，河东的老乡们盼着哪！"

这就是人民，觉悟了的人民，真心拥护共产党的人民……

登上黄河东岸，岸英仍旧依依不舍地注视着黄河边上的渡船，发自肺腑地对同伴们说："黄河边上的老乡们多好啊！"

4 月 5 日，岸英到了郝家坡。

中央土改工作团早在 1947 年 3 月初就进了村，同去的还有晋绥分局、地委、县委的干部。工作队员们听说又来了新队员，都从村子里跑到村口上，迎接他们，抢着帮队员们拿背包，好不亲热。然而，老乡们却站在村口，不跟他们打招呼，神情淡漠地看着热闹。除了几个农会骨干帮他们安排住处外，只有一群不懂事的孩子在人群里穿来穿去。

"怎么回事，这里的老乡跟河西的不一样呀！"岸英到郝家坡的第一个印象竟是这样。

他一放下行李，就要老队员们介绍村子里的阶级、政治、经济情况，一边认真地作笔记，有时提出一些问题。

郝家坡是个行政村，有十个自然村，共有二三百户人家，分散住在桑沟、南沟、柱子沟，离村政府大约都有 5 里路上下。村子里的土地绝大部分被 6 户地主霸占了，最大的地主叫刘浩生，他有钱有势，占有大量土地，还在县城开了粮行，在郝家坡北面 5 里的白文镇上，开了两家棉布号，一家榨油坊。他的儿子刘荣昌是国民党第五区党部委员，最凶狠。小儿子参加了阎锡山的突击团……

"群众情绪怎么样呢？"岸英停下笔问。

"群众很欢迎我们，可是，又怕变天，过去吃过变天的亏。"老队员说，"1936 年 2 月，红军东征时到过郝家坡，给贫苦农民分了些

田，可是，红军撤走以后，刘浩生勾结伪县政府，把四个为首的贫雇农抓到县城，杀害了。”岸英若有所思地说：“难怪老乡有顾虑呀！”

岸英摸了个大致情况后，就要求工作团给他分配具体任务。他根据以往在吴家枣园上“大学”学来的经验，先与农民交朋友。要交真心朋友，必须多做实事，少说空话，进村后岸英的第一件工作就是访贫问苦，从村里最贫苦老乡开始。

一天，他来到高坤生家。

高坤生是个三十四五岁的穷光棍儿，他本来很能干，给地主做长工，可以混口饭吃。可是，如今脚上生了疮，下不了炕，眼下连烧火煮饭都成了问题。

岸英找到了高坤生那口破窑洞，弓着腰才进了窑洞门。里面昏暗乌黑，刚从外面进去，什么也看不清。

“谁呀？你是谁？”炕上有人讲话。

“是我，工作队的小曹。”岸英和气地说，一屁股坐在炕沿上。

“啊呀，曹同志，这怎么好呢？我屋里要水没水，要火没火的。”他慌忙着要下炕，岸英一把将他按住说：

“你别麻烦，我知道你脚上生了疮。”

岸英看了高坤生红肿的双脚，对他说：“别急，想办法找个医生给你看看。”再看看他躺的炕，冷冰冰的没有一点热气，炕上只有一张破芦席，没有被子，盖了一件羊皮袄。他揭开炕头的锅盖，锅里空空的，没有饭也没有水，水缸里面也没有水。

岸英十分同情地问：“你吃了饭吗？”

高坤生有气无力地摇摇头：“连水都喝不上。”

听到这里，岸英心里一阵难过。

“老高，我给你挑水去！”岸英说着就在屋子里到处找水桶，可是，寻了半天，只有一只烂铁桶。

“老高，你歇着吧！我去去就来。”岸英离开高坤生家，心情十分沉重。他把情况向工作队作了汇报，要求村政府先替高坤生解决点小米，好熬点小米粥充充饥。

岸英先把几升小米送到高坤生屋里，然后借了一副水桶，到村政府后边水井里挑水。

村里人看见“小曹”在高坤生屋里进进出出，不知他要干啥，眼下见他担着一副水桶，知道他给高坤生挑水了，便亲热地走过来，要帮着挑。岸英说：“我来我来，我年轻力壮，力气用不完呢。”

水井很深很大，井旁湿漉漉的，水井吊桶的绳子，缠在辘轳上，提水时，转动辘轳，水桶就徐徐吊了上来。岸英没用过这玩艺儿，最伤脑筋的是打水的桶沉不到水里头，他把绳子折来折去，每次只打上一小半桶水，忙活了半天，才把一担水加满。

他顾不上抹额上的汗珠儿，挑起一对尺把高的水桶，沿着土路，歪歪斜斜地向高坤生的窑洞走去。他在苏联10年，从未挑过水。一担水并不沉，但是刚一挑上肩，那脚步却不好掌握，晃晃悠悠的，有多大劲也使不上，还压得肩膀挺疼的。岸英咬着牙，硬挺着把水挑到高坤生家，又把火生着了，熬了一锅小米粥，端到老高面前，看着他把稀粥喝进肚里，才轻轻地舒了口气。岸英忙里忙外，老高看在眼里，端着那碗热乎乎、喷香的小米粥，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了……

此后一个多月，高坤生的脚不能走路，他吃的用的水，都是岸英和几个工作队员给他包了。“曹同志，我一生还没有看见过你这样的好人那！”老高流着泪。岸英安慰他说：“把地主老财斗倒了，把地分给贫雇农，大伙就都过好日子喽！老高，你敢斗刘浩生吗？”

“那个狗老财，村里人都恨死他了。我敢斗，我是个穷光蛋，斗不过，我就跑到河西参加毛主席的部队。”

岸英的工作，初见成效。

“只要大家齐心干，准能斗垮刘浩生！”岸英给他撑腰。

岸英结识了高坤生，摸清了村里很多情况。高坤生到处讲小曹如何如何好，工作队是如何如何替咱贫苦农民讲话撑腰……一个传一个，小曹在村里就出了名。

每天晚上，岸英要到工作队研究情况，召集翻身委员会（贫农团）的骨干开会布置任务……回到他住的平房时常常是半夜过后，第二天，他早早地又跟农民一起下地干活。

然而，“每天坚持学习二小时”这个制度，他还是抽空坚持了下来。他经常把学习心得、工作体会写在本本上。

“打倒恶霸地主刘浩生！”

“向刘浩生讨回血债？”

“血债要用血来还！”

村里，第一次斗争刘浩生的大会开始了。台前挂着一条横幅：“郝家坡村斗争大恶霸刘浩生大会”。

两旁的标语是：穷人要作主，土地要还家。台上坐着工作团的负责人和翻身委员会的骨干。大恶霸刘浩生，站在台前，面朝院子里的群众。他60岁的年纪，头戴狐皮帽，身穿驼绒长袍，天气并不冷，但他的双手仍旧缩在袖筒里，耸着肩，低着脑瓜子。有时，台下谁喝骂他一声，他就抬起头仇视地盯着台下一眼，显得若无其事。

站在刘浩生旁边的，一个是他的大儿子刘荣昌，40来岁，一脸杀气；另一个是刘浩生的小儿子，也是一副兵痞流氓相。

斗争会由党支书严朝成主持，他诉了一通苦后，要大家上台控诉，有冤伸冤，有仇报仇。

可是，台下却冷了场。

岸英心里很焦急，仔细一看，场上百十号人，工作队员和村干部占了少一半，跟贫苦群众的人数差不多是一比一。每个苦大仇深的贫农身旁，都有工作队员在给他打气撑腰。然而，敢于上台斗刘浩生的只有几个贫农团干部，他们上台发了言以后，竟没有人跟着响应。呼起口号来，声威也不大，倒是工作队员的嗓门比群众的还响些。

这么一来，原先耷拉着脑袋的刘浩生，又昂起了头，向台下东张西望。会议主持人老严要他交待压迫剥削贫雇农的罪行，他都装糊涂地说：

"我是工商业者，我有钱，是做生意赚的。"

"你还有血债！"一个工作队员站起来对刘浩生训斥了一番。

会议草草收了场。

"今天的斗争会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主要因为群众没有发动起来。"岸英在会议上分析说，"刘浩生杀害的四个贫农的亲属都没有上台控诉，还有他家的长工，也不作声，群众还是怕变天，怕出现1936年的反复。"

大家都同意岸英的分析，觉得发动群众的工作还要下苦功夫扎扎实实地去做，关键在于打消群众的顾虑。

第二天，岸英兴致勃勃地先到妇联主任张秀英的家里。张秀英跟岸英年龄差不多，比较开通，也谈得拢些。

"秀英，昨晚开斗争大会，斗争大恶霸刘浩生，你没有去呀？"岸英从秀英手里接过才两三个月的小女娃，抱在怀里。

"我是想去的，可她爹说，深更半夜的还是带娃子吧！我就没有去。"秀英红着脸，因为她知道，"不上战场"，与她这个贫农女儿、妇联主任身份是不相称的。

"那，昨夜斗争会的事，老乡们知道吗？"岸英又问。

“小曹，你不晓得，村政府开会的时候，好多乡亲们躲在屋门外，竖起耳朵听呢，他们受够了刘浩生的苦，吃了他的肉才解恨哩。”秀英笑笑，“可乡亲们都怯生生的，怕再变天。”

“秀英，你怕不怕呀？”岸英直接了当地问。

“我吗？也有点怕。”秀英补上一句，“娃她爹比我还怕。不像光棍小伙，有了孩子老婆，飞不高，走不远呀……”

“秀英，你别担心，如今的天下是穷人的天下了。有了共产党作主，刘浩生这回是‘城墙里的砖头’——翻不了身了！你是妇联主任，要发动妇女参加斗争，只有大家都起来跟刘浩生斗，人们真正觉悟了，团结一起，形成铁拳一样，才能真正斗垮刘浩生。人民真正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拧成一股绳，也才能真正有力量，使刘浩生没办法翻过身来。到那时土地回到农民手里了，穷人才有好日子过啊！”岸英以坚定的口气，说服着张秀英，提高她的斗争勇气。

“我去是想去，就是没人带孩子。”秀英为难地说。

“这个好办，我为你找个女娃替你看孩子，行不行？”

“你想得真周到，行！我一定去开会。”秀英从岸英手里接过孩子，笑盈盈地目送着岸英走进另一户贫农家里。

1936年，由于刘浩生告密，被伪县政府抓去枪毙的四个贫农之一的薛东生，他的父亲还在。岸英找到老薛头，先打听薛东生是怎样死的。这一提，老薛头原原本本诉说了一通，便抱头痛哭起来。岸英的眼睛里也含着热泪，他因势利导地对老薛头说：

“你还怕刘浩生吗？他把你儿子都杀啦，这可是血海般的冤仇啊！”

老薛头没吭气，停了停，从万分痛苦中苏醒过来说：

“刘浩生，我咬得下他的肉。”

“那你在斗争会上，把你儿子薛东生被他害死一事，讲一讲，行

不行?”

“行,我讲,我敢讲!”老薛头把眼泪一抹,横下一条心。

接着岸英又到长工老王家里,启发他的阶级觉悟,指着老王那两个光屁股小小孩说:

“你看看,刘浩生的孙娃子,穿的什么,吃的什么,你的娃娃连裤子都没得穿,脱了棉裤就打光腚。你一年苦到头,落得过啥?刘浩生一不做工,二不种田,他吃得好,穿得暖,凭的啥?还不是靠剥削你们过日子?”

岸英紧张地在贫苦农民中间扎根串连。对中农,则要他们解除顾虑,告诉他们,“刘浩生是贫苦农民的仇人,也是你们的仇人呀!”

由于工作队员们分头作了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两天后,郝家坡的贫雇农终于被发动起来。斗争刘浩生的会场,因为参加的人数很多,村政府院内显小了,临时设在柱子沟附近的一块空坪里,连梯田坡上都站满了愤怒的人群。

大会还是由村支书老严主持。今天的气氛跟前天晚上截然不同,民兵也武装起来维持秩序。当刘浩生父子被绑着牵进会场,大伙儿都举起拳头高呼:

“向刘浩生讨回血债!”

“打倒大恶霸刘浩生!”

第一个跳上台的是退伍军人薛浩祥,他指着大恶霸的鼻子数落道:

“刘浩生,你这个大坏蛋,你夺了我家的地,杀了我家的人,我哥哥薛东生被你杀了,我爹气得半死,我被逼逃出去……”

台下一片呼杀声:“枪毙刘浩生!”“打倒刘荣昌!”

看到穷苦村民真的起来和他斗争了,恶霸刘浩生,平时作威作福、欺压百姓的威风劲全没了,一副狗熊样,双腿吓得发抖,脸色铁

青，眼睛闭着，看也不敢看台下一眼。

老贫农，老长工，一个接着一个，伸冤的伸冤，控诉的控诉，整个会场都沸腾起来。

“要报仇，要伸冤，血债要用血来还！”

这次斗争会，总算把刘浩生斗倒了，从此，地主老财们的威风扫地，那些地痞流氓和刘浩生的狗腿子，也乖乖地缩着脖子，不敢公开或暗里地散布“胡宗南要打过黄河”之类的谣言了。

斗倒了刘浩生，大长了贫雇农的志气，郝家坡土改工作团对6户地主进行了清算，让他们搬到贫雇农住的破窑洞去住，两个人一条被子，给他们留下一些零星灶具、生产工具、几升粮食，使地主分子和他们家庭也能生活下去并要他们在生产劳动中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

没收的地主财物，经过贫农团和群众的评议，分给穷苦老百姓。那一天，阳光灿烂，春风送暖，受苦受穷的老百姓喜笑言开。老冯分了条案、柜子，还给他一间好窑。老王的两个光屁股娃娃，当场就穿上了新衣服。张秀英的女娃用红花被子包裹了，更加好看；老严头牵着漂亮的小毛驴，拴在自己的窑洞门口，给它梳毛、抓痒……

最主要的，贫苦农民如今有了土地，这是命根子呀！

过去，农民整年劳作田间，还要挨饿受穷，就是因为地主占有大部分土地。他们凭借着他手中掌握的土地，这一重要的生产要素，拼命地攫取农民的剩余劳动。而农民没有土地，只好忍受地主的剥削与压迫，出卖劳动力。土地是封建地主阶级维持其统治的基础，它沿袭了几千年。如今共产党领导着亿万农民起来了，要挖掉了这受剥削的根子！毛岸英回国不久，便参加了中国这场最深刻的伟大革命之中，看到农民们起来革命了，他感到异常的兴奋。这虽

然不像战场真刀真枪地冲锋陷阵那样壮壮烈烈。但是尖锐的阶级斗争，同样是轰轰烈烈。他在阶级斗争的实践中学到了很多以前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在几个月的斗争中，他好像真正地懂得了许多、许多……

郝家坡天翻地覆，喜气洋洋。岸英夜以继日地分析情况，研究问题，分享着贫雇农翻身的喜悦。

紧张地工作了一天，岸英坐在油灯前，打开信纸，用毛笔向正在转战陕北的爸爸汇报了这一段参加土改的收获，他在信中写道：

亲爱的爸爸：

……

我在郝家坡两个多月的土改工作中学到了如下东西：

（一）最重要的一点，认清了自己所站的无产阶级立场。

（二）群众路线就是阶级路线加上民主作风。

（三）不把农村中的阶级斗争掀起到最高程度，是不能发动广大农民群众的。

（四）没有群众的监督，没有民主，干部就必然变坏，必然会站在人民头上为所欲为，哪怕这干部在未当干部时成份是好的，人也很好的。

（五）只有用群众的力量才能彻底改造我们的党、政、军。

爸爸……

我来到郝家坡才两个月，已深刻感觉到自己长大了不少，土地改革工作中学习两个月所得的东西，要比蹲在延安机关学习两年还多。

祝你健康！

儿　岸英

1947年7月底，谷子成熟了，一条条，仿佛是黄鼠狼的尾巴，又丰满又结实，把秆子压得弯弯的；高粱已长得一人那么高，只是还没长穗儿；玉米棒子胀鼓鼓的，简直像一个个纺锤……

漫山遍野，丰收在望。

岸英就要离开这块熟悉的土地了，他真舍不得啊！他独自一个人，从桑沟走到南沟，从南沟走到柱子沟，还冒着酷热去柳叶沟走了一圈。他自言自语地说：

"种子，离不开土地，我，离不开人民啊！郝家坡的贫雇农，就像我的亲爹娘一样！爸爸说得多好：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那里生根、开花……我要做一颗革命的种子，永远不离开人民！"

不知谁说出去的，说小曹要提前离开土改工作团，到河北去了。结果，老严、老薛、老冯、高坤生……分头在村里到处找小曹，大热的天，一个个急得满头大汗。最后，终于被高坤生"抓"住了。

"小曹，听说你要走啦？"高坤生恋恋不舍地问。

"嗯，要再见啦！"岸英也怪难受的。

"还来不来啦？"高坤生深情地望着岸英，泪花在眼眶里打旋。

岸英笑着安慰说："暂时不回来了，以后，等你们这里丰收了，我再来郝家坡，向贫雇农学习。"

"呃，小曹，你怎么这样讲，说实在的，我们舍不得你走，你就留在郝家坡当干部吧，今后，这里也不错哩。"高坤生拉着岸英的手，诚挚地说。

岸英觉得老高提的建议是出自肺腑的，真诚的，然而，也是办

不到的，新的工作正等着他呢。

“不行啊，明早就得走了。”岸英说。

“那，今晚你一定跟我吃顿‘拉拉面’！”说着，拖着岸英的手就往窑洞里走。

就在这时，其他几个老贫农也找来了，都争着把小曹往自己屋里拉，你争我夺的互不相让。张秀英因手里抱着女娃，又不好意思当众拉岸英，都急红了脸。“你们都算了，今儿你们谁也拉不去！”高坤生说着，推开众人，把岸英拉进自己的窑洞。

几个农民在窑外敲门，岸英把他们都请进屋，又闲扯了一些今后生活和生产问题……

那一晚，岸英差不多到全村贫雇农家里都走了一遭。

第二天，东方还没发白，岸英和同行的工作队员就打好背包，踏着晨雾，悄悄地离开了郝家坡。他们不愿惊动大伙，特别怕老乡们到时候往他袋子里塞鸡蛋、红枣、核桃，收了不好，不收又怕老乡们会生气……

等天亮，乡亲们来给岸英送别时，岸英他们早已离开村子个把小时了。“小曹这人，唉！”

“昨晚上他就是给你们告别的，今天怕惊吵你们，耽误你们的生产。”留下的工作人员帮着解释。

不知哪位同志嘴巴不紧，岸英走后第二天，村子里就传开了：

“你们知道小曹是谁？”“咋不知道？小曹就是曹轶鸥的侄儿呗！”

“不，他是毛岸英。”

“毛岸英是谁？”

“这还不知道？毛岸英就是毛主席的大儿子啊！”

“啊呀！你看你看，怎么不早些告诉我们呢？”

“对，越想越像，他那模样，是像他爸爸毛主席。毛主席的儿子真不赖呀！”

人们谈论着，称赞着，从心深处夸奖着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

岸英一行，于8月初到了河北平山县西柏坡。由刘少奇、朱德等组成的中央工作委员会在这里开展工作将近半年了。当时，全国土地工作会议正在召开。会议前半期，主要是总结各解放区土地改革的情况，交流经验；从8月底到9月中旬，会议主要是讨论土地改革中的政策问题。

岸英列席旁听了全国土地工作会议。在分组讨论时，岸英也介绍了郝家坡土改的经验教训。会上，他还听了许多中央领导人的讲话。尤其领先一步学习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大纲》宗旨是：“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1947年10月10日，《大纲》由中共中央公布实行，它为在全国彻底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提供了法律依据。

这个会议，对岸英来说思想收获是很大的。虽然，他不会作诗，但他怎么也按捺不住自己充满感想的心情，从苏联回来的这一年半多的时间里，毛岸英在亲身的实践中，感触太深了，也太多了。其中对他触动最大的就是人民群众的力量。共产党之所以能取得这么伟大的成就，关键在于人民群众的支持、拥护。中国共产党人要想立于不败之地，永远的有力量，就必须深深扎根在人民群众之中，全心全意地、彻底地为人民服务，甘当人民勤务员。带着这些感触，他在笔记本上写了一首题名《鞋下一层土》的顺口溜：

斯大林把那人民比如土，

离土必死近土生。

这句话早已响如鼓，
却直到今天才搞清！
郝家坡土改两个月，
人问我最贵何所得？
是不是金，是不是银，
是不是地位和美名？
我说一样也不是，
却是那脚下一层土！

回想以前真可怜，
不上不下半空间，
指手划脚满自足，
拉屎拉尿要人牵！
如今巴上了真正的土，
脚踏实地把步数，
快死的人重新生，
恩人就是那土一层！
这一层土要宝贵，
只能有加决无减，
加了，我的寿加倍，
减了，生命就危险！
希腊的安泰可为例，
脚一离地气便息！

因为人少把夫拉，
我也当了编辑部的差，

要我找人多拉扯，
根据拉扯的把材料写！
这样一来我深感到，
没有土底子可不得了，
用不上谈，更说不上写，
什么问题也不能解决！
幸亏郝家坡的那一层土，
从万难之中把我救出，
但困难仍是许许多多，
那土层子还是太稀薄，

今后的方针很明白：
下乡去搞土地改革，
永不离群众，永事不离土。
埋头苦干把力努！（毛子之名方不辜负！）
但望我那鞋下之土层层加，
但望群众真正变成我亲妈妈，
步步登高据此而来，
幸福的大门由此而开！

岸英写好这首诗，重看了一遍。觉得"毛子之名方不辜负！"这一句十分刺眼，便一笔将它涂掉，换上"埋头苦干把力努！"

"由于自己是毛泽东的亲生儿子，它是由于我的社会地位与本身实质之间的矛盾上，前者是'好得很'，后者是'糟得很'。"

"我从不希望由于我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儿子，而受到特殊照顾，被'另眼看待'。"

他在日记上、给亲友的信件上是这样写的，对熟悉的朋友是这

样说的，自己也是这样做的。

1947年7、8月份，是陕北战场上的决战时刻。8月20日下午，毛泽东在佳县梁家岔亲自用电话指挥沙家店战役，我军对敌三十六师发起总攻，全歼该师6000余人。沙家店战役是西北战场的伟大转折点，彻底粉碎了蒋介石、胡宗南对陕甘宁边区的“重点进攻”。西北我军由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打得敌人闻风丧胆。

毛泽东在日理万机的戎马倥偬之余，惦记着平山西柏坡的岸英，他给岸英复信中写道：

岸英儿：

别后，晋西北一信，平山一信，均已收到。

看你的信，你在进步中，甚为喜慰。永寿这孩子有很大进步，他的信写得很好。复他一信，请你译成外国语，连同原文，托便带去。我们在此很好，我的身体要比在延安好得多，主要是脑子休息了。你要看历史小说，明清两朝人写的笔记小说（明以前笔记不必多看），可托周扬同志设法，或能找到一些。

我们这里打了胜仗，打得敌人很怕我们。

问你好！

毛泽东

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二日

“啊，爸爸打了胜仗，打得敌人很怕我们！”岸英捧着信一遍又一遍地念着，念着，碰到熟识的同志，他就重复着这句话。

爸爸的鼓励对岸英是个鞭策。岸英是个有自知之明的不满足于一得之见的青年。参加了全国土地工作会议，再回顾一下几个月

来所走过的路，岸英反而难受起来，他忍不住把自己当时的想法，重写在本子上：

郝家坡后记

回想以前真可怜，

不上不下半空间，

指手划脚满自足，

拉屎拉尿要人牵！

这是四月五日以前的事情。

一九四七年四月五日，到了晋绥郝家坡村，开始了新生活，重新做起人来。

翻了一下还在郝家坡村写给父亲的信，信中有这么一句话："我来到郝家坡才两个月，已深刻地感觉到自己长大了不少，土地改革中学习两个月所得的东西，要比蹲在延安机关学习两年还多。"

经过三个多月以后，这段话看起来竟很是不顺眼，而当时却毫无此种感觉，须要把它分析检查一下。

岸英是从思想深处来检查的，爸爸对他的进步是肯定的，领导和同志们又总是在表扬他。可是，他不解剖一下自己，似乎晚上也睡不着觉，有一种负疚的感觉。于是，他在本子上剖析道：

一方面它表明当时还严重的存在着自以为是自高自大，另一方面，它反映出先前的极端幼稚无知。

满瓶子不响，半瓶子叮当。

最深刻地解释了当时的自以为是。

岸英痛击着思想上的毛病，并不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有时在本本上写几句，有时在屋里踱着步，有时捧着脑袋在凳子上沉思、苦想，他终于又挥笔写了下去，脸上露出一丝微笑：

我现在似乎发现了这么一个规律：

当我的知识愈少时，我的自高自大便愈厉害；知识的一步一步增加，自高自大也就一步一步减少。对于我来说，这一个规律是我的不幸中之大幸。在郝家坡写信时的自以为是，自高自大，比起在苏联及刚回国不久时的情形，已经好得多了。在以前简直不知道自己有多大本领！因此，这一段话其刺眼处虽然在于有自以为是的精神，但其本质却不在于此一方面，而在于另一方面：它反映了我幼稚无知。

因为以前的无知，所以一切对我都成了新知识，其中包括什么是黑豆，什么是谷子，什么是穷人，什么是地主，甚至什么是农村里的茅房！

至于什么是阶级路线，什么是群众路线，什么是半地主，什么是干群关系等更是奇闻！难怪我大声疾呼地说：

郝家坡的两个月超过延安机关两年！并说自己深刻感到长大了不少……

深刻的自我解剖，无情地揭露自己的弱点和错误，这正是岸英又一次飞跃的新起点。

写到这里，我又一次被手边的这些资料的内容感动了，这已不是第一次了。当年，我在刘松林那里第一次看到毛岸英的笔记本时，就激动不已……这是一颗高尚的严于律己的心灵，他是一个把自己根植于人民群众之中的人，他比安泰有力量，因为他的脚跟永远自觉地不会脱离大地母亲……

1947 年 10 月，毛泽东在陕北佳县神泉堡起草了《中国人民解

放军宣言》，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在此同时，毛泽东接到岸青的信，得知岸青已从苏联回国，兴奋之余，他挥笔给岸英写信说：

岸英：

告诉你，永寿回来了，到了哈尔滨。要进中学学中文，我已同意。这个孩子很久不见，很想看见他。

你现在怎样？工作？还是学习？

一个人无论学什么或做什么，只要有热情，有恒心，不要那种无着落的与人民利益不相符合的个人主义的虚荣心，总是会有进步的。

我比上次写信时要好些。这里气候已颇凉，要穿棉衣了。再谈。

祝你好！

毛泽东

一九四七年十月八日

爸爸想念岸青，这是人之常情。自从1927年分别后，至今整整20年没有看到自己的亲骨肉了，怎能不想啊！岸英也十分惦念着弟弟，跟岸青也将近两年没见了，十分怀念呀！

“快了，快胜利了，到时候，我们一家就会团聚了。”岸英自我安慰着。爸爸在这封信中提出的希望，他铭刻在心中，还用钢笔将信里的那段话划了线，牢牢地记熟了。

自从岸英从苏联回国以来，他的脉搏早就被爸爸摸准了，孩子酷爱政治、历史、文学、哲学，但迫切需要接触实际斗争，到基层去锻炼。爸爸也是一句老话：“你们有你们的前途，或好或坏，决定于你们自己及你们的直接环境，我不想来干涉你们。”他对岸英的态度是循循善诱，只希望他能真正投身到为人民谋幸福的伟大事业

中去。在个人志向的选择上父亲是开明的，放手的。

开完全国土地工作会议以后，岸英便参加冀中土改工作团，来到河北阜平县。晋察冀中央分局就设在阜平。岸英一到那里，又参加全区土改积极分子和干部会议。他兴致勃勃地报了到，领到一张长方形的油印的红色“入场证”，上面写着“土地会议　第224号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会后，岸英很珍爱地把它贴在笔记本上，一直带在身边。这本笔记本现在仍保存在刘松林那里。

开了三四天会议，岸英他们正准备到冀中各县去土改，可是又接到命令，要他们一行到山东渤海去，搞土改复查工作。这样，他们又坐上缴获来的美国十轮卡车出发了。从河北阜平到渤海地区大约有330公里，还要穿越敌占区，因此，为了防备敌机轰炸，他们日宿夜行，白天隐蔽起来，夜里就在卡车上你挤我、我挤你地睡大觉。

他们到了渤海区党委所在地阳信县。此时，渤海区党委正根据全国土地会议精神和《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召开土改整党会议，总结前一段土改工作。岸英他们一行参加了一个时期的土改整党会议，然后便于春节以后分别下到各县乡去工作。岸英等6名工作队员分配到阳信县沈家油坊乡张集村。这里离乡政府只有半里路。

他们来到张集后，马上就投入到土改复查工作中去。当时，岸英还写了一首打油诗，对他们六人的决心作了一番描写：

张家集上，
粗茶不堪设想。
六个虾兵蟹将，
到此决心换模样。
东头步到西头，
犹似走遍五洲。

马列主义在手。

细水变成洪流。

渤海是个老解放区，土改开始得比较早，但在土改过程中发生过不少问题，时左时右。对土改的成果也众说不一，有的说搞右了，有的说搞得差不多了，有的说还不行。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康生指示，派人下去摸摸底，搞搞点，看土改到底搞得怎么样，还存在什么问题，需不需要补课，然后写个报告给他，康生认为渤海地区不需要再搞土改和复查，也不要补课了，只有个别问题多一点的地方，再派人去搞搞就行了。

岸英所在的土改工作团共有五六十人，团长是由渤海区党委的张辑伍担任。当时岸英仍用杨永福的名字，只有张团长知道他是毛泽东的儿子。上级要求保密。可是，不知怎么搞的，工作队一到渤海，老乡们都知道毛泽东的儿子来搞土改复查来了，但不知哪个人是，地方干部和老乡们看看这个，猜猜那个，议论纷纷。

在人们眼里，甚至40年后，和他一起工作过的同事们记忆中的岸英，仍然是个“土八路”的形象，平凡、朴素、诚恳、朴实，见了人总是和和气气，没有任何特殊的地方。平时他总是穿着父亲给他的那件肥大的灰军衣，不修边幅，衣服的五个扣子有时掉了一半，也不去理它，从来没见他把衣服扣得整整齐齐。他特别爱吃花生米儿，而山东的特产花生，又大又香又便宜，岸英袋里总装着一些，边走边吃，碰见人，就笑着掏出一把热情地让着，“来，吃花生米儿。”在众人面前，他没有说过一句俄国话，没有提起一件俄国的事，不像吃过洋面包的人。他对谁也没有发过脾气……一句话，平凡得像一个普通的农村干部。每逢吃饭时最热闹啦，因为只有桌子没有凳子，大家便端着碗，聚在一起或站着，或蹲着，从天上扯到地下，又从地下扯到天上，无所不谈。岸英有时插上两句话，诙谐有趣，经常

逗得大家大笑不止，吃在嘴里的饭快要喷出来了。他淳厚朴实，有时又未免有些稚气，但不喜欢吹毛求疵在小事上纠缠。可是，原则问题他是当然不让的。

他与大家相处得非常和谐、团结，在我访问当年土改复查团团长张辑伍时，他向我谈起这样一件事：岸英跟他一起工作了三个月，土改复查快要结束时，他向岸英征求意见说："小毛，工作这么久，还没听你对我正式提提意见呢，马上要分开了，想听听你的意见。"吃过饭以后，老张一定要他谈谈。

"你一定要我讲，我讲一讲。我只有两句话。一句，你是个统帅，确实能统帅起来；第二句，你不是士兵兼统帅。"

老张一下子被击中要害，暗暗佩服岸英的观察力和概括水平，点头称是。

毛岸英对任何人，包括自己的领导，都是坦诚的，怎么看就怎么想，怎么想就怎么说，很少世故。

他就是这样一种人，下面的事实更说明了他的为人。

他久以向往到基层、到群众中去工作。当他所追求的目的实现了的时候，他带着兴奋的心情对好友说："工作的内容要比过去机关工作不知丰富多少倍……"

1948年5月，河北平山县，党中央和毛泽东到达这里。5月正是鲜花遍地开放的时节。

也就在这一时期，毛岸英完成土改工作团的任务，从山东又回到西柏坡，在中共中央宣传部担任编辑助理。这期间，他和著名的马列主义翻译家曹葆华一起翻译了恩格斯的《法德农民问题》以及《苏联国民经济领导研究提纲》，还协助曹葆华翻译了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等著作。同时，他还做国内外大事的摘抄，供中央负责人参考。

他不分昼夜的埋头工作，做了大量的事，然而，他是个从不满足的人，后来，他在给外婆和舅舅的信中，谈起这段工作时说："更有一层使自己万分痛苦的，就是几年来太不长进了。今后当努力奋发；不辜负生者，对得起死者才好！"

平山县西柏坡村位于太行山麓，滹沱河畔，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毛泽东就住在那里。当时，毛泽东迫在眉梢的两大任务，一是新老解放区的土改和整党，一是在运筹帷幄，策划如何消灭国民党，解放全中国。当时考虑，准备用5年左右(从1946年7月算起)的时间，打倒国民党。也就是在西柏坡这期间，毛泽东亲自部署和指挥了著名的、具有战略意义的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为彻底推翻蒋家王朝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派岸英参加山西临县郝家坡的土改，后来岸英又随康生到山东渤海整党，一来是锻炼儿子，二来也可以从岸英的亲身经历中得到些基层的新鲜材料——经验或教训，为指导土改、整党，为中央制订新的方针政策提供活生生的范例。

如果说，岸英在1947年春夏在郝家坡土改，他完全当"小学生"，那么，在山东渤海的整党试点中，他已是个开动脑筋，思考问题的"中学生"了，实际工作使他成熟多了。

回到西柏坡，他便兴冲冲地来到父亲身边。

毛泽东正在起草党内指示：《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他有个习惯，写累了，就到屋子外边的槐树下踱踱步，碰到熟人就请人坐在藤椅上聊一聊，一方面解除疲劳，一方面可以了解下情。

从去年3月下旬，父子俩在陕西清涧分手后，已经一年多没见面了。毛泽东看见儿子又长壮实了，渤海的海风吹得他的脸庞黧黑透红，手上的老茧表示他在乡下是个好劳力。岸英从衣袋里抓出一把炒花生，递给父亲说："爸爸，你尝尝山东花生的滋味，可香脆呢！"

毛泽东剥着花生壳，边吃边问岸英："在渤海怎么样啊？"

"不怎么样！"岸英一时不知如何回答，便含糊地说。

"么子不怎么样喽？"毛泽东搬出了韶山话，有些疑惑地诘问儿子，"比如，领导的思想、作风怎么样？群众的情绪怎么样？"

毛泽东实际上向岸英摆出了谈话的几个要点。

岸英边吃花生米，边思考，沉默了片刻，终于大胆地说："爸爸，我就是跟你随便聊聊，既不是正式汇报，更不是打小报告。"

"嘿，你顾虑还蛮多哩！"毛泽东笑笑。

"先谈领导，陈伯达写文章还可以，不过，也是靠助手帮忙，要他当团长搞土改可不怎么的。我是反对派，后来，他这个团长没当成，调走了。"岸英一本正经地说完，逗得毛泽东又笑了起来，说道：

"嗬，你倒还有点造反精神啊，在下头搞了'政变'啦！"

"不是我一个人的意见，那些老同志和青年同志也都有这个看法。"岸英辩解着。毛泽东暂不表态，又问："康生同志还好吧？"

毛泽东曾经在《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一文中，批评康生在临县郝家坡行政村土改时，"没有按照老区半老区和新区的不同

的情况决定不同的工作方针；在划分阶级成份的问题上，太注重了清查地主的浮财；以及在对待群众要求的问题上缺乏清醒的分析，笼统地提出了‘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的口号”，而且早就指出康生在土改中对中农采取的冒险政策的错误。

岸英到郝家坡是康生向毛泽东“要”去的，当然有他的目的。他妻子曹轶鸥也一同去郝家坡，毛岸英化名小曹，自称是曹轶鸥的侄儿。那时，他回国才一年多，对中国农村的一切都很陌生而且新奇，而康生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土改工作团领导，岸英对他可称是既尊重又佩服，言听计从。他在给父亲的许多信中，都谈到康生“有办法”！在他的笔记本中以及他写的发言提纲中，多次提到“康老板”和康的“思想方法”。康生对中农采取的冒险政策，在他的笔记中也有记载：

居民小组

分配开始，强调贫雇农

偏激，不理，讨厌中农

这偏激　(1)自然

(2)有益

(3)无害　因有下着棋转弯。

总之，从正反，从运动，从研究过去、今后发生的不同现象，看出本质及其最重要者，即康之思想方法也。

有了在郝家坡的工作经验，又参加了土地工作会议，在到了渤海后，岸英一边深入基层参加整党，一边在思考问题，对党在土改中的政策问题有了深入的认识。父亲在几篇文章中(和党内指示里)均不提名地点了康生，使他感到，父亲比康生高出一筹，于是，他更加敬重父亲了。现在，父亲问他康生怎样？他不能违心地回答，只好说真话：“康生同志对有些问题的处理‘左’了一些，去年在郝

家坡挖坟墓找浮财，还有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口号，经过土地会议，已经得到纠正，可是，在山东，对一些具体事情，他也显得粗暴了些。”

“说说具体事例！”毛泽东要儿子讲个来龙去脉。岸英便原原本本说了一件事：

有一次，华东局杨帆等人请康生吃饭，我们几个年轻人也去了。在饭桌上，杨帆谈到当地的会道门很猖狂。他们在村里挖了壕沟，沟上架了吊桥，吊桥不放下，别人是进不去的。我们有些伤兵在村里，被他们杀掉了。我们警告他们也没有用……。这些事当然令人气愤，康生听罢，瞪大眼睛，用力把桌子一拍，碗筷都跳了起来，他吼道：“还有这样的事？老子开两个团去，把他村子轰平！”

可是，村子里的反动会道门只是少数，大部分是被欺骗的穷苦老百姓。康生的举动，岸英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回到住地，他就跟几个年轻同志边说边摇头：“康生缺乏政治家风度，中央领导同志怎么能这样讲话？派两个团轰平村子，死的不都是农民老乡？！”

曾彦修等青年伙伴对岸英的大胆议论捏了一把汗，生怕传到康生耳朵里对岸英不利，便解释说：“康生同志说说气话，不是真正地轰平，对反革命分子要坚决镇压！”

“也不能把洗澡水和孩子一起泼掉呀！”岸英还是固执己见地分辩着……

他向父亲原原本本地述说了这件事后，又对父亲说：“康生同志太粗暴，缺少政治家的风度。”而在一年前，岸英从郝家坡写给父亲的信中，对康生是赞不绝口的。

对于儿子的辨别能力，特别是这一年多的实际工作锻炼所取得的进步，毛泽东是非常喜欢的，他希望儿子有独立的见解和看法。然而，他没流露出任何声色来。作为父亲，他并没有表扬儿子，

夸奖儿子，他不希望儿子沾沾自喜起来，不希望儿子翘尾巴，而且，作为党的领袖，在听取情况汇报时，汇报人不管是自己的儿子，还是其他人，都不应急于表态，那样做对工作是不利的。他耐心地听儿子讲述后，只是平静地提醒他说："你还要多看看那些老同志的长处呀！"

岸英也心领神会地点了点头。

父子俩谈得十分投机，越谈越海阔天空，好像对什么事情都兴趣很浓……也难怪，父子俩分开的这一年多，形势有多大的变化呀！岸英可以从与父亲的谈话中学到很多东西，学到父亲认识问题、分析问题的思想方法以及指导中国革命的领导艺术；父亲可以从与儿子的谈心中了解到更多的实际问题，也可以从谈话中了解到儿子的能力、水平。父子间这种最亲近的谈话是最难得的、最无顾忌的交流。

父子俩这次谈话不久，又进行了一次谈话。关于这次谈话的内容，是当年曾和毛岸英在中央宣传部一起工作过的曾彦修告诉我的。他后来担任过人民出版社的社长，1978 年 12 月 25 日我访问了他。岸英在土改工作团的情况也是他向我介绍的。

毛泽东父子的这次谈话是这样的……

一天，岸英带着两本散发着油墨芳香的新书，又来到父亲的办公室，一进屋他没说话，把两本书摆在了父亲办公桌上，一本是恩格斯著《法德农民问题》，一本是《苏联国民经济领导研究提纲》。他的神态、他的意思很明确不过，为了让父亲也体会他的高兴心情，他故意卖了关子，有意让父亲发问，好像只有这样，他才能得到满足。这也是他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几个月的产物。他很珍爱这两本书，不仅仅是由俄文译成中文，而且，他在翻译过程中，学到了不少政治经济学理论。

毛泽东看看桌上的两本书，翻了翻，明白了，高兴地问岸英："你也参加翻译？"他当然要为儿子的成绩感到欣慰。

父亲真问话了，岸英反而不好意思起来，连忙谦虚地说："跟人合译的，俄文这玩艺儿不经常弄弄，就会忘记，我学翻译，可以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呢？"

毛泽东掂掂手中的两本书，故意考察岸英似的问道："你在苏联呆了10年，那里的情况到底怎样？"

岸英回道："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优越。苏联卫国战争前，我给延安《新中华报》写过一篇文章，讲的都是苏联的好话，那时候十六七岁，不懂事。"

"现在懂事了？"毛泽东紧追一句。

"二次大战，尤其是苏德战争中，暴露了苏联内部的一些问题。"岸英在给父亲讲心里话，直言不讳地开了一个头。

毛泽东似乎颇有兴趣："我想听听各个方面的情况，坏的地方呢？"

毛岸英似乎堕入了卫国战争的苦难之中，他亲眼看到了一些丑恶现象，现在想起来都有些愤愤不平。

毛岸英说："战争期间，我随慰问团到前线慰问，有些军官看见女的就乱来。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好，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斯大林的民族政策不正确，他对少数民族不信任，把接近战区的整个少数民族都迁到西伯利亚去，几十万人大迁徙，苏联的民族问题处理不好，迟早会出事的。再就是苏联青年的理想跟咱们中国青年不一样。男的找对象要漂亮，女的找对象看对方地位高低。当兵不愿意，劳动也不愿意，都想当科学家当艺术家。青年人没志向，对学习马列主义不感兴趣，只考虑个人的前途、将来。这批人掌权，不是没有问题哩！"

岸英的这些话，只在小范围内跟住在一起的几个青年朋友谈过。在那时，当然不能公开，会有人抓他的辫子。当然，在父亲面前，他就要一五一十地讲实话。岸英就是这样的人，怎么看到的，就怎么说，不能因为在那里学习了10年，隐恶扬善，只能说好话，而不实事求是。

毛泽东听完岸英的话，沉思着，在屋里踱了一个圈，喷出一口浓烟……

“岸英，你要做好准备，参加到解放全中国的伟大行列中去呀！”突然，毛泽东话题一转，谈起岸英的工作问题。

“爸爸，我很想到前线当兵，可是，上级却分配我去河北建屏中央机关保卫训练班学习。听说结业后，给李克农同志当秘书。”岸英说，语气中带着不情愿的意思。

毛泽东嗯了一声，说：“李克农同志长期从事隐蔽战线的斗争，经验非常丰富。”他听出了儿子的意思，又加了一句：“还是服从组织分配，干一行爱一行吧！”

但是，这个工作岸英并不喜欢。在苏联学习期间，他的理想是当个政治家、军事家。回国两年多来，实际工作的经历教育了他，使他从理想中回到了现实。他深深地体会到，必须要脚踏实地去做工作，从头做起，从基层做起。火热的工作、第一线人民群众之中，才是最活跃的、最有意义的、最能锻炼人的地方。如果老浮在上面，沉湎于理想之中，很可能使人变成一个空谈家，幻想家，很容易变成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者。因此，他下决心，即使现在不成，但是，要慢慢地要求，一定要争取到下面去工作。现在，既然组织上安排自己去干保卫工作，父亲也要求他听从组织分配，也只有服从组织决定，而且一定要干好。

他参加了保卫训练班短期学习培训。工作性质的改变，工作要

求和复杂环境的决定，岸英变得机警了，随时以警惕的眼光审视一切了。

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炮声，《解放区的天》这支嘹亮的歌曲，也在黄河上下、大江南北传唱着。解放战争进展神速，比预想的要快得多，百万大军所到之处，好似东风扫残云，……1948 年 11 月 2 日辽沈战役胜利结束；1949 年 1 月 10 日淮海战役又歼敌 55 万多人。1 月 22 日，我平津前线司令部与傅作义达成《关于和平解放北平问题的协议》。

1 月 31 日，岸英随同两名苏军扫雷专家和一个工兵排，跟随中国人民解放军，雄赳赳气昂昂地第一批开进北平城。

北平人民涌到街头，挥舞着彩旗和鲜花，欢迎人民的子弟兵。多少人流着热泪，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岸英，作为一个革命战士，他感到多么自豪，他挺着胸膛，走在北平的大街上，挥手向欢迎的人群致意。因为解放军的进城，使北平这灰色的故都，仿佛凭空增添了光辉，天，变得更蓝了，太阳，变得更温暖更红了……

进入北平城以后，从 1949 年 2 月开始，岸英被分配到中共中央社会部工作，担任李克农部长的秘书。实际上，更多的是担任俄语翻译。

但是，暗藏的国民党的敌特分子并不甘心把这座城市拱手交给人民，交给共产党。那些可恶的特务分子，白天摇着红旗高呼“共产党万岁”，夜晚他们就干着卑鄙的勾当。他们切断电线，使一大片一大片的城区顿时黑暗，他们炸断自来水管，使北平的居民吃饭、用水都很困难。更可恶的是，他们在失败前，暗暗地在名胜古迹，在交通要道埋下地雷和炸药。因为工作性质的关系，岸英经常看到报

告：某某地段，一群扭着秧歌的孩子踩着地雷，炸得血肉横飞；某某工厂的卡车，路过桥梁，连桥一同炸毁。

这些令人吃惊的消息，使岸英觉得肩上的担子和工作责任更重了。这时，他全身心地投入到保卫革命胜利成果的斗争中去了，根本无暇考虑干什么工作的问题，党现在需要他作一个真诚、勇敢的卫士，就要全力做好。

他和工兵排的战士，不分白夜地检查高压线路、自来水管道、桥梁枢纽，排除一切危害人民的隐患。

1949 年 3 月 24 日傍晚，正准备吃饭的岸英接到社会部领导李克农的电话，通知他们：3 月 25 日下午，党中央负责同志，就要进入北平城。入城前，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出席在西苑机场举行的阅兵式，然后到颐和园休息，并在景福阁宴请各民主党派人士。李克农命令他们，火速前往颐和园，严格检查，消除各种不安全因素，确保中央负责同志的安全。

啊，爸爸就要进城了，朱总司令、周伯伯就要进城了，这个意义是无比伟大的，这将成为中华民族历史上一个转折点，一个崭新的、没有人剥削人的新时期就要从这里开始了。岸英心里多么激动、兴奋。同时，又感到肩上的担子更重！颐和园的面积有多么大，亭台楼阁有多少！即使什么都不干，沿着院墙走一遭，就是 18 公里，整整走一个上午你也别想歇气。而且时间又是那么紧，就是把晚上的时间都加上，也就十七八个小时。

任务再艰巨，岸英也是从不讲价钱的。

他三口两口吃完饭，和工兵排一起，携带着一部扫雷器，坐上军用卡车，飞快地驶往颐和园。此时，北平已是万家灯火了。

颐和园如此之大，排除不安全因素又谈何容易啊！岸英和同志们研究以后，决定先把要用的殿堂里里外外，仔仔细细地检查一

遍。然后他们又在昆明湖畔，检查石舫和一座座水榭、曲桥；在万寿山上，上上下下检查着每一座楼阁，每一张石桌和石椅。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北平仍是春寒料峭，可是，岸英忙得只把棉衣披在肩上。到半夜时分，他们每人吃了一点干粮，又开始工作了，就这样一刻不停地工作了一个通宵。

1949 年 3 月 25 日，这是一个多么值得纪念的日子！下午，警卫排派人赶来通知说："毛主席已经进入北平了，正要到西苑机场检阅部队。"岸英听了这个消息，又惊又喜，但更多的只是焦急。从西苑机场到颐和园没有多远的路，也就是说，父亲和党中央负责同志不久就要到颐和园来了。

他仿佛看见爸爸和朱总司令、周伯伯穿着翻领大衣，头戴军帽，乘着敞篷吉普车，威严而又亲切地挥着大手，向战士们致意！

想到这里，岸英会心地笑了。然而，时间的紧迫不容他多想，爸爸就要到颐和园来了，需要清查的地方还有那么多。

时间在一秒一秒地过去，而扫雷器又只有一部，怎么办？正在万分焦灼之际，富有破雷经验的老刘，急中生智，想了个没有办法的办法，采取人工扫雷。全排分成若干小组，每组 6 人，手挽手，肩并肩，在尚未检查过的地方，排成横队一步一步走。这是非常危险的，若一个人踏上地雷，另外五个同志也会同时牺牲。所以，老刘为了保护岸英的安全，找了个借口，要将岸英支开，不让他担任这极其危险的用人体破雷的工作。

然而，在最危险又最需要他的时刻和场所，你就是用起重机也休想把他弄走。他对老刘说："你的意见很好，照此办吧！"说着他伸出粗壮结实的胳膊，站在中间，两边勾着同伴的胳膊，根据分派的路线，迈开了第一步……他的心在激烈地跳动，热血在沸腾，他知道，只要敌人埋的哪怕一个小小的地雷，在一声爆炸声中，也会轻

易地结束他27岁的年轻生命。可是，为了爸爸，为了中央领导的安全，为了爸爸在接见民主党派人士时不出事故，就是赴汤蹈火，粉身碎骨，他也甘心情愿。毛岸英和战士们挺胸昂头地迈着步，还互相高声呼喊着、勉励着："加油啊！加油！"

下午5时，他们终于胜利完成任务。仿佛在死亡的边缘走了一道，精神高度紧张加上他们一天一夜没有合眼，每个人都是汗流浃背，精疲力尽。然而，他们胜利了，人间最绮丽的勇敢之花，应该戴在这群爱党、爱国、爱领袖、爱人民的勇士的胸前！

稍微休息了一会儿，他们来到颐和园大门口集合。刚站好队，毛泽东、朱总司令、周恩来等一行的车队，已经开到了颐和园。岸英看见爸爸、周伯伯等人在向他微笑，他从来没有感到这样的自豪。他，毛泽东的儿子，一个普通的战士，曾经用自己的身体，为中央首长排除了不安全的因素，为党中央进驻北平，开辟了通畅的大路，平安的大路！

5月初，岸英又和扫雷专家一起，随陈毅指挥的第三野战大军的隆隆炮声，进入国民党统治的老巢南京。5月27日，他又进入我国最大的都市——上海！

"啊！大上海，我们终于回来了！"

当部队开到上海郊外，岸英站在沪宁铁路的一个小站上，翘首南望硝烟弥漫中的大上海，他真是感慨万千！

他们兄弟在上海度过5年的流浪生活，受尽了人世间最凄惨最痛苦的折磨。往事不堪回首。可是，在离别13年之后，他以主人的身份终于又回来了……

上海解放了，由于工作的繁忙，岸英根本没时间旧地重游，去看看他蜷缩过的破庙，只在南京路、福州路、广东路漫步了一番，他

的思潮，犹如黄浦江的波、东海的浪……

1949年10月1日，中央人民共和国诞生的日子，下午3时，亲爱的父亲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人，党中央领导，登上了天安门。

岸英跟首都几十万人民一起，亲耳聆听了父亲那庄严的、震撼世界的宣告：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亲眼看着父亲亲手升起的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广场上空高高的飘扬。这是多么令人激动的时刻，近百年来，中国人民浴血奋斗，就是为了这一天的到来……

新中国建立后，岸英仍在社会部工作，后来又调到中央情报委员会，还是担任李克农的秘书，有外宾来访时，他还要担任翻译。虽然他不喜欢这个工作，可是，在李克农的言传身教下，岸英似乎成熟了好多。他的好朋友蔡博告诉我，由于职业和职责的关系，那一阵子，岸英变化很大，变得深沉了，双目炯炯有神，经常带着警惕的目光，头脑也变得机敏多了……

渐渐地，随着形势的好转和环境的稳定，埋藏在岸英心中的久以向往的到基层、到群众中去工作的心愿又冒了出来。很多人向我谈起这件事……

蔡博向我讲述过毛岸英的想法，还给我看了岸英给他的信。

他真的羡慕在鞍钢工作的好友蔡博，经常与他通信，无所不谈，而谈得更多的是工作和学习。1950年2月6日，他给蔡博的信中写道：

> 你近来的工作和学习情况如何？对中国工人阶级、中国工业发展前途有何观感，若能拨冗见示，我是拍手鼓掌

的，原因是想多知道一些远方的活生生的社会动态。

请你帮我在工人职员中多多收集一些俗语、成语、格言等。这事你还可以动员你的朋友出把力，这我想对于接近群众的你并不困难（譬如说一天收集他十句八句）。

我生平有这样一个计划：收集全国各地老百姓的俗语、成语、格言等，以便将来（也许十年以后）编一本华俄（俄华）俗语、成语、格言对照辞典，这是一件很有趣的长期的工作。这个念头是我参加了土改以后产生的，我深感到民间语汇的丰富，老百姓智慧之伟大，有收集它们并把它们介绍给中国人民和外国人的必需。

这可以作业余文学自修课，是一件有益无害的事。

岸英在苏联的老师韩铁声告诉我：1950 年夏天，岸英随李克农一同到苏联去了一趟。从苏联回来后，他特意来看我。在交谈中我问他："最近又去那儿（指苏联）啦？"岸英带着神秘的眼色说："是秘密任务"。我讲："那算了，秘密工作就不要跟我说。"他也不再提那件事而是话头一转问我："我要改行，到工厂去工作，您看怎么样？"我说："那好啊，工厂工作最能接近群众了……"还没等我说完，他便喜出望外地冲着我说："伊万诺维奇，你同意了！"看着他那孩子般模样，我不免好笑起来，向他泼了一点冷水，说："我同意有什么用？这是组织上的事，要经组织部门批准才行。"听我这样一说，他也不笑了，又在我那里坐了一会儿，谈了点别的事情，就告辞走了。没过几天，我听说他真的到工厂当总支书记去了。他能如愿以偿，我也为他高兴。不久，我见到在中央组织部工作的帅孟奇大姐。她特别喜欢毛岸英，无意中谈起岸英来。她对我说，前一阵子，岸英老是找我，纠缠着要求调离中央社会部，到基层去工作。开始我不同意，于是他便采取泡蘑菇的战术，三天两头地到我那里去，

死乞白赖地软磨硬泡，说战争基本结束了，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建设我们的祖国。我到下面干点实际工作，一方面直接投入到新中国的恢复和建设事业中，另一方面可以在生产第一线锻炼自己。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一个年青的干部，不要老浮在上面，应该到下面去磨练磨练，这样才能够成才。但终究这不是通常一个干部的调动安排问题，要由李克农同意才行，估计他是不会放岸英走的，而且以前碰过钉子的。被他缠得没办法了，我就对他说，我没什么意见，关键是要你们领导点头才行。我给他出了个主意，让他去找父亲和周伯伯谈谈。他真的向他父亲和周恩来提出了下基层的要求，而且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同意他到工厂去。周恩来亲自安排他到北京机器总厂当党总支副书记。不过，由于李克农的坚持，这不能算是正式调动，只是下放锻炼，人还是属于中央社会部的……

尽管这种调动并不彻底，然而，岸英对于这种安排已是心满意足了。1950 年 8 月中旬，他告别了结婚不到一年的妻子，仅带了一床军被、一床褥子和实行供给制发给他的两套单衣服，骑上他那辆破旧的自行车，到机器厂上班去了。他要和工人们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和工人打成一片。他对妻子说，他没到过工厂，对工人阶级了解得很少，他要在工厂里蹲上 10 年。

毛岸英到了工厂以后，简直像鱼儿入了大海一样，浑身好像有使不完的劲，对工厂的工作充满热情。因为是刚解放不久，一切都处在恢复阶段，作为一名党的干部，岸英全身心地投入工厂的工作之中。他组织群众学习政治，召开诉苦大会，提高工人的主人翁觉悟。白天，他下到最脏最累的浇铸车间和工人师傅们一道干笨重的体力劳动。吃饭时，他和工人们一起到大食堂排队买饭。食堂没有桌子、板凳，买完饭，他便和工人仨一群俩一伙地，扎在一起，或站，或蹲，边吃边聊家常，谈心。他还组织了俄文学习小组，利用业余时

间，由他教青年工人学习俄语，为的是在将来的大规模的工业建设中，学习和吸收苏联的先进技术……而且，即使在繁忙的工作中，他也没有忘记他的兴趣和爱好，每次开会时，会前、会后他总是把准备好的纸片发给与会者，然后，诚恳地对在场的人说一声“请大家帮帮忙，写几条谚语或歇后语”。工人们对这位热情奔放的、充满朝气而又随和的青年总支书记非常爱戴，都愿意和他交往。可是，除了工厂中少数几个领导外，人们并不知道他的来历，更不知道他是毛泽东的儿子。

在工厂工作了一段时间后，他带着兴奋的心情，把自己全新的感受和今后抱负，写信告诉了蔡博：

> 我和你现在几乎是同行了。半个月前，我离开了社会部的上层工作，达到了自己一向所追求的目的，转为群众工作，做党的工作了，我现任北京机器总厂党的副书记，工作的内容要比过去机关工作不知丰富多少倍，缺点是我不懂技术——从工具机、动力机、技工理化、工艺数学、机械制图学起。
>
> 工厂的人数比起鞍钢来是少得可怜，仅一千六百余人，如果党不调动我的话，我准备在这个工厂连续不断地做十年工作，随着它进步而进步、发展而发展，搞出一套完整的工厂中党的工作经验来，以上就是我的雄心大志，不知你同意否？
>
> 你近来的工作如何？有些什么心得和意见？你们工厂党的工作做的如何，是怎样做的，有些什么经验教训，一切请多告诉我一些。
>
> 同志，不久前我很幸运地得以重游旧地，那里的朋友（除大保、娟娟外）都见到了，许多人问到你……

信是1950年9月9日写的。如果不发生意外的话，岸英的计划有可能实现。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就在他的信写过仅仅一周之后，美国扩大了侵朝战争。9月15日，美军集中了7万余人在仁川登陆并疯狂地北进，很快便把战火烧到了中朝边境的鸭绿江和图门江边……

又过了几天，岸英便悄悄地离开了工厂，很少有人知道，连行装都没带走，……从此，他再也未能回到北京机器总厂。

> 我们共产党没有帮助亲戚、朋友、同乡、同事做官发财的人情，不讲这种人情，共产党有的是另一种人情，那便是对人民的无限热爱，对劳苦大众的无限热爱……
>
> ——岸英

儿子太像父亲了，那么“不近人情”。而他说：我没有权力，没有本钱，更没有志向去做这些扶助亲戚高升的事。

经过21年的流血牺牲，艰苦奋斗，中国共产党终于领导人民群众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赢来了人民当家作主人，掌握国家政权的新时代。毛泽东当了国家的主席了！这一消息震动着家乡的人民，尤其是毛泽东的亲属们。于是，毛泽东父子便成了亲朋好友们致信的对象。当然，这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情况，有的祝贺革命成功，称颂毛泽东伟大的；有的询问毛泽东带出去参加革命的亲属下落的；有的请求证明家人烈士身份的；有的要求到北京会一会毛

泽东这位与自己当年要好的“同学少年”的；有的诉说困难，请毛泽东帮助的；有的是想来北京学习的；更多的是要求安排工作，谋个工资高、职位好的职业的；也有伸手要官的；有的人自恃过去帮助过毛泽东，向毛泽东邀功的；更有些亲属，自以为是毛泽东的亲戚，不听政府领导的话，还伸手要钱要物的……对于种种这些，毛泽东父子两人态度是明确的，凡属正当的，符合人民利益的，就千方百计去帮助；对于超出了私人感情范围，与人民利益相抵触的，坚决拒绝，并耐心讲道理，做工作说服他们。

在这方面，毛岸英和父亲一样，他爱自己的亲人们，爱故乡的人民，对他们有深厚的感情，而且加以巩固，并努力把这种感情引导到正确的、与人民利益相符的、有利于人民的方向。

1949 年 8 月初，湖南和平解放了。岸英舅舅杨开智从长沙给毛泽东打来电报。这刚开始的联系，他仅问候毛泽东，告诉毛泽东，他母亲向振熙老人尚且健在，并询问毛岸英、毛岸青兄弟和自己的女儿杨展的情况。很快毛泽东给他回了封电报：

杨开智先生：

来函已悉。老夫人健在，甚慰，敬致祝贺。岸英、岸青均在北平。岸青尚在学习。岸英或可回湘工作，他很想看外祖母。展儿于八年前在华北抗日战争中光荣地为国牺牲，她是数百万牺牲者之一，你们不必悲痛。我身体甚好，告老夫人勿念。兄从事农场生产事业甚好，家中衣食能过得去否，有便望告。

此复。

敬颂大安！

毛泽东

八月十日

因为杨开智信中问起毛岸英的情况，毛泽东嘱咐他给舅舅写一封信。由于战争环境造成的隔绝，岸英与外婆及舅舅、舅妈（与外婆一起护送他们兄弟到上海去的李崇德）已经十七八年未联系了。现在，得到他们的信息，他激动得不得了，8月17日，他给外婆、舅舅写了一封回信：

舅父并转外婆：

看到舅舅的来函，悲喜交加，热泪不禁脱眶而出。人终然是个有高度感情的动物。离别已经二十年了（原文如此），对于人生来讲，这不是一个短小的时间。你们都好吗？二十年的苦头终于熬过来了，长沙也解放了，全中国的解放就在眼前，数千年一直被压迫、被欺凌、被侮辱、被残害的中国人民胜利地站起来了！让我首先向你们祝贺这一件大事变吧！

一九三一年与外婆分别后，在上海过了五年流浪生活，一九三六年底到了苏联（可惜没有学一门技术），一九四六年初回到延安，学了一个时候中文，参加了土地改革运动，现在北平中央机关里工作。岸青也于一九四七年回国，现尚未正式参加工作，他的耳朵有些毛病，但不很要紧，我的身体很好，勿念。

我们都很想来看你们，只要有可能，我想我是一定要回长沙来的。回国后，我曾给你们寄过好几封信，大概都没有收到（这封信我想你们一定能收到了）。

来函中说外婆“康健如常”对我是一个莫大的安慰，我谨祝我那亲爱的外婆健康愉快并祝舅父、舅母及其他亲人安好！

你们的情况望多告诉我，来信就寄北平邮政信箱四

十五号即可。

专此　　致

革命敬礼！

岸英叩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七日

信写好后，岸英又补上一句话："父亲身体很好，他给你们的电报，谅已收到了……又及。"

这封信寄出去后，毛岸英心中仍然平静不下来，浮想联翩，觉得很多话还没说够似的，于是，又给外婆写了一封长长的信：

亲爱的外婆、舅父：

回信收到，快慰万状之余，也不禁凄然泪下，伟大的母亲的遗容和记忆中所留下的外婆的一举一动不时呈现在眼前。更有一层使自己万分痛苦的，就是几年来太不长进了。今后当努力奋发，不辜负生者，对得起死者才好。

我非常想来看你们，父亲亦极力赞助，湖南刚开始解放时，我就与父亲谈到回湖南寻找你们（过去给你们的信，皆无回答），长沙很快解放了，你们的电报也来了——那份电报我真不知看了多少次……然而，对于一个共产党员，工作、人民的利益是占第一位的，党的利益（亦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人的利益应该服从整个人民的利益——这样，我现在一面虽是眼望江南，归心似箭，一面却还要等待两三个月才能来看你们，我想你们是了解我的，并会等着我的。

我的身体都还好，弟弟耳朵稍许有些毛病，但不要紧，以前在苏联与我一样没有学技术，吃了亏，现加紧补习中文，预备考专科学校。我现一面工作，一面努力把中

文、俄文真正学好，想在这方面专一下。最近深感像我们这类人，在新社会中，没得一门专长是不行的。父亲身体好，忙一些，他的双肩所担负的担子太重了。

离别二十年，我倘若突然回来，你们可能已不认识我了。我想给你们寄张照片，但没有合适的，准备与弟弟到照相馆去好好照一张寄给你们，你们不会反对吧！你们若有照片，极望寄给我们（如果保存有母亲照片，一定请赠给我们）。

革命形势这样飞快发展，全国的解放即将在眼前，数千年来一直被残害的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治，从此永远翻身！谁在此时不欢呼，谁就不是我们的朋友；然而这还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谁若是仅仅欢呼，谁也不是我们的好朋友。这样你们便不难想到当谈到舅舅在来电中所云：准备在社会上"好好做番事业"——一语时，我是如何高兴！

外婆是不是还是那个样子，我想不管你变得怎么样，我一定能认识你，只要你对我——一个陌生的刚从外边进入你们屋内的穿着军服的年轻人——仔细地望一眼，你那双慈善的眼睛，我是永远忘不了的。

外婆，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向你耍赖皮硬要你给我们买糖，买甜水豆腐吃，在地上打滚那回事吗？我现在大了，不便再在地上打滚了。但却还想向你讨个债，请你在下次来信中告诉我：我和弟弟是何年何月何地生的，因为直到今天，我还搞不清楚自己到底多大岁数呢！

舅舅说舅母身体不大好，望多多保重。其他亲人请代为问候。

信已写得很长，就此止笔，即祝外婆健康

岸英叩

一九四九年九月十日

从此，杨开智经常与毛泽东父子通信，毛泽东非常关心杨老太太的生活，多次给老人寄钱寄物，尽一份孝心。

刚刚解放，要做的工作很多，各地区要建立正常的秩序和恢复生产，各行各业都需要大量的就业人员。开国大典之后没几天，杨开智又写信给毛泽东，希望能在长沙谋一个“厅长方面的位置”。毛泽东坚持原则，不为亲友在谋私方面开方便之门，而且为了防止借他名义找省里领导要求什么，毛泽东态度坚决地给当时任湖南省军政委员会委员、长沙军管会副主任的王首道拍了一封电报，并另有一电给杨开智，请王首道转送：

首道同志：

杨开智等不可来京，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适当工作，任何无理要求不应允许。其老母如有困难，可给若干帮助。另电请派人转送。

毛泽东

九日

请王首道转给杨开智的电报是这样的：

杨开智先生：

希望你在湘听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不要使政府为难。

毛泽东

十月九日

毛泽东的母亲棠佳阁文家那计，有他很多表兄弟，战争年代，

因他牵连，吃过很多苦。解放了，毛泽东对他们非常关怀和爱护，不时地从钱、物上接济他们，更多的是给他们以教育和帮助，然而，绝不为他们搞特殊，以权谋私。毛泽东的表兄文运昌曾给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写信开列了14名亲属的名单，要求在工作或升学上给以照顾和安排。名单转到毛泽东手里，他当即批示："许多人介绍工作不能办，人们会要说话的。"

1950年初，几位表兄又写信给他，反映乡里情况。毛泽东没有因为他们是自己的亲戚而就相信了，而且从信的内容上看出一些问题。他放心不下，便给湘乡县县长刘亚南写了一封信：

亚南同志：

兹有湘乡四都凤音乡大坪坳文氏兄弟四人来信，附上请你看一下。他们对当地区乡政府的工作有些不满意的话，未知实际情况如何。假如可能的话，请你派一同志去调查一下，以其结果告我。文氏兄弟都是贫农，信上则替地富说话，是何原因，亦请查明告我。至于文家（我的舅家）生活困难要求救济一节，只能从减租和土改中照一般农民那样去解决，不能给以特殊救济，以免引起一般人民的不满。此祝

健康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五月二十七日

毛泽东就是这样的人。他的行为影响着儿子。岸英以父亲为榜样，严格要求自己，自觉遵守党纪和政策原则，不徇私情，亲属中的事，在毛泽东那里行不通的话，在毛岸英这里也照样行不通。

就在这期间，外婆的一个本家亲戚也托人向毛岸英要求帮他安排一个"好"的工作岗位，捎信的人讲："帮帮忙，这是人之常情

……”从父亲那里和从说情人那里，岸英了解到外婆家里一些亲人的思想状况，他当即写了一封更长的信，一点一点掰开来，揉碎了做他们的思想工作，耐心地进行解释，说明共产党是什么样的政党，父亲毛泽东又是位什么样的领袖，他本人对这种事的坚定态度，对亲戚们进行诚恳的规劝。毛岸英的这封信，不但在当年，就是在现在，读一读，也会叫人感动不已。

……

反动派常常骂共产党没有人情，不讲人情，如果他们所指的是这种帮助亲戚、朋友、同乡、同事做官发财的人情的话，那么我们共产党正是没有这种人情；不讲这种人情。共产党有的是另一种人情，那便是对人民的无限热爱，对劳苦大众的无限热爱，其中也包括自己的父亲子女亲戚在内。当然，对于自己的近亲，对于自己的父、母、子、女、妻、舅、兄、弟、姨、叔是有一层特别感情的，一种与血统家族有关的人的深厚感情的。这种特别感情，共产党不仅不否认，而且加以巩固、并努力于引导它走向正确的、与人民利益相符合的、有利于人民的途径。但如果这种特别感情超出了私人范围，并与人民利益相抵触时，共产党是坚决站在后方面的，即“大义灭亲”亦在所不惜。

岸英非常明确地反对了那位亲戚的旧思想：

新的时代，这种进一步登高的“做官”思想已是极端落后了，而尤以通过我父亲即能“上任”，更是要不得的想法。新中国之所以不同于旧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不同于国民党，毛泽东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毛泽东的子女妻舅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的子女妻舅，除了其他更基本的原因以外，正在于此；皇亲国戚仗势发财，少数人统治多数人

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岸英对于那位亲戚的要求，所作的回答也决不会含糊敷衍，而是明明白白的：

> 我决不能也决不愿违背原则做事，我本人是一部伟大机器的一个极普通极平凡的螺丝钉，同时也没有“权力”，没有“本钱”，更没有志向来做这些扶助亲戚高升的事。至于父亲，他是这种做法的最坚决的反对者，因为这种做法是与共产主义思想，毛泽东思想水火不相容的，是与人民大众的利益水火不相容的，是极不公平，极不合理的……

这种坚持原则的信件，在不坚持原则的人看来，当然是不近人情。或许，有人会说，那个亲戚也许跟岸英关系不怎么密切吧？那么，请再看看他给陈玉英老人，也就是曾经是他家的保姆，并且跟开慧妈妈坐过牢的孙嫂吧。岸英回湖南探亲的时候，曾经十分地关怀她和她的后代，然而，这种感情难道仅仅是一种报恩思想吗？不！岸英在信里写得很清楚。

孙嫂：

> 这封信有些地方写的太潦草和太文，你要舅母帮你念一下。
>
> 你的信我前天才收到，这是因为我自你们那里返回北京后，马上又被公家派到别处去了，前天才回来。
>
> 你在信中感谢我照顾你，这我决然不敢当，我对你没有丝毫特殊，组织上对你照顾是把你当作对革命有一定功劳的人看待的。这是你二十几年前在敌人威吓面前，在敌人监狱中捱骂捱打，坚定不屈的应有代价，这就是你的光荣。但你可千万不要以此而自高自大，这也要那也要，

若如此，那就会把你自己的光荣历史污辱了。我想你不会这样的，你将仍是一个老实的、朴素的、对众人好的，为众人做事的因而为众人所尊敬的孙嫂，起码我是热望你自革命胜利后变得比以前更好。你的女儿进保育院一事，组织上已答应代你办，不要你自己出钱（因为你自己没有钱），如果一定要你出钱，而你确实没有钱，那么请你拿着这封信请舅母同你一起去见交际处刘道衡处长，他会正确处理问题的（他是一个老革命同志）。我的身体比以前要好一些，岸青不久前在医院里割了扁桃腺，身体好多了。

你的身体千万也要注意，同时又要好好在自己岗位上工作，不要使人家觉得解放后，你似乎有了“后台”（?）就不听话了，不好好工作了，这是不对的。我们是劳动人民，我们以此而光荣，但因此我们永远应该是世界上最忠实、最纯洁、最勤劳、最朴素、最刚强而又善良的人们，望你永远不失这种伟大工人阶级优良品质，宝贵这种伟大的优良品质。去掉一切不好的，非工人阶级的品质！

信已写的很长了，就此止笔。

祝你愉快！

岸青问你好，我父亲也问候你，希望你决不退步，跟着大众前进！

岸英上

19/8 （1950 年）

当然，与领导者沾亲带故本身就具有特殊性，这是普通人所没有的“特权”，他们可以以亲属的身份与领导者通信、见面、谈话等等，一般老百姓通过正规渠道都很难做到的，他们以亲戚朋友关系

就能做到。这当中，难免不出现一些不符合党的、国家的利益和原则的事。然而，不可能要求领导者不能有亲属或远离亲朋好友，事实上也做不到。现实生活中无论是谁，哪个人没有三亲六故、至爱亲朋。关键问题就在于领导者本身是怎样看待和处理这样的问题。我们觉得毛岸英的观点是对的，在我们这样的国家中，特别是在领导干部中应大力提倡的。现在再抄录如下，以加深印象：

> 对于自己的近亲，对于自己的父母、子、女、妻、舅、兄、弟、姨、叔是有一层特别感情的，一种与血统家族有关的人的深厚感情的。这种特别感情，共产党不仅不否认，而且加以巩固，并努力于引导它走向正确的、与人民利益相符合的、有利于人民的途径。但如果这种特别感情超出了私人范围，并与人民利益相抵触时，共产党是坚决站在后方面的，即"大义灭亲"亦在所不惜。

在与亲戚的关系上，毛岸英和他的父亲做得是对的，有些事情看似无情，然而却蕴藏着深厚的感情在其中。

> 乡亲们把他回乡探亲看作是"太子荣归故里"。他却提着鞋赤脚走在故乡泥泞的小路上……

以前，想回乡但条件不允许。现在家乡解放了，岸英很想回故乡看看，那里安睡着他亲爱的妈妈，那里还有众多的亲人和乡亲们……他在给外婆的信中就表示了这种思乡心情，"只要有可能，我想我是一定要回长沙来的。"遇有机会，他也向爸爸提出了这个要求，"让我回湖南一趟吧！"

毛泽东何尝不想回故乡看看呢？无奈，共和国刚刚建立，百废待兴，工作太多太忙了，根本抽不出身来，哪有时间呀！他也想叫岸英代表他回湖南，一来祭扫祭扫杨开慧的墓，解放了，她未尽的事业已经完成了，也该让她更好地安息了，岸英也该回去看看妈妈的；韶山的父老乡亲为革命出过力，不能忘了他们；更重要的是要了解了解湖南乡下的情况，马上就要土地改革了，农民们怎么想的？都有些什么要求？特别是乡下来信说，湖南有些地区粮食欠收，发生了粮荒，不知情况会糟得什么程度？今冬明春，老百姓将怎样度过呢？他也有顾虑，岸英从小就离开了湖南，恐怕对家乡的事情一点不知道了。他问道："你回去又能干啥？连话都听不懂。"

岸英马上接过问话，用地道的湘潭方言答腔："我跟爸爸学了咯多土话子，从今日起，再跟您学三个月韶山话，你看要得啵？"

毛泽东听着儿子讲家乡话，不禁笑了起来，点了点头，算是同意了岸英的请求。

同意是同意了，但真正成行也并不容易，岸英也有许多工作要做。尽管这样忙，回乡的念头，一直惦记在心里。他在给好友蔡博的几次信中，都讲到这件事，"下湘问题原则上已解决了，大概半个月后即动身……"可真正南下已经是1950年的5月份了。那还是跟随李克农到武汉出差，在武汉办完了公事，才于5月23日匆匆赶往长沙。因为外婆的八十寿辰就在5月25日，他带着父亲的贺信和寿礼，这件事耽误不得的。

经过这段时间的安排和筹划，岸英作好了回湘的各方面准备。

他随身带着父亲交办的三封信、两项任务。三封信：一封是给舅舅杨开智的；一封是给外婆祝寿的那封信；一封是给已担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副书记，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席的王首道的。两项任务：一是要他回乡看望父老乡亲，把他的问候带给乡亲们；二是告

诉乡亲们不久就要实行土地改革了，这是一场深刻的革命运动，贫苦农民盼望多年的翻身解放的好日子就要到来了，希望乡亲们积极投入到这场伟大的斗争中去。除了父亲交办的事外，他还给自己规定了一个目的——即他给蔡博信中表示的回湘"旅行期间准备用心学些新鲜东西，绝不仅限于'省亲'而已。"三封信，两个任务，一个目的，这就是毛岸英20年后回湖南的全部计划。

临走前，毛泽东又叮嘱了他几句，"见了乡亲们要有礼貌，辈份大的男人北方叫爷爷，我们韶山称阿公，女的喊娭(艾)毑(基)，长辈喊伯伯叔叔婶婶阿姨，同辈的以兄弟相称，或者喊同志，不要没大没细的；再一点，要入乡随俗，不要有任何特殊，老百姓最不喜欢摆格的人。"岸英心领神会，用地道的韶山话回道："晓得喽，爸爸，你还有么子吩咐的？"毛泽东笑笑，递给他一个皮包，用手指指说："这里的一些票子，是我多年的积蓄，是我资助你的，看到真正困难的乡亲，你就见机行事吧，俗话说，空手进门，猫狗不理，……总之，你看着办吧。"

"爸爸，你放心，我晓得！不过，那'娭毑'二字真是既难写又难念，'哎——基'——"岸英写了几遍，忍不住自己笑了起来，"爱——鸡——对，记得了！"

说老实话，为了准备回老家，毛岸英才有意跟父亲学土话的。即使在学韶山话的时候，他也对父亲提过意见："爸爸，大家都在学说普通话，可你的韶山口音老是改不了，平时还好，大家还能将就听，可是，跟外宾谈话，有时还要先把韶山话翻译成普通话，再译成外国话。"

毛泽东对岸英提的意见表示"诚恳接受"，可是却"坚决不改"，还说，"我是个老顽固分子，保守党人，这口韶山腔一世也改不了啦！"

到长沙后，天色已晚，先住在省委接待处里。第二天，岸英迫不及待地去学宫街看他的外婆和舅舅、舅母。80 岁的外婆，仍然耳聪目明，富富态态，岸英一头扑在她怀里，像个孩子似的又哭又笑，口里不断地说道："外婆，外婆，我好想你啊……。"渐渐地，又喊起"妈妈，妈妈你好苦啊……。"弄得外婆也哭，舅舅、舅妈也哭，在场的人，也都难过得不断地抽泣，抹泪。

过了好一阵子，岸英才平静下来，亲手把父亲的信和寿礼送到外婆手里，还拆开信，一字一句地念给外婆听："外婆，你听清了吗？"外婆不住地点头："我懂，伢子，我懂，谢谢你爷老子的一片孝心啊！要是霞妹子还健在，该有多好唷！"提起"霞姑——杨开慧"，人们又是一阵感叹唏嘘，岸英更是热泪盈眶。

接着外婆东一句西一句的跟岸英讲他小时候调皮捣蛋的故事，逗得岸英像细伢子似的扶着外婆的肩膀傻笑。舅妈李崇德这个瘦小体弱的女人，已经是未老先衰了，她就给岸英讲，当时冒险送三兄弟去上海天生祥酒店的情景，勾起岸英许多痛苦的回忆……

5 月 25 日在省委交际处，由省里出面，为杨老太太八十大寿举行了一个小型的庆祝会，同时，也是为岸英荣归故里接风洗尘。

岸英时刻怀念着牺牲了 20 年的妈妈，他要到的第一站就是请舅舅、舅妈陪他去板仓。

那天早晨，岸英跟舅舅、舅妈从小吴门火车站乘车北上，在白水车站下车，住了一晚。第二天清晨吃了早饭，便由白水向板仓前进。40 里乡村小道，整整走了大半天。这使岸英顿时想起了 20 年前那个令人心惊的日子——1930 年 10 月 24 日，他的 8 岁生日，特务分子范瑾熙带着枪兵，押着妈妈、保姆孙嫂和他，也是这条路，从板仓到白水，再由白水坐火车去长沙。亲爱的妈妈从此一去不复

返。……20年过去了，“天翻地覆慨而慷”，今天他仍然走在这条大路上，只不过方向相反而已。毛岸英真有说不出的感触！

回到板仓，回到他小时候最熟悉的外婆家，他激动得不能自持，中午，他三口两口地扒了半碗饭，便要舅舅跟他去看妈妈。

在棉花坡，在“毛母杨开慧墓”的石碑前，岸英这个1.8米的大汉，扑地一声跪在母亲的墓前，泣不成声地哭诉着：

“妈妈，妈妈，儿子回来啦——这次回来真不容易啊，妈妈呀！”岸英流着眼泪，暗暗地立下誓言：革命前辈流血牺牲，艰苦创业，我一定继承烈士遗志，为人类的解放事业奋斗，永保江山不变色！

根据当地的习俗，舅舅、舅妈给开慧化了纸钱，祭了坟。岸英记得20年前，他也是在妈妈坟前默祷（不敢大声哭泣），抹着眼泪，与弟弟岸青、岸龙告别了妈妈，由舅妈护送，离开板仓，经武汉去上海……

岸英没有沉浸在痛苦的回忆中，扫墓回来后稍事休息，便努力去完成父亲给的任务。他要舅舅带他到板仓的十几家贫苦农民家里访贫问苦。对于曾经为安葬妈妈出过力的老人，他则再三的鞠躬致谢。

乡亲们三三两两地来家里看岸英，这批走了那批来，深更半夜也有人找岸英谈心，谈得最多的是减租减息和今后土改的事。岸英见农民乡亲们这样热情，便约他们第二天在杨公庙再见。

结果，第二天来了上千个农民，一来是看岸英，二来是要向岸英打听土改的政策，把个杨公庙挤得水泄不通，更有些妇女小孩完全是来看热闹的。这天，倒成了板仓少有的盛会的日子

舅舅杨开智陪着岸英站到戏台上，舅舅介绍说：“岸英小时候在这座杨公庙小学读过书，这次，毛主席要他到板仓来看大家，跟板仓的老乡们见见面。”

毛岸英忍住热泪，嘶哑着嗓子说："父老乡亲们，20年前我们三兄弟被迫离开板仓，今天，我又回来了！20年里，我时刻想念着板仓，想念着埋在棉花山的妈妈！"

台下响起了老年妇女唏唏嘘嘘的抽泣声。男子汉们则严峻着面孔。

岸英话锋一转："如今世道变啦，贫苦农民就要翻身了。大家最关心的是何时进行土改。我在北方已经参加过几次土改，现在板仓虽然还未进行，但是，不用多久，一定也会土改的。我希望你们要注意政策，贫苦农民要团结，中农也要团结。听说这里有吊打中农的事，这就不对了。我看了一下，这里的田禾长得不错。你们暂时还很苦，只要农作物种好了，加上搞点纺纱织布的副业，日子还能过下去的。土改以后，大家的积极性一定会调动起来，下次回来，我还要看看农业大丰收的情景呢！"他尽其所知，向乡亲们讲解着土地改革的问题，满腔热情的一一回答着他们的提问……

岸英当时不满28岁，母亲的坟墓也葬在这里，板仓人没有一个怀疑他"下次回来"的话，乡亲们也希望他能多回来看看。可是，就是这一次，他在板仓只呆了两三天，离开之后，从此一去不复返，再也不能回来了。

•

提起韶山冲，岸英就激动得心潮起伏，快要不能控制自己了！这儿虽然不是他的生身之地，可它是父亲诞生的地方，父亲曾不止一千次地向他提起过韶山冲，那里的风土人情，山川地貌，革命故事，在岸英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5年前的春天，毛泽东带着全家在韶山住了一段时间。那时，岸英还只是个2岁多一点的细伢子，岸青还常要妈妈抱在怀里。岸英只依稀地记得，妈妈陪乡亲们打木脑壳（湖南乡间的一种牌，类

似麻将)时,坐在妈妈怀里的岸青,老是用肥胖的小手去桌上抓牌。而在地下踉跄乱跑的自己,最喜欢到火堆前玩火,这时,爸爸便弓下身子,指着火对岸英说:"火——火——这是火——。"又用树枝在地上写个"火"字教岸英识字……

岸英脑子里朦朦胧胧记得的零零星星的片断,毕竟是25年前的事了,如今认真想起来,又是那么的飘忽,仿佛雾中看花,似隐似现,越是这样,韶山冲对岸英就更有吸引力了。

省政府派了一辆苏式吉普车,让在省接待处工作的一个堂兄毛远翔陪着,把岸英从长沙送到湘潭。吉普车向西开到湘潭至邵阳公路上的七里铺,便无法前进了。到韶山冲要向北走,那时刚解放,七里铺到韶山冲没有公路,只有一条乡村土道,因此,吉普车只能就此止步。在湘潭县县长毛特夫陪同下,岸英一行改为骑马进韶山冲。

从七里铺到韶山冲,沿途经湾槽——银田寺——铁铺桥——白马团——引凤亭,总共要走70华里。眼下是江南的阴历四月,天气暖和,空气湿润,道路两旁野花盛开,而且在树叶丛中,已经孕育了许多细小的果子。远处的稻田像一块块碧绿的翡翠,稻秧在春风吹拂中掀起层层绿波。牛儿悠闲地吃着沾满细小水珠的青草,一两只花喜鹊站在牛背上,啄食牛身上的小虫……

这秀丽的江南春色、田园美景,真像一幅充满着诗意的山水画一般。岸英边走边欣赏着这春光佳色,心旷神怡,家乡在他的心目中更富有魅力了。岸英骑在马背上,马也贪嘴,有时看见一兜鲜嫩的青草,也要偷嘴偷舌地啃一下。岸英知道,在这条乡间土道上,曾留下父亲多少足迹!

江南的天气像小孩的脸,说变就变,刚刚还好好的,晴空万里,一忽儿便乌云密布。此时,岸英才体会到父亲常挂在口上的一句

话："湖南人真大胆，出外竟敢不带伞。"今天，他骑在马上，不能打伞，可是有雨衣挡风雨，在雨中行走也倒别有韵味。

岸英一路浏览着田园风光。路上行人不多，只有他们一行人骑着的这几匹马倒显得悠闲自在，70里山路对它们来说本来就是家常便饭。然而，只有岸英归心似箭，反觉得时间过得太慢，走着走着便懒洋洋起来。为了充分利用时间，他就从背袋里取出一本父亲的书来看，看得最带劲的是父亲早年写的那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他从文章中体味着父亲当年为革命奔走在乡间小道上的情景。

当他全神贯注看得入迷、心思全在书上时，坐骑看见脚下有个过水的圳口，四蹄跃起往前跳起一窜，未及防范的岸英没坐稳，冷不防从马背上被掀下来。幸好刚下过雨，地下软踏踏的，没有摔伤，只是身上像裹着糠的皮蛋一样，粘满了泥巴。这一来，把大家吓了一大跳，还不知他摔得怎样，伤着没有，赶忙下马"救驾"，倒是岸英很快回过神来，笑个不停：嗬，屁股跌成两爿喽！

这跟头，反倒使他精神振作起来，他收起书，牵着马走了一段，边走边向毛远翔打听当地风俗习惯、风土人情，打问沿途乡镇村庄的名称、识别山坡田野里的树木花草庄稼，一路谈笑风声，不知不觉就走进了韶山冲。

1950年的韶山，山青水秀，仍保持自给自足的自然状态。由于它远离城市，交通又不便，而且又是山区，这里的农民们一家一户整年的劳作田间，很少走出去，就显得有些闭塞而与城市隔绝了。韶峰脚下，土地冲里，一栋栋茅顶泥墙的低矮的房屋，藏在青松翠竹中间。傍晚时分了，各家各户的屋顶烟囱里，冒着乳白色的炊烟，炊烟融汇到一起，在山腰的房顶上连成一条起伏的烟云，袅袅婷婷。空气中弥漫着松脂的清香、禾苗和泥土的芬芳。这里充满着一

派宁静、和谐、安乐的世外桃源气息。

岸英一踏上韶山冲的土地，立即被这种芳香包围着、浸染着，吸进胸腔里，觉得全身香酥酥的，他被故乡的泥土气息陶醉了，他真想像小时候那样，在草地上打个滚，去亲亲那故乡的土、故乡的庄稼、故乡的溪水……

岸英回韶山，对韶山的父老乡亲们来说，无疑是个值得庆贺的喜日。且不用说这里平时很少有人来，即便是来个人，哪怕是很不熟悉的人，也会成为全冲人都兴奋的新鲜事，更何况，今天回来的是令韶山人骄傲的、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的儿子，他是代表他父亲回乡来的。他们像当年盼毛润之一样盼望毛岸英，欢迎毛岸英。

在一些上了年纪的人中间，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在韶山毛氏族谱中，也有“虎踞龙盘”，“灵秀聚鍾”的描述，因此，传说中的尧舜曾到过韶山并在韶峰上吹箫弄笛，预示着若干年后韶山会出“真命天子”。而现在，韶山乡亲们心目中的“天子”就是毛泽东。那么，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也就成了韶山乡亲们心目中的“太子”了。

“哈，太子回来喽！”

“嘿，太子荣归故里啦！”

“毛主席的大儿子毛岸英骑着高头大马回韶山冲来啦！”

……

兴奋的人们互相传递着喜讯，半大不小的少年们飞起光脚板，漫无目的地飞跑着，见了人就喊：“太子回来啦！”“少主席回冲里来啦！”

岸英老远就下了马，大步向人群走过去，他看到的人，都很陌生，又都很熟悉。陌生的是面孔，熟悉的是他们的语言、神态。真是“亲不亲故乡人，甜不甜家乡水”啊！

岸英激动得滚动着泪花，嗓子有些哽哑，见了年老的就喊阿公、娭毑，年长的喊叔叔伯伯婶婶姑姑，同龄的就喊大哥老弟：

“乡亲们，你们好啊，爸爸要我回来看看大家，向你们问好，爸爸身体很好，工作很忙，他一直惦记着你们呢！”

人们审视着他，抚爱着他，品评着他：

“嘿，岸英那身段，那个头，那笑脸，真像他父亲！”

“朴朴实实，大大方方，没有架子，是个好伢子……”

毛岸英穿着一身洗得灰白的旧军装，戴着军便帽，穿一双大头皮鞋，那模样，活像一个工作在农村区乡的转业干部。他听见有人在喊着什么，由于口音的原因，开始没有听真切，也没在意。当他再次听见有人“太子”、“太子”的呼喊时，他琢磨出其中意思了。他出乎意料之外的吃了一惊，脸色苍白地连忙张开双臂，急切地大声对乡亲们说：

“要不得，要不得，千万莫咯样讲，我爸爸不是皇帝，他是人们的公仆，千万再莫咯样喊了，要是爸爸晓得了，会‘谩它’(生气)的呢！”他态度非常诚恳对大家说：“就叫我岸英或岸英同志吧！阿公叔子们喊我小毛伢子也行！”

给毛泽东当过私塾先生的毛宇居老人，在当地是有名的“秀才”，他留着雪白的美人髯，见了岸英，先捋胡须，然后把头向后一伸仰，用大拇指朝岸英一竖，笑道：“不错，不错，个子很魁伟，气质也很像你爸爸！”岸英说：“我爸爸特别提过你老人家，以后有机会要接你到北京去住住呢！”

岸英在乡亲们的簇拥下，走进了乡政府所在地——毛鉴公祠。所谓乡政府，也就是一个空空落落的几间破旧不堪的屋子。

“咦？岸英，你的韶山话何解说得咯样好喽？”

韶山人为岸英的坦诚所感动，经他打招呼后，再没人喊他“太

子”了。不过，一些托他办事的人，后来还是改不掉，仍然称他“少主席”。刚刚解放了的韶山人，对于“同志”称谓还很不习惯。

晚上，乡政府办事人员从小溪里捞了几条活鲫鱼，用豆豉辣椒蒸了一碗，算是头菜，还有的就是酸菜、空心菜以及粉丝之类，乡里招待人也只有这些了，虽然简单，可这是地道的家乡饭呀！岸英吃得津津有味。

“呷呀、呷呀！”

“挟菜呷饭，挟菜呀！”

人们用带着浓重乡音的话语劝岸英多吃点，是那样的质朴、热情。席间，还不时询问毛泽东家的情况，什么都问，从爸爸的身体到兄弟姐妹的年纪……

“这次爸爸要我回乡，一是向父老乡亲们问好；二是要我告诉大家，不久就要进行土地改革了，贫苦的农民要分田地了，打碎千年的封建锁链，从此就要当家作主人了……”

岸英不时掏出笔记本，记下老百姓的想法、要求（包括一些民间谚语，他已记下了两个本子）。

夜深人静，剥了漆的办公桌上，燃着一盏桐油灯，人们不断地拨着灯芯，添着灯油。岸英坐在桌边，周围是热情的乡亲，他们聚在那儿久久不散，听岸英讲外面的情况，向岸英述说家乡的事情。直到过了午夜时分，陪同的人见太晚了，才说服了乡亲们回去睡觉，也让岸英早些休息。

岸英自己动手，将祠堂大门上的两扇木板门，取下来，架在长条凳上，门板上铺了一层软松的稻草，打开铺盖卷儿，躺下去四肢朝天，与几位同伴答了几句腔，便一头进入甜蜜的梦乡。

第二天早晨，他踏着土路，绕到上屋场他祖父的旧屋，瞻仰父亲的衣胞之地。

那时的旧居可不比现在。

解放前，旧居被国民党反动派作为“匪产”而没收查封很多年，直到1943年才让毛润民搬进去住。毛泽东祖上的半边屋是瓦屋盖顶，房基也高耸些，而对面邻居的茅草房，就更差劲儿了。旧居门前堆放着七八根圆木，竹杆和一堆松树枝。后屋的山坎也坍了。

毛岸英在屋里走了两圈，乡里人问他，这山坎塌了，要不要修？他说：“把浮土挑走就行了。”

乡政府的人告诉他，毛泽东曾在少年时代写过两句诗：

“鸡鸣未晓车轮叫，隔夜难存半合粮。”形容韶山冲仅有土制鸡公车作交通工具，人民的生活非常艰难。要改变韶山面貌，首先要解决交通问题，他们问岸英，韶山到湘潭可不可以修一条公路？

岸英思考了一下，回答道：“看来路是要修的，不过，千万要注意，不要占去好田好地！”

5月，正是湖南的雨季，田间小路被人和牲畜的踩踏，就跟塘泥一样的又粘又滑又烂。岸英顾不得这些，抓紧时间访贫问苦，他请堂叔毛泽连给他带路。毛泽连曾经去北京治过眼疾，一直是岸英陪着他。根据爸爸的意见，岸英带他到北京的同仁医院动过手术，所以，彼此较熟悉，毛泽连对他也是无话不说。

乡村小道、田埂上，都是烂泥，岸英穿着雨衣，撑一把红油纸伞，脚下那双牛皮鞋，已有三四斤重了，走路极不方便，常常陷在泥沼里，拔出来很费劲。于是，他便弯下腰，卷起裤脚，脱下皮鞋拎在手里，干脆打着赤脚走在田埂上，这样既便捷，又轻快。草根扎得脚板痒痒兮兮的，也有一种难以形容的舒服感。毛泽连赶上来要给他提皮鞋，他连忙摇手：“要不得要不得，那有叔叔给侄儿提鞋的？”

岸英要毛泽连带他去看望几家最困难的农民。

他们来到毛瑞和家，毛瑞和躺在床上。岸英问：“瑞和阿公，你

家几口人呀?"

毛瑞和有气无力地回答道:"大小6口人,嘴巴连起来尺把长。"

"你堂客和细伢子哪里去了?"

"瑞和阿公,你呷饭了吗?"

"我没饭呷呀,呷了好久的草啦,我又有病。"

岸英心里一颤,好像刀割一般,难过地问:"你呷的么子草呀?还有没有?"

"我呷的鹅藤草、饭蒿子草、红花草,锅里还有。"毛瑞和说着,就要从床上爬起来,岸英连忙按住他说:"瑞和阿公,你有病,你躺在床上,我自己去拿。"

岸英走到灶边,揭开锅盖,只见鼎锅里,黑糊糊一片,他用手捏了几根,送到嘴里,先是一股猪潲味直往鼻子里冲。那草,嚼在嘴里,淡淡的带着苦味,但还有些嚼头,可以充饥。岸英掏出手帕包了一包,塞在衣袋里。

"哎,这野草怎么吃得下?"

"有办法呀!肚子饿了还不吃一点?比榆树皮、观音土要好吃些!"

毛岸英眼前闪着同情的泪花,从皮包里掏出十万块钱(旧币,合现在十元),说:"瑞和阿公,我没么子东西送你,这点钱你买点粮食吧!"

毛瑞和贫病交加,想不到一个陌生人会给他送十万块钱,在当时,这钱可以买一担多谷呢。他感激涕零问毛泽连:"润发(泽连的字),他是谁?"

毛泽连说:"他是润之的大儿子毛岸英,主席要他回韶山了解乡间的情况,他特事来看看你的。"

毛瑞和十分感激地说："毛主席教育的儿子，到底好啊！"

他们又去长冲看毛连奇（九阿公）。九阿公看见岸英的脚上打了血泡，很过意不去。

岸英说："应该来看看九阿公。"问他吃什么，结果，厨房的碗里盛的也都是草。岸英也拿出十万块钱送给他。后来又到樟树塘毛连桂家，情况几乎是一样的，都是孩子多，家里穷，没饭吃，吃的是草。岸英很难过，一打听，韶山冲里大多数农民过的是这种日子。他当即向毛县长提议，要调查一下，有多少缺粮食户，想办法，给贫困农民发放点救济粮食，让乡亲们度过春荒这一难关。好容易盼到解放，无论如何不能饿死人呀！

就这样，毛岸英访贫问苦，撒胡椒面似的，这家给五万块，那家给十万块，最多不超过二十万块钱，父亲给他的那只鼓鼓囊囊的皮包，逐渐地瘪下去了。这些钱都是他父亲平时省下的津贴和一部分稿费收入。

离开北京时，父亲要他一定去大坪坳棠佳阁看看舅家的人。

这天一早，岸英从上屋场出来，经过毛震公祠、东茅塘，到了滴水洞。原先，他以为，滴水洞是个大山洞，来到一看，根本不是洞，只是两山之间夹着的一个深长的狭谷山冲而已。

岸英在湘潭县长毛特夫及毛远翔陪同下，每人牵着一匹马，沿着滴水洞的山间小道，经过滑油潭，翻过八亩田坳上，跨过七亩坑和龙潭圩，直达大坪坳棠佳阁。文涧泉、文运昌、文枚清、文南松等几位老人和一些老娭毑，老早就来等候岸英。

亲人们按当地的风俗习惯迎接毛岸英的到来，坐下后先给他倒了碗芝麻豆子茶，然后摆上一桌十分丰盛的酒席。岸英每样菜都尝了一下，觉得味道鲜美独特，胜过城里的佳肴。其实，这些菜的原料，不外乎是新采摘的笋子、香菇、嫩蕨及活鸡、鲜鱼之类，只是制

作的方法与城里不同。乡下用的是柴灶，炉膛里火候好，烧出的鱼和炖得的鸡，肉又香又嫩，炒的菜既新鲜而又别有滋味，加上他们走了几十里山路，所以吃起来就特别的香。岸英吃得格外甜美。

席间，他父亲常常给他提起的文运昌老人，高举酒杯，文绉绉地说："今日岸英贤侄光临寒舍，堪称盛会，我等平生难得，实属幸莫大焉，让我们共同举杯为毛主席的健康长寿，为新中国的繁荣昌盛，干杯！"岸英也向老人一一祝福。

岸英逐一拜访了棠佳阁的亲友们，带去了毛泽东的问候。

临走前，老人们又以茶会为岸英饯行。桌面上摆的都是不起眼的小碟子，碟子上盛着醋浸多年的藠头、大蒜、青梅刀豆、蒜苔和精心晒制的紫苏、梅子、山楂饼、盐姜等等。他们边吃边叙，谈笑风声。

老人们当然以老卖老，谈他们跟毛泽东的友谊，谈毛泽东小时候的故事。这些，岸英都是洗耳恭听。特别是文涧泉老人，背诵了一首毛泽东于1901年从韶山到湘乡东山学校读书时，寄给父母的一首诗：

孩儿立志出乡关，
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
人生无处不青山。

岸英听来十分新鲜，更加佩服父亲从小就立下宏大的志向。

文运昌老夫子接过来一字不漏地背诵着毛泽东的"祭母文"：

……吾母高风，首推博爱；遐迩亲疏，一皆覆载；恺恻慈祥，感动庶汇。爱力所及，原本真诚；不作诳言，不存欺心。整饬成性，一丝不诡；手泽所经，皆有条理。头脑精密，劈理分情；事无遗算，物无遁行。洁净之风，传遍戚里。不染一尘，身心表里；五德荦荦，乃其大端。合其人格，如在上

焉。……病时攬手，酸心结肠；但呼汝辈，各务为良。……

养育之恩，春晖朝霭；板之何时，精禽大海；呜呼吾母，母终未死；躯壳虽殚，灵则万古。……

《祭母文》共96句，384个字，老夫子摇头晃脑，眯着双眼、抑扬顿挫，有腔有调地背诵着，岸英以极大的兴趣，目不转睛，专注地听着。背诵完《祭母文》，老人又高声背着毛泽东写的两副挽联：

疾革尚呼儿，无限关怀，万端遗恨皆须补；

长生新学佛，不能往世，一掬慈容何处寻。

春风南岸留晖远，

秋雨韶山洒泪多。

文南松和文运昌还将毛泽东父母的遗像和毛泽东兄弟分别与父母合影的照片，还有1915年毛泽东向文运昌借书的亲笔信，都交给了岸英。岸英含泪致谢，说实话，到今天为止，他才第一次看到他祖父祖母的尊容！啊，爸爸多像奶奶呀！那脸形，那眼神；而泽民叔叔却很像爷爷，一样精明能干，难怪他在党内和政府里不是管银行，就是当经理呀！

时过申刻，红霞满天。岸英依依惜别棠佳阁，经樟木冲、黑石寨、从芭蕉潭过坳，走滴水洞返回韶山。这是岸英第一次当然也是最后一次沿着他爸爸青少年时期经常往返于外婆家的路线，踏着父亲的足迹，走在这乡间的山路上。他的感受自然会很多很多。

毛岸英又在韶山访贫问苦，调查研究，前后花了6天时间。临走前，他与韶山党支部的同志座谈时，再三强调，在土改中要讲政策，要依靠贫苦的农民，要团结中农……

岸英依依不舍地离开了韶山，完成了爸爸交给的两项任务，达

到他学习新鲜事物的目的。

他那鼓鼓囊囊的皮包，在韶山一转，变得干干瘪瘪的，父亲要他随身所带的钞票，就那么零零落落地送光了，最后，还有一些困难户没有拿到钱。这次回家乡使他醒悟到：虽然人民在政治上解放了，但大多数农民仍过着贫困的生活。解决贫苦农民困难的根本途径在于实行土地改革，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否则，就是拿一火车钞票，也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岸英囊空如洗，不仅如此，他回到长沙交际处时，他的堂兄看见他趴在桌上正在给湖南省政府主席王首道写信。原来，他回韶山时，住在毛震公祠对面冲里的毛贻泉找他讨债，说他爸爸毛泽东某年某月借了他的 100 元大洋，云云。

他已两手空空，只好求助于王首道，信的大意是：几十年前，爸爸从毛贻泉手里拿过 100 元钱，这次回去，人家找我要钱。我原先不知，又没有准备，现在我的钱已用完了，请求借给 100 元，以解燃眉之急！……话语十分恳切，真是应了一句古训：父债子还！

第四部

戀愛·婚姻

异国初恋——叶琳娜，我爱你！

江青当红娘，毛泽东泼冷水。

毛氏父子的第一次冲突——儿子要结婚，老子不批准。

既是中国最高规格的，又是最俭朴的婚礼。

他对儿子的婚事态度，似不近人情，然而，他是为了坚持原则；其实，他最关心儿子的婚姻大事。他和她接触，最初还是他提供的机会和条件。

开国大典刚过不久，一天，毛岸英来到父亲的房间。看看父亲今天的气色和神情都很好，便挨着父亲坐下来。但是，想到今天的目的，他的心里仍忐忑不安，他不知道谈话会是怎样的结果。然而，无论如何，这件事，今天也得争取谈出个好结果来，再过几天，自己就满 27 岁了。周围的一些同事、朋友，个人问题早就解决了，而且有的人孩子都挺大的了……于是，他鼓起勇气说："爸爸，开国大典也举行了，我和思齐的事……"

毛泽东不等儿子说完，把手一挥说："不用讲喽，你想说什么我都晓得。不过，我的事情多，一切要靠你们自己操办。"

听了爸爸的话，岸英高兴极了，刚才还揣揣不安的心情，现在一扫而光，没想到这一回事情会这样顺利，可上次却……

那是 1948 年 8、9 月间的事。

当时，已是硕果累累的夏秋之交了。他跟思齐相见相爱时，槐花才放香，石榴树开着红花，那太行山里的红果子树上也刚刚结出青青的小果子。几个月过去了，现在槐树绿荫遮天；石榴已长成了小拳头般大小，常常被爱偷嘴的小孩们摘下剥开，里面的石榴子仍

是白色透明的，像一颗颗晶莹的宝石，孩子们怕酸怕涩，仅咬一粒就丢掉了；到是那像苹果似的红果子，快熟透了，甜甜的，咬在嘴里脆生生的满是果汁。岸英很爱吃这种红果子。

他感觉在爱情上，也像这秋天的果实，马上就要成熟了。

一天傍晚，蝉儿还在枝叶间唱着“热呀——热呀”，有人却听出是“知了——知了”。秋日的傍晚，太阳虽已暮落，但仍不收去它那余威；远山、近村，一片宁静，听得清老妈妈喊娃回来吃饭的声音，家家户户的屋顶上冒出炊烟，整个村庄笼罩在燃烧后的树脂的芬芳中。

刘少奇的妻子王前，跟刘思齐在一个学校里。思齐常常去他们家，因此，刘少奇对她也很熟悉，仿佛她这烈士遗孤也是他的干女儿一样。

在岸英与思齐的婚姻问题上，他愿意帮忙，早日促成这件美满的婚姻。

那天傍晚，刘少奇陪着思齐来到毛泽东的住处，在那棵毛泽东常常休息、吃饭的槐荫下，刘少奇要思齐坐在一把藤椅上，悄悄地叮嘱了几句就离开了。走了差不多十几步，他又回过头来笑笑，意思是：沉着，祝你们成功！

刘少奇走了不久，岸英跟在父亲身后，从后院来到槐树旁。思齐见毛氏父子一齐来到跟前，连忙站起身，向毛泽东打招呼，投去一个亲昵的微笑。她红着脸，用手拨弄着那油黑的长辫子，羞答答的，这种事，对于一个十七八岁的情窦初开的姑娘，是不好启齿的。可是，比她大 8 岁的岸英却是个五大三粗的成熟的小伙子了。

然而，毛岸英和刘思齐都在不适当的地方，选了一个不适当的时间，提出了请父亲批准二人结婚这个不适当的要求。

那时，毛泽东正在筹划如何用 5 年左右（从 1946 年 7 月算

起)，根本上打倒国民党，“今年七月至明年六月，我们希望能歼敌正规军一百五十个旅左右。”“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这是当时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伟大号召。

毛泽东运筹帷幄，好似一个大手笔的作家，正在构思他的长篇巨作，受不得一点刺激和干扰。而江青全然不顾这些，大事小事甚至无事也找毛泽东罗嗦、争吵，弄得毛泽东心烦意乱，火气也大。

刚才，岸英先在后院跟父亲请求了一阵子，毛泽东没有搭腔。现在父子二人走到前院槐树荫下，毛泽东用手压一压，示意已经站起身的思齐，仍然坐在原位不动。他挨着思齐，一屁股坐在一把大藤椅上，弄得椅子格吱格吱响，显示出他此时的心情并不十分好。岸英在父亲身旁的椅子上小心翼翼地坐下。

俗话说，进门看脸色，出门看天色。思齐是个聪颖的姑娘，她抬眼瞄了一下他们父子，只见二人脸上都是阴沉沉的。沉默片刻，毛泽东终于微笑了一下，在思齐肩上轻轻地拍了一下，关切地问：

“思齐，你今年多大啦？”

思齐欠欠身子，不好意思地说：“满了 17 岁，吃 18 岁的饭了。”她满脸飞红，不好意思抬头。

“按照民间的算法，她也可以说是 18 岁了。”岸英生怕爸爸不同意，连忙补充一句。

毛泽东横了他一眼，又问思齐：“你才 17 岁，又在学校读书，着么子急喽？等打完这一仗，再结婚也不迟呀？”

“爸爸，这个仗是打不完的，我是不想再等了。”岸英把头摇得像个货郎鼓，想恳求父亲批准，在西柏坡立即结婚。

毛泽东又掉过脸，用炯炯如炬的眼光盯着岸英，威严地说：“岸英，你才 25 岁，着么子急喽？”

“不是，爸爸，我已经满了 26 岁了！”岸英皱着眉毛诉苦似的

说。

毛泽东“嘿”地干笑了一声，苦口婆心地说：“岸英，你回国才两年，要学习的东西很多呀！你可知道，我们干部里有一条规定，部队连长以上的干部，不满30岁是不准结婚的，你就是26岁吧，还差好几年呢！”

“爸爸，我在中宣部工作，又不是当兵的，为什么要拿那个规矩套在我头上？我总觉得，现在结婚条件已经成熟，我是不想再等下去了。”毛岸英把两手十指叉在油黑的头发里，表示他正为结婚的事烦恼头痛呢！

毛泽东的语气也硬起来了，他迸出几句韶山土话：“你咯伢子为何解劝不回呢？我可以明白告诉你，你们二人都不够条件。尤其是思齐，她不满18岁。解放区的婚姻法规定：男满20岁，女满18岁才能结婚，这一条，思齐不够条件结婚。”

刘思齐羞怯地点点头，同意她的干爹、也是未来的公公毛泽东的意见，小声地说：“好吧，我听爸爸的，只要岸英真心爱我，等10年再结婚我也愿意。”

岸英白了思齐一眼，气愤地说：“我是不愿再等了！再等10年，我都老了。”

毛泽东听了觉得好笑，但仍然劝解道：“说天话哩，再过10年你也才三十五六岁呀！我跟你开慧妈结婚的时候，也是快30岁的人了。如今，你不是长得蛮大蛮好吗？你抱儿子的日子长着呢！”

“爸爸又开玩笑，反正，我是拿定主意了，我和思齐要结婚！”过去对父亲言听计从，百依百顺的岸英，为了个人的婚事，竟然不听父亲的规劝。他有他的小算盘，也可能他想，我是你的儿子，在你面前耍耍赖，你也没办法。我坚持非要结婚不可，你对我这个儿子能有什么办法？况且，刘思齐也是你最喜欢的女孩子，总得给点面子

吧?只要我的态度坚定些,最后你总得同意,谁让我是你的儿子呢。然而,他的这种表现,不但没起任何作用,反使本来就已心烦意乱的毛泽东大光其火。

他把脸一沉,用手指着岸英训斥道:

"你再急也不能违犯法律,我们规定军队连长以上的干部,不到30岁不能结婚,你凭什么不到30岁就要结婚,来破坏这条规定?就因为你是我毛泽东的儿子,你就可以特殊化,不遵守军队的规定,任意破坏纪律!都照你这样不受纪律约束,那军队还能打仗吗?现在,你们两个人都不够条件,最主要女方刘思齐不够婚姻法规定的年龄,法律是公正无私的,不允许有特殊人物不遵守的,你毛岸英、刘思齐不能例外。"

岸英根本听不进去,一会儿把脑壳从左边摇到右边,一会儿从右边又摇到左边,表示拒绝父亲的规劝。不知是儿子不体谅父亲,还是父亲不理解儿子?好像各有各的理由。其实,毛岸英是个很少考虑个人、为个人打算的人。要是在别的问题上,他通常是诚恳地听取他人意见的,要是感觉到是自己错了,也会作自我批评,并认真改正。而唯独在个人婚姻问题上,他一反常态执拗起来。当然,也有他的道理,都二十七八岁的人了……

毛岸英心里又急又恼,便躺在床上哭闹起来,谁也劝不住。阎长林报告江青,江青不便出面调解,说:"还是让他爸爸去说说吧。"毛泽东听了阎长林的报告,勃然大怒,掼下大笔,走到岸英房门前,朝里大吼一声:"毛岸英,你想干什么?"这一吼,毛岸英老实了,由嚎啕大哭到暗暗抽泣。

然而,自那天以后,他仍念念不忘结婚这件事。有一次,他托一位伯伯;请他传话给父亲,要求见面倾吐心声。毛泽东知道他想说什么,就对那位老同志讲:"你告诉岸英,作检讨可以来,要结婚就

别来找我。”

毛岸英可不管这些。有一天，他又一头闯到父亲的前院，而且是光着一双脚。那时候，天气不冷，赤脚并不稀奇，稀奇的倒是岸英故意在父亲面前做出这个样子。

毛泽东看见儿子比自己还高，竟然像个细伢子似的，光着脚站在他面前，惊诧地问：“岸英，你何解不穿鞋子？光着脚到我这里做么子？”

“我没鞋穿？”岸英粗声粗气地讲。在过去，他是从来不敢用这种口吻跟父亲讲话的。

毛泽东生气地责怪道：“公家发给你的鞋呢？”

毛岸英说：“送人了，我看见农民脚上有疮，疮都溃烂了，我觉得他挺可怜的，就把脚上的鞋脱下，送给他穿了。”

毛泽东问他：“那人是谁呢？”岸英回答不出。

“嗯，同情劳苦大众，这倒也好，只是江青几次跟我讲，替你织的毛衣毛裤毛袜，你到外头转一圈都送人了，你倒大公无私，是不是呀？”

岸英点点头。

毛泽东从屋里取出一双公家新发的圆口布鞋，递给岸英：“喏，我省下的，给你穿吧！光着脚板总不好意思进办公室吧！”

岸英打量了一下父亲的双脚，只见他那双布鞋已经破烂不堪，右脚前头开了洞，露出大脚趾，左边的那只，后跟上已绽开一条缝。

“爸爸，你自己……”岸英有些不好意思了。一来，爸爸这样节俭，二来，他把鞋送给过路农民，赤着脚来找父亲，本来是带有对父亲挑衅的意味：谁要你不让我结婚的？我现在没人照顾。

毛岸英的本意，并不是向老子要鞋穿，他仍坚持要结婚。

儿子对父亲几乎是恳求；父亲对儿子近乎苦口婆心。双方仍对

峙着，谁也不屈服，不退让，而其他人都无法插手这对父子的矛盾冲突。

父亲原以为儿子是来作检讨的，谁知道送了鞋给他，还赖着不走，又念起那个经来：

“爸爸，我总是听你的话，这一回，你就答应我跟思齐结婚吧，结了婚，我就安安心心地学习、工作，省得心挂两头的。”

毛泽东见儿子这般固执，不禁肝火更旺，训斥道：“岸英，你还是个党员，怎么不懂道理？”

岸英仍不理解，也不退让，气得毛泽东用手一指：“你你，你回去吧，我没时间跟你费口舌！”

岸英咬咬嘴唇，左肋挟着那双新鞋，赤着脚，头也不回地离开了父亲的住房。走了老远，还听见毛泽东递过来一句话：“这么大的伢子，怎么不懂大道理要管小道理呢！”不是父亲不理解儿子，父亲所处的地位，他所担负的、其它任何人承担不了的责任……所有这一切一切，都要求他严于律己，起表率作用，全党、人民有多少双眼睛在看着呀！而且有那么多大事情要做，争分夺秒都嫌来不及呢……在他面前，任何个人的道理，也是小道理。这也许是父亲劝儿子把婚事一拖再拖的理由吧。不过，岸英知道，父亲一向对子女要求严格，严格得有时近于苛刻。他看过斯诺的《西行漫记》，书里边，毛泽东多次提到他父亲毛顺生对他的苛求，以及他反抗父亲的战略战术。时过境迁，毛泽东当了父亲了，他总不会用祖父对他的办法来对付自己的子女吧！或者说，他毛岸英也学学父亲小时候对付爷爷的办法来对付父亲，来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小时候，毛泽东叫石山伢子，相当调皮，不按毛顺生的教导办事。他总说：“年纪大的应该多做点，年纪小的伢子少做点！”惹怒了

性格刚愎的毛顺生，随手拿起扫把，就要打他，毛泽东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他见父亲追来，没有了出路，便急中生智，爬到一棵树上，树下是一口又清又深邃的池塘。

“你再追打，我就跳塘！”毛泽东威胁说。

毛顺生一见那情景，只好主动求和，保证不打他，要他乖乖地回屋里去。

对！父亲对付爷爷的办法，不妨借来一试，也许有效。于是，在一个傍晚，在毛泽东住地，父子又展开了一场关于可不可以结婚的争辩。毛岸英眼看自己的理由说服不了父亲，突然嘴吐白沫，全身抽搐，摇摇晃晃地倒在地上，仿佛昏死了一般，口中还说着胡话。

这可把爱子如命的毛泽东吓坏了，他连忙在院里大喊大叫：“快来人，快来人，岸英不行了，岸英不行了。”他把翻译师哲找来：“快去喊大夫，快！”

师哲立即把苏联医生米大夫请来。

米大夫是个医术高明的内科医生，跟岸英同机抵达延安的，后来，又常在一起，所以，关系密切，俩人常用俄语讲些笑话之类。米大夫见岸英躺在地上一动也不动，先是一惊，再看看毛泽东，正双手背着在屋里转来转去，十分不安。也许是爱子太深切，也许是管教太严厉，把儿子气成这个样子，毛泽东好心疼啊！

米大夫从容不迫地蹲下一条腿，右手取出手电筒，左手翻开岸英的眼皮，看瞳孔是否放大？又用双手揿揿岸英肚皮，再用探测器在岸英大腿上一刺，岸英的脚马上一缩。米大夫心里有数，给急不可耐的毛泽东送去一个微笑。

“米大夫，怎么样？要不要抢救？”毛泽东真的吓白了脸，弓着腰，悄悄地问。

“不要紧，请放心吧！”米大夫用蹩脚的中国话说，接着，对着岸

英的耳边，用俄语说：

“谢廖沙，不要耍死狗，乖乖地起来吧！”

随后，他把两只手插到岸英两肋间，胳肢岸英，岸英痒不过，只好腾地坐起来，揉揉眼睛。

毛泽东这才放下一条心，问岸英：“怎么了？是不是中暑？”顺手把白毛巾在脸盆里打湿，递给岸英。

岸英再也不好意思装蒜了，站起身，拍拍屁股上的灰尘，头也不回地回东柏坡去了……

软的不行，硬的也不行，毛岸英实在没有办法对付他那顽固的父亲，只好把对父亲的不满，转化为消极的沉默对抗。

据毛泽东警卫员回忆：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毛泽东坐中吉普车到家裕村的南河滩去散步。当汽车开到西柏坡与东柏坡两村之间的路上时，毛岸英又从东柏坡里出来了，他朝毛主席的汽车走过来了。

“毛主席在车上看见了毛岸英，对阎长林说：‘岸英要拦汽车捣乱，你就把他送到警卫团禁闭起来，押他几个月！’

“毛岸英看见他爸爸坐着汽车过来了，他往路边一闪身，面向北面的山坡，低下头立正站着，气呼呼地一动也不动，毛主席的汽车一闪而过，他这才抬脚向西柏坡走去。”

说毛泽东在儿子的婚事上不近人情，也是也不是。说是，他不近人情，是为了坚持原则，不符合原则的事，不论是谁，都不能做；说不是，他真的关心着儿子的婚姻大事，他觉得刘思齐各方面条件都不错，就经常叫她来家里玩，并设法为他们接触提供机会。岸英和刘思齐就是在西柏坡才确定的关系……。

那还是在1948年5月的一天，刚从山东回到西柏坡的毛岸英正和父亲在院子里谈话。他们山南海北谈得正浓时，一个十七八岁的、梳着大辫子的姑娘落落大方地走了进来，见了毛泽东便亲热地喊了一声“爸爸”。

“啊，思齐啊，你么子时候回来的呀？”毛泽东喜出望外，立即走到思齐身边，用手在她头上比量了比量，幽默地说：“长得真快呀，女大十八变，在延安那阵子，你还是个细妹子呢！”他掉过头，笑嘻嘻地对儿子说：“岸英，你还记得她吗？”

岸英仔细打量了一下刘思齐，只见她苗条的身材，秀气的脸庞，两只黑眼眸子，闪闪灼灼；两条油黑的大辫子，一直垂到了腰际，辫梢处扎着两只蝴蝶结，走动时，就像两只翩翩起舞的真蝴蝶一样摇动着；整个外貌看上去，干净、整齐、朴素、大方，没有一点骄娇之气，而且全身充满一种青春的魅力。

岸英正看着她愣神，倒是刘思齐先向他打招呼，“岸英哥，你也在这里？”她显得十分高兴，但又不免流露出少女的几分羞涩来。

岸英突然像猛醒过来似的，连忙走到她跟前，用手在她的头顶上轻轻拍了拍：“思齐啊，你长高啦，长大啦，也长漂亮啦！记得吗？前年在延安时，你还这点点高。”他用手摆在自己胸前做了个手势，又将右手一抬，“如今，眼睛一眨，老母鸡变鸭啦——呱呱叫啦！”

“好呀，你把我比作笨鸭子呀！”思齐用小拳头捶岸英的胳膊，这一切，毛泽东都看在眼里，心里甜滋滋的。等两个年轻人久别重逢，嘻嘻哈哈时，他也就退居“二线”，进入他的办公室去了。

“怎么样，还好吗？”岸英关切地问。

“马马虎虎，在山西长治的北方大学文学院学文科。现在学校放暑假了，我就到平山县来看病。前一阵子发疟疾，老也不好，这次用了一种新药，现在病全好了。刘少奇伯伯的妻子王前也跟我在一

起上学。我到这里来，一来看看爸爸，二来看王前的两个孩子丁丁和涛涛，想不到碰到你，真让人高兴！”刘思齐絮絮叨叨地说，脸上笑成一朵花。

岸英突然迸了一句：“这叫有缘千里来相会！”说完，刘思齐的黑眸子紧紧地盯着他，脸上感到燥热，而岸英顿觉失言，也有些脸红，忙更正说：“噢，这叫巧合，完全是巧合！”

岸英连忙转了话题：“思齐，你妈还好吗？”

思齐说：“妈妈跟我都是1947年3月东渡黄河，加入了李先念的部队。她还好，只是精神上受的打击太大了。”

岸英不再多问，因为，他晓得思齐也跟他一样，是个苦孩子。他们在延安初次相见时，他就了解了她的身世……

原来，思齐的爸爸刘谦初，曾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1931年牺牲了，思齐出生后就没见过爸爸。爸爸临刑前有一封给母亲张文秋的遗书，读来催人泪下：

丽娟（张文秋搞地下工作时化名李丽娟）：

我在临死之际，向我最亲爱的母亲（指的是党）和最亲爱的兄弟（指同志们）告别，并向你紧握告别之手，希望你不要悲伤，你要紧紧记住我的话，无论在任何条件下，都要孝敬母亲，爱护母亲，听母亲的话！你要保重身体，好好抚养孩子，重建幸福家庭。你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你的快乐，就是我的快乐。

刘谦初与张文秋曾经同在一个监狱中囚禁，因张文秋没有暴露共产党员身份，敌人把她放了。二人在诀别时，张文秋问他：“谦初，你给未出世的孩子取个名字吧！”

“就叫‘牢生’吧，不管是男是女。”

“这是乳名，再取个大名！”张文秋恳求着。

“不管你们流落到哪里，要思念齐鲁，思念故土，就取个‘思齐’吧！”这是刘谦初的最后的声音。1931 年 4 月 5 日，山东军阀韩复榘下令将刘谦初等 21 位同志枪杀了。他牺牲时，年仅 34 岁，连亲生女儿是个什么模样都不知道，思齐当然也就未能见上自己的生身父亲一面。

谈到这些痛苦经历，岸英和思齐就不禁潸然泪下。岸英安慰思齐：“要革命就会有牺牲，你是在娘肚子里跟父母一同坐牢，我是 8 岁时跟妈妈坐牢，亲眼看到刽子手把妈妈押走。”

“我和妈妈跟继父陈振亚（韶华的爸爸，长征干部）还一起坐过新疆盛世才的监牢，一共坐了 4 年，继父陈振亚死在牢里……真不是人过的日子啊！”刘思齐想起这些，就忍不住流泪，岸英把她当作自己的小妹妹一样替她揩眼泪，安慰她。——那是 1946 年岸英回国不久的事。

现在两年过去了，这一根藤上的两个苦瓜，更加心心相印了。

这期间，岸英和思齐接触比较多。她听他讲解放区进行的这场消灭封建剥削制度的伟大斗争，讲他回国后思想上的收获和工作中的体会。她不由得对他产生了一种深深的敬意。不久，她被分去和岸英一道参加了平山县周围农村的土改工作，并且在工作中渐渐地产生了感情。但是，刚开始时，他们的这种感情藏在心底心照不宣，谁也不好意思先开口。这张窗户纸最终还是由邓颖超邓妈妈和康克清康妈妈捅破的，经她们说和，他们建立了亲密的恋爱关系。因为是邓颖超和康克清的介绍人，毛泽东自然就同意了。

本来，毛泽东对刘思齐就是很中意的。但孩子们的事他不好自作主张，只好听其自然。他是非常喜欢思齐的。原来，他和思齐的

父母早在大革命时期就是战友。而他第一次见到刘思齐是在1938年的春节，那年思齐刚8岁。那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当时他和党中央的一些领导人一起，在延安中央党校礼堂观看话剧《弃儿》。剧中，有一个父母都被国民党反动派抓走后，在寒风中追着呼喊着"妈妈！妈妈！"的小女孩。演小女孩的演员把戏演得非常逼真动情，催人泪下，看戏的人都被她感染了，毛泽东也被剧中的小女孩打动了。剧演完了，毛泽东派人把小演员叫到跟前，亲切地抚摸着她的头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呀？""我叫刘思齐"，她在人群中寻找着，终于发现了什么似的，手一指，"那就是爸爸妈妈。"当毛泽东知道，小女孩是战友刘谦初和张文秋的孩子时，表情变得严肃起来，他交待张文秋和思齐的继父陈振亚："这是烈士的后代，我们有责任好好教育她。"毛泽东弯下腰，问思齐："我做你的干爸爸，你做我的干女儿，好不好呀？"思齐羞答答地喊了一声"爸爸"。他第二次再见到刘思齐是在8年以后，思齐已经16岁了，她从新疆军阀盛世才的牢狱中出来不久，继父陈振亚也牺牲了，她随母亲刚刚返回延安。毛泽东到中央党校看望从新疆回来的全体人员。毛泽东看到张文秋，就急切地问："思齐呢？怎么没见到她？"张文秋把思齐拉到他身边，毛泽东高兴地说："七八年不见面，长成大人了，我都认不出来啦！你还是我的干女儿呢，记得吗？"思齐点点头："记得，记得。我常想起你呢。"以后，毛泽东常把思齐接到那里去玩，毛岸英最初见到刘思齐就是那个时候。

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她才是自己理想的儿媳妇呢！

关于岸英与思齐的相识、相爱，刘松林（即思齐）跟我有过一次长谈，现将原话陈述如下：

"我是1946年从新疆盛世才的监狱中放出后，到延安，去毛主

席那里玩，碰上岸英。我那时16岁，岸英24岁，我把他当成大哥哥。双方的印象都不错，我对他的第一个印象是很随和，虽然相差8岁，可是能玩到一块儿。他的中国话讲得很好，不像是从国外回来的。我们小孩子的语言他也懂。

“1948年5月份，毛主席在平山县西柏坡，我去看毛主席，又第二次碰见他。我是下午到的，到了以后，在毛主席那里一起吃了一顿饭。他坐到我那里，给我讲马列主义理论，讲的基本是《实践论》和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从吃饭后，一直讲到11点多，我越听越湖涂，越糊涂他越是往下讲。他对政治、经济很感兴趣，很健谈，很耐心。

“那次，我在那里住了将近一个月，接触比较多，他发现我对理论不感兴趣，便想培养我学习理论的兴趣。我觉得他感情奔放，心地坦白，人也直率。

“以后，关系渐渐改变了。我在山西长治北方大学学习。当时，主席要我从中学读起，岸英也极力劝我从中学读起，要我循序渐进。他希望我起码要把文化学好，在政治、文化上和他一起配合，否则，我们的关系便是空中楼阁。我在主席和岸英的指导下，就从中学课本学起。

“在通信中，他对自己要求很严格。一般说来，男的在女朋友面前都要掩盖自己的缺点，但岸英总是把自己的缺点告诉我，再三要我慎重考虑我们之间的关系。

“有一次，他在信中讲：他给爸爸写信，说他在郝家坡土改，几个月里的收获比从苏联回来几年的收获还大。现在分析，这是一种骄傲情绪。他感觉到，一个人知识越来越多时，越感到自己无能；当一个人越无知时，越以为自己的知识很多，很了不起似的。

“岸英对谈恋爱有他自己的观点：他说，在符合人民利益的情

况下，恋爱是正当的，是可以的；如果违反了人民的利益，妨碍了工作，这种恋爱不管对谁都要拒绝。岸英当时给我来信，他想得很多，很细致，比如，将来的家庭应该是相互以感情为基础，在政治上、生活上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另外，绝对的男女平等是难以做到的，如果他的工作忙一些，他也要把一些家务活推给我。他在信中写道：我也确实不会搞家务。我没有任何特殊感，不能认为自己是毛泽东的儿子，生活上就跟普通人不一样，应该把我当作一个普通翻译来考虑，我也没有什么远大的'野心'，生活水平也不是太高的，一般过得去，我就是这个条件。

"他对学习很认真，很刻苦。他在信中告诉我，在和农村的贫下中农接触时，发现中国的群众语言非常丰富。他说，我有个愿望，要把中国的民间谚语、歇后语，跟俄罗斯的民间语言对照起来，编成小词典、中俄成语词典等，我喜欢这类的工作。至今，我身边还保存着他的两本笔记。"

毛泽东对岸英与思齐谈恋爱，是非常满意的，思齐是烈士后代，又是他的干女儿，人品、相貌都蛮好，只是与岸英年纪差得多一些，其余都还般配。

毛泽东心想，再过三五年，全国解放了，岸英与思齐结为伉俪，是再好没有的一对小夫妻了。

可是，他却忽略了年轻人的心理、生理要求。岸英要马上结婚，从而，导致了岸英和他的这次矛盾冲突。

现在好了，很顺利，没费什么口舌，父亲就同意了他们结婚的要求。

在异国时，他曾有过一段浪漫的经历。但是，他的这段经历如果借用两句当今比较时髦的话来说，其一是：初恋时，他们并不懂得爱情；其二是，两颗分别为东西文化传统薰陶的心灵，不可能撞击出真正的爱情火花。

按说，照岸英这个年龄，不要说在40年代，就是搁在现在——计划生育、晚婚晚育被当作一项基本国策而坚决地、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的今天，要是结婚的话也算是晚婚了。当然，现在两个人中，有一方不够法定的年龄也是不能结婚的。人们要问，在那个年代十八九岁就成家立业，生儿育女是普遍的现象，为什么他却拖到二十七八岁时才解决这个问题？难道真的一门心思想当政治家、军事家而把个人的事忘在九霄云外了，置之于不顾了呢？还是他在遇到刘思齐以前没有一个能看得上的呢？这也确实是个问题。无情未必真豪杰，按道理讲，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一个共产党员，绝不是清教徒，正相反，他们也都是有血有肉，有爱有情的活生生的人。所不同的，他们追求的是一种高尚的、建立在共同的事业上和共同的思想基础上的感情。在这方面，可以找出很多很多例子。所以，为了寻找一个真正的、实实在在的岸英，我便带着这样的疑问，在收集他的材料的过程中，有意识地询问过一些与他交往很久、很深的、相当知心的、对他也相当了解的人，他们也为我讲述过一些事情。

原来，毛岸英在苏联生活学习期间，也有过一段浪漫的经历，而且是有“洋”味的。

这还得从郭志成说起。

第二国际儿童院迁到伊万诺沃城与第一国际儿童院合并后，中国孩子们才真正生活在国际儿童们中间。不久毛岸英担任了儿童院的共青团支部书记，这一年他满18岁。郭志成比岸英小3岁，已经15岁，担任了儿童院儿童委员会主席(即苏维埃主席)。

两个儿童院合并后，事情就多起来，不像在第二国际儿童院时，清一色的中国孩子，比较单一，好管理。合并后，各国的民族性格、风俗习惯都不同。中国孩子都是革命家的后代，受父母和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比较听话。当然，调皮鬼也有那么几个。那些来自其他国家的孩子们，就个性很强，不听话，调皮捣蛋，不服从管理，常常触犯纪律，弄得大家都不得安宁。比如有位巴西女孩，就最使院长和老师头疼。她年龄比其他孩子大些，是孩子王，很有一股子不把儿童院闹翻天，决不罢休的劲头，老院长感到十分恼火，但无法可施，只好养而不教了。毛岸青也是个调皮角色，在与各国的孩子们相处中，各方面都不习惯，常跟其他国家的孩子发生纠纷，害得副院长师哲经常向苏联院长道歉，如此等等。这就给毛岸英、郭志成等小领导出了很多难题，带来了很多麻烦。批评、教育、帮助等各种以往在中国孩子中间行之有效的办法在这里都失去了效力，做了很多工作都收效甚微。

然而，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很快他们便发现，在中国孩子中间不能实行的也不愿实行的惩罚的办法，有时还管点用。有的孩子虽然用说服的办法他不听，可是，“命令”他去做什么，尽管他还是捣蛋，但是，命令还是“执行”的，这可能也是各自的特点，有些人能自觉服从；有的人就得强迫才服从。

于是，身为儿童们的行政领导的郭志成，在征得了老师的认可下，开始实行一种新的管理办法：谁调皮捣蛋，谁就会得到一个任务——削土豆皮。这是一种带有强制和惩罚性的劳动。

土豆（马铃薯）是俄国人餐桌上的主菜，也是他们喜欢吃的食物，顿顿都少不了。可是，麻烦的是必须要一个个地削皮。家里吃土豆数量有限，几口人总共吃不了几个，所以削皮还不算是什么太沉重的负担。然而，儿童院里有200多个孩子，都要在餐厅吃饭，一顿饭所用的土豆数量也是可观的了。别看削土豆皮并不累，坐在那里，一个一个削，挺轻松的，其实，这是一种非常磨人的活。郭志成根据调皮鬼们犯错误的大小，便指定他削一盆或是一筐土豆，必须削完，保质保量，削完了才能去活动，如果削不完就不许去休息，不许吃饭，不许睡觉。被罚的调皮鬼坐在那里削着土豆皮，眼巴巴地看着其他孩子们高高兴兴地去打球啦，跳舞啦，去旅行啦……心里多难受呀！可是，完不成任务，儿童委员会主席有权对你不客气，加重处罚。

有时，有人成心磨蹭不好好削皮，结果是把整个周末的时间都搭上用来干活。因而，那些个性更强一点的、胆子大的人就骂郭志成。

有一天，一位受惩罚者实在受不住了，便画了一张漫画——画中人长着个大脑袋，灯泡似的双眼，鼻子是两大空洞，嘴巴弯弯的像香蕉，牙齿是一格一格的，像口琴，手和腿却画得像柴火棍……这是孩子对“专政”的反抗。这幅画被贴在最为显眼的餐厅门口，吃饭的时候人来人往的，吸引了不少人观看。看着这幅丑陋的人像，人们小声议论着，讥笑着。更有一位被罚削过土豆皮的巴西籍女孩子叶琳娜，胆子尤其的大，她竟然当众在漫画上用俄文写了一行字：“弗拉季米尔·大保”——郭志成的俄语名字。

被羞辱了的郭志成，真的气坏了，他气势汹汹地要找那位“漫画家”和叶琳娜算帐。

岸英得知此事后，立即找郭志成交换了意见，劝他不要把事情搞大了，还指出了他的工作方式上的问题。接着，他又找到“漫画家”，严肃地批评了他的这种做法，直说得他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事后，他便到食堂撕下了他那张“杰作”。岸英做人的工作还挺有门道，主要的是他处处以身作则而且待人公道，在孩子们中间威信很高的缘故。

至于那位巴西女士，倒是主动找上门向岸英认错的。

她的俄语名字叫叶琳娜，是巴西共产党负责人的侄女儿，比岸英小两岁。由于乍一看，那些外国女孩子模样似乎都一样，金发碧眼的，只有共性，很难区分出个性，所以，岸英对她并没有太多的印象。那天，叶琳娜走到岸英的房间，说是认错，只不过是简单地说了几句。不知怎的，在男孩子面前善于言辞做思想工作的他，在女孩子面前倒显得矜持起来了。那种严肃认真的话本来也没有多少说的，可是，当说到画郭志成的那幅漫画时，俩人倒是好好地“评论”了一番，乐得他们开心得笑出了眼泪，连肚皮都笑疼了。

谈笑了一阵之后，叶琳娜话头一转，指着兄弟俩人的床铺说：“瞧瞧，你们这些男孩子，都是那么不注意整洁，窝窝囊囊的不修边幅。在这么乱的房间待客，是不礼貌的。”

说着就主动去叠被子，整理屋子，动作轻盈敏捷。她的这番话和她的行动，一时弄得岸英不好意思起来。猛然，他好像醒悟了过来，赶忙去抢叶琳娜手里的东西，无意之中，他抓住了她那双纤细的、柔软的手，一时间，他好像有一股电流一样的感觉涌遍全身，脸腾的一下红了起来，呼吸也急促了……

“书记同志，怎么你的脸红啦！”叶琳娜却大大方方，一副满不

在乎的样子调侃地故意问着。

岸英慌忙把抓着的小手松开，尴尬极了，脸涨得通红，平时那副领导的劲不知哪去了，支支吾吾地说："没什么，没什么，对不起！我、我……"还没说完，就忙着低头收拾起房间来。其实，在西方，这样的事是非常普通、平常的，长辈对晚辈，兄弟姐妹、朋友同事之间，经常用亲吻、拥抱之类的动作，表示礼貌的问候、祝愿、告别等等，根本用不着那么紧张。然而，中国的传统观念中，男女是授受不亲的，它影响着人们，禁锢着人们的行为，除非是亲爱者。

房间很快便清理完了。可岸英还没有从刚才那种惊心动魄的境遇中解脱出来，而叶琳娜可能并不知道，为什么一件小事竟使这位"领导"那样窘迫，她很莫明其妙。于是，刚才两人还谈得很开心，现在却出现了一段冷场。然而，岸英毕竟是见过一些世面的，况且在苏联生活了4年多的时间。他稳定了一下情绪，便主动打破僵局，说："叶琳娜，你给我讲讲你的祖国，你的家乡好吗？"

叶琳娜没作正面回答，而是问："谢廖沙，有咖啡吗？"岸英连忙起身去找咖啡。

那时候，苏德战争还未爆发，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很高，而对于国际儿童院的孩子，生活条件比一般苏联公民还要优裕些，所以，房间里的咖啡、牛奶、糖果糕点之类还是常备的。

"谢廖沙，我来煮咖啡！"叶琳娜边说边干，如数家珍地谈起了她的祖国。"谢廖沙，你知道吗？我们巴西素有咖啡王国之称，是世界上最大的咖啡消费国之一，我们每个家庭都有天天喝咖啡的习惯。在巴西利亚城，街头的咖啡摊到处都是。在各银行、旅行社、航空公司和政府机关的办公室里都免费供应咖啡，工间休息称为喝咖啡时间。给人小费时，也要说一句：用这钱喝杯咖啡吧！巴西人喝咖啡还挺有讲究的，当客人进门来访时，主人总是向客人献上一

杯热气腾腾的咖啡，表示对客人的欢迎。作为客人，一定要把咖啡喝完，表示对主人的尊敬，要不然，主人会不高兴的，以为客人瞧不起他。相反的，如果主人不向客人献咖啡，这就表示主人对来者态度的冷淡。"

"啊唷，我刚才没给你献咖啡，你不见外吧！"岸英说笑着，看叶琳娜娴熟地煮着咖啡。叶琳娜端给岸英一杯热气腾腾、香味扑鼻的咖啡，莞尔一笑，两腮显示出两个"酒窝"，"尊敬的书记同志，请您用咖啡！"

"嘿，还有这许多规矩？在我们中国，也有这种礼节，那就是喝茶。"岸英兴致勃勃地说。此刻，他才认真地打量着叶琳娜。只见她的个头几乎跟岸英差不多高，胸脯高高的，穿上高跟鞋，全身变成了一个"S"形，充满了少女青春的魅力。她的脸真像洋娃娃那样可爱，一双眼睛蓝得可爱，一头金发带着卷儿，皮肤白里透红，尤其是那两个酒窝，使她更显得姣媚动人，天真烂漫。

岸英久久地凝视着她，而当叶琳娜深情的双眸带着微笑，大胆地盯视他时，他羞怯地低下头来。

二人沉默了片刻，都在想新话题。

"叶琳娜，由你的名字，我想起了刚刚读完的俄国大作家屠格涅夫的名著《前夜》，你读过吗？"叶琳娜摇摇头，岸英继续说："屠格涅夫笔下的叶琳娜·尼古拉叶夫娜，是典型的俄国少女。她爱上了保加利亚革命者英沙罗夫，为了爱情，她跟英沙罗夫一同去保加利亚。太美了，太动人了。"岸英赞叹不已，找出俄文版的《前夜》，递给叶琳娜，"叶琳娜，我希望你看一看。"

叶琳娜是个聪明过人的姑娘，岸英的一席话，引出了她的一连串问话：

"谢廖沙，要知道，你我现在都在苏联呀！我们满18岁的那天，

都会加入苏联国籍呢！你是不是想当英沙罗夫，也找个俄国姑娘？”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经叶琳娜这么一问，岸英猛然醒悟到，此时此刻他讲的这番话会使人家产生什么样的联想。他讲的时候可没想到那么多，只是为刚读完这部小说，为小说主人公的事迹所感染而已，谁想到叶琳娜这样追问起来。岸英连续摇头：“叶琳娜，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你的名字叫叶琳娜，你长得又很像屠格涅夫笔下的叶琳娜……我，我已满了 18 岁，可是，我并没有加入苏联国籍，我还要回祖国去！”他越是想表白，想解释清楚，越是漏洞百出。

“当中国的英沙罗夫！”叶琳娜格格地笑起来，“谁是你的叶琳娜呀？”姑娘真有些咄咄逼人，这回是听者无心，问者有意了。早在两个儿童院合并的时候起，叶琳娜看到岸英，就对这位高个子、魁伟、而富有个性的中国男子汉很有兴趣了，背地里找中国姑娘打听过他的身世，他的父母、他的……

自从这次叶琳娜找“书记同志”承认错误的谈话后，也使岸英那颗青春勃发的心灵中，注入了一种莫明其妙的感受……

从此以后，叶琳娜常到岸英卧室拜访、聊天。周末的傍晚，他俩常肩并肩在儿童院长满青草的池塘边，在白桦林荫道上漫步，且越来越情意绵绵。岸英谈得多的是他的理想——政治军事家。可是，叶琳娜这位情窦初开的少女，对政治并不感兴趣，因为政治，她的一家遭劫，如今孤单一人来到离祖国万里之遥的苏联。她需要的是温情脉脉，是情话絮絮，甚至是热烈的拥抱亲吻。巴西每年一度的狂欢节，是世界闻名的，那几天，即使男女青年有些出格，也不会有人怪罪的。在那里，有这样的习惯。

然而，岸英却顾虑重重，一是作为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的长

子，父亲会怎样看这样的事，他一点不知道；二是儿童院团支部书记，他又要照顾到形象；加上中国的传统习惯的影响，他是浪漫不起来的。然而，这个已经发育成熟的身强力壮的青年，他的内心是躁动不安的，对异性充满了渴望。如今，一个美丽的南美洲姑娘就在身边，而且倾心于自己，他又怎能不动心？矛盾！苦恼！他处在无法解脱的感情纠葛之中。他是个意志坚强的人，即使是感情困绕着自己，他还是要努力克制自己，故没想进一步发展到要谈恋爱，更不愿想后果将会如何。可是，他喜欢她，她也爱跟他在一起，二人心心相印，心照不宣。岸英没有话题了，就又扯上《前夜》中的叶琳娜。

"谢廖沙，你又在纸上谈兵，如果你是英沙罗夫，你有勇气带回一个叶琳娜·尼古拉叶夫娜到中国去吗？"叶琳娜似乎看出了岸英的心思，充满深情的直盯着他。

岸英羞怯地低下头，看着脚下的青草，讷讷地说："叶琳娜，别问这些，我们都还年轻，中学还没毕业呢！"他的潜台词是：我还要回国，还不知父亲的意见……

其实，岸英是个富有诗人气质的幻想型人物，当他一个人在房间里写日记或躺在床上想念回味与叶琳娜接触时的情景的时候，脑子里真是翻江倒海，玫瑰色的彩云在脑海中飘舞翻腾。可是，当他真的面对心上人时，他又显得那么木讷、可怜、可笑。日记上写的，脑子里转的，突然成了一片空白，尤其是要表露个人感情时，他就变成了哑巴。

俄国大诗人普希金有句名言：

"我们对女人的爱越淡泊，她们对我们的爱便越温柔。"

眼下，岸英和叶琳娜正处在这个阶段。岸英越是淡泊，叶琳娜越是温柔。是不是想用"情"来感化、帮助岸英战胜顾虑？她去岸英

卧室的时候更多了，她占据了岸英的周末时间。有一次，这位感情难以抑制的巴西少女，在密林里与岸英散步时，出其不意，竟感情冲动地用双手勾起岸英的粗壮的颈脖，把毫无思想准备的岸英吓了一跳。叶琳娜的身体紧贴在他的身上，他未敢张开嘴巴迎上去，但她那温暖柔软丰腴的身体刺激着他，那软绵绵的富有弹性的乳房，却像电源一般震得他好像要失去知觉，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呼吸似乎停止了，血液好像停止了流动，周围的空气、时间都像凝固住了，他呆呆地僵立在那里……突然，他回过神来，很快的，他又恢复了理智，用双手轻轻地推开了叶琳娜……

叶琳娜受了委屈似的嘤嘤啜泣起来，把岸英弄得手足无措，也不知怎么安抚她才好，一个人在月光下的树林里转来转去。后来，聪敏的叶琳娜问岸英：

"你们中国有句成语，叫'叶公好龙'，你给我讲讲好吗？"

"这很简单，古时候，中国有个姓叶的老人，他非常喜欢龙，他家里到处都是他画的龙，他爱龙之心感动了真正的龙。有一天，天上的龙真的下凡，来到他的府上，叶公看见那张牙舞爪的真龙，吓得半死，连忙哀求那龙：你快走吧，我不要你，我怕你……。"聪明的岸英知道她问的目的。这不是很明显吗？叶琳娜在责备他呢！可是他还是认真地向她讲着，是在向她表白自己？是在自我解剖？还是在自我嘲笑？还是……

"嘿，你就是那个叶公！"叶琳娜毫不留情地一语道破。她愠怒地甩下这句话后，便匆匆转身走了……

树林里留下岸英高大的、孤单的身影。

从此，岸英与叶琳娜的关系，成了普希金那句名言的反义：

我们对女人的爱越热烈，她们对我们的爱便越冷淡。

姑娘不喜欢温吞水。爱情，在关键时刻要撞击出火花，要你勇

取地去拼搏、夺取；女人喜欢闪电和雷鸣，她们厌烦纸上谈兵，千万句甜言蜜语，抵不上十秒钟的双眸凝视，或一个狂吻……

哦，甜蜜的是爱情，折磨人的也是爱情！岸英尝到了初恋的激悦和苦涩……

此后，岸英那卧室没有了叶琳娜的倩影，她到是常跟一个欧洲的小伙子在一起散步。

苏德战争爆发以后，苏联处于战争体制，一切优厚的生活供应都中断了。不仅如此，还规定儿童院的每一个人，大人、小孩都要为前线服务。

那时的口号是：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斯大林。前线非常紧张。1941 年冬天，气温在零下 40 度，冻得人真受不了。儿童院组织女孩子参加护士队，到医院做护理伤兵的工作。男孩子挖防空壕和反坦克壕。人们还领到了武器。天，又冷又下雪，真像奥斯特洛夫斯基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中描写筑路的那段情景。人们又冷又累，还吃不饱，手指头都冻裂了。

最艰苦的是伐木，男孩每人每天 3 立方米，女孩每人每天 2.5 立方米。儿童院的孩子们编成班排，由岸英带队，到 20 公里以外的森林地区砍伐树木。他们在林中空地上搭起帐篷，晚上就住在帐篷里，上边下着雪，地下铺些草，就睡在上边，冷得要命。环境变得既残酷又艰苦。

松树林里的松树有十几、二十几米高，又粗又大，得先用斧头在树根部砍一个豁口，再用锯子锯，然后放倒。大树放倒后，再截成一段段的，然后用斧头劈成长条状的能烧火的劈柴，垒起来。那时，岸英不但拼命完成自己的任务，还帮那些体力弱的女孩的忙，更多的还悄悄地帮叶琳娜伐木、锯树、劈柴。是在弥补着什么？……不管怎样说，他是在用中国男子汉的那种方式，默默地把那份初恋的

激动的心献给叶琳娜。但是，这一切都只能暗暗地做，他怕中国的女孩子嫉妒，说风凉话。他采用的完全是中国式的恋爱方式，深深地爱着叶琳娜，在生活中和劳动时，有意识地照顾她，替她干重活儿。然而，叶琳娜不是中国姑娘，她有她的想法，她喜欢的是另一种感情撞击方式。

如今全倒过来了，叶琳娜变得冷若冰霜，而越是这样，岸英却越发爱她，从心底里喜欢她。偶然有机会单独在一起，他谈到苏德战争的进展，谈到第二祖国苏联时，眉飞色舞。然而，一旦接触到两人之间的情感问题，他就又慌了手脚，准备了许久的话，烟消云散。每每到此，他都责怪自己太无能，将来准是个讨不到老婆的家伙。

那次在密林中岸英的表现，深深刺伤了叶琳娜的心，加上巴西的思想观念和感情情调，与中国完全不同，所以，有一次叶琳娜挖苦地说："你们中国的夫子多得很，老夫子、小夫子，你也会变成一个谢廖沙夫子呢！"虽是打趣，可是当中透着认真。他只好无可奈何地耸耸肩。

叶琳娜不愿来了，岸英也不好意思去。在感情上他是个内向的人，俩人之间缺少了沟通。于是，岸英又使起中国的传统法宝——写信，不知能不能称之为情书。他的好友蔡博，便成了他的信使，蔡博跟叶琳娜在伊万诺沃市同一座学校，同一个班级。

毛岸英的第一封情书送到叶琳娜手中，她读了满脸飞霞，那种少女的虚荣心、自豪感、夸耀感一起涌上心头。这也许又是传统的不同，在中国这样的事，隐藏着还怕露出风声呢，她却把这件事当作一件非常得意的事加以炫耀，竟当着班上的同学，把这件事讲了出来："瞧，谢廖沙写信向我求爱呢！"

这对岸英真是个沉重的打击，这种事怎能大张旗鼓地公开宣扬呢？他又退缩了。没过多久，他又后悔起来，责怪自己又错过了

良机。他不怨恨叶琳娜，又写了封长信，向她陪礼道歉。蔡博再次当了信使，这回，叶琳娜沉静了，只悄悄地骂了一句："谢廖沙，这个冒失鬼！"看来，还会有所转机的……

然而，好事难成。就在这种微妙的发展中，岸英这位事业型的青年没有读完中学，便坚决请求去学军事，后来又参加苏军，打到东欧战场，战争结束前夕才回到莫斯科。从军这几年间，岸英一直惦念着叶琳娜，虽"鸿雁传书"，不知倾注了多少真情，但是，不是相处在一起，彼此，渐渐地疏远了。战后，岸英考上了莫斯科的东方语言学院，叶琳娜也在莫斯科读大学，然而，俩人的关系并没有任何转机。

1945 年冬，岸英要秘密回国了。

回国前，他心潮澎湃，思绪万千，在忙于向老师、同学告别之中，他花了半个夜晚，给叶琳娜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希望叶琳娜像《前夜》中的叶琳娜·尼古拉叶夫娜一样，勇敢地跟随他——中国的英沙罗夫，去参加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事业。他的心房深处呼喊着：叶琳娜，我爱你！

当然，信使又是他的挚友蔡博。

当叶琳娜接到岸英的信时，是怎么想的就不得而知了；她是否知道岸英要回国了，也不清楚；她愿不愿意作屠格涅夫笔下的那个叶琳娜，也不知道……岸英很快地走了，以后再也没有有关他在这方面的材料。他被拒绝了？还是他走得匆忙没接到她的回音……都不得而知。

然而，从事实上看，好事难成。对岸英来说，没成好呢？还是成了好呢……总的来讲，在这件事情中，各种各样不利的因素太多了，结局也只能如此了。

中国有句俗话，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岸英把爸爸同意他们结婚而且就定在10月15日的消息告诉思齐的时候，俩人都非常高兴。因为，他们的小家庭生活几乎是和共和国同步开始的，这是多么富有纪念意义的事情呀！俩人兴奋地憧憬着婚后的幸福生活……突然，他们想到离结婚的日子还仅仅有几天了。“结婚”说是容易，真要办起来真是千头万绪，即使再简单的操办，必要的事情也得要准备呀！什么铺的、盖的、穿的、用的、吃的、住的，样样都得有呀。终归要建立一个新家庭嘛。

爸爸不是有言在先了，“我的事情多，一切要靠你们自己操办。”那是当然了，就是爸爸要管，我们也不能让他为我们的事操心啊，要知道他是共和国的主席呀！有多少国家大事在等着他干！要是妈妈在就好了。不用说别的，看到儿子长大成人了，又有那么好的一位儿媳妇，单凭这一点，她老人家就会乐得合不上嘴的，结婚的事还用得着儿女们自己动手，她早会操办得井井有条了。……可是，妈妈已经牺牲快20年了……

要是贺妈妈在也好呀！在苏联的时候，她是多么地关心我们兄弟俩呀，就像自己的亲生母亲一样……办婚事贺妈妈肯定会全力为我们操心的……然而，这也是不可能的了，她再也不会回到我们的生活中间来了……

还有她，她是不会管的，这件事也没有向她说过。自从那次起，他对她的喜怒无常、凶悍泼辣的样子非常反感。要说，他刚回国那阵子，她对他曾是满关心的……

岸英从苏联回国时，除了带回一套西装外，其余的衣物都留给岸青了。在延安，“洋服”穿不得了，平时穿的是公家发的土布衣服、粗布袜子、土布圆口鞋。

当时，延安的物质生活很紧张，因此，每个人都要参加生产劳动，口号是“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纺纱、织布、织毛衣毛袜等工作是女同志经常做的。江青是从上海来的，她会织各种式样、各种图案的毛衣。她给毛泽东织。岸英从苏联回国后，她也给他织过毛衣、毛背心。

可是岸英有一个“毛病”，就是在生活上大大咧咧，马马虎虎，而且非常豪气大方。这可能是在上海滩过流浪生活，与一帮无家可归的穷苦孩子长期生活中养成的习惯。要是看到谁没有裤子穿，他宁可自己打赤腿，也要脱下自己的裤子送给他。他心目中没什么你的、我的概念，抱定了有苦同受、有福同享的信念。他就是这种性格的汉子。没过多久，江青给他织的毛衣什么的，都送给了陕北老乡了。为此，江青也好意地埋怨过他，但对他这种行为也真没办法。

在延安时，中央机关经常组织干部参加义务劳动，像修公路、修窑洞、开荒、收庄稼……凡是在这种场合，岸英总是把外衣一脱，浑身的肌肉鼓鼓的，满是劲，干得非常卖力气。在休息时，岸英又充分展示他的风趣、幽默的特长，常常讲一些使人捧腹大笑的事，而他却一本正经的一点也不笑。因此，凡是义务劳动时，只要有他这位活跃人物在场，大家的活干得又多又快又好，而且还不感到累。所以，岸英吸引了不少女青年，尤其是那些刚从国统区来的女学生，最愿意和他一起干活了。因为，劳动时有力气大的岸英照顾；休息时，有岸英讲逗乐的故事，消除疲劳。有时，岸英也爱搞些恶作剧，抓条虫子什么的，吓唬吓唬这些小姐们，使这些小姐们又哭又笑的，直骂岸英“该死”。然而大家还是愿意和他在一起。

有一天，江青带了一件米黄色的毛线衣，送给岸英说："岸英呀，这回可不能慷慨送人了。"

岸英感激地笑道："自己穿，自己穿，谢谢你啦！"

"你别谢我，应该谢谢傅小姐——小傅。这是人家拆了自己的毛衣，专心替你打的呢。你看这针脚、针法、花式，要多美有多美。"江青故意卖了个关子说，"这位傅小姐，人也长得美，典型的东方美人。"

毛岸英一愣："哪个傅小姐？"

"你见过她，你们在一起修过公路，听她说，有一次她的手划破了皮，还是你替她包扎的呢！"

岸英仰起头，若有所思地"哦"了一声："想起来了，有那么回事。这女孩子太矜持了。"

"岸英，未婚姑娘就要这份矜持，这是拿钱买不到的魅力呀！对于女人，我比你懂。"

"岸英呀，今年你可是二十四五岁的大小伙子了，俗话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你看看陕北的小伙子，在你这个年纪，早就当爸爸了。你有满意的人儿，也可谈谈了。"

"我刚回国，什么都不懂，先学习学习吧！"

"学习跟恋爱结婚并无矛盾呀！如果你对傅小姐比较中意，我可以当个红娘，怎么样？"

岸英被江青说得满脸飞红，他心里很激动，也很感激，没有吭气。江青看到岸英这个表情，也就明白了三四分。

一个风和日丽、春光明艳的星期天，江青约了小傅和岸英，同游宝塔山，江青撮合了一下，替他们两个人稍作介绍后，便借机溜开了。其实他们并不是第一次见面，只不过俩人单独在一起是头一回。

岸英陪着小傅在小树林里转悠。

陕北的春天姗姗来迟，远处的山，还是光秃秃的一片，仔细看去，近处的山坡上，茅草悄悄地钻出嫩芽，土黄色开始让位给浅浅的淡绿了。

太阳晒在身上暖融融地，岸英心里紧张，自然感到有些燥热，更像有千百个蚂蚁在背上爬，他脱下老羊皮袄，露出米黄色的毛衣。两人沉默地踱了很久，可以说是两个互不了解的人，初次单独见面，又是为了终身大事，更不知从何讲起。还是小傅主动，看见岸英身上的米黄色毛衣，便打开了话匣子。

“岸英同志，这件毛衣还合身吗？”

“谢谢你，再合身没有了，而且，式样也好，同志们都羡慕呢！”岸英心情激越，能得到一个姑娘的温情，心里当然是甜酥酥的。话只要开了头，也就渐渐地多起来了。这时，岸英才仔细打量了她，觉得的确长得标致，面庞清秀，高高的鼻梁，双眼很能传神，确实美丽出众。她身材苗条，虽然比他矮，但比一般女青年要高很多。此时的她，一扫平时在公众面前的拘谨样，倒显得很热情、大方。

第一次约会，自然不会深谈什么，但彼此都给对方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从此，他俩常在一起漫步。岸英的节假日也充实起来，一想起小傅，岸英浑身便充满了活力。江青也暗自欣喜。

岸英与傅小姐来往多了些，归根结蒂要谈到未来，谈到结婚，建立小家庭之类。而对此，岸英是没有把握的，拿不准。他一来担心，傅小姐也许因为他是中共领袖毛泽东的儿子，才看上他。然而，共产党讲求的是吃苦、奋斗、牺牲，傅小姐能接受这些吗？能吃得这个苦吗？第二条吃不准的是父亲的态度。与叶琳娜相处时的顾虑又泛了起来。在重大问题上，他是尊重最崇敬的父亲的。当然，这

并不全是由于父亲是党的领袖的缘故。他确实由衷地信服父亲的。他处在难以解脱的矛盾状态中。

所以，岸英在与傅小姐的接触中，总是忐忑不安，这瞒不了聪慧的傅小姐。有一次，她开门见山地问："岸英，我们的事情，如果你父亲不同意，你有勇气坚持到底吗？"

这句话像重型炮弹，击中了岸英的要害，他面有难色地低下头，不置可否。

"好吧，你既然不能回答这个基本的问题，那还是问清楚了再谈。"傅小姐很有一些伤感。

一天，江青碰见岸英，诡谲地笑问道："岸英，进展如何？傅小姐可是百里挑一，千里挑一的姑娘呀，你得抓紧点儿，要给姑娘多些温情，不要见了面老是谈打仗、谈理想、谈读书，能使姑娘动情的话也要说说哩！"

岸英无可奈何地摇摇头，不吭气。

"怎么啦？吹啦？"江青比岸英还紧迫。

"没，没吹，只是这件事我拿不定主意。"

"咋？你不喜欢傅小姐？她的品貌跟你都很般配呀！"

"我是喜欢她的，她对我也好，只是，我爸爸有这个意思吗？"岸英涨红了脸，跟江青吐露心思。

听到这里，江青爽朗地大笑道："嘿，原来是为这个发愁。只要你同意，他那里我说一声准行。"

江青兴冲冲地跑回家里，先是倒茶，又给他点烟，显得十分热情，关怀体贴。

看见毛泽东正在一张大地图面前发愣，就笑眯眯地说："你也该休息一会儿了，咱俩拉拉家常。"

毛泽东终于从地图上收回视线，盯着江青问："么子家常？看你

喜滋滋的，怕不是胡宗南不敢进攻延安了吧？”

“哎呀，讲的是家常，当然不是国家大事，是我们家的大事。”江青按着毛泽东的双肩，要他坐在藤椅上歇一会儿，听她讲。

“我说呀，我们家岸英今年也有二十三四岁了吧？”

毛泽东马上纠正道：“到今年的秋天，满25岁，你问这个干么子？”

江青说：“是么，都25岁的大小伙子了，他的婚姻大事你也不关心关心，成天忙着指挥打仗。”接着，江青信心十足地把岸英与傅小姐相识的事和盘托出，期盼着毛泽东一锤定音。

毛泽东猛吸了一口烟，从藤椅上站起，在屋里转了一圈，又把双目盯视着那张大地图，不吭气。

江青熟知毛泽东的脾气，他不同意的事，不会截然回绝，而是讲典故，打比方，绕着弯子，让你自己“撤退”。

江青并不甘心，讲起傅小姐，她眉飞色舞，论文才，人家是北平的大学生，能从优越的书香门第家庭出来奔向延安，就说明她的思想觉悟高；论品貌，不仅在延安是数第一，就是在上海滩上，也是佼佼者，人家对岸英也很主动……。

待江青絮絮叨叨地讲完，毛泽东却泼了一瓢冷水：“就这些？——见了几面就定终身，也太轻率了吧？岸英这孩子年轻，沉不住气，怎么你也沉不住气？”毛泽东对江青办的一些事情，总不太放心，江青的话，他时常打折扣来听。“你要岸英到我这儿来一下吧！”

江青见了岸英，没有将毛泽东的原话转告岸英，还是一股劲地给他打气说：“你爸叫你去哩，有门儿，现在恋爱自由，主要看你们双方，只要你坚决一些，你爸也不会阻挡的，去吧，快去吧！”

岸英忐忑不安地进了毛泽东那简陋的住房，问了问父亲的饮

食起居，要父亲注意身体之类的话。

毛泽东告诉岸英，胡宗南要进攻延安了，工作千头万绪呀！你也不能浮在上面，要下去到斗争的第一线去磨练……

岸英知道父亲的心意，那件事到了嘴边也不好启齿。

还是老子先开口："听说你结识了一个姑娘，北平来的。"未等他讲完，岸英先入为主的说："我觉得人还挺不错，长的也漂亮，又有文化……。"

毛泽东早看透儿子的心，他笑着幽默地说："当然了，不漂亮不聪敏，你也不会动心，这一条我理解，你也二十四五岁的大小伙子了，共产党人不是禁欲主义者。不过，见了漂亮的都动心，这一条我就不敢理解你了。"

毛泽东换了严肃的口吻："除了漂亮，有文化，你还了解她些什么呢？理想、品德、性格，你了解吗？她刚刚从北平来，她的家庭出身、社会关系，个人品质，我们都不甚了了。岸英，婚姻对你来讲，不，对每个人来讲，都是终身大事，既是终身大事，也关系着我们的革命事业。因为你是我毛泽东的儿子呢，这件事，一定要慎重，不能轻率从事。现在你还年轻，刚回国才一年，眼前正赶上胡宗南举兵进攻延安城，千头万绪呀！岸英，爸爸是过来人，时间是考验爱情的试金石，你们不要急于定终身，双方再处处，多方面了解了解，你看要得啵？"做父亲的，并没有否定这件事，而且态度是讲道理的，语重心长的……

岸英虽然心头不悦，可是，冷静下来，细嚼爸爸的话，还是有道理的，那就再让时间来"考验考验"与傅小姐的感情吧！

不久，延安成了胡宗南的天下。岸英东渡黄河，到艰苦的山西临县郝家坡搞土改。那位傅小姐据说吃不了苦，脱离了革命队伍，又回到北平，并且在报上发表文章攻击共产党。

岸英的这段恋爱，也就到此结束了。既然不是同一志向的人，那位傅小姐形象，便很快从他的脑海中消失的无影无踪。

后来毛泽东对岸英说："看来漂亮靠不住，还得靠理想。"

江青保媒未成功，加上又受到毛泽东的一通批评，以后对岸英的事自然就不会热心了。

他们的婚礼是简朴的，唯一的排场是父亲掏钱请的一桌简简单单的酒席。然而可以说，他们的婚礼又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格最高的婚礼，舷来的中央领导人都来了……

要说准备结婚，俩人几乎一无所有。新房是社会部的宿舍；房子里的摆设——床铺、桌子、椅子是向公家借的；就是那两床薄被，是属于他们的个人财产，岸英的那条是供给制，由公家发的统一规格的被子，另一条是思齐带过来的嫁妆；那对枕头，只有枕套没有枕芯，岸英和思齐就把暂时不穿的衣服填在里边，变成一对又软又暖和的枕头，这和部队中的战士们的作法是一样的。

基本安排就绪后，岸英和思齐把筹备结婚的情况跟父亲讲了。毛泽东非常高兴地说："好啊，这是喜上加喜，应该艰苦朴素。可是，结婚是你们一辈子的大事啊，我请你们吃顿饭，你们想请谁就请谁。岸英你跟思齐的妈妈说说，现在是供给制，她也不要花钱买东西了。她想请谁来，都可以，来吃顿饭。"

其实，岸英和思齐早就拟了一份名单，他马上递给父亲："爸

爸，你看看，有没有遗漏的？”

毛泽东翻了翻，看看名单，思考了一会儿说：“大体上都齐了。只是，你们只请邓妈妈不行，请了邓妈妈，还应该请恩来；请了蔡妈妈，还应该请李富春；请了康妈妈，还应该请总司令；请了谢（觉哉）老，还应该请王定国；请了陈瑾昆，还应该请梁淑华，还有少奇和光美同志也要请。弼时同志有病住在玉泉山休息，就不要麻烦他了。婚事简办，我完全赞同，就是应该改一下旧习嘛！”

岸英和思齐根据父亲的意见，一下子跑到周伯伯家，一下子跑到了朱老总家，总是笑容满面。被邀请的长辈们也是又祝贺，又嘱咐，他们是看着岸英和思齐长大的啊！

1949年10月15日，是个秋高气爽的大好晴天。

岸英思齐的婚礼在中南海举行。

岸英一身标准制服，是他给李克农当翻译会见外宾时穿的“礼服”，倒也风度翩翩；思齐的上衣是灯芯绒布做的，裤子半新不旧，方口布鞋是新买的，两条油黑的长辫，加上两只水汪汪的大眼睛，把这山东姑娘衬托得确实若人喜爱。

“真是天生的一对！”大家纷纷地由衷赞美岸英和思齐。

晚上，伯伯叔叔妈妈阿姨们，都手持礼品，笑盈盈地来到了中南海菊香书屋的西屋里，互相交看带来的小纪念品，蔡畅和康克清送的是一对绣花枕头套……大家既向一对新人祝福，祝他们今后的生活美满幸福，又向毛泽东祝贺，祝贺他有这么一个好儿子，又有了一个好儿媳。婚礼充满了和谐、喜庆的气氛。

毛泽东自己掏钱，请了一桌酒席。大家济济一堂，笑语连珠。毛泽东也掩饰不住心头的喜悦，端起一杯红葡萄酒，走到张文秋跟前，笑容可掬地说：“谢谢你教育了思齐这个好孩子，为岸英和思齐的幸福，为你的健康干杯！”

张文秋一时窘得不知说什么好了，僵在那里。善于交际的外交家周恩来连忙悄悄地告诉她，把毛泽东的话，稍改一下，照样说一遍就行。

张文秋想了一下，说道："谢谢你养育了岸英这样的好孩子，谢谢主席在百忙中为孩子们的婚事操心，思齐年幼不太懂事，希望主席多加批评指教。"

说完，把高脚酒杯与他的酒杯轻轻碰了一下。周恩来立即鼓励张文秋："你看，不是说得很好么！"

毛泽东以主人的身份向在座的宾客颇为得意地说："孩子的婚事没有要我操心，也没买这买那。吃了饭，请你们到孩子的新屋去看看。"

席间，伯伯们笑谈几十年的往事。"妈妈"们谈得多的则是家务事、儿女情长。毛泽东不住地将湖南腊肉、腊鱼、豆豉辣椒往徐特立、谢觉哉老人的碗里挟，边挟边说："尝尝家乡风味，几十年没吃到这样的茶油浸腊肉了。"

婚宴结束后，毛泽东拿出一件青色的海军呢夹大衣，想了良久，他有些歉疚地对岸英和思齐说："我没有什么贵重礼品送你们，就这么一件大衣，白天岸英穿，晚上盖在被子上，你们俩都有份。"在场的人，都忍不住大笑起来。

确实，建国初期，百废待兴，各方面是很困难的，作为党和国家领袖，毛泽东也不例外。

第　五　部

激情·壮烈

他要入朝作战；

他将赴汤蹈火；

谁叫他是我毛泽东的儿子！

“壮士一去兮不复返”！

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中，

战争之神无情地选择了他。

毛岸英到湖南探亲，前前后后——包括在长沙、到板仓、到韶山、到棠佳阁……大约一个月的时间，我们只能推算出他离开湖南返回北京已是6月底或7月初。但具体是在哪一天，已无从可考。在收集资料时，我试图问清他是哪一天回到北京的，然而是徒劳的。当年，知情人谁也没有把它当作一回事。

为什么会对这样的一个普普通通的探亲返京的日期如此感兴趣，像这样的一个一般干部探亲离去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即使是重要的人物，如果他们做的事情，对历史、对形势没有什么重大的意义的话，谁也不会那么用心地去注意他行程的具体时间的。我们之所以想弄清楚毛岸英回京的日期，是因为，就在他返回前后，世界上发生了一件对于我们这本书的主人公后来的命运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大事件。

1950年6月25日，朝鲜爆发了内战。内战打响的第三天，27日，美国派出海军和空军参战，干涉朝鲜内政。同时，美国政府派出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以武力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台湾。

朝鲜的内战其原因要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出兵歼灭了日本关东军主力并一直打到了朝鲜北部。苏军的使命是在朝鲜半岛北部接受日军的投降。与此同时，美军在其南部履行同样的职责。它们的分界线就是通常所说的“三八线”，即，沿着北纬38度线所形成的一条“军事分界线”。

从1910年起，朝鲜长期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中朝人民曾并肩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奴役。本来，早在1943年12月，中、美、英三国首脑的开罗会议及其发布的《开罗宣言》中就重申："我们三大盟国轸念朝鲜人民所受的奴隶待遇，决定在适当期间，使朝鲜自由独立。"1945年7月26日的《波茨坦公告》又强调了《开罗宣言》的条件必须实施。而且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1945年12月苏、美、英三国莫斯科外长会议，对朝鲜问题也达成了具体协议，即朝鲜将通过自由民主选举实现独立和统一。如果各大国都按这些原则实施，让朝鲜人民自己处理自己国家的事务，朝鲜南北临时分界的问题可能就能解决，朝鲜内战可能也不会发生，当然，更不至演变成带有国际性的战争了。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西方处于冷战状态中。朝鲜因此就成为一个被人为地分裂的国家、被人为分裂开来的单一的民族。当时的美国杜鲁门政府首先违背了上述的原则和具体协定，对朝鲜采取的是以分裂为基础，一有可能即实行武力统一政策，并坚持在南方进行单独的"选举"。1948年8月，南方建立"大韩民国"，李承晚为"大韩民国总统"。在美国政府支持下的李承晚，更是明确提出"北进统一"的口号。在美国顾问指导下，李承晚的10万军队进行着紧张的训练，并且全部以美国武器装备起来。在朝鲜内战爆发前的一段时间里，李承晚一再叫嚷"要结束南北分裂，必须用战争来解决"，"可以占领北韩来实现统一"，"我们要在热战中赢得胜利"……因此，在美国杜鲁门政府支持和怂恿下，朝鲜半岛的战火是不可避免地要燃烧起来的。

以上这些情况似乎扯太远了，与毛岸英的命运没有什么关系。其实，这是历史背景，而他在战争爆发不久便卷入了那场战争，因而，不能说没有关系。从大的方面讲朝鲜战争直接威胁着我国的安

全，中国也不能看着邻国被美国侵略而坐视不管，更不能任美国侵略者肆意侵犯我国的东北边境。在国家面临外来入侵者的威胁时，每一个中国人都有责任和义务捍卫自己的祖国。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为了保家卫国，援助兄弟的朝鲜人民，在战争需要的时候，中华民族派出了自己的优秀儿女组成志愿军赴朝作战，毛岸英便是其中的杰出的一位。

又扯远了。然而，为了说明我们的主人公在朝鲜战争爆发期间的经历，我们仍需简单交待一下有关的背景。

这和当年被称为“老大哥”的苏联有关。

刚才，说的是朝鲜南部的情况，下面所说的背景就要和朝鲜北方的状况有关，还得从 1945 年 8 月说起。

1945 年 8 月苏军进入朝鲜北部接受日军投降，并负有按照有关的原则和协议，尽速解除日本在朝鲜长期殖民统治所造成的恶果的责任。当时，在朝鲜的北方真正握有军权的是苏军司令史蒂科夫中将。美国人罗素·斯泊尔在他著的《韩战内幕》一书中，曾这样记述了当时朝鲜北方的情况。

> 当在北方确立一个稳固的、受苏联影响的政权之前，史蒂科夫将军一直抵制选举。到 1948 年初，史蒂科夫将军的占领军角色正式结束，他奇迹般地摇身一变，成了史蒂科夫大使。俄国军队撤出了北朝鲜，因为苏联代表一直不停地提醒联合国注意朝鲜问题。苏联在朝鲜的“利他主义”政策与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斯大林的代言人葛罗米柯坚持说，“美帝国主义企图支持南方的傀儡政权”，他却只字不提留下来的成百上千的“苏联顾问”。下脣宽厚、戴着一幅眼镜的史蒂科夫，这位长着一对明显的灰眼珠的

老练的情报官，只是把他的军服换成了一套双排扣的哔叽西装，呆在他那所戒备森严的使馆大院里做他的大使。使馆恰好毗邻金首相的官邸……

众所周知，中国和朝鲜是近邻，陆路的边界仅一江之隔，而且两国往来的历史源远流长。1910年，日本侵占朝鲜后，大批不愿当亡国奴的朝鲜爱国志士，流亡到中国的东北，组织抗日武装，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30年代，中朝抗日义勇军携手并肩浴血战斗在白山黑水之间。在中国内地，也有大批的朝鲜革命者，参加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实际上，1945年8月朝鲜光复后，许许多多长期在中国从事革命活动的朝鲜人回到他们的祖国，去重建家园。还是那位美国作家，他写过这样一段：

中国对北朝鲜军队的组建，也做出了重要贡献，组成朝鲜人民军中间力量的战士大多来自回国的一万六千名朝鲜老兵，他们曾参加过中国的内战。就在朝鲜人民军越过三八线之前的两个月，应平壤的要求，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另外一万二千名朝鲜老兵移交给北朝鲜指挥。然而，尽管这些战士身经百战，他们并未受过像苏联人要求的那样适应现代化战争的训练。

这里，还有一个情况不能忽视，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平壤是由苏联‘指导’的，”(《韩战内幕》)“如果有人敢于探究一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花哨词藻的背后的东西，他立即就会被苏联的强大这一基本事实所震惊。”(《韩战内幕》)

这位美国作家的话不免偏颇，带有西方人的成见。但是，尽管中朝两国唇齿相依，往来悠久，而且中国又是开罗会议和《开罗宣言》的参加国，然而，“苏联人从日本战败以后，就排斥他们(指中国)在北朝鲜扮演角色，尽管从未有人蛮横地提起过。”(《韩战内

幕》)

当时,统治中国大陆的是国民党政府。一方面中国内部正在进行着一场决定自己前途和命运的内战,内战持续了3年多,直到朝鲜内战爆发时,中国还有台湾及周围岛屿没有解放。另一方面,虽说中国是属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五大战胜国之一,但在国际上所处的地位,却与五大强国的地位极不相称。"中国人民作出了最伟大的民族牺牲,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伟大的贡献。可是,正当胜利在望的时候,两位最受中国人民尊敬的'巨头'罗斯福和斯大林,竟背着当时的中国政府,当然更背着我们共产党人,签订了一个秘密的雅尔塔协定瓜分中国,在中国土地上划分势力范围,把中华民族置于屈辱的地位。"(柴成文、赵勇田著《板门店谈判》)美国本身就是帝国主义,这暂且不说。就说斯大林和他领导下的苏联政府以及他之后的苏共和苏联政府,民族沙文主义色彩十分浓厚。就是在中国共产党夺取了政权,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苏联曾给予我们以巨大的援助,但是,人们不会忘记,它向我方提出的建立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的要求,这直接触及到我国的主权;人们也不会忘记,苏联逼我们还债,而这笔欠债的主要部分是抗美援朝中的军火用款。为了还债,中国人民在10多年的时间中,勒着裤腰带过日子……

又扯远了。

值得深思的是,苏联既然在朝鲜问题上扮演着那样一种角色,可是,在朝鲜内战爆发以后,1950年6月27日杜鲁门对国会领袖们讲:"我已经命令美国部队对南朝鲜支持到底。"南方李承晚的军队,得到了美国军队包括海、陆、空军的支持,直接参战。而在北方,"从1948年朝鲜人民军正式成立之日起,成千上万名苏联顾问就参与了它的军事训练计划。当北朝鲜单方面开始作战时,尽管苏联

顾问仍还参加平壤的重要会议，实际上他们已分道扬镳了。”“你（指朝鲜北方）不能从俄国人那里再指望别的东西了。……多数武器是大战时使用的旧式武器，有些武器迟至1950年5月才从海参崴由苏联货船运抵。”（《韩战内幕》）

事情就是这样富有戏剧性，国际上的政治也是如此。当年苏联既“指导”着又撒手不管。苏联外交部副部长公开谈话：“现在对朝鲜的内部事务，苏联政府同样坚持外力不得干涉的原则。”罗素·斯泊尔这样写道：“自二战结束以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直禁止中国的插手，但是，突然之间，面纱就要被揭开了。朝鲜人无疑是在苏联的督促下，想急于警告他们的中国邻居：他们可能需要增援的时刻即将来临。”

可是，中国与朝鲜之间的关系上是很被动的。中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虽是在1949年10月6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但是，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后，“朝鲜战场上的情况，各方面的报导说法不一，中国在平壤没有使馆，任命不久的驻朝鲜大使倪志亮，因病还在武汉。在平壤仅有的东北行政委员会派出的商业代表处，它的主要负责人温士祯也在沈阳休假。”“我国东北于1948年全境解放后，北边是‘老大哥’苏联，南边是兄弟邻邦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可以说在那里是有边无境。”（柴成文、赵勇田《板门店谈判》）1950年7月8日晚，刚刚组成的中国驻朝鲜的大使馆外交官员在临时代办柴成文率领下离北京赴朝鲜，9日下午到达安东（今丹东），因防空关系，9日晚过江赴朝，7月10日晨到达平壤，并正式开始办公。他们到达平壤后，立即开始工作，了解战争进行情况……

6月25日凌晨，战争打响以来，朝鲜人民军发起反攻，很快突破了三八线，一鼓作气进行了五次战役。8月31日，第五次战役，

即釜山战役开始，人民军以顽强的毅力，克服种种困难，突破洛东江敌人的防线，先遣部队打到了北纬35度线上。可惜，人民军已是强弩之末，没有后劲了。战局形成胶着状态。……9月15日，美军投入7.5万人，在仁川登陆；9月30日战火又烧过三八线，并烧到我国东北边境，严重威胁着我国的安全……

美帝国主义妄想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仁川登陆后，麦克阿瑟更加嚣张骄悍，不可一世，他的部下也不断地发出战争叫嚣，美军第二十四师师长丘奇口出狂言："美军连夜向中国边境推进，如果我们明天到不了鸭绿江，那才真是怪事。"他还妄想否认鸭绿江是中朝的国界。

报载：美第八军军长已命令"美英两国军队以任何必需的兵力，向中朝边境推进，"李承晚伪军五个师"奉麦克阿瑟的命令，尽速向中国东北边境前进。"

鸭绿江边炮声隆隆，美帝国主义虎视眈眈。

随着军事行动的升级，外交战也在逐步升级。

[新华社30日讯]我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周恩来部长于24日就美国侵略军用飞机再次轰炸我国领土安东一事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

美国代表葛罗斯无可抵赖，承认"不幸的错误"："9月22日晚间为联合国服役的美国空军飞机一架可能因疏忽而侵犯中国领土，并且在安东附近投弹。"

在此同时，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为着出兵朝鲜的头等大事，正在进行紧张的商讨、争论……

10 月 4 日，彭德怀被紧急从大西北召到北京，匆忙得连洗漱用具都未来得及带上。一下飞机，就有一辆轿车将他送进中南海。

紧张的气氛，从进进出出中南海的小卧车上也可见一斑。

由以上的背景中我们看到，中国要援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履行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一方面要和朝鲜政府接触，这已由中国驻朝鲜的大使馆来承担；另一方面，尽管苏联声明不干涉朝鲜内部事务，然而事实上，我们还要和苏联政府和斯大林接触，交换意见，包括诸如苏联出空军，我国出地面部队；我们出人力，苏联提供军火（其实，他们是以贷款方式提供的，即后来逼着我们偿还的债务）。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到志愿军正式入朝时止，也不过一年的时间，百废待兴，正是困难的时期。如果仅靠我们自己的经济力量，是难以和世界头号强国的美国作战的。

为了与苏联协调援助北朝鲜的问题，中央决定派一个高级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在与苏联打交道中，少不了需要熟悉苏联情况，又熟练地掌握俄语，而且在政治上又特别可靠的人，因此，历史便选择了毛岸英担当起这样重要的角色。就在毛岸英从湖南回京后，到他 8 月 20 日前后去北京机器总厂任党总支副书记离开社会部前这期间，他去了苏联一趟。

他这次去苏联，我们从他同年 9 月 9 日给好友蔡博的信中得到证实，“同志，不久前我很幸运地得以重游旧地，那里的朋友（除大保、娟娟外）都见到了。……”至于，他去苏联的使命，与援朝问题有没有关系，我们不得而知，因为是秘密的。前面，我们介绍了，岸英从苏联回来后，曾到他在国际儿童院的老师韩铁生那里，征询老师对他调基层工作的意见时，谈起他刚从苏联回来，是带着秘密任务去的，听他这么说，韩铁生便不再问了。

这已是40年前的事了。这40年间，世界形势发生了极大变化，中国已和当年的对手美国关系正常化，苏联已不存在……

1950年10月1日，国庆一周年，是个十分严峻的日子。

鸭绿江这边，北京，40万人举行庆祝大会，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国庆节，礼炮齐鸣28响，游行进行了3小时25分钟之久。这次游行，实际上是对美帝侵略者的大示威，大警告，那气氛，有些近似1942年苏德战争莫斯科红场的军事检阅。

朱德总司令在国庆大会上指出："……美帝国主义现在正在用武装军队侵略我们的邻邦朝鲜，同时与蒋介石残余匪帮勾结，公开侵占我国的台湾，美帝国主义正在用战争威胁世界和平……。"

在这严重的时刻，中共中央根据朝鲜劳动党、朝鲜政府的要求和中国人民的意志，毅然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

彭高贺、邓洪解及中国人民志愿军各级领导同志们：

（一）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进攻，借以保护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着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

（二）中国人民志愿军辖十三兵团及所属之三十八军三十九军四十军四十二军，及边防炮兵司令部与所属之炮兵一师、二师、八师。上述各部须立即准备完毕，待令出动。

（三）任命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四）中国人民志愿军以东北行政区为总后方基地，所有一切后方工作供应事宜，以及有关援助朝鲜同志的事务，统由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调度指挥并负责保证之。

（五）我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必须对朝鲜人民、朝鲜人民军、朝鲜民主政府、朝鲜劳动党（即共产党）、其他民主党派及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表示友爱和尊重，严格地遵守军事纪律和政治纪律，这是保证完成军事任务的一个极重要的政治基础。

（六）必须深刻地估计到各种可能遇到和必然遇到的困难情况，并准备用高度的热情、勇气、细心和刻苦耐劳的精神去克服这些困难。

目前总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对我们有利，于侵略者不利，只要同志们坚决勇敢，善于团结当地人民，善于和侵略者作战，最后胜利就是我们的。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十月八日于北京

当天，毛泽东电示中国驻朝鲜大使倪志亮，让他将中共中央准备派中国志愿部队赴朝参战的决定转告金日成首相。

其实，罗嗦了半天，洋洋数千言，归纳起来就是两层意思：一层是，朝鲜战争不可避免；中国一定要抗美援朝。另一层是，有关抗美援朝问题，又必须与苏联打交道，必须有适当的人去协助首长做这项工作。

到此为止，背景情况交待完了，该回到我们的主人公这一时期

的活动上来了。可以说，他，毛岸英，正处在这个历史的坐标点上。

就在毛泽东发布了《给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的前三天，他仅给彭德怀10天时间准备，即10月15日要出动。司令部的小班子，需立即在北京组建。彭德怀从西北来京时只带了一名参谋高瑞欣。再有，就是他的秘书杨凤安了，其他人员要在北京选择。

在确定司令部的小班子时，彭德怀考虑这个班子要小而精悍，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要包括军事、机要、秘书、通讯、翻译等人员。由谁任司令部的翻译，费了一番周折。开始是让军委办公厅的一位科长去，但这位科长抽不出身。考虑来，考虑去，最后根据李克农的意图，作战部副部长李涛将军推荐毛岸英跟彭德怀入朝。

老一辈革命家们对他关怀备至，但他的主意已定。

离京的前一天，他非常忙碌，看望了心爱的妻子；告别了刚上任不久的工作岗位；从岳母那里拿走了钢笔、手表……

夜已经很深了，父亲还在等待着他，父子俩又有说不完的话……

国庆节前后，毛岸英忙得焦头烂额的。他已经知道了派他入朝参战的事。然而，就在这忙得不亦乐乎的时候，他的年轻的妻子刘思齐，却发了急性阑尾炎，在医院动手术，他不得不在百忙中抽空去看望妻子，心不在焉地说些体贴话。因为，他有许多事情要做

……

1978年12月19日，我在中央组织部宿舍见到当时已81岁高龄、被人尊称为帅大姐的帅孟奇老人，听了我来访的目的后，向我讲述了毛岸英出国前的一些情况……

帅大姐是湖南汉寿县人，是1926年入党的老党员，长期在上海搞地下工作。1932年10月她被国民党反动当局逮捕，在狱中受尽酷刑，坚贞不屈，直到抗战爆发前夕，经党中央营救才出狱。著名的女作家李伯钊曾根据她的经历写了《女共产党员》一书，记述了她在狱中的英勇斗争事迹。1942年她到延安，从事妇女运动的领导工作，出席过党的七大。全国解放后，担任中央组织部的副部长。她1918年和许之桢结婚，但是她的丈夫很早就牺牲了，她没有儿女，便把烈士遗孤及干部子女都视为自己的亲生儿女。在孩子们眼中，她是个慈祥的老妈妈。岸英1945年底回国后，毛泽东就要他去看帅妈妈。在所有的干部子弟中，帅妈妈尤其喜爱岸英。岸英懂事，能体贴人，跟帅妈妈扯起家常来没个完。他很早就失去了母爱，从帅妈妈那里，他得到了母亲般的关怀和爱护。1950年5月回湖南前，岸英去看帅妈妈，问她有什么信要捎回去。帅妈妈说："我这个湖南人已经没有湖南特点了，我离开老家早，那里也没有什么亲人了，你回去就代我向你外婆问好吧！"一个月后，岸英兴致勃勃地回到帅妈妈身边，讲了回湘的收获及家乡情况。

1950年10月初的一天，岸英又跑到帅妈妈那里，兴奋地说："帅妈妈，我要参加抗美援朝啦！"

出于一位久经考验的老革命家对岸英的关怀爱护，帅妈妈对岸英赴朝自然有自己的想法。

她对毛泽东一家人的情况，尤其是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和牺牲太

了解了，而且她对岸英的身世也太了解了。他是一个多么有培养前途的孩子呀！帅妈妈简直把他当成了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所以，帅妈妈一听岸英要到朝鲜去打仗，第一个反应是四个字："我不同意！"

这回轮到岸英开导年过半百的她了。

"帅妈妈，你别急呀，你听我说，我回国后到过农村，参加土改、整党，也到工厂搞了几天，但是没有体验过军事生活。在苏联倒是进过军校，搞过军事训练，也参加了大反攻，但那是胜利之师的追击，德寇兵败如山倒，没有真正的打过仗。"

帅妈妈不悦地说："你刚刚要求从社会部调到工厂去，我当时不同意，你又再三再四地请求，好吧，刚去不久，又要上前线。"帅妈妈想了一个缓冲之计，对岸英说："你不是喜欢研究政治经济吗？现在要充实中央马列学院，你可以去那儿工作。"

帅妈妈是个很有经验的组织家，她虽然眼睛不太好，可头脑十分精明，她来了个"迂回侦察"，说："岸英，我知道是谁要你去的。"

在爸爸和帅妈妈面前，岸英是个一根肠子通到底的坦诚之人，经不起帅妈妈这一迂回战术的进攻，他不加犹豫地坦白说：

"帅妈妈，李伯伯要我去！"

"李伯伯胡扯！"帅妈妈发火了，"李克农是搞安全工作的，他又不打仗，你听他的做么子？"帅妈妈恼怒地说。

岸英一时觉得说走了嘴，马上用了一副兴奋的面孔，以解释的语气说："帅妈妈，我自己也愿意去！"

"你自己也想去？"她心里十分清楚，稍许平息了一点怒气，说，"不过，这样的大事，你一定要征求爸爸的意见，你爸爸同意你去，你就去，不同意，你就别去！"

岸英唉唉地答应着，站起身就要告辞。

帅妈妈留他吃饭。这是惯例，凡是到她那儿的干部子弟、烈士遗孤，她都要留下来吃顿饭，聊聊家常，她的津贴大都花在这些孩子身上。而岸英跟江青弄不来，回到丰泽园，看见江青老跟爸爸闹气，他也不快活，所以，尽量避开江青，最好的去处就是帅妈妈那儿。

这次，岸英没有心思吃饭，他说，还有许多事要办，许多地方要打招呼，而最主要的是他要征询父亲的意见——去不去朝鲜？

毛泽东一向不把子女当成私有财产，对家务事、儿女情也看得非常淡泊，他总把自己的孩子，看成是千千万万接班人之一。当然，这并不是说他没有一点偏爱，他是很钟爱岸英的，对他抱有很大很高的期望。可是，在工作安排问题上，他是把自己的子女，当作一个普通党员、普通工作人员一样，完全由组织部门去调动，去安排，去发挥螺丝钉的作用。特别是在关键问题上，毛泽东从不让岸英有任何特殊的感觉。1949 年 12 月，毛泽东有生以来第一次出国，去苏联与斯大林会晤。师哲在《在历史巨人身边》一书中是这样描述的，“李克农护送至边境，为在边境与苏方接交方便，李克农带了岸英同行。我陪着毛主席在前边的车厢里，他们在后边车厢。我并不知道岸英也在车上，但主席知道。到了东北后，主席要我注意，不让岸英过境到苏联，并要我转告克农，边境接交工作完毕后，一定要把岸英带回去，不要让他过境到苏联，其实他去了对我的工作会有帮助的，但是这是主席的指示，我只好照办。”即使他的俄语水平再高，不该他参与的事，也不能参与。

他唯一寄于厚望的儿子要上前线，这对于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毛泽东，确实也是个艰难的决策，战争所造成的后果是难以预测的，在战争年代，他已经失去了 5 位亲人，杨开慧、毛泽民、毛泽覃、毛泽建、毛楚雄……为此，当岸英向他提出要赴朝参战时，他陷入

了沉思。

毛泽东不愧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经过考虑，很快，他便作出果断的选择——同意毛岸英入朝，并托付给彭德怀照管。谁让他是我毛泽东的儿子呢？他不去，让谁去？

当然，组织部门选择毛岸英赴朝，也有充分理由的：一是岸英俄语好，二是政治上可靠。志愿军司令部确实需要有一位这样的人。既然朝鲜问题要和苏联打交道，还有苏联专家在前方，战斗中还需要苏联空军的支援，所以，跟苏联人打交道多得很，况且战争形势又瞬间万变，更少不了精通俄文的翻译。再说，岸英的英语也很好，一打起仗来，少不了也要和美国人打交道。

组织上选中毛岸英是正确的；毛泽东的抉择也是正确的；毛岸英的要求也是正确的，他要在血与火的考验中磨练自己，当然也可能牺牲了；帅孟奇的想法、担心也是有道理的，谁不知道，战争是无情的。

当毛岸英牺牲的噩耗传来，那些看着毛岸英成长起来的前辈们，特别是帅孟奇及一些老大姐、老伯伯们，都痛苦地指责、怨恨李克农也是人之常情，是可以理解的……岸英的牺牲，实在是令人惋惜。

也就在毛泽东发出那份字字千钧的入朝作战命令的当天，一架伊尔型专机，飞转着螺旋桨，从北京的机场起飞，在阳光灼灼中腾云驾雾，直飞山海关外的沈阳城。

飞机上，正襟危坐的彭德怀，不时用手抓粗短的头发，好像要从脑壳里抓出一串锦囊妙计似的。他不大吭气，也没心思俯瞰舷窗外的锦绣山河，而是紧闭厚唇唇的双唇，心思重重地思考着各种问

题。他于4日从兰州飞京，5日受命，今天是10月8日。就在这两三天的时间里，他这位身兼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和政委之职的统帅，仅从北京、沈阳凑了个小班子。他的秘书杨凤安还在兰州，身边只有一个"高参"——高瑞欣，其余的人，除了毛岸英曾经在毛泽东那里见过几面，其他人都是陌生面孔。还有那几位大鼻子苏联军事顾问，更是头一回相见，由于语言不通，便无话可谈。

临时凑合的班子成员之间彼此陌生，似乎也无话可谈。只是岸英对一切都充满热情，舷窗下的长城、大海，他都要细细地注视，生怕漏掉一个风景点似的。

飞机越过山海关，突然遇到高空大气流的袭击，顿时上下左右颠簸起来。一位打瞌睡的苏联顾问被震醒，桌上的铅笔掉在地毯上。

毛岸英用熟练的俄语提醒他："你的铅笔掉了。"

苏联顾问说了声："西巴西巴（谢谢）！"把铅笔捡了起来。

这时，坐在周围的同事们吃惊了，悄悄地互相询问着："他是谁？俄国话说得好流利啊！"

程普神秘地说："他是毛岸英。毛主席的大公子。"

毛岸英？他也去朝鲜？人们既兴奋又有些吃惊，带着惊奇又钦佩的目光注视着他。岸英装着什么也没听到，仍向外侧着身子看蓝天白云。

彭德怀一行在沈阳和平街一号一幢日式小楼里住下。彭德怀住在里屋，司令部的成员在外屋搭了一溜地铺。沈阳的10月不冷不热，年轻人挤在一堆睡觉，更觉得有味道。

彭德怀一进屋，金日成派来的特使朴一禹次相便赶到。见了彭德怀，如见救星似的握着彭总的手连声说："彭总啊，你好，我受金

日成同志派遣欢迎彭总来了！”

彭总问：“你们接到毛泽东主席的电报了吗？”

“接到了，金日成首相委托我向你传达他的要求，朝鲜党、朝鲜人民希望彭总尽快率兵入朝。”

可是，彭德怀刚刚受命两天，对于朝鲜战局几乎一无所知。这时，朴一禹便简单地介绍战况，彭德怀越听越着急，不断地在心里念叨：糟糕，不妙，危险！

朴一禹说：“美军已经越过三八线，已经推进到平壤附近，金日成已经撤退到德川……”

彭德怀最关心的是苏联的态度，他迫不及待地问朴一禹：“向苏联请求出兵了吗？”朴一禹说：“请求了，但没有回音。我们还在继续要求苏方出兵……”

需要插进来的一些情况是，彭德怀的担心不是多余的。就在他带着毛岸英一班人飞向沈阳的同时，10 月 8 日，周恩来偕工作人员师哲（兼翻译）乘飞机飞往莫斯科，就中国出兵援朝请求苏联给予军需物资支援一事与斯大林磋商。借故不愿担任志愿军司令员的林彪也同机前往苏联养病。当时斯大林正在黑海海滨的阿布哈兹休养。周总理抵莫斯科后，在布尔加宁陪同下，前往会见了斯大林和苏联其他政治局委员。周恩来向斯大林介绍了中国的决定，中国准备出兵赴朝作战，以挽救朝鲜局势，维护亚洲和平。周恩来说，新中国成立不久，财力不足，武器弹药、运输工具都有困难，空军也刚刚组建，这些方面需要苏联支援。而斯大林讲了很多困难，意思是：既不能出兵，也不能支援空军，如果中国不出兵，那就让朝鲜人民军有生力量撤到苏联和中国东北，也许能东山再起，否则，朝鲜只能维持一个星期。但是他们可以提供武器，因为，第二次世界大

战后，他们剩余的军火多得很。

斯大林对仁川登陆后的朝鲜形势犹豫不决，对我国派志愿军入朝作战顾虑重重，他担心中国出兵会引起世界战争，甚至主张如果朝鲜失败了，可以让金日成到中国东北组成“流亡政府”。

（引自柴成文、赵勇田《板门店谈判》一书）

本来，中苏双方已经同意，中国出地面部队，苏联出空军，共同支援朝鲜。现在志愿军入朝作战的命令已经发出了，毛泽东专门派周恩来赴苏会见斯大林，要求苏方兑现已作出的承诺。马上就要发兵了，这也是最让彭德怀担心的，“老大哥”的态度到底如何？

送走了朴一禹，彭德怀把手一招，把一班子人都叫了过来。

程普、海鹏、毛岸英等人都来到客厅里。彭德怀巡视着每一张面孔，沉默了一会说：“我们马上就要参战了，你们有什么想法没有？”

大家互相看看，相视而笑：“没有什么看法，听老总的，为老总服务好。”

彭德怀不满意地说：“怎么是为我服好务？应该是为那即将来临的反侵略战争服好务么！”

毛岸英见过大世面，带头说：“老总，你是司令员，我们把你交办的事办好，就是为战争服务。”

“好，岸英呀，你要求来朝鲜战争前线，我很高兴。我们需要与苏联大使馆和军事顾问团经常联系，我正好缺一个俄文翻译呢，你么，就是我的秘书，负责与苏联顾问联络的翻译，另外，还要在办公室做些文字工作，行不行？”

岸英兴奋地说：“服从命令听指挥！”

彭德怀说："岸英呀，我们对外只说你是我的秘书，不讲你是毛主席的儿子，这样有利于工作，你同意不同意呀？"

岸英爽朗地回答："我同意。"

彭总又关照程普，在杨凤安未来之前，由他多负些责。要大家不要向外讲毛岸英是毛泽东的儿子，要口严，这样有利于工作。

可是毛岸英还有个习惯，凡到了一个新的地方，住下后就要到外边逛逛，熟悉地理环境，了解当地人民的风俗习惯。他到沈阳后，除了伴着彭德怀开会、闲谈外，便约了一二个新朋友逛街。他逛街的目标首先是书店。

进了书店，便舍不得离开，先是看"白书"——只看不买，临到离开时，就挑选几本。这一回，他知道要离开祖国，去朝鲜这陌生的异国他乡了，这一去不知是要多长时间了，是半年一年还是两年三年。战争环境中，艰苦、危险都不算什么，没书看可是最大的缺憾呀！因此，他选了一本又一本，马克思列宁的著作，达尔文传以及有关朝鲜的历史、地理书籍，几乎倾其囊中所有，买了一大摞。回到住处，他把衣服杂物从那口苏联带回的皮箱中请出来，然后，把一本本新书藏进去，而且嘱咐同行者："同志，可要替我保密呀！即使在战争环境里，也得学习啊！"

同志们都很理解地点点头。

为什么要保密呢？因为中央有规定，出国作战是绝密行动，这是为了战术上的隐蔽，直到打完第一个战役，1950年11月8日我国才正式发布消息："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彭德怀司令员的带领下，渡过了鸭绿江，参加朝鲜人民的抗美战争。"

10月10日清晨，毛岸英一行人随彭德怀坐火车由沈阳来到安东（现在叫丹东）。他们下榻在镇江山（现改名锦江山）下的一幢

日式小楼里。吃了饭，他们便乘吉普车迫不及待地来到鸭绿江边。

安东是个边陲小城，三面环山，南面是鸭绿江，江对岸便是朝鲜的新义州，一座铁桥，把两国紧紧相连。

安东是座安静的小城，东边是元宝山，北面的镇江山，西边的老洼岭，以及青龙山，帽盔山，海拔都在百米左右，形成一个天然屏障，将安东市区紧紧地搂在怀里。

下午，彭德怀在十三兵团负责人的陪同下，来到江边桥头视察，毛岸英尾随左右，以多思少说的态度，处理好自己的位置。

对岸的新义州，几天前还是一座和平安宁的城市，随着美军越过三八线的消息，传来了几百架美国 B—29 和野马式飞机的轰鸣声，几分钟之内，扔下数千枚炸弹，新义州在火海中变成了一片废墟。

彭德怀用望远镜扫描，尽收眼底的是残垣断壁。他叹了口气，再看看横跨在鸭绿江上的大铁桥，还是完好无损，他狡黠地笑笑："麦克阿瑟，你还是没有狗胆冒犯我们呀！"这时，他想到，即将出兵朝鲜，一旦美国人发现中国军队进入朝鲜，肯定首先炸铁桥，其次轰炸安东。他便跟洪学智等十三兵团首长商议，决定四个军三个炮兵师同时开进朝鲜，以防断桥后支援困难。

商议的结果用电报立即发给北京毛泽东主席，同时，彭德怀突然萌发了去见金日成，摸清朝鲜战场的真实情况的想法。于是，初步拟定次日(10 月 11 日)过江去拜会金日成。晚上 8 点钟，他给毛泽东发了一份请示电报：

> 还有不少具体问题，须与金日成同志面商解决，拟明(十一日)晨经安东前往德川。特报。

电报发出不久，就收到毛泽东出人意料的来电：

> 彭高、邓洪韩解：

（一）十月八日命令暂不执行，十三兵团各部仍旧原地进行训练，不要出动；

（二）请高岗德怀二同志明日或后日来京一谈。

毛泽东

十月十二日廿时

10月13日，岸英随彭德怀一同回到北京。

他得到的信息是，斯大林变卦。原先中苏两党两国作出共同支援朝鲜，中国出陆军，苏联出空军。现在中国的陆军已经兵临鸭绿江边，整装待发，箭在弦上，正等待苏联空军的配合，以击败美国的海陆空优势。就在这节骨眼上，斯大林以“空军没有准备好，暂缓行动”为借口，拒绝履行诺言，志愿军处于孤立无援境地。

岸英对此非常气愤。他在苏联10年，对斯大林的一些作法早有看法，如今，面对朝鲜的紧急局面，他的爱、憎、恨更加分明了。当然，他与父亲、彭总完全一致。

此刻，周恩来还在莫斯科，第一次与斯大林会晤后，没有说服那位70岁的“老大哥”。苏联是怕引火烧身，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现在，对一触即发的战局，采取隔江观火的态度。斯大林另一想法是，对中国军队能不能打败美国人持怀疑态度，心想，我们不派空军出阵，中国陆军也许不敢单枪匹马赴朝作战……

谁知，久经考验的毛泽东说服了其他战友，中央政治局研究的结果是，不管苏联出不出空军，中国军队仍按原计划赴朝作战。并向周恩来发出电报：

（一）与政治局同志商量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兵朝鲜为有利……

（二）我们采取上述积极政策，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

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

周恩来马上通知苏方：

中国党和政府已经作出决策，不管苏联是否出动空军，中国照样出兵援朝。

斯大林虽然表示激动，但对援朝还是没有行动。

岸英从父亲长夜不眠的神情中，更深刻地了解到事态的严峻。来回几个折腾，特别是在安东看到鸭绿江那边的惨景，他由热情澎湃而变得深沉严肃。

10 月 14 日实际上是他在北京的最后一天。在紧张的工作之后，他挤出了一些时间，去跟亲友、同志们告别。

他按照老习惯，骑着那辆破旧的自行车，首先到他敬爱的帅妈妈家。帅妈妈请他吃了一顿晚饭。席间，气氛十分严肃。

临别时，帅妈妈要岸英靠到她身边，用颤抖的双手，抚摸着岸英，摸他那粗黑的头发，那宽阔的像他爸爸一样饱满的天庭，摸他高悬的鼻梁，两只大耳朵，摸他轮廓分明的面颊……

帅妈妈叹了口气："岸英，我是不同意你去的，唉！这个李克农啊……既然你爸爸批准你去，你自己也要求到前线去实践、去锻炼，那就去吧！"

岸英很动感情地说："帅妈妈，你放心！况且，我也不是直接到前方去，是在彭总的司令部工作。"

她知道岸英是新兵，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叮嘱："你要当心啊！"

岸英坦然地似乎在宣誓般地说：

"帅妈妈，你放心好了！再说，人总是要死的，只要对人民有

利，为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去死，也是死得其所！我是个共产党员，共产主义革命是不分国籍的，而且有几十万人都去，也不是我一个人孤军作战。帅妈妈，你别为我担心，你自己要多多保重啊！”

临别时，她紧握岸英的手，再三再四地叮嘱道：

“岸英，炮子儿不认人啊，你还是当心一点好！”

一直到听不见自行车的响声了，她才依依不舍地回到房里。那晚，这个老共产党员失眠了。

岸英骑着破车，回到他原准备工作10年的北京机器总厂，因为他是秘密出国，便只跟厂长胡光告别。

因为时间紧迫，岸英没有绕弯子，而是开门见山地对胡光讲：“我国决定出兵朝鲜。我有紧急任务，马上就走。我负责的那块工作，请总支再安排一下吧。我的东西，留在这里，统统都不要拿，好像我还在那里工作一样，不要因为我走了而影响大家。”

他们谈了半个小时。他对工厂，对朝夕相处的工人、干部，真是恋恋不舍啊！

可是，这一去就再也没回来过。

岸英从机器厂骑车又到了北京医院，去向结婚刚满一周年的妻子刘思齐告别。一路上，岸英就在想：妻子很年轻，话不要讲得太生硬，否则她会受不住的。

一见面，岸英关心地问了思齐手术后的感觉如何，吃的流食还是普通饭，胃口好不好，伤口还疼不疼？接着跟思齐讲：

“我已经外出了一次，刚回来，还要走。”

思齐国庆前夕发了阑尾炎，做了手术。岸英来看了她两三次，后来突然几天不见了，思齐想盘问一下根底，但是，当牵涉到国家大事和党的机密时，岸英是守口如瓶的。

思齐听岸英讲还要走，就关切地问：

“又要到哪里去呀？”

岸英绕了个弯子说：

“最近你看了报纸吗？你知道国际形势吗？很紧张呢。打仗的事你知道吗？美国侵略者侵略朝鲜，还妄图打到中国来，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

岸英怕思齐舍不得他，没有直说。这小两口儿，结婚刚刚一年。这期间，岸英回了一次湖南老家，又到苏联去了一趟，平时以厂为家，住在机器总厂的宿舍里，也很少回家。作为一个新婚不久的青年，他对爱人的照顾、体贴是欠缺的。可是，他实在太忙，他把精力和热情都使在工作上了。思齐这个山东姑娘也很通情达理，知道丈夫的工作性质，对他的来去匆匆也习惯了，能够体谅他。现在，岸英又要走了，而且从暗示的话语中听得出来，又是一件特殊的使命，不知又要走多久，心中自然柔情绵绵，觉得有说不完的话。

岸英忽然想起了带在身上的这支钢笔裂了口直漏水，不好使唤。思齐就说：“拿我那支派克钢笔去用吧，在我妈妈那里。”那支笔是他们结婚时一个老同志送的礼物。

岸英说：“正好，我还要到妈妈那里去告辞。”

时针已经敲过十下，北京医院的大门快要落锁了，岸英不得不跟思齐告别。岸英临走时特别关照刘思齐：“江青她只照顾自己，根本不照料爸爸。她不爱我爸爸，我在前不久还骂过她‘你既然不爱我爸爸，滚开就是了，何必赖在这里？’你可得小心，这个人是很记仇的……”思齐眼泪汪汪，默默地点点头。

走到病房门口，岸英回过身来对思齐说：

“收不到我的信不要着急啊！我走了以后，你每个星期都要到中南海看看爸爸，不要我不在家你就不去呀！收不到信不要着急！……”言语中也充满了柔情。

岸英又匆匆赶到岳母张文秋家里，他还有一件放心不下的事，他再三对岳母说：

“我走了以后，要多多照顾我的弟弟。”

想起他那个受伤致残的胞弟毛岸青，他的心情就显得沉重起来。两兄弟相依为命20多年，在上海流浪5年，吃尽了苦头，在苏联10年，也很少分离。他时时事事都要照顾不太懂事的弟弟，为弟弟操碎了心。岸英回国后，岸青在苏联又呆了一个时期，直到1947年才回到东北。北平解放后，他搞了一段俄文翻译工作，可是，因为江青对他的刺激，脑病复发，又去苏联治病疗养去了。遗憾的是，岸英不能跟弟弟告别，只好委托岳母多加照顾了。

岳母是个老革命干部，岸英对她很尊重，也很信任，对她是用不着隐瞒什么的。他说：“妈妈，我要出国去朝鲜，来向你告辞。”

“多保重，早点回来！”岳母从心底里喜欢这个女婿，她非常理解他。

他们谈到午夜过后一点多钟。岸英看着手表，那块老爷表已经“罢工”了。岸英心想，这怎么行呢？到前线作战，还要跟苏联人打交道，没有一块走得准时的手表，工作多不方便啊！当然，现在的青少年可能不会相信，毛泽东的儿子，竟如平民一样，没有一支好钢笔，没有一块能走动的手表，可是，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现在的青年人当然不能理解。

岸英从岳母那儿取到派克钢笔，看看停摆的手表，才想起岳母有一块自动手表，便不好意思地请求道：

“妈妈，我这块手表不顶用了，你那块自动表先给我用一用，将来回国时再还给你，好吗？”

她的这块手表是朋友赠送的，她舍不得用，一直珍藏着，岸英这一提起，她立即找了出来，深情地说：“那我就送给你吧，哪有女

婿用丈母娘的表要还之理，这就算我这个妈妈送给你的纪念物！”

岸英接过手表，对准时间，欣慰地笑了，再次向岳母鞠一躬，说声：“妈妈，你真好！”岸英推出自行车，三步一回头地惜别岳母。

回到父亲身边时，毛泽东正在书屋里焦灼地思考着，踱着步，像是在想别的问题，又像是在等儿子回来。

父子情深，一谈又是几个钟头……

第二天，10 月 15 日，飞机又载着彭德怀和毛岸英等人飞回沈阳。16 日，彭德怀召开重要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19 日过江。

10 月 18 日凌晨，飞机又飞到北京，岸英是否也跟彭德怀回去，从现在资料中看不出，但他已经作好入朝的一切准备。从一张在安东镇江山烈士塔前的照片中，可以看到岸英换上了朝鲜人民军干部服，跟司令部的战友徐亩元、杨凤安、唐本及坐在烈士塔台阶上的五个战士，还有一位戴大盖帽的军官（此人很像是苏联军事顾问）合影。背景的烈士塔由于被人遮挡着，只露出“牺牲”二字，塔周围摆了一排花圈……这是毛岸英的最后的留影。

本来，十三兵团已在安东市西边的老洼岭构筑工事，准备彭德怀在此设立司令部。可是，52 岁的老将彭德怀的习惯是，前线在哪里，司令部就在哪里。不仅如此，他提出第一个进入朝鲜，去找金日成会谈。真是别出心裁，出语惊人，不仅司令部的小班子感到愕然，连那些身经百战的将军们，也不知所措。但将军们早已熟知彭大将军的脾气，所以，也没人敢去劝说。

岸英和战友们目送彭德怀登上吉普车，与秘书杨凤安、警卫员郭风光、黄有焕向鸭绿江大桥驶去。

1950 年 10 月 19 日傍晚，在桥头，岸英目送着彭总的吉普车从桥面上缓缓驶向朝鲜那边的新义州。在中朝分界的地方，彭德怀

命令司机停车，他从车窗口探出头，向安东，也是向祖国深情地张望一番，有一种悲壮的情绪，随着热血冲向脑门。车上的另外几位相视无言，默默地跟祖国母亲告别。

夜晚，岸英跟随着司令部的战友们一同，在夜幕沉沉中跨过鸭绿江。周围寂然无声，只听见脚踏铁桥的嚓嚓声以及鸭绿江水流动的哗哗声。岸英不时地、恋恋不舍地回头张望，心中默默地向渐渐远离的祖国告别：祖国，母亲，再见了！您的忠诚儿女为了捍卫您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尊严，将不惜赴汤蹈火。

他的双脚一离开了祖国的大地，便再也没回来……

尾　　声

丹东的金秋，热得有点出奇，气温比号称“火炉”的湖南长沙还高几度。步出车站，找到下榻之处，我迫不及待地背上照相机，去寻觅毛岸英当年在离开祖国前的最后几天的行踪。

我租了一辆“的士”，先去抗美援朝纪念馆筹备处，然后直奔丹东东北方向的元宝山。汽车盘旋而上，开到山顶极目四望：山下，是新兴的丹东城；鸭绿江大铁桥飞架南北，桥那边的新义州一片迷朦；右边，一溜青山像一条胳膊把丹东市区搂在怀里；那是锦江山——过去叫镇江山，为了与朝鲜友好，改名锦江山；再过去是老洼岭，老洼岭过去是帽盔山，山形如帽盔，这些山头海拔 100 米上下，不算高，丘陵而已，可是在战争中它却是大军的阵地、人民的靠山，非同寻常！当年毛岸英就站在这里远眺战火燃烧的朝鲜的……

司机很热心，送我去锦江山途中，车向右一拐，开到志愿军烈士陵园的路边，用手向上一指：“你去看看吧，有不少是新近移葬过来的。”他靠着车身抽烟。我则怀着沉痛的心情，步向台阶，在一座座平摆着的水泥墓前致哀。长条墓碑上，中间刻着烈士的姓名，右上方是生前所在部队番号，左下方是烈士的籍贯。然而，许多人没有番号也无籍贯。这是些可以找到姓名的烈士，还有更多的无名烈

士，世人永远不知其名……我后悔没带一束鲜花，只好在心底念叨：烈士们安息吧！

看到这些墓碑，我想起了毛岸英，我急切地想赶到朝鲜平安南道的桧仓志愿军烈士陵园……

我此次直奔丹东的目的，想将我的沿着毛岸英的足迹走一遍的计划打个圆满的句号，然而……

司机将我拉上老洼岭。

老洼岭海拔100米，是个台形的山岭，如今正在大兴土木修建一座抗美援朝纪念馆，脚手架比比皆是，水泥浆溢满山坡，黄沙和卵石堆积路旁。我下车向施工者打听这里的地理位置，附近山河的名称，抗美援朝时十三兵团指挥部所在地……几乎没有一个人知道这段历史，对附近的地理位置也不熟悉。司机见我有些失望，便安慰道："上车吧，要看朝鲜，到鸭绿江桥头去！"离开老洼岭时，司机摇头说："嘿，花5千万人民币，盖这些房子有什么意思？还不如办学校办工厂划得来！"

听了这话，我说不出心中是什么滋味：究竟司机说得对呢？还是盖一座规模庞大全国首屈一指的抗美援朝纪念馆好呢？对于死去的数十万烈士以及他们的仍然健在的战友、首长，以及我们的后代，当然有一座纪念馆是必要的。然而，年轻人讲的一无是处吗？在这"文化大革命"以后成长的一代，他们的价值观与毛泽东时代——即毛岸英生活的时代，以及像我们这些五六十年代参加工作的一代，差距是如此之大。那些为了这个国家而献出生命的烈士若是在九泉有知，会是一种什么心情呢？

还是换过话题吧！

"去朝鲜容易吗？"

"很简单！"司机瞥了我一眼，我也仔细打量了他一番，高高的

个儿，一撮小胡子，脸上没有奸诈，有的是憨直与疲乏，“我现在是替老板开小车，前些日子，我在车队，专门跑朝鲜。”

“干什么？”我好奇地问。

“援朝啊，每天开车去朝鲜，车上装的是玉米、白面、大米，往回拉废钢铁抵债。现在不抗美，还得援朝……”

“我去要办什么手续？”

“很简单，海关开通行证就行了，3 日游啦，4 日游啦……”我打断他说话：“那就赶快开到海关办手续。”

他苦笑了一下，眼巴巴地望着我：“老哥，你来晚啦，要在一个月前就好了。”

我真有些后悔，可也不甘心，朝鲜去不了，我就在鸭绿江边看看吧！看来，这个句号还很难画呢。

我单独租了一只游艇，为的是能靠到鸭绿江对岸。游艇先在铁桥下边游弋，我拍了一张又一张照片。我要老板把游艇靠近对岸。对岸跟这边一样，开辟了一座江畔公园，一些老人在晒太阳，年轻人在江边垂钓，儿童们嬉笑着玩风车。江边宁静幽雅，花团锦簇，一片和平景象。游艇离岸边仅 20 来米，就这样沿岸行走了大约半小时，我拍了两卷照片，真是满载而归。

登岸后，我爬上了大铁桥的桥头堡。

眼前一片鲜花铺地。左边是战后新修的铁桥，以鸭绿江心为国界，我方的桥梁宽大、结实，铁道上边有交叉支架，桥上不时有火车、汽车来往。我站在废桥这边，也是同样的结构，铁桥延伸到江心，突然断了，江心那边仅剩下几个光杆桥墩，泾渭分明。

我在桥头堡上拍了一张又一张照片，也请一位年轻人替我拍了一张以资留念的全身照。他惊奇地说：“你是那边过来的吧？看你对朝鲜很有感情啊！”我笑笑，说：“是有感情！我们为那三千里江

山流过血，死了很多的人……”我哽咽了。我盯视着鸭绿江在夕照下泛红的水花，眼前出现的像是一条流淌着鲜血的大江。

我坐在石墩上，只见血色黄昏中的新义州一片红光。红光中，我仿佛看到毛岸英在火海中挣扎，大火烧着了他的衣服，他的皮肉吱吱发响，疼到他的骨头，他窒息了……

我痛苦地凝视着对岸。

我禁不住热泪盈眶。

回头瞻望，太阳已快坠入山肚，西天是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我突然好像跳进痛苦的深渊，思绪牵着我不得不跟着岸英去历经烈火的磨难与痛苦……

我要奋笔写完这部书，该写的都写上去，既为了死去的，也为活着的人，我不应吝啬自己的笔墨……

彭总率志愿军到了朝鲜以后，跟朝鲜人民军并肩战斗，以排山倒海之势，压向敌人，打得麦克阿瑟和李承晚蒙头转向。11月8日早晨，岸英收听到了广播电台的新闻：

朝鲜人民军司令部发表公报：

共和国军最近在朝鲜西北部的作战中取得了重大胜利。在此次作战时期，有中国人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志愿部队，在人民军总司令部统一指挥之下，和人民军一道参加了作战。在中国人民志愿部队的参加之下，人民军在温井、云山一带击溃了李承晚第二军团四个师及美军一部，迫使该方面美国侵略军及李承晚军逃到清川江以南……我人民军与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从10月25日开始反击……

毛岸英和战友们欣喜若狂，欢呼初战告捷。入朝后毛岸英主要

担任金日成、彭德怀和苏联军事顾问团的翻译，然而因为他懂英语还要和被俘的美国兵打交道，所以不分日夜地忙碌着。

11 月 24 日下午，四架美军飞机在志愿军司令部的上空盘旋侦察，这说明，敌人要对我们进行空袭。

11 月 25 日晨，三架美军 B—29 型轰炸机向司令部上空飞来。这天是第二战役的第一天，事情千头万绪。在敌机从上空飞过，防空警报解除之后，毛岸英披着大衣，同参谋高瑞欣一起到司令部作战室的木板房取东西。突然，狡猾的敌机又掉过头来，折回司令部上空并扔下大批凝固汽油弹。爆炸的气浪吞没了作战室，大火包围了岸英和高参谋……他们把青春和热血洒在了朝鲜的土地上。从一只烧剩的表壳上，人们分辨出了岸英的忠骨。这只表还是他出国入朝前夕岳母送他的纪念物。在清理他的遗物时，只发现一只很小的帆布包，里面有几件换洗衣服和日用品、一把小剪刀，还有科学家小传《达尔文》等一批他珍爱的书籍。

当时，他和高瑞欣烈士一起安葬在大榆洞的山头上。朝鲜停战以后，他们的忠骨被迁葬到桧仓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里。烈士墓前的大理石墓碑上，镌刻着郭沫若题的“毛岸英同志之墓”七个大字，墓碑的背面是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刻下的一段碑文：

> 毛岸英同志原籍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是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的长子，一九五〇年他坚决请求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于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英勇牺牲。
>
> 毛岸英同志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将永远教育和鼓舞着青年一代。
>
> 毛岸英烈士永垂不朽！

本书写到这里，应该说写完了。不过，我还想交待一下烈士身后的事情。

据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回忆：

毛岸英牺牲后，彭德怀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发来了电报。

机要主任叶子龙拿到电报后，忙同周恩来、江青研究一番，没有马上告诉毛泽东。后来，毛泽东办完公，到万寿路新六所一号楼休息时，叶子龙和江青才把消息报告了毛泽东。

当时，毛泽东正坐在沙发里。听到消息，先是一怔，盯着叶子龙和江青一声不响。

江青和叶子龙不敢说第二遍，也不好说什么劝慰的话，不约而同垂下了头。

于是，毛泽东眨了一下眼，目光开始缓缓移动，望着茶几上的烟盒。

他去拿烟，两次都没将烟从烟盒里抽出来。我忙帮他抽出一支烟，再帮他点燃。

屋里静了很长时间，谁也没说一句话。能够听到的只有毛泽东从牙缝咝咝往里吸烟的声响。陕北农民吸烟都喜欢发出这种咝咝声。

大概烟雾熏了毛泽东的眼睛，大概他想起了儿子许许多多的往事，我见到毛泽东眼圈陡然一红，湿润了。

叶子龙一声不响地退了出去。

又沉默了很久，毛泽东吸完第二支烟，把烟头熄灭在烟灰缸里，用略带沙哑的声音，发出催人泪下的一声叹息："唉，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呢……"

毛泽东没有掉泪，又点燃一支烟，开始听江青汇报儿子牺牲的经过……

毛泽东最后只交待一句："这个不要急着告诉思齐了。"

据说，在安葬岸英烈士时，曾请示毛泽东，问是否迁回祖国，毛泽东回电用了两句古诗：青山到处埋忠骨，何需马革裹尸还。

关于毛岸英葬在朝鲜的详情，最近公布了一份彭德怀的报告，时间是1954年12月，此时彭德怀已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主持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现将报告抄录如下：

总理：

昨二十四日赖传珠同志拟一封电稿，将毛岸英同志尸骨运回北京，我意理在朝北，以志司或志愿军司令员名义刊碑，说明其自愿参军和牺牲经过，不愧为毛泽东的儿子，与其同时牺牲的另一参谋高瑞欣合埋一处，以此对朝鲜人民教育意义甚好，其他死难烈士家属亦无异议，原电稿已送你处，上述意见未写上。特补告，妥否请考虑。

敬礼

彭德怀

周恩来收到彭德怀的信后，当即在信上批复：同意彭的意见。请少奇、小平圈阅。

1959年，毛泽东派刘思齐去朝鲜平安南道的桧仓志愿军烈士陵园为毛岸英扫墓、祭奠。为了不给国家增添负担，毛泽东不要国家补贴一分钱，思齐等人沿途的路费和开销都用他自己的稿费支付。毛泽东说："我能负担，就不要麻烦组织了。"

毛岸英的不幸牺牲，犹如五雷劈顶，沉重地震撼了年已57岁

的毛泽东的心灵。他是一位领袖，但他仍是一个有血有肉、感情极丰富的伟人，人所具备的一切，他都有。只是，常年的战争生涯，使他比常人更坚强，更有理智。虽然这么说，但当彭德怀于1951年春节在中南海向毛泽东汇报朝鲜战况时，彭德怀内疚地谈起没有照顾好岸英。毛泽东久久地沉默着，一支支抽着烟，抬眼凝视着窗外那已经萧杀落叶的柳枝，轻轻地念叨着北周庾信的"枯树赋"：

昔年种柳，依依汉南；

今看摇落，凄怆江潭；

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他长长地叹口气，深深地回忆了岸英短暂的一生，说："岸英是1922年10月24日（阴历九月初五寅时）出生在长沙，他生下不久后就跟我们一起去过上海、韶山、广州、武汉等地，后来跟开慧同志一起坐牢，又带着两个弟弟一起在上海街头流浪——他的一生经历了不少艰难困苦。"稍停片刻，他扳着指头算了一下说："岸英牺牲的时候，还不满28岁。"俄顷，他昂起头，轻轻走了两步，激昂地说："革命战争，总是付出代价的。岸英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一位普通战士，为了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了年轻而宝贵的生命，作为无产阶级战士、共产党员，他尽到了自己的责任。不能因为他是我的儿子，就不能为中朝两国人民的共同事业而牺牲，世上没有这样的道理呀！哪个战士的血肉之躯不是父母所生！"

彭德怀默默地听着，心情十分沉痛，他深知，岸英的牺牲，对党，尤其是对毛泽东，是一个无法挽回的重大损失。

毛泽东强忍着内心的悲痛，把全身心倾注在党国大事上。然而对于儿媳刘思齐每周必到的拜晤，简直是一场感情上的灾难。思齐每次来，都要打问收到岸英的信啥？前线战况如何？岸英为何几个

月不给我来信？……爸爸总是强颜欢笑，装得若无其事地宽慰她，开导她。时间一个月又一个月、一年半载地过去了，爸爸不能总扮演这世上最难演的角色。终于在两年后，向思齐诉说起一家为革命牺牲的烈士：杨开慧、毛泽民、毛泽覃、毛泽健、毛楚雄、还有韶山党支部的毛福轩……思齐越听越不对劲，朝鲜停战协定都签字了，为何岸英没寄片言只字？而爸爸又迂回曲折地谈起毛家牺牲的烈士，难道岸英他……她不敢想下去，倒反而安慰起年迈的爸爸来。她离开了中南海，心里如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

又一次去中南海，毛泽东和李敏一起跟思齐谈心。他委婉地告诉思齐，成千上万的志愿军战士，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已经牺牲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人们是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岸英也是其中之一，岸英不在了！"当这句话从他口中传到思齐的耳内，好似一根钢针扎向她的心田。她痛不欲生，伏在毛泽东肩头上哭呀、哭呀、毛泽东木然地坐着，脸色苍白，心潮翻滚，李敏过来让思齐微微地躺在沙发上，当她的手碰到毛泽东的大手时，心里一惊，对思齐耳语道："思齐，你要节哀，爸爸的手都冰凉啦！"思齐一愣，重又哭着去安慰爸爸……这是多么悲壮、多么揪心、多么痛苦的人生一幕啊！他把痛苦埋在心底，还要安慰思齐，关心思齐。

1978 年 12 月，刘松林（思齐）向我展现了毛泽东给她的许多封亲笔信。

亲爱的大女儿：

信已看过，很高兴。

谣言不足信，可以置之不理，因为不胜其理。你的心要清闲些，把身子养好要紧。

为了努力学点技术，刘思齐经组织上批准，赴苏留学，毛泽东也同意她换换环境。思齐在病中给爸爸去了一信，毛泽东马上回她

一信。

思齐儿：

信收到。患重感冒，好生休养，恢复体力，以利出国，如今日好些，望来此一看，否则不要来。最要紧是争一口气，学成为国效力。

祝好！

父字

一九五五年八月六日

你要的列宁选集两卷，给你送上。

刘思齐赴苏留学后，也常给爸爸去信，毛泽东化名“德胜”（战争期间毛泽东常用化名李德胜），给她以循循善诱。

亲爱的思齐儿：

给我的信均收到了，很高兴。希望你注意身体，不要生病，好好学习。我们都好，勿以为念。国内社会主义高涨，你那里有国内报纸否？应当找到报纸，看些国内消息，不要国内情况太隔绝了。

祝好！

德胜

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四日

同年的12月，毛泽东又去信给思齐。

思齐儿：

两信均收，甚慰。留一年，很有益。有人闲话，可以置之不理。岸青暂时不见电影，将来总可以见着的。这里一切如常，弟妹均尚勤学，我也好，不劳繁念。

祝好！

父书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二日

刘思齐有病，在国外学习理工科，感到吃力，暑假回国便给父亲写了一封信，要求转学国内。毛泽东接思齐信后，立即回复：

思齐儿：

信收到。回来了，很高兴。

转学事是好的，自己作主，向组织申请得允即可。如不得允，仍去苏联，改学文科，时间长点也不要紧，不论怎样，都要自己作主，不要用家长的名义去申请，注意为盼。

祝你进步

父字

八月四日（五七年）

几天后，毛泽东又给她写了一封信，帮助她克服犹豫不决的状态，促其回国转学。

思齐儿：

信收到。我在此间有事，又病，不要来。你应当遵照医生、党支部、大使馆的意见，下决心在国内转学文科。一切浮言讥笑，不要管它。全部精力，应当集中在转学后几年的功课上，学成为国服务。

此嘱

父字

八月九日

刘思齐回国后，江青派人把她出入中南海的特别通行证没收了。江青气势汹汹地说："刘思齐不是我们家的人！"自此，刘思齐不能经常去看望爸爸了，内心的痛苦难以言喻，而爸爸于1957年以后，已搬离中南海丰泽园，他看不到思齐，心里多么惦念啊！

思齐儿：

不知道你的情况如何，身体有更大的起色没有，挺为挂念。要立雄心壮志，注意政治理论。要争一口气，为死者，为父亲，为人民，也为那些轻视、仇视的人们争一口气。我好，只是念你。

祝你

平安

父字

一月十五日（五九年）

岸英牺牲10年了，刘思齐仍然孤单一人，毛泽东多次劝她找个合适的男朋友，早些结婚。他把思齐当作自己的亲生女儿看待。

女儿：你好！

那有忘记的道理？隔久了，疑心就生了，是不是？脑痛要注意，是学习太多的原因。

还有就是要结婚，你为什么老劝不听呢？下决心结婚吧，是时候了。五心不定输得干干净净。高不成低不就，是你们这一类女孩子的通病。是不是呢？信到回一信给我为盼！

问好

父字

六月十三日（六一年）

崖泉滴透石玲珑。毛泽东的几封信中，充满了伟大父亲的慈爱。在他的催促下，刘思齐于1962年初重建了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她爱人杨茂之是空军学院的教员。每当节假日，他们带着孩子来到毛泽东的身边时，他总是乐不可支，心里充满了无限温暖，享受着天伦之乐！孩子们叫喊爷爷的笑声，抚慰着他心灵的创伤，使他对李白诗句增添了新的感慨，他手书了四句给刘思齐：

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
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

我是十分尊重刘松林（思齐）的，她为我提供毛岸英的许多珍贵的资料，如毛岸英的日记本、信和遗物……她已离休。我希望本书的出版，不会勾起她的创痛，而能给她一点精神上的慰藉。

希望这本书能为读者喜欢；希望当今的和未来的青少年们，能从毛岸英短暂的一生中学到什么，领悟到什么……

毛岸英烈士永垂不朽！

毛岸英烈士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精神将永远教育和鼓励着青年的一代。

1992年10月24日开笔于南岳磨镜台405房
1993年春节脱稿于长沙难闲书斋
1993年7月24日修改于长沙
1993年8月20日校订于南岳磨镜台405房

附：毛岸英生平大事记

1922年10月24日（阴历九月初五寅时） 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市湘雅医院，住小吴门清水塘22号；当日正逢父亲毛泽东率领长沙泥木工人大罢工胜利之时。

1923年11月 随母亲杨开慧回到板仓。阴历十月初六弟弟岸青出生。

1924年5月底、6月初 随母亲、外婆和弟弟一起赴上海毛泽东处。

1925年2月 随父母、外婆、弟弟回到韶山上屋场。

10月 举家迁往广州。

1926年12月27日 举家迁回长沙。

1927年2月12日（阴历三月初三） 举家迁至武昌都府堤41号不久，二弟岸龙出生。

8月 党的"八·七"会议后，因父亲去湖南、江西等地组织秋收起义，只得随母亲、外婆、弟弟迁回长沙，改姓杨。

1929年春 入板仓杨公庙小学。

1930年10月24日 随母亲杨开慧一同被捕。在监狱里，杨开慧教他识字，给他讲父亲的故事，教育他要坚强，在敌人面前不要流泪，长大了要跟父亲一起为穷苦人办好事。

11月14日 母亲英勇就义，因悲痛过度，不吃不喝而病倒。

12月底 敌人制定了一个放长线钓大鱼的计划，妄图引毛泽东等上钩，被释放回板仓。至次年初，由舅妈李崇德带着往返于长沙、平江等地亲戚家避难，未躲西藏。

1931年春节前夕 经叔叔毛泽民安排，外婆和舅妈将三兄弟秘密送往上海，由地下党安排到大同幼稚园，化名杨永福。

4月 由于叛徒出卖，上海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大同幼稚园没有经济

来源而解散，被匆忙安置在法国天主教堂的一个牧师家里，党组织按月补贴生活费。后来党组织又遭到严重的破坏，关系断了，生活费无着落，自谋生路，出家流浪，住在破庙里，以捡烟蒂卖钱、卖报赚钱糊口，还经常到苏州桥推车，备受欺凌，岸青被特务打成脑震荡，岸龙失踪。

1936年6月 与弟弟岸青一起被党组织找到，由李杜将军（化名王元华）带往法国，并送往苏联学习。

1937年初 由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主要负责人康生从巴黎接到莫斯科，被送往莫斯科市郊的莫尼诺第二国际儿童院。

1939年元月 列宁诞辰纪念日，参加少先队任大队长，插进苏联十年制学校的六年级。

1940年元旦 周恩来在苏联治伤期间专程看望了两兄弟并合影留念。

4月12日 延安《新中华报》全文登载了他的《中国儿童在苏联》的长篇来信，并加编者按。

秋 第二国际儿童院和第一国际儿童院合并，随之迁往伊万诺沃城。

加入共青团，后任团支部书记、伊万诺沃市列宁区团区委委员。

1941年6月22日 德国法西斯武装侵犯苏联，参加了市内的保卫工作和民兵武装训练，并到20公里外的市郊垦荒种菜，伐木劈柴，缝制衣服，挖反坦克壕支援前线。

1942年5月 进入伊万诺沃苏雅军事学校学习。

1943年1月 进入列宁军政大学深造，中尉军衔。期间三次写信给苏联最高统帅斯大林，要求参加苏联的卫国战争。

在列宁军政大学学习期间，经韩铁生写信介绍被批准加入苏联共产党（布），为预备党员。

1944年夏 转为正式党员。毕业后被批准上前线，担任某坦克连指导员，在白俄罗斯及波兰、德国等国家参加反击战。晋升为上尉。

1945年初 从前线回到莫斯科，受到斯大林的接见，斯大林赠送他一支手枪以作纪念。随后，又进入莫斯科东方语言学院学习，在这所专门培养外交人员的学校里，集中精力研读了《资本论》。

1945年底 经中央和毛泽东的批准，随同两名苏联医生秘密回国。

1946年1月 回到祖国延安，见到了阔别19年的父亲。

2月 安排在中宣部工作，并转为中共党员，不久，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来到吴家枣园参加生产劳动。

半年后，因胡宗南部进攻延安，回中央宣传部。

1947年3月 敌人23万余人向延安进犯，19日，随中共中央主动撤离延安，后参加中央土改工作团，在山西临县郝家坡进行土地改革。白天劳动，晚上访贫问苦，深入调查，发动群众。

8月—10月 随同中央工作团来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列席全国土地会议，并在小组讨论中介绍了在郝家坡依靠群众进行土改的经验。

1947年11月—1948年5月 去山东渤海地区阳信县参加土改复查，总结了一套较完整的经验。对陈伯达、康生的一些极左作法有不同看法。周恩来在一次中央机关会议上指示：毛岸英同志在土改运动中一些意见是正确的，很有学问，他攻读了不少马列著作，有较高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

1948年7月—11月 回到西柏坡，在中共中央宣传部担任编辑助理，与曹葆华合译了恩格斯《法德农民问题》、《苏联国民经济领导研究提纲》等著作。

12月 调河北建屏中央机关保卫训练班学习。

1949年2月初 调社会部工作。

3月 调中情委担任李克农秘书兼任翻译，曾随代表团出访苏联。

8月17日 给舅父、外婆写信，追忆5年的上海流浪生活，真是“不堪回首”。

10月15日 与刘思齐结婚。

19日 给外婆、舅舅回信畅谈思念之情和回湘省亲计划，表示以后要学一门技术。

1950年5月下旬 受父亲委托回湘看望亲友，回板仓为母亲杨开慧扫墓，了解群众对土地改革的反映。

26日 回到韶山。

8月上旬 随李克农秘密访问苏联，见了一些老同学、老朋友。

秋 经再三要求，离开社会部，调任北京机器总厂党总支副书记，主管宣传工作。

10月8日 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随彭德怀飞抵沈阳。

13日　随彭德怀返回北京。

14日　告别亲人。

15日　随彭德怀返回沈阳。

18日　到安东。

19日　晚跨过鸭绿江，随志愿军司令部到朝鲜，担任司令部俄文翻译兼机要秘书。

11月25日上午　在由防空洞返作战室取地图时，因敌机轰炸而壮烈牺牲，时年28岁。先葬在大榆洞山头，朝鲜停战后迁至平安南道的桧仓志愿军烈士陵园。

谭逻松辑

金振林校